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典藏本

杨炳章 著

Benjamin Ya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伟 译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杨炳章 著

Benjamin Yang

郭 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杨炳章著；郭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ISBN 978-7-300-17637-6

I. ①从… II. ①杨… ②郭…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人物研究 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 IV. ①A755 ②K26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946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典藏本

杨炳章 著

郭伟 译

Cong Geming dao Zhengz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1 000

定 价 72.00 元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 问 冷 溶 逢先知 龚育之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忠杰 李君如 章百家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牛大勇	冯筱才	朱学勤	任剑涛
许纪霖	杜 蒲	李向前	杨奎松	宋新宁
沈志华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韩 钢	景跃进	程 农	

出版说明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颇富个性的诗人。鉴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鉴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之“现代性”和比较政治学的宏观视角上，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毛泽东研究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这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首先旨在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同时也期望为人们进一步审视和反思 20 世纪人类的“现代性”过程，提供一个侧面的资料支持。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合作的科研出版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诸位专家，为本译丛的持续和拓展做出了大量建设性的贡献。秉承学术研究的基础准则，我们注意精选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影响，持论公允、论说严谨的研究著述。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论证的学术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作者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专家，他们慷慨允诺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是促成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盛事的基础要素。国内各位权威专家慨然允诺担任译丛的顾问，是对我们译介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审读专家们对选题和译文所提出的多方面的修改意见，也是译丛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译丛翻译出版的专家、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敬意和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均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核校；凡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以及特定条件的局限所带来的问题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编委会

2013年8月

www.mzdbl.cn

中文版序

本书原英文版已有序言，这里只简单地针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十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希望一般读者翻阅后觉得有意思，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读者觉得有收益。

这本书名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写过一本《中共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曾热心帮助，而今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过世了。

该书扉页上写有：“敬献给我的父亲，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老共产党人。”其中具有某种严肃的理想主义意味，我不是为了靠它赚钱，也不是为了靠它求职。

既然书是献给父亲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码我自己心里这样要求。其内容是以 20 世纪 30 年代红军长征为题材讨论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共革命的关系。我脑子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内最高水平，一个是国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阅该书，对有些具体观点可能有质疑，我仍然觉得总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可以留得下的。现在已有该书中文版，且看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国外“汉学家”、“中国通”的争议不用说了——他们往往是粗枝大叶，隔靴搔痒——我更注意的还是同国内学者的商榷。随便

举一个例子，比如以往广泛称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实认识。第一次主要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的，或者两项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我认为沿着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关历史文献，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不免陷入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者”的立场和作用，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政策，进而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总体联系，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这种方式也许超出了我们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不过归根结底，总是一个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写一本书《毛泽东的武功与文采》，一次一次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胜就是胜，败就是败；一篇一篇分析毛泽东的书文和诗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也许是很意思的，很有意义的。政治上固然应该守边，但这种研究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采用的。

本书有没有重大错误？有！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显然是低估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变化趋势，我的判断显然也是不对的。

当时中苏两国都在谈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我曾觉得苏联行，中国不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了。我必须承认，我也乐于承认：我错了，苏联不行，中国行。记得1986年在北京大学见到国政系主任赵宝煦先生，他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欣赏，

6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对苏联形势表示乐观。

看来我犯错误，还是无独有偶呢！我相信赵老师同我一样，也乐于承认这一错误的。国家好就好，个人对错何妨？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这需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我的同事萧延中教授和郭伟女士。

杨炳章

2005 年 12 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鸣谢

我个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被囚禁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在那里，被囚禁者只准阅读毛泽东的书，不准读其他任何读物，甚至连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官方的《人民日报》也不允许看。为了在两餐之间“杀时间”，我反复咀嚼《毛泽东选集》（四卷）不下五六遍。不言而喻，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政治。

1973—1974年，在山东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期间，我曾费心写过一本大部头的书，取名为《政治与中国政治》。这本书主要是批评当时那种野马无羁的激进的革命路线，其中专门一章是写中共党史的。我把厚厚的十章手稿通过邮局寄给了毛主席，还附了一封长信。当然，我没有得到什么答复。现在我有时还猜想，这部书稿说不定还保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某个地方呢！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罗斯·特里尔把我介绍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当时正准备去中国重走当年的长征路。与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相识最终促使我打算研究长征这一课题，虽然在研究方法上与索尔兹伯里有不同之处。在我最近回国探亲期间，我走访了一些学者、官员、老师、学生和朋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中共党员。我要感谢他们，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胡华教授。他们不仅为我所研究的具体历史问题提供了帮助，最重要的还是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总

2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体印象：共产党人的确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而这场变革同本书所要详细阐明的中心论题大体是一致的。

我多年来得到哈佛大学本杰明·I·史华慈教授的亲切关怀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精心指导。只在此说一句“谢谢”，是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二人深厚的感激之情的。我想，他们对我一个外国学生的全部希望无非是我本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这里我倒想许下诺言：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使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失望。

费正清先生的著述是我查阅此前西方出版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便利向导。山田正雄教授的作品以及和我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使我注意到许多有关的日文文书。在写作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把部分手稿提交给帕克斯·科布尔、凯瑟琳·哈特福德、米歇尔·奥森伯格、安东尼·塞奇、约翰·史莱克和弗雷德里克·威克曼等人审阅，并从他（她）们那里得到了热情的鼓励或中肯的建议。尽管如此，我个人的疏忽和固执使我不能不对书中可能存在的瑕疵负全部责任。

对下面各章和注释中所提到的所有作者我都要深表感谢，他们提供的见解和信息使我很受启发，尽管我所表达的有些意见也许与他们不尽相同。我充分认识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政治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因而不想看到自己去随便挑剔别人。如果我在这一学术研究中偶然犯下这种罪过，那么我只能引用孔夫子的话为自己聊作申诉：“当仁不让。”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在人性原则上是不能妥协的。我抱着同样的态度，也期待读者能对本书提出任何合理的批评。

杨炳章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敬献给我的父亲，
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
老共产党人。

目 录

作者鸣谢	1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二章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14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44
第四章 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72
第五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102
第六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31
第七章 落脚陕北	161
第八章 红军大会师	191
第九章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220
第十章 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251
附录一 长征大事记	268
附录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 萧军	278
参考文献	289
注释	297
索引	345
译后记	372

第一章

引言

真不知道曾经有多少著名学者和杰出政客试图对当今世界本质或时代特征下过定义！他们给当代世界贴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标签，诸如什么“精神危机时代”，什么“社会重建时代”，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什么“天下大乱时代”，如此等等。我个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基本特征仍然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尽管这两个词似乎已经显得有些陈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几乎一切重大问题无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此种对抗有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两个方面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一个占地球面积十五分之一和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而拥有的党员人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的一半以上。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她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她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论战并毅然决然与之分道扬镳；现在，她又在倡导实施“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这种令世人瞩目的务实政策。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进行革新的代表和象征。

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是最合适的方法之一，而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即长征时期则显得更加有趣。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

* 当我 1986 年初为本书写此注释的时候，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刚刚被赶下台，阿基诺夫人正面临着如何解决美国空军基地和共产党游击队的问题；韩国各反对党正在发动反对全斗焕军事政权的抗议活动，全则利用来自共产党的朝鲜方面的威胁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里根总统正在使其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所采取的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行动逐步升级，而美国政府对是否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正犹豫不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正在一本正经地实施公开性政策，并且呼吁削减乃至销毁核武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一连串的事件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是何关系，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能力足以摧毁全地球，毁灭全人类；相反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把现有生产能力和人物资源全部用于发展经济建设的和平事业，那么，不妨借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将在五年之内翻上一番。从这种物质意义上来看，我们的确正进入一个绝无前例的人类历史时代。

化：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艰难跋涉两万余里，从华南转战到了华北；共产党本身的地位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关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中共历史的转折点。即使在五十多年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对此，我曾专门查证并撰文分析过）^[1]，甚至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正如同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经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虽然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曾引起过不少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景仰和赞美（其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最新的，而且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也是最为可靠的），但是在西方，严肃认真研究长征的学术著作仍不多见。而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局限于具体人事的论述而缺乏一般性理论分析。^[2]

定 义

1934年末至1935年初，还在行军途中时，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尚未被命名为长征。当时共产党人称之为“西征”，因为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正在向西部的省份进军。^[3]在敌对的国民党军队看来，红军的西进只配称之为“西窜”而已。^[4]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二万里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蒋介石一次讲话当中，用来指他的国军对共产党人的追剿。薛岳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他曾率领国民党第二路军追击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从江西沿路追击，一直把中央红军追赶到四川。据薛岳讲，当他完成追剿任务后，蒋介石曾发表讲话予以赞扬。蒋说：“通观古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这个纪录，而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第二

路军的将士们。”就共产党方面来说，只是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结束其长征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使用长征一词。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5]这些话不仅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使用长征一词，而且显然也表明毛泽东把他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看成是长征的结束，尽管当他在1935年底讲这番话时，另外两大主力红军还在为完成他们各自的长征而辛苦挣扎。

要么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要么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长征不久便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有关人员的一种名誉和资历的象征——后来在官方的表述中，长征的持续时间延长到1936年10月，以便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也包括进去。³而长征的起始时间则仍然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的日期。因此，在正式的中央出版物中，长征的期限现在被确定为从1934年10月始，到1936年10月止。^[6]

然而，这里便有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如果说长征不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且也指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那么红军的长征就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而长征的起始时间——若把长征看成一个综合历史时期的话——也就必须由此加以更正才对。事实上，早在1932年秋季，由于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就已撤离各自的根据地，开始远征行动。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应作为长征真正开始的时间。^[7]

关于长征结束的时间也应该有所争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部队在甘肃东部会师，但这未必就意味着长征的结束，因为与此同时，还有2万人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二，占全部红军的将近一半——正在跨越黄河，“西征”新疆。历尽千辛

万苦之后，这支西路军于 1937 年初在甘肃遭到灭顶之灾。除非是以成功为其先决条件，否则在此之前长征不应被视为已经结束。基于上述理由，在我的这项研究中，长征被定义为一个跨越 1932 年末以至 1937 年初、长达 4 年之久的历史运动。

若抛开具体日期和事件，长征则可以从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予以定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从华南到华北的一次整体性大转移。长征不仅仅是指某个共产党组织在短期内的某个孤立事件，而是指与共产党的全部主要军事力量有关的、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虽然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无疑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从撤离江西到抵达陕北期间所表演的，但是为期更早的其他红军部队从其南方根据地的撤离也应作为必不可少的序幕，而西路军的命运则应看作是这一综合历史事件的尾声。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长征一词一般将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即包括从 1932 年秋季到 1937 年春季，由几支不同的红军部队所进行的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若干“长征”。

论 题

- 4 不论以前是否明确提出过，在以往描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尤其是中共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和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导致共产党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和毛泽东的党的领袖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确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维埃运动能够逐步兴起，然后又走向低潮，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能够先落而后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虽然查尔莫斯·约翰逊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他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开拓性著作中，也曾试图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中国共产党胜败得失的原

因。约翰逊写道：

……换句话说，从 1921 年到 1937 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失败了，因为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对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主张漠不关心。而在 1937 年之后，它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发出一种令全体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政治呼吁。尽管持有各种虚伪掩饰，共产党大致满足了人民的民族主义要求，在组织对侵略者的抵抗和结束农村战乱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8]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金日平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他所写的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的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金日平断言：“江西苏区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创建和实施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方面，在发动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他们“在 1934 年撤离江西苏区则主要是由于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并不是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9]。

在约翰逊的论点中存在着事实和逻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从 1921 年到 1937 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时期，因为在 1921—1926 年、1928—1933 年和 1936—1937 年这三个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几度高涨，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共产党的力量在总体上明显增强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 1937—1949 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把 1946—1949 年的解放战争简单地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延续，也不是像约翰逊所说的，“共产党因领导抗日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群众支持在后来征服了全中国”那样简单——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作详细阐述。^[10]最后，在战争时期（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群众支持（这个词本身就含义不甚明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量性的因素。只有当它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综合力量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因素，

因此，与其把它当成一种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照此推理，便会得出这样一种更可质疑的看法：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与战败的共产党相比，得胜的国民党想必是得到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倒不如把它放在中共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的综合力量上予以权衡。

共产党人在 1934 年离开江西苏区显然是他们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这方面金日平当然没有错误。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江西苏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军事上则相反。这的确也是中共领导人在 1935 年初所持的观点，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共产党的群众动员、社会组织、行政管理、思想宣传和瓦解敌军等政策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进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对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方面金日平没有涉及，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说明。

本杰明·史华慈对中共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所做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他在研究中曾试图概括毛泽东领导中共走向成功的基本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的形势下，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共产党的自治政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 1928 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被史华慈看成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战略的主要特征。^[11]史华慈认为，虽然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其基本战略几乎没有改变。他把这一概括与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总结说：“我认为，这些就是该战略的主要内容。这一战略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相结合，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成功。”^[12]

然而，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坚信，毛泽东与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从江西苏区到抗战爆发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Shanti Swarup 把中共在江西苏区的失败说成是由它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过高造成的，而把中共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成功归因于社会改革与民族革命相结合。^[13]同样，Tetsuya Kataoka 认为共产党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以来的巨大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以往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以后实行城市与农村并重路线的结果。^[14]

虽然有必要给毛泽东的总体战略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但是我还是同意史华慈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至少应当承认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有很大变化。在瑞金时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而到延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支配全党全军的核心人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后来也就成了全党的战略。由此可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期间必然是有所变化的。其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和后期，毛泽东本人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后期提“人民政府”的口号；前期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后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些变化非常重大，足以被认为是战略性的改变。而其中没有变化的——我猜想这也该是史华慈的基本观点——只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我把它称作政治现实主义，以便与以前党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革命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史华慈也注意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长征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变化对共产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也就是说，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同历史人物的意志互相吻合。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世纪以前由张之洞及其同僚针对中国国内的变革而提出的那个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就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言，看来好像是“共产主义革命为体，中国政治为用”。但是，正如前者的儒家口号产生于西方列

* 有许多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一问题，参见 Kataoka 书 309~311 页；Swarup 书 73~75、101~104、259~266 页；Trygve Lotveit, *Chinese Communism, 1931—1934* (Land, 1975), pp. 210 ~ 211; William Wei, *The Counterrevolution* (Ann Arbor, 1985) 结论部分。

Kataoka 指出，共产主义革命若不顾及政治环境是不能无限扩展的，他把中共比喻为鱼，把中国的老百姓比喻为水，并由此而把长征描述为鱼在无水的情况下“游动”的时期；Shanti Swarup 指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李立三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后来王明和博古的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Lotveit 提到，毛泽东注重现实的稳健路线与以往领导人过分热心于革命的激进路线形成了鲜明对照；魏说，经历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像柔韧的毛竹子那样去随风而动，变化姿态。

* 对晚清时期有关“体用”问题的争论所做的颇有见地的研究,请参见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 (Berkeley, 1968), vol. 1, pp. 59~77.

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后来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西学转变为“体”,中学反变为“用”一样,共产党人的口号也是来自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中共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证明了相反的观点——政治变成了“体”,革命变成了“用”。*

7 我现在的研究想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共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从革命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或者说(如果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这一转变与长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权同步发生,而且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不少历史学家曾把江西时期与延安时期进行比较,以发现共产党内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性质的。然而连结这两个时期的长征就是这种变化的本身!当然,长征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而在当时,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曾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时期——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努力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恢复他们“正常的”革命活动,而国民党人则一直以消灭共产党人并恢复他们“正常的”政治统治为目标。不过,正常与非正常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许多反常,比如军阀战争,倒成为正常。总之,长征依其本身的地位和性质而言,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或许更为合适。

资 料

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20世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的著作问世。鉴于这种情况,费正清提出如下结论:“在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以前,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这一主题。”^[15]然而一般

说来，这些研究起码在历史事实准确性方面都存在着若干缺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靠下面两种有限的资料：一是由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围剿过程中所获得的中共文献；二是移居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

应当承认，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党人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所以，可能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的只不过是那些在苏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广泛散发的一些书面材料，诸如报纸、杂志、通知以及告示之类。这类文献对于从社会的或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也许足以够用，但是要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决策与权力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这正是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所注重的），则需要更加具体、更加确实的资料。例如，德里克·沃尔勒对分别于 1931 年和 1934 年召开的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做过精心的研究，但对中央苏区政治局赣南会议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却根本没有提及。^[16]

以回忆录的形式提供的资料更是残缺不全。这类材料都是依靠一些老年人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回忆，而且受到他们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例如，龚楚在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中声称，在 1934 年 5 月至 7 月，他曾担任红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对 1934 年 4 月至 5 月广昌之战前后军事形势的叙述也许是可靠的。然而事实上，龚在红军中从未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他的虚假声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不论作何种解释，都不能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17] 8

至于长征时期，相关的文献资料更加贫乏，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为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没有定期刊物——像江西苏维埃时期的《红星》、《红色中华》和《斗争》——能够出版发行。同样，作为军事远征的一支部队，长征者们比以往更加警惕并能够有效地销毁他们的文件，因此落到国民党手里的材料并不多。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对这些根本不关心因而也就未能完好地保存这些文件。他们并没有认为将来会用得着这些历史资料，所以他们把许多材料当成了废纸，没有妥善加以保存。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出版了大量讲述长征故事的革命回忆录，比如在故事丛书《红旗飘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登载的那些回忆性文章。绝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章（若不能说是全部的话）是以长征时期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红军士兵的名义发表的，而且都是为着同一种目的，即歌颂“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这些材料一般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对于某些新闻作家来说也许会很有用，而对历史研究来说，它们至少是引导作用和误导作用兼而有之。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长征期间召开的方面军一级或更高级别的党和军队的十几次会议中，只有第一、第二次为西方历史学家所知晓，而这些作者所能向读者提供的，只不过是模糊地描述一下遵义会议（并且漏洞百出），随便地提及一下毛儿盖会议（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地方召开的会议，而对真正的毛儿盖会议或沙窝会议则全然一无所知）。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台掌权一事，John Rue 如是写道：

1935年1月初，他们抵达贵州省北部的小城遵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对现行路线的军事首领们的支持下，坚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召开了，毛泽东代替周恩来被选为军委主席。周本人虽勉强留在军委，但已没有太大的地位和权力。叶剑英和保安局长邓发也被迫退出军委。新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没有再任命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接替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朱德继续任总司令，王稼祥出任政治委员。^[18]

9 在同时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致相同的描述。^[19]

但是实际上，这里所讲的整个故事带有太多的主观感情色彩，不能用作理解党内权力关系的证据。仅在这一小段表述中，就几乎有十几处事实上的错误。根据这种表述得出的任何一般性结论都不能指

望会更加准确。’

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文献材料而出现的与事实不符，而是更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问题。日本的一位学者德田教之（Noriyuki Tokuda），在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一书中所持有的态度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该书没有多少事实上的新发现，而且还使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物理学术语——如“内聚力”、“权力的积聚”、“超凡领导能力的启动”等用语在书中频繁出现——但是，德田把毛泽东的上台掌权理解成一个渐进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描述虽然少一些戏剧性，但是其可信度则相对较高。^[20]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一开始，他们的研究便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一种政治声明和历史参考的混合物。1945 年 4 月，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直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严格遵循这个决议的精神行事，并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在党外，证明共产党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艰苦而又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曲折而又成功的斗争。虽然党史上的许多情节——比如李立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与分裂——也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中，却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含混和抽象的语言。

毛泽东逝世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政治大气候变得更加宽松，也由于多数当事人已经作古，这段历史逐渐得到较为客观的细心研究。大量的文件、回忆录乃至于分析性的文章已公开向国内外的读者发表。1984 年夏天和 1986 年夏天，我两次回中国访问。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上千份关于中共党史的原始材料，其中绝大多数还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晓。在我的这项研究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二百份。（我这里使用“原始材料”一词，意指中共党政军的公开声明、内部指示和通信、报章杂志和小册子、

* 遵义不是一个小城镇，而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召开遵义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与军团领导人无关；毛泽东没有接替周恩来的军委主席一职，实际上，自 20 年代末以后，周恩来也没有在党中央担任这一职务；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得到了正式确认而不是被取消；叶剑英并未在此时被撤职，而且叶在当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邓发的保安局长一职也未变换；刘伯承早在长征开始以前就担任了总参谋长；王稼祥从未担任过红军政治委员，他在遵义会议上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我在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文献都包括在正式出版物中或被它们所引用，其中有一些只限中国国内发行，另有少数文献是从原始档案上抄录下来的。

军事电报、会议决议和记录、个人日记等等一切当时人事记载。) 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来介绍并澄清有关长征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组新材料，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有关历史事件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往事的回忆录。仅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与身在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的情况大同小异，它们都因记忆不清和门户之见而不足全信。但是，由于现在不止一个人谈及同一问题，从而进行反复核对已成为可能。为准确地给某些历史事件定位，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两次或更多次反复核对。凡不可能进行核对的，在使用某一证据时将有所保留。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出版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二手材料。虽然这些著作中有许多还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但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著作的学术性显然是强多了。比较一下最近在中国出版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和国外出版的同类著作不难发现，前者从总体上讲远比后者更精确，内容更丰富。原因很明显：第一，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大部分是集体组织撰写的；第二，一些官方历史学家有机会接近更多的档案材料；第三，必须承认，中共党史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家有事自家知嘛！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长征期间的有关史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目的是对长征作一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以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中共党内权力关系的战略走向。在关注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变化时，该书的前九章仍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和区分革命与政治这两个词汇——前者表示国家或社会现状发生剧变的方式，后者则表示行使国家权力的艺术和科学。最后一章企图在更加宽泛、更少传统的意义上论述革命与政治的区别，希望不仅能够阐明中共党史上一些有关论题，而且能够加深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学说和政治运动的总体性认识。现在迫切需要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判断和理论分析，但是

11 我清楚地知道，研究中共历史也许会像其他一些学术课题一样，因为过于错综复杂而难以完美地实现以上任何一项目标。即便认识到

这一点，也并不等于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会发生任何事实或者分析上的差错，但若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则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只会更大。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慈教授几十年以前对于中共问题研究所采取的“虔诚的无知主义”立场，至今仍然值得赞赏。^[21]

第二章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12

简单地回顾一下长征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南方进行的苏维埃运动的情况看来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长征的一些基本背景知识，因为长征毕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代表着苏维埃革命的低潮，而另一种意义上当然也可以说是标志着苏维埃革命的高峰。其次，这种回顾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本书作者自以为是的新鲜视角，对前一时期的若干突出事件本身进行一番与众不同的观察评议。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以往认识角度的不同之处。起码鉴于中国内地最近公布的许多崭新的档案文献材料，我本人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早期的革命活动的许多论题其实也都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虑。

国共合作的结束

就党际关系而言，1923—1927 年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时期。从全国形势看，国共合作的后两年是两党携手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战争或称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1927 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共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其实这个过程从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过的一种政治规则上更容易获得解释：共同的强大的敌人的压力使得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共同敌人的消

失和联合行动的完成则意味着新的政治分裂，新欢旧恨的各种具体理由倒是次要的，也是现成的。*

直至今今天，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大都把北伐说成是极大的成功。他们还说，若没有共产党人从中捣乱，北伐会取得更大的胜利。^[1]然而，中共历史学家则把北伐看成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而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2]虽然对这一课题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从总体上对它稍加审视还是有必要的。

看起来，国民党在北伐中赢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1926年7月开始北伐时，国民党只有几个军，不足10万人的武装力量，它所控制的地盘也不过是以广州为中心很小的一块根据地。1927年初，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扩大为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有约10万人，而华南各省大部分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到1928年下半年，中国各大军阀势力不是被打败，就是主动易帜，归顺国民党的统治。南京政府确立了它对全国的合法统治，其军事力量猛增到80个军，200多万人。^[3]

但是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同以上国民党官方立场有所不同的是，虽然北伐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不应忘记，共产党人为北伐取得成功所做出的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除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给北伐军带来了高昂的士气之外，他们还在北伐中发挥了各种具体的影响。比如广东、江西、湖南三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势如破竹，为北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和取之不尽的物质供应；工人的武装起义使得夺取南昌、上海这些大城市看上去更像是政治示威而非军事行动。而这些农民运动和工人起义主要是靠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

此外，国家政权的迅速建立仅仅证明是一种表面上的成功，而且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国民党刚刚宣布全国统一，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通过招安各地军阀，国民党在1928年顺利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但是各军阀所控制的地盘却都原封不

13

* 这一观察可以适用于近代以前中国许多新王朝的形成。比如汉、晋、唐、宋、明、清几个朝代。

** Harold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1951, p. 111. 我不认为大革命和北伐时期只是“悲剧”而已。提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艾萨克斯写道：“人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使得国民党军队除接管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地盘之外，再无他事可做。赶在主力部队之前出发的政工队伍，每到一处就能立刻将当地的革命势力鼓动起来。”

动。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军队和长江流域的五六个省份处于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其他的军队和地区仍然由各军事派系控制，其中主要属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四大军事派别。随之而来，在 1928—1930 年期间，蒋介石不得不接二连三地进行军阀内战。*

在社会政策上，国民党由注重发动基层工农群众革命转向与上层地主资产阶级精英的合作，以使国家的政治管理走向正轨。这一转变对于国民党而言也许不无道理，但却使它脱离了人民大众；尤其在广大农村，蒋介石政府从未成功地在县级以下建立起任何正式的行政机构，也没有能进行任何像孙中山先生所期望的重大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4]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工农大众的革命代言人，并以此为14 基础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向国民党政权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中共历史学家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看成是一场失败也不无道理。他们也有着足够的证据。从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开始清党运动，到同年 12 月镇压广州起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脱党或死在蒋介石的屠杀之下。由共产党所扶植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曾一度拥有几百万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捣毁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预料，使得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茫然不知所措，从而共产党自己的表现行为本身便成为其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明。^[5]

但是若把我们的视线放得稍微长远一些，就不难看出，从 1923 年到 1928 年这一阶段对共产党人来说并不能一概以失败论之。共

*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内部各军事集团的状况，李守孔列了一个表格（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93～494 页），现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 2.1 20 年代末国民党内的军事派别			
派别	首领	地盘	兵力
中央军	蒋介石	6 个省	60 万人
桂系	李宗仁	4 个省	30 万人
西北军	冯玉祥	6 个省	42 万人
晋系	阎锡山	4 个省	30 万人
东北军	张学良	4 个省	23 万人

产党的力量 and 影响在逐年增长着，而军阀割据作为传统的帝国专制向现代的共和政府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到 1927 年已经宣告结束。仅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进步，而不宜用“失败的悲剧”一言以蔽之。^[6]

即便是把国共合作的破裂仅仅看成是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总的上升趋势中的一个暂时的回落，也无法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开脱责任。陈独秀已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1927 年 7 月国民党的左翼武汉政府开始后不久，他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后来他更加公开地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训令。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拒绝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公开声明，严厉抨击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粗暴的官僚主义和中共在国内采取武装暴动的轻率政策。^[7]陈独秀的这些言行，若从私人的或道义的角度来看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不过从政治上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照此而论，陈独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本来不该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该做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总而言之，1927 年以后陈独秀辞去了中央领导职务，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这可以理解为中共在当时的主要成就——正是经过共产党抛弃陈独秀或者说陈独秀抛弃共产党而得以实现的。

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建设

国共联盟的“盖子”一旦被揭开，共产党人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当中所产生的组织上、思想上的影响力也就自然爆发出来，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对抗。1927 年下半年和随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组织发动了十几次武装暴动（主要是在南方各省）。虽然这些暴动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打击之下，绝大多数都趋于失败，也没有任何一次暴动能够立刻引起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些暴动又是成功的，因为它们为中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前

15

* 陈独秀最终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在晚年所写的一封信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涯和个性：“宗派意味着局限。我对宋代学者所提倡的正统之道一向表示反感。当我感到儒家学说不对的时候，我就起而反对它，当我发现第三国际出错的时候，我也站出来反对它，我会同样对待第四、第五或其他任何国际。胡适先生曾说我是天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确如此。”见《致 H 先生、S 先生的信》，载《陈独秀自传》，86 页，香港，无出版日期。

16

17

* 关于南昌起义，有必要说明几点：第一，起义受双重领导——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为首的总指挥部，中共暴动史可能只有这一次，是两个领导机关并列发挥作用。第二，一般认为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遭到逮捕，而由于他与国民党军队有老关系才获得释放。事实上，贺龙的获释主要是因为他的部队即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朱德所召集的幸存者不是他本人的部队，而是周士第的第一军25师。周士第（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老党员）离开了自己的部队，逃到了香港，其部队留给了朱德指挥。见“中央通告第三号”1927年11月，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46页。另见Martin Wilbour, “The Ashes of Defeat”, in *China Quarterly*, No. 18, 1964, p. 38; James Harrison, p. 123, et seq.

景，即创建由共产党人自己控制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简单介绍一些比较著名的、对当时及随后几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武装暴动和苏区建设。

理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党人的暴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以它们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把这些暴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由党中央直接组织的大规模起义，另一部分是后期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小规模起义。一般说来，这两处暴动的最后结果大致相同，也就是在农村形成了军事割据的局面。但是，若以动机与结果是否一致为标准来评判某一政治行动的成败，那么第一种类型的起义无疑是失败了，因为这些起义的目标都是为了造成全国的革命形势，结果是没有任何一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第二种类型的起义却可以说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成功，因为这类起义的发动仅仅是为了在地方上造成革命声势和创建政权，而其中有些也确实这样做到了。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共产党人的暴动”转变成为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是不过分的。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发动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1927年8月，参加者有三个军，总兵力达2万人。在1927年10月向汕头转移的途中——汕头是东南沿海的一个港口，共产党人向这里转移是考虑到便于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后进行他们自己的北伐——起义部队受到粤桂联军的毁灭性打击，与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大多数起义领导人离开了部队，去了香港和上海。在幸存者中，有2000人在朱德率领下向西撤退。他们在广东韶关被迫投靠了范石生——一支地方武装的首领，也是朱德的同乡好友。几个月后，朱德又率部向湘赣边界转移，并在1928年4月与井冈山毛泽东的部队会师。^{*}

朱德、毛泽东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创建了一支红军和一块军事基地，后来的江西苏区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就毛泽东这一方面来看，他把1927年10月秋收起义中保留下来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在与朱德会师以前，他之所以能在井冈山把自己的部

队保存下来，主要应归功于与当地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实行了联合。如此说来，与地方武装联合既帮助了朱德又帮助了毛泽东，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不过，为他们日后迅速崛起提供强大动力的则是随后开展的苏维埃建设活动。

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另一支部队不足 1 000 人，在师长董朗的率领下于 1927 年 10 月初进入广东东江一带。这支强大援军的到来使当地的农民革命军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在林道文的指挥下发动了第三次暴动，并很快于 10 月下旬夺取了两座县城：海丰和陆丰。随后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彭湃为中共东江地区特委书记，宣布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随着 1927 年 12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另一支部队的到来，东江苏维埃已成为这一运动中最为宝贵、最有前途的一项成就。在其鼎盛时期，这块根据地拥有两个师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四个县的广大地区。一方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利——位于东海岸，结果证明不但不易获得苏联的援助，反而更容易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领导不力——彭湃是一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但他对军事却不甚精通，结果东江苏维埃于 1928 年 2 月被摧毁。彭湃去了上海，特委书记一职由林道文接任，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军队在古大存的指挥下在山区打游击。尽管林、古等人英勇奋战，只是东江苏维埃已永远失去了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生机与活力。^[8]

就在党中央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东江苏维埃的失败而对军事行动失去信心的时候，在党的地方干部中却产生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浓厚兴趣。从 1927 年底开始又爆发了新一轮赤色暴动，这些暴动虽然目标不够远大，却更加切合实际条件。它们是由各地的共产党人发动的，虽然也是响应党中央的一般号召，却不属于党中央直接领导。方志敏在赣西北发动的起义是最早的地方暴动之一。与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方志敏在出任“五县县委”书记、负责在家乡弋阳县发动农民起义之前并未在党内担任过显赫的职务。起义于 1927 年底爆发，先是热火朝天地积极出击，1928 年

初遇到一些挫折，随后就走上地方割据和游击斗争的正轨。这次农民暴动创建了一个地方苏维埃政府，由方志敏担任领导，还创建了一个团的工农革命武装，由邵式萍任团长。从 1928 年年中到 1930 年初，赣西北苏区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监督和指导下（很少受到党中央的干预）发展虽然缓慢，却一直在稳步扩大。^[9]同中央苏区的隔离与国民党的攻击似乎是方志敏地位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而熟悉家乡的社会地理环境却利于他的继续生存。

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另一次重要起义是湖北东部的黄安、麻城起义。在当地共产党人符向一、潘忠汝和王树声等人的领导下，参加暴动的农民于 1927 年底占领了这两个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一个农民革命军。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幸存者不足 100 人，逃避到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直到 1928 年 5 月才又公开活动，并与另一支农民武装一起在光山重建苏维埃根据地。一年后，队伍不断壮大，已足以挂上红一军的头衔，这时才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徐向前被中央派来以军长身份领导这支部队。在豫南、皖西两省毗邻地区，也爆发了两次农民暴动，分别是 1929 年 5 月的商南暴动和 1930 年 1 月的六安、霍山暴动。两次起义各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都归属徐向前的红一军。这样在 1928—1930 年的两年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或称鄂豫皖苏区）就脱颖而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战略基地。^[10]而鄂豫皖苏区的发展潜力甚大，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一地区位于华北和华南之间，能够减轻南方国民党中央军和北方军阀的军事压力；而从进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向北部和东部广大乡村地区寻求自然发展，也可以沿京汉铁路和长江流域而向南、向西发动对中心城市的突然攻击。

1928 年 1 月，贺龙和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湘鄂边界地区，去发展那里的农民暴动。他们抵达湖北西部的监利，并把分散在乡间的地方武装召集起来，只是没能占领该县县城。他们率部向湘西进军，因为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北伐战争前，他曾作为一名军官在这里驻守过几年。在他的部下和老相识的帮助下，他的部队扩充到 3 000 人，并于 1928 年 3 月占领了桑植县城。但在国民党

的地方军队和保安部队的进攻下，这支拼凑起来的共产党军队连输了两仗。周逸群只身一人返回湖北，贺龙则率领残余部队向西撤退，在湘鄂两省边界地区坚持斗争近两年。1929年5月，湘鄂边根据地已拥有两个县的全部和其他县的一部分地区。贺龙的部队被命名为红三军。与此同时，周逸群也在湖北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并创建了红六军。^[11]直到1930年年中，这一广大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苏维埃区域，仅次于毛泽东的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的建立应首先归功于贺龙在这一地区的私人影响和私人关系。但是，作为刚刚改信共产主义的一名前国民党军官，贺龙似乎一方面过分习惯于旧的军事准则而忽视党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注重遵守党中央的指示而缺乏足够的独创精神。这种情况可能是造成这一根据地区域缺乏像其他一些苏区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原因。

20

彭德怀和滕代远于1928年7月发动的平江起义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策动兵变的旧策略获得了新生机。彭德怀是国民党地方军的一个团长，在共产党员滕代远的鼓动下，他率领全团3000余人在湖南平江宣布起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在同政府军进行的长达3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彭的部队减员至不足2000人。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转移其主力部队，去与井冈山的朱毛部队联合。留下来的部队由黄公略指挥，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建立了湘鄂赣苏区。^[12]

再向南方，又有两次起义发生，即由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和李明瑞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百色起义开辟了右江根据地，并于1929年底成立了红七军。龙州起义则建立了左江根据地，并在1930年初成立了红八军。两次起义后，这两大红军部队多达8000人，并控制了十几个县的广大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与其他共产党的势力缺乏必要的联系，因而受到国民党的四面围攻；又因为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对起义全权负责，所以更愿意把部队带到北方，与共产党的大部队会合，而不想在偏远的南方固守一块孤零零的根据地，所以左右江根据地自始至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13]

较为特殊却又不难理解的是，在陕西省也发生了两起中共暴动，一次是1927年11月的清涧起义，另一次是1928年4月的渭南和华县起义。陕西起义构成了中国北方罕见的一大景观，其他北方省份不曾发生。这两次暴动都很快被镇压下去，在1930年以前既没有形成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也没能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该省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杜衡、杨国栋、刘志丹、谢子长等陕西本省人。他们凭借着对当地人民与军队的了解和熟悉而在一些边沿农村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活动，但是由于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区域相距甚远，这使得他们不可能迅速发展并立刻有所起色。^[14]

苏维埃革命的特征与动态

关于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问題，当时的中央政治家和事后的历史学家都曾列举过各种各样的因素。就一致看法而言，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第一类因素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军事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与分裂对抗以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状态。在以上两种客观条件中，后者看上去虽不太明显，却更加值得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会一直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自治区域，为农民造反、秘密结社以及恶霸、土匪和军阀挑战政府权威提供了各种可能。这些可能性经过共产党员的新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有声有色的农村武装割据或苏维埃运动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各地的苏维埃运动在本质上也有很大差别。在另一种研究中，这些差别或许可以成为专门讨论的课题，但对我现在的这项研究来说，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整个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发现的几项共同特征。

一、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对革命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

后期获得并在整个 30 年代都一直强调的基本教训之一。^[15]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到 1928 年这一阶段，在党内军内叫得最响亮的是这样两句话：“听党的话”和“跟着党走”。特别是刚刚脱离国民党的旧军官如贺龙、彭德怀，更必须牢记在心，念念不忘。强调共产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除了表明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与之开展斗争的决心外，还表现在若干实际工作方面，如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发动劳苦大众，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军队改革，特别是强调在各级军官和地方干部中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虽已成为人所皆知的口头语，但尚未被普通老百姓（农民和士兵）所深刻理解。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团体，共产主义就是每个穷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土地——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16]不过，即使这种狭隘的理解，也已足以使他们加入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高昂的斗志和无穷的力量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22

共产党的实际作用比其思想更加重要。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一种内部机制发挥着十分有效的作用。比如红军部队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搜集信息，获得物资和人员方面的补给。而在撤离某个地方之前，则至少要安排一个党的秘密支部以备后用。在苏区和红军中，共产党员发挥着领导、监督、鼓动和示范作用。他们由此而成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核心”和“先锋队”，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

二、红军和武装斗争

创建自己的军队必须开展独立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破裂后所吸取的又一条基本教训。国共合作破裂时，共产党

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因松散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给摧毁了，而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17]1927年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冲突已公开化，自然无须再一味地重复军事斗争的必要性。而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有效地进行作战并开展革命活动，则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红军的革命特点后来被共产党人归纳为“三大关系”——军事任务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红军指战员所受的教育是：不仅要作战斗队，而且要做革命的宣传队、政治上的工作队和经济上的生产队。共产党还教育他们，红军打仗不仅是为了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是要最终解放被压迫的农工劳动阶级，使整个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为在红军中加强政治工作，下至各连排，上至红军总部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和各级党委，由他们在各个级别上监督军事领导。军队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红军内部纪律严明，要求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等。^[18]此外，还规定了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穿着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薪水；而且定期举行组织生活会，让广大官兵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3

三、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这一俄文词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东江起义的时候。随后，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也都相继采用。起义农民们对这一词汇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某个领导人的名字（也许是苏兆征的别名吧！）。^[19]然而，这个外国的词儿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带来荣誉与尊重。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

从理论上讲，苏维埃或称工农兵代表会议，是一种彻底的民主制度，它能使全体劳动人民充分地参与政府的管理与决策。^[20]而事

实上，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领导人通常是党和红军自上而下任命的，大致起着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很少吸收乡村的农民，更不用说工人和士兵了。尽管如此，由于新政府采取了集体化管理的形式，所以较之以前，这种体制要民主得多。特别是在基层村镇中，农民选举自己的苏维埃领导人，因此享有参与管理的大量机会。在那里，苏维埃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居民委员会或职业协会组织。

苏维埃制度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它把共产党和红军与群众运动以及社会组织从上到下联结起来。虽然在共产党人是否真正要创造一种更加完美、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上可以有所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共产党人巩固根据地，动员农民支持其革命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土地改革

土地分配不公，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通病。这一现象简直可以说已经使得中国农民养成了一种“土地拜物教”的心理，农民的这种心理已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实际需求。纵观中国任何农民起义若不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来吸引贫困的农民，是很难取得成功并有所作为的。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土地改革，这一点反映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决议上。^[21]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7年这整整10年的时间，都被共产党人称为土地革命时期，甚至干脆叫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虽然在对待中农和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党和红军领导层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没收地主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一基本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土地改革纲领中却从未受到过怀疑。这就足够了。土地改革政策与苏维埃机构是共产党人的两大根基，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能够在农村贯彻“群众路线”，开展“人民战争”了。

这个时期也面临着一系列疑难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也曾经提出，现在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回答。共产党应该是（或曾经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吗？能不能把红军的战斗力看成是

与他们的革命热情成正比的？苏维埃制度应该是（或曾经是）民主参与还是权力集中？土地改革与群众路线是能够直接把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魔力棒吗？概括地说，应该把这些革命措施看成是绝对目的，还是仅仅把它们当作实现其他目的（或许不太崇高）的权宜手段？这些问题既不容易提出，更不容易回答。

暂时抛开这些问题不谈，若简单比较一下国共两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会明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及其特征在实践上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力量，为他们与国民党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极大优势。与共产党不同，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国民党都未能在省级以下发展自己的地方组织；国民党的军队带有职业化政府军的全部特征，不同普通老百姓发生任何关系，也不过问农村农民的社会经济问题；国民党的地方行政基本上还是“一长责任制”，省长、专区专员、县长分别在少数职员协助下全权负责各辖地的行政事务，县以下就不好管了；对国民党来说，土地改革问题更不必谈了。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政党在自身力量上的增长不一定就能使它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少以及他们各自的努力程度。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什么与世无争的独立社会，实际上它构成国共斗争的一方罢了，它的兴衰浮沉或者战争的形式不仅取决于共产党人的实力和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人的实力和努力。

直到 1930 年初，红军和苏区都还没有形成规模，活动分散，且多数是南方各省。各个根据地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也没有联系的必要。各地红军还没有直接对国民党的中央军开战，他们要应付的是驻守在各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即民团、警察和各省地方部队。

25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体制极为复杂，因时因地而异。鉴于本项研究的目的，我把目标放在南方和中南各省，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影响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共产党起义最活跃的地区。1930 年国民党军事机构改组以前，它的最大单位是军，基本的作战单位是团。

除直接受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军约 50 万人作为全国的机动兵力外，南方每个省份大约有 2~3 个军，6~9 个师、18~27 个团的兵力驻守，总共得有 6 万至 9 万人。^[22]这些部队一般由各省府调遣，驻扎在省城和一些专区所在地。在县城一级没有正规部队驻防，只有保安队、宪警队大约 300 人~500 人。在县级以下的乡，则只有地主和乡绅扶持的地方民团武装。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共产党人在每个苏区有 1 000 人至 5 000 人的红军部队在介于专区和县之间的级别上作战，有 50 人至 200 人的赤卫队在介于县乡的级别上作战，还有一些青年小分队分散在小城镇和农村游击活动。*

驻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贪图安逸，只愿待在大城市里（而且他们是被部署在那里的），无事则安，对共产党人在下面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打击民团和警察不闻不问。在没有各省军队介入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逐步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活动范围。然后，他们开始兴趣大增，开始攻打县城。虽然在县保安队面前往往吃败仗，但他们却不受什么太大损失，退回乡村就是；而一旦他们夺取县城，赶走了保安队，这种胜利可就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一两个县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国民党各省政府便开始坐卧不安起来。他们纷纷调兵遣将，开始对“造反者”发动围剿。如果暴动发生在各省边界地区，那么围剿作战就由有关各省联合发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不论哪一支红军部队都很难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军或歼灭其一个团。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交战受挫后，红军就撤出县城，撤到下面乡间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开展斗争。国民党的进攻部队在夺回县城逼走红军之后，自然得意洋洋宣布胜利并立即撤兵，结果使共产党人得以恢复他们原来的根据地，或是在日后创建新的根据地。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为共产党人发展势力制造了良机。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与其他军事集团之间爆发战争，驻守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会被调往前线作战，留下的少数兵力将会集中驻防省城，而在区县两地则显空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不会忘

* 这也是一个大致的分析。例如在 1929 年底，共产党的主要军队大致如下：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有 3 000 人；彭德怀和滕代远的红五军有 2 000 人；贺龙的红三军有 3 000 人；徐向前的红一军有 1 000 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的红七军有 3 000 人；方志敏的红十军有 1 000 人。每支红军部队都占据 2 至 5 个县作为其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另有 5 至 10 个县作为其势力范围。每一个中心县通常拥有一支由几十名到几百名业余士兵组成的赤卫队。

*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提出了“十六字诀”，而彭德怀和徐向前的部队则分别运用了“石磨战术”和“八句话原则”。当然应当指出，游击战可以根据各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及其自身状况而具体灵活采用。

记乘机抢占新的地盘并补充新的兵源。

以上的描述可以说是红军和苏维埃活动的一般动态和轨迹。对国共两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的对抗所进行的总体考察表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人举行暴动的南方和中南各省的军事控制是相对稳固的。当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时，各省的军队便开始进行讨伐。在历次战斗中，国民党军胜多败少；在整个围剿战役中，他们也几乎全部胜利。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少能够根除共产党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力量和影响。共产党人依靠他们与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令人神往的农业纲领、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现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头。

红军部队一般采用游击战的战术，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而不单纯是某个领导人的创造发明。强敌进攻时，弱小的红军就做必要的后退，到农村去和敌人周旋；红军兵力弱小，但熟悉地理环境，自然要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以便寻机作战。敌军撤退时，他们又化零为整，乘胜追歼。这套打游击的战略战术不仅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所运用，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早期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过。*

毛泽东与江西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 1927 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公达两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分别以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被派往湖南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23]在随后的一个月內，党中央与湖南省委函电来往频繁（在《中央通讯》中有详细记载）。

这些函电表明，起初党中央对湖南省委大加赞扬，而后来又深表失望。^[24]“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的确及时来到湖南省会长沙，但他没有逗留在城里开会发文件，而是马上奔赴湘东农村。与此同时，由彭公达等人制定并寄予厚望的全省起义计划在各地实施过程中均先后宣告失败，唯有毛泽东去的湘赣边界地区例外。^[25]但是，

这并不表示着毛泽东本人创建了什么武装力量或发动了什么农民起义。虽然他在 1927 年 9 月确曾被任命为计划中起义部队的师长，27但这一任命徒有虚名，而且很快又被取消。当时倒有一个师的“工农红军”在湘赣边界宣告成立，秋收起义只不过是把现有的若干部队召集起来，先夺取附近的县城，再去攻打省城长沙。只是在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才出面通知各路部队至文家市集合，并决定挥师东进。经过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新命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于 1927 年 10 月向东撤退到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地区。^[26]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之所以向江西撤退，可能是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后来他在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实行联合也可能是出于暂时考虑。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不可能追求绝无原则可言的联合，乃至和袁、王这样两个“土匪首领”公开结盟——称袁、王二人为土匪是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稍后提出来的，而国民党的历史学家自然乐意接受这种说法，至今一直采用此说。实际上，袁、王二人分别是北伐战争时期在井冈山一带成立的两支“农民自卫军”的领袖。由于这些农军与当地的地主豪绅发生冲突并公然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倾向于加入中共暴动。如果像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那样把所有共产党人都称作“匪”的话，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袁、王二人倒也不妨如此称呼。

1928 年 4 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这样会师后，立即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共有万余人，由六个团组成：朱自己的队伍两个团、朱带来的湘南农军两个团、毛泽东的一个团，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一个团。^[27]在随后的三个月内，毛泽东、朱德利用幅员辽阔的井冈山山区作为根据地的核心，派出一些部队到周围各县去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府，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

实行联合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摩擦，这成了一个普遍定律。湖

28 南省委要求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回湘发动另一次起义；湘南农军因井冈山上的给养困难要求返回老家；朱德的部下则要求维持独立。到1928年5月底，两个团的湘南农民已大部分返回湘南。7月下旬，当湘赣两省的敌军发动围剿时，朱德率领他的两个团也离开井冈山去了湖南。一个时期内毛泽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通过分裂、失败和后来红四军的重新联合，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最终合并成一个整体，以至于后来很难说哪个部队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从1928年9月至1929年1月，对红四军和湘赣边根据地来说，是一个顺利发展和迅速扩大的时期。^[28]

1928年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大约1000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来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决定投奔井冈山，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十分钦佩。实际上，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和红五军和平江地区遇到的不利形势可能与彭德怀采取上述行动有更大的关系。两军会合后，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1929年1月，当另一场围剿到来之际（这次围剿由闽、湘、赣三省政府联合发动，出动的兵力有12~18个团，大约2.5万~3.5万人），彭德怀和王佐分别率领红五军原部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到外线作战。这里有无派别之见，暂且不论，单就这种军事安排来说，其出发点是：如果毛泽东、朱德能够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那么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江西省的军队——将不得不从井冈山迅速撤退。这样，不仅围剿可以得以制止，而且敌军还将受到毛、朱和彭、王部队的前后夹击。*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既没有攻下吉安，也没能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相反，他们在去赣南的途中，在大余一带受到赣军的重创。此后他们又连输三仗，直到1929年2月才在大柏地取得一次胜利。他们被迫进一步南下，向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进军，重返井冈山已不可能。幸运的是，这年5月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军阀战争，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部队立刻被全部调

* 参见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52页。另见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38, p. 153. 毛泽东对斯诺说，中共六大的新路线传达到井冈山后，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不同意见消失了。我想补充一句：朱、毛二人之间的默契融合关系主要是随着1928年下半年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而不断进行调整的结果。

回。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在张鼎丞、邓子恢等人领导的中共闽西地方武装和刘少奇、李文林等人领导的赣南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毛泽东、朱德在闽赣边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一块新的更大的根据地。^[29]

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队在1929年1月孤军迎敌，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剩下的300多人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向南撤退。3月份，他们在赣南的宁都遇到了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毛泽东为井冈山反围剿的事表示歉意，彭德怀不肯轻易接受。他集合自己的部队，挥师北上而去，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初次合作就这样结束了，虽不甚愉快，但也没有公开反目敌视。随后彭德怀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并于4月份收复了湘赣边根据地。7月，他又回到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在那里受到了老部下黄公略的热烈欢迎。10月，彭德怀派出一部分军队到鄂南发展。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五军就占领了三个根据地区域，所属部队扩充到3000余人。^[30]

到1929年下半年，江西中央苏区大体规模已经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由赣南、闽南、湘赣和湘鄂这四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组成的。它构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体。在这一区域，有共产党的三大势力：毛、朱的红四军，彭、滕的红五军，以及地方党、政（苏维埃）、军人员。毛泽东从开始便是这一区域内最有资历、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和毛泽东的正式领导，却是通过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之后得以形成的。

多年以来，中共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主题。在江西时期，毛泽东被说成是反对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内地以外的某些观察家试图避免重复这一说法，但又提不出新颖的见解，结果随波逐流，在中共历史学家所限定的范围内左右摇摆，以示独立。他们往往会说，在1927—1935年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同党中央相抗衡。但是，对于“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拥护还是反对中央”这类抽象而又模糊的

问题，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追求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这样勾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不那么黑白分明，不那么是非明确，但却更加生动，更加真实。^[31]

30 从毛泽东在中央党内的地位看来，江西初期可以说是他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毛泽东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 1923 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 年发动秋收起义前夕，他又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以后，他的领导地位开始下降为地方一级：先是担任中央在湖南省的特派员，然后又依次担任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苏区的党代表、红军政治委员等职。然而毫无疑问，这一级别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实权地位的提高除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干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党中央的支持和影响。1927 年 9 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家市把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集合起来并置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主要是因为他在党中央的资历较深。1928 年 4 月和 11 月，也正是在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下，朱德和彭德怀才率部来井冈山。两次会师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军事实力。当时，朱德的部队有 9 000 人，而毛泽东的部队却只有 1 000 人，但是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又一次帮助了他，使他在联合部队中占据上风，而毛泽东凭借自己的才干能力逐步成为支配性的人物则是后来的事情。在 1930 年 2 月成立红一军团和同年 8 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党中央看来，毛泽东是个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而在红军士兵眼里，毛泽东则是中央领导的象征。这种双重作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初期各项活动的一把钥匙。

直到 1930 年初，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关系还不密切、不直接和不频繁。他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一般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而且每年只有少数的几次。在这些通信中，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其红军队伍的状况，而不是全国乃至国际方面的事务，即使偶尔提及后

者，也只是在它们同红军发生关系的时候。至于党中央，虽然它作为最高权威也在发指示、提建议，但它却很少下达能对毛泽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指令。实际上，党中央有时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待在哪里、干些什么。^[32]简单地说，毛泽东既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援助，也受不到它太多的直接干预。中央能向毛泽东提供的只是精神上的鼓励，而毛泽东能为中央做的事情是有时捐献一些打土豪获得的金银，把它们通过秘密渠道从苏区送往上海。

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共同利益。他们毕竟都是共产主义者，不时发生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多半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党的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层统揽全局，他们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以及理论问题上的争论；而毛泽东作为农村开展斗争的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上的应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谈论革命的高潮问题，但是对前者来说，31
这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世界形势和劳资阶级立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而对后者而言，意味着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将要爆发另一场大战；二者也都在谈论土地改革，但前者把它看成是最终铲除“封建制度”的神圣目标，而后者则把它看作是吸引农民参与其军事行动的权宜手段。有些时候，毛泽东要求夺取江西全省和一些大城市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中央，但也有些时候他又迟迟不肯采取积极行动，尽管中央一再催促；有时毛泽东提倡实行完全没收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以便争取新根据地的群众，而有时他又强调需要实施较为温和的土地政策，以促进苏区的经济生产和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他一再重申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同时又不断强调军事优先的原则；他信赖并依靠广大农民，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对农民的保守和狭隘心理表示反感。在党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遵从的总体框架中，毛泽东的言论和行动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在这些表面上前后矛盾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这同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关于中共革命的总体战略也成熟了：即以武装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治——仅此一条而已，不可缺少，亦无可添加。其他一切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这一主要目标，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什么独特优惠之处。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打败国民党政府，建立共产党政权。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确实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代表着共产党人的真正利益。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地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作用，然而在各个具体步骤和具体时刻上，他们彼此之间又会形成相互对照乃至相互对立。

李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

32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方面，武装反抗国民党已成为中共坚定不移的政策和无可更改的现实；另一方面，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和巨大挫折——由武装暴动发展而来的苏维埃运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得以体现。这两种颇为矛盾的前提使得中共六大采取了一条比较温和的政治路线。这一点从六大决议和新当选的中央领导成员的构成上可以看出。这样被选出来或者说被挑出来的政治局成员有七位，即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和项英，绝大多数都是入党多年的骨干。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上有李立三、彭湃等七人。大会闭幕后，张国焘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苏兆征因患肺炎也留在莫斯科治病。中央其他领导人会后不久便离开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返回上海。^[33]

然而在中共六大结束后不久，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开始变得有利于采取一条更为激进的路线。1928年下半年，各处苏区和红军稳步扩大，这给共产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前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布哈林这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中共六大的主导者逐渐成为斯大林攻击的靶子，其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反对六大温和路线的“左”倾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共中央，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激进的李立三接替了保守的蔡和森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蔡被召去莫斯科；李走上核心领导岗位。^[34]在国内的四名政治局委员中，向忠发和项英只挂名不主事，实际工作由周恩来和李立三两人分担负责。

从1928年11月政治局改组，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中央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中共六大制定的温和路线基本上得到了维护。但与此同时，从莫斯科刮来的反右倾之风却在不停地吹打着中共中央的航船。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共中央的路线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1929年6月至1930年4月这一时期。^[35]周恩来失去依托，李立三开始得志，于是开始了二人的并列竞争时期。在此期间，稳健的周恩来与冒失的李立三虽然常有争论，但还没有分出你高我低。向忠发的自白书为这一分析提供了某些证据。向忠发写道：

在1929年6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与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全会结束后，他们又继续争吵了两天。虽然我不大支持李立三，却也没有能说服他。后来，这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我总是在中间给他们调解。从1930年1月开始，他们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周恩来决定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36]

从1930年4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到同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李立三完全控制了党中央，他的“左”倾言行也到达了顶峰。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史华慈教授所指出的，共产国际的

影响力为李立三走上领导岗位和中共中央采用他的激进路线打开了绿灯。^[37]1930年5月，李立三连接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是红军代表会议，要求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武汉；另一次是苏区代表会议，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或说是臭名昭著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援引马列主义的一些抽象言词，对中国及世界革命的形势作出了过分夸张的表述，下面引用其中一段，我们便可窥斑知豹：

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的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在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现在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38]

当中共中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其激进路线付诸实施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却开始担心李立三可能走得太远了。7月16日李立三自上海致函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正式表态，公开支持他的全部冒险计划。一个星期后，共产国际写了回信。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息是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冒险计划发生分歧的一个信号。^[39]在这封指示信中，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是否已出现“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提出质疑，以此想阻止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攻打各大中心城市的战略行动。^[40]

34 共产国际指示到来的时候，恰逢彭德怀的第五军团于7月28日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激奋异常，8月1日和3日，又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共产国际的指示被搁置到一边；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受到公开指责；他甚至还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国革

命，以此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

共产国际获悉红军攻克长沙这一出人意料的好消息之后，当然也是庆祝了一番，甚至还可能为在7月23日信中坚持的保守立场而有些内心遗憾。几天过后，情况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当李立三的抗议书送到共产国际的时候，长沙又沦入了敌手，共产国际欢庆气氛消失了，对李立三的不满情绪却依然存在。李立三的苛求、长沙的丢失、国际远东局的抱怨、周恩来的报告，一股脑儿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作出决定，需要防止李立三的过火行为。1930年8月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派回国内，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再攻长沙这一战成为对李立三政治命运的最终裁决。从8月24日到9月12日，李立三孤注一掷，要求各地红军主力采取一致行动，再次夺取长沙。红军苦战了几个星期，但最终还是未能打下长沙。拿下长沙没有那么容易，但摘下李立三的乌纱帽却不那么难。9月下旬，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许多中共党史著作都大书特书李立三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失，很少有人去解释此话怎讲。不错，在1930年下半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李立三本人的愿望背道而驰——9月份，他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2月，他又被召去莫斯科受审。但是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李立三掌权时期到底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其次，不管是何种情况，李立三的激进政策对运动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总的方面来看，李立三的领导似乎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具有破坏性——至少从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方面来说是这样的，而当时红军和苏区显然代表着共产党员的真正力量。

在1929年6月以前，共产党员的部队只有两三支称得上“军”的称号，其余部队只能称为“师”或“团”。红军的总兵力约有1万到2万，且分散在各地独自活动。正规红军部队既缺少武器装备，又缺乏严格的体制，而地方部队则只能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战

术。1930年初，红军发展到7~8个军，所有兵力大约4万~5万人。至1930年6月，又进一步发展到15~20个军，兵力多达6万~8万人。8月初，党中央号召对中心城市发动战略进攻时，红军已发展为10~15个军，总兵力已达8万~10万人之多。^[42]

在1930年以前，没有哪一支红军部队能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整旅（2000人~3000人）打上一仗，也没有任何一支红军能够攻打并夺取县级以上的大中城市。但在1930年以后，对这两件事，红军都能够做到了。也就是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与战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以前他们只能在没有各省军队的干预下打败地方武装，现在他们已能够在没有国民党中央的干预下打败各省一级的敌军了。

除对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确切地讲，也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爆发）之外，中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那些带有深厚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1930年初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增长，这方面也是与李立三中央的鼓动和指示分不开的。比如所有新近成立或扩编的红军军级单位，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其军长和军政委都是中央任命的。

在李立三领导中共中央期间，红军在总体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同样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的红五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比毛泽东的红四军更为积极。彭德怀的部队从1929年6月的1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000人，最后他的部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000人。红五军一度攻克长沙，虽然不久又被迫放弃，却补充了大量兵员。同一时期内，毛泽东的部队也有所增长，但不快，从1929年6月的3000人，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000人。若不是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于彭德怀的红五军），毛泽东的队伍还不会达到这个数量。^[43]

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最为积极活跃，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贺龙的红三军和周逸群的红六军于1930年5月合并为红二军团。不久他

们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越过长江，开始对武汉和长沙发动联合进攻。结果，他们2万人的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徐向前的红一军在开始时兵力并不强大，不受中央重视，这倒成了好事，因而没有中央的硬性征战指示。他们执行了中央积极发展的一般号召，从1930年6月的3000人，增长到1930年9月的6000人。1930年以后，鄂豫皖苏区已超过湘鄂西苏区，成为中共的第二大根据地。地处最南方的邓小平的红七军按照中央意见，离开广西左右江根据地远征广州和桂林，一路挫折，从3000人有余减员到1000人不足，最后到达苏区。^[44]

总而言之，如果从历史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立场出发，就需要公正地分析评价李立三路线的成败得失及其与共产党力量消长的关系。对此，我前些年曾有专文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若把上述基本事实考虑在内，我们起码应该放弃那种认为李立三的领导是完全失败的观点。李立三的悲剧在于，他过分迷恋革命理想主义的幻想，未能认清本党本人在国内和国外被实际卷入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到头来真可以说是功归于人而过归于己。

36

另一个非常有趣但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毛泽东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共中央内部，李立三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左”倾激进和右倾保守两种立场；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共总的方针政策不断“左”倾激进化几个阶段，以免得出表面化和片面化的结论。毛泽东与党中央之间交换的两封信件常被提及，用以说明毛泽东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45]现在，可以看到信文的全件，使我们能够进行更详细、更准确的研究。

1929年2月7日党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很可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因为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该信中说，现时的形势仍然是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持不下”的局面，要求红四军领导干部去“影响并争取广大群众”。这正是中共六大路线所规定的温和要求。信中还建议毛泽东和朱德，应把红四军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中去。^[46]4月5日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复信显然是由毛泽东本人写的，信中抱怨党中

央对“客观条件和我们的主观力量的估价都太悲观”，并主张发动积极进攻，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47]

显然，这两封信表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批评周恩来的保守立场，而支持李立三（虽然毛泽东在中央人事上并不太明确）的激进立场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红军和中共在1929年的大发展对李立三在党中央采取激进立场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公正地讲，毛泽东在信中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队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而不是党中央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指出，中央来信写于1929年2月份，当时红四军刚刚失去井冈山根据地；而前委的复信写于4月份，是红四军在赣南、闽南得到恢复之后，当时所面临的不同的军事形势也可能影响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乐观和悲观的立场。

由于朱德、陈毅等人反对“专制领导作风”，1929年6月到9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朱德手下的红四军倒是民主了，只是打不好仗。尔后陈毅去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和李立三，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有关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有关情况。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告诉陈毅要坚决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返回苏区时，陈毅带回了一封中央指示信。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党中央的指示信对加强苏区和红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46]通过解释中央指示，强调党的纪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政治工作等，毛泽东显然巩固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也加强了他在地方党政干部中的权威。^[49]

在1930年1月8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的私人通信，当时林彪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团长）中，毛泽东抱怨说：“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但是，当毛泽东发现“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是对的了”，并为此显得比较满意。该文除了表明毛泽东在他的部下面前信口评议中央领导时以一贯正确的权威自居这一事实之外，同时还说明毛泽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赞成李立三的激进立场而反对周恩来的保守立场的。^[50]

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改组和集中红军时，毛泽东仍然获益于

中央的激进路线。他打着反右倾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军官交出手中的权力，从而还被正式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只是后来当李立三中央命令全部红军（毛泽东的部队当然也包括在内）采取一致作战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才开始发生矛盾。

党中央的或说是李立三的基本想法是首先集中全国红军，实行统一领导；然后调动主力部队去攻打武汉。对于红军实行集中领导，毛泽东并没有反对意见，原因不言自明。这正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权位的增强。红一军团建立了，当然毛泽东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李立三的要求挥师北上，而是向南、向东疏散自己的部队，在乡镇地区求得正常扩展。为了应付中央，毛泽东声称有三个旅的国民党部队挡住了北去的道路，并且断言：“四军暂时不能走北上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向赣南、闽西农村分兵的“三个月计划”。他强调说：“在现时这种环境中，若仍然采取大部分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51]

李立三越想直接控制指挥红四军，党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1930年4月，党中央向毛泽东发出了警告：“红四军在扩兵方面过于缓慢，结果极不令人满意。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你们对自己的保守立场没有觉察，故而未能决定尽快扩兵；二是你们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不够及时；三是你们没有尝试各种不同途径去动员农民加入红军。”^[52]

38

党中央的反复指示给毛泽东留下了日益深刻的印象。中央指示信的口气越来越严肃，意图越来越明确，这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同时他的红四军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在扩兵方面确实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快，特别是赶不上彭德怀的红五军。彭德怀响应中央号召比较积极，他的部队比毛泽东的部队扩大的也快，在1930年2月至6月间，彭德怀的红五军扩大了三倍，并夺取了一些大中城市。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

1930年6月15日，党中央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对毛泽东提出批

评，说他过于保守，并且限令他的部队立刻向北进军。10 天之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而走向另一个极端，6 月 25 日，他召集第一军团的 36 名高级将领开会，随后联合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最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崇高头衔。^[53]他率领部队离开福建汀州，首先去攻打南昌。毛泽东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却没有采取像模像样的大军事行动。7 月底，即获悉彭德怀夺取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立刻将其部队调离南昌开向湖南，同时以令人吃惊的大胆口吻致函党中央：

我们估计目前的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红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却决心消灭敌人，占领长沙岳州，夺取武汉，促进全国总暴动。……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54]

39 从上述引文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是在向党中央要求更高的军事指挥权。他的愿望实现了。当红一军团到达永河城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从长沙撤回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指示，这两个主力红军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围攻长沙，但他只是在口头上执行李立三的命令。把长沙围困了两周，在长沙郊外打了几场小仗，然后撤退下来。但是毛泽东却保留住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当时他所拥有的总兵力达 3 万余人。^[55]

不难看出，在李立三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两年中，毛泽东与他的直接冲突只是发生在 1930 年 4 月至 6 月，因为在此期间，李立三试图直接指挥毛泽东的部队。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行动上有意无意地与李立三路线相符合。毛泽东与李立三本是湖南同乡，青年时代就彼此认识，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则比其他任何中央领导人更为密切。也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毛泽东才得以在半年之内连

续得到擢升，从一个军的领导人晋升为军团领导人，然后又从军团领导被提升为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最终结束了长达3年的脱离于党中央之外的处境，重新在党中央得到一席之地。

就其总体战略思想而论，毛泽东倒确实是以李立三中央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会反对一切中央权威。一方面，红四军内的毛泽东与党中央内的李立三的个人关系反映了共产党复杂的政治关系，其中上下级之间在兴趣和行动方面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基本思想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注重政治现实条件，而后者强调革命理想原则。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40

在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阀混战中，蒋、冯、阎大战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混战各方都打着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旗帜。这场战争从1930年5月起至11月止，长达半年之久，波及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大都在北方。蒋方调集了几乎全部兵力，多达100万人；阎、冯双方投入了60万兵力。结果是阎、冯军队20万人投降，20万人伤亡，另20万人被编入蒋军。蒋军也至少损失10万人。^[1]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国民党内部动乱无暇外顾的情况下，何以1930年共产党的势力得以迅速壮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军阀混战一经结束，蒋便把注意力转向南方苏区，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共围剿战争。

由于东江苏维埃遭到打击，左右江根据地也被迫放弃，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自南向北转移到长江流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众多的苏维埃根据地汇合而成为三个大本营，即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它们分布在华中重镇武汉的北面、南面和西面。由于党中央需要解决因李立三倒台造成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问题，并要重新整顿省市两级领导体系，各路红军暂时获得了自由。他们逐渐退回老苏区根据地，作为以前出击进攻的代价，他们现在不得不承受国民党的军事报复。

前三次围剿与反围剿

41

对蒋介石来说，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强大兵力相比，红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它毕竟只不过是分散在农村的一些数万人的农民部队而已。当然，蒋起初并没有把 1930 年底对江西苏区发动的进攻称为“第一次围剿”，他没想到还有再次围剿的必要。除此以外，出于某些政治上的考虑，他只是委派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几个最关键的省份的省主席镇压当地红军，只在他认为红军力量最强大的江西省增加了一些中央援助。

在江西，建立了以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的“剿匪”指挥部。司令部下管辖三路纵队，共计 10 万人，分为 10 个师。鲁亲自指挥中路的四个师，其余六个师并没有直接投入战斗。中路纵队中，罗霖所率之师镇守吉安并做后卫。公秉藩、张辉瓒和谭道源所率各师共计 3 万人发动前线进攻。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以闪电战消灭红军。^[2]

1930 年 10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退后，曾攻克吉安。虽然也还喊着“吉安的胜利意味着江西革命的胜利”这样类似的口号，毛泽东已重新回到了在农村积蓄力量而并非向大城市发动进攻的老思路上来。^[3] 吉安市很快又失陷了，或者说是被放弃了。10 月 30 日，在罗坊召开了毛泽东主持的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委的联席会议。罗坊会议批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进攻长沙时采取了李立三路线，同时也积极赞扬了他接受总前委正确路线而撤回江西苏区的态度。^[4] 对彭德怀的一则批评一则表扬对于巩固毛泽东在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地位都是有必要的。到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围剿时为止，江西红军已拥有 4 万人的部队，分为两个军团，总体上归毛泽东指挥。他们分布在东固这个江西西部山区的小镇周围。

1930 年 12 月 22 日，总前委发表了名为《争取决战胜利的八项有利条件》的宣言。在这篇文笔生动而又意义重大的文件中，已经形成贯穿毛泽东在整个江西苏区军事生涯的基本战略思想：第一，

42

放弃部分苏区领土，诱敌深入到对红军最有利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红军得到广大当地农民的支持，并十分熟悉地形；第二，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进犯的敌人部队。这些新的战略思想同时也标志着主力红军由以往小规模的分散游击战发展到目前大规模的集中运动战的作战能力上的变化。^[5]

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于1930年12月初正式开始。鲁涤平以公秉藩的第五师在前面开道，以自己的嫡系部队即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殿后。公、张两师对在东固向红军发起进攻担负主要责任。公秉藩部受命后准时出发，但张辉瓒部却未能如约动身。使公秉藩惊喜的是公部并未遇到红军的任何抵抗便轻而易举地拿下东固。红军主力放弃该地转移了兵力。公自然不会忘记电告南昌野战司令部，同时又向蒋介石作了战功汇报。蒋迅即赏银1万大洋。^[6]至于在此以后的战况，当时担任江西“剿匪”司令部总参谋长的谢慕韩这样写道：

张（辉瓒）亲率第十八师未能遵照预定日期推进，于17日停顿一天，致延迟于21日晨才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秉藩）师为敌，竟行攻击，双方激战近4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认为张系嫉妒心理，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因富，脱离了张的掌握。张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以致原来形成的重点进攻不复存在。^[7]

几天后，张辉瓒的孤军在龙冈遭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伏击，红军比张辉瓒的军队多两万人。红军歼敌7000人，活捉了张辉瓒后又迅速向附近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发起进攻，从而又赢得了另一场决定性战斗的胜利。鲁涤平的军队遭到如此重创，他也就难以继续领导下去。国民党军队的重新调整标志着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43

由于北兵南调十分缓慢，所以第二次围剿3个月后才开始。这一次军事部长何应钦被任命为总指挥。他所领导的大都是由北方调至江西的原冯系和阎系军阀的杂牌军队，兵分5路，共有20个师

约 20 万人，其中约 11 个师共计 11 万人直接投入战斗。^[8]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被投入战斗并置于显赫地位。在开战前，王同部下的一席谈话足以表明他的动机和心态：“咱们都是杂牌部队，带的官兵都是北方人。杂牌部队无家可归，部队一调远了，留守处的东西就要丢掉。这个苦头，你是吃过的。这下子可好啦，蒋总司令答应我打完这一仗担任江西省主席，咱们今后将要有家了。有了东西，不会担心没处放了，前途有远大的希望，咱们好好地干吧。”^[9]

实际上，蒋总司令将王所企盼的这个也同样许诺给了另一个杂牌军首领孙连仲。在战场上，这两位将领是否能全力以赴是令人怀疑的，但有一点十分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们都不希望对方全力以赴。

第二次围剿期间国民党的总战略是“步步为营，齐头并进”。这就要求进攻各部队慢速而又安全地向江西苏区推进，并且各部之间要紧密配合。很显然这种战略是吸取了上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并且比较适合杂牌军良莠不齐的状况。第一次围剿消灭了部分红军，但是反围剿的胜利却帮助毛泽东加紧控制红军和当地苏维埃。从现存的总前委的记录看，1931 年初毛泽东已在红军中建立了绝对权威并成为一位不可缺少的领导人。无一例外，毛泽东成为所有会议的主席。这些会议的共同主题是如何转移红军，集中兵力进行最具决定性的战役。^[10]

第二次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有大约 3 万人的总兵力。这支军队在东固附近的山区埋伏了 20 多天以待敌军的到来。这样的埋伏只有红军才能打，因为红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不会走漏风声。

国民党围剿军方面由公秉藩率领的第五师由富田向东固行进，他十分纳闷，为何“三天以来还未遇见红军，沿路各地都平静得和水一样。部队继续前进，师直属部队共有 1 000 多人，特务营过后，就是师部，乘马四五十匹，还有三座大轿（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各一座），以及驮载骡马和输送队，在山路上排成一行纵队，要占

五六里长”^[11]。

公秉藩的军队就这样掉进了红军在崇山峻岭间设下的包围圈中，一声令下，占绝对优势的红军战士四面向下冲击，几小时内就会歼了这一行乘马坐轿的国民党老爷兵，并活捉了公秉藩。在最紧要关头，公本人也曾连连发出求援信号，但是他所能联系到的国民党将官都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拒绝前来救援。^[12]

接下来的三天中，红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由西向东连续打了3仗，每一次都消灭或重创国民党的一个师。10天后，红军抵达广昌，同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战斗并占得上风，但是并未攻下该城。红军继续向东挺进，击垮了敌军一个师并占领了建宁城。1931年5月底，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已撤退，红军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13]这场战役是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战略的最佳验证。这也说明红军可以击溃一支力量弱小而又陷于孤立的杂牌军，但是如果与一支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交锋或攻打广昌这样的堡垒城市则未必能够得手。

第二次围剿失利后，蒋介石马上又卷土重来，对江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此次，蒋介石决定亲任总指挥并调集了其嫡系部队中央军的五个师临阵以待。这次围剿总共动用22个师，25万人，较上次兵力又是加倍。三支进攻部队中有两支在左翼（或称之为西线战场）由何应钦指挥；另一支由陈铭枢指挥，放在右翼（或称之为东线战场）。他们主要由国民党的中央军构成，并被委以突击之任。第三次围剿所采取的战略与第一次围剿大致相似。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调集强大兵力，数路并进，直抵苏维埃根据地，迅速击败红军主力，摧毁苏维埃政府，最终消除共产党在该地区的势力影响。^[14]

45 在取得前两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形势总的来说对共产党有利。苏维埃政权得到加强，红军力量迅速壮大。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使共产党得以调整旧的军事战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必要像以往那样大幅度收缩苏区以诱敌深入。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在康都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甚至连毛泽东都认为这次可以考虑制

敌于苏区之外。他在讲话时说到：“此次我们也许可以在敌人未站稳脚跟之前击垮敌人。这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的。”^[15]1931年6月22日召开的康都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党中央军、广东地方军和红军之间存在着某种军事平衡和战略影响，因此他建议：

通常蒋介石会对广东采取防御态势，首先进攻红军。但假如广东军进攻长沙，那么蒋介石就会不顾红军对梧州的威胁而首先进军广东。所以目前我军不应继续向梧州挺进。即使敌军从南丰撤退，我们也只应调派少数兵力前往，而应将我军部署在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这样可以使蒋介石对我军采取防御态势而去进攻广东军。^[16]

在国民党看来，第三次围剿的初始阶段是令人相当满意的。尽管遭到了共产党军队的顽强抵抗，1931年7月底国民党军队还是攻下了江西苏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并控制了大部分苏区领土。7月份，红军先退至瑞金，尔后又转移到位于根据地中心地带的东固地区。起初，红军想由富田突围，进而将兵力转移至东部以从敌后展开突然袭击。然而他们发现计划暴露，敌军前方力量加强，于是就被迫撤退至兴国。那里只有方圆几十里的开阔地带可供集中兵力。在兴国，红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击。他们突袭兵力弱的第三进攻部队，击溃由上官云相和郝梦龄所率领的军队。他们向东行进，在黄陂再同毛炳文部作战，打成平手。在前有伏兵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毛泽东挥师返西，于1931年8月回到兴国。毛泽东回忆说：“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17]

事实上，国民党撤退的原因并非完全如毛泽东所言。从黄陂到兴国只有大约200里的路程，只需行军1至2天。另外到此为止，红军也只不过是打败了三个杂牌部队，影响不大。国民党撤退的真正原因更加复杂一些。蒋介石之所以撤军并非由于对红军作战的失

利而更多的是出于如下重大原因：6月，在南昌发生了指向蒋介石的暗杀活动；8月，发生了两广反抗南京政府的叛乱；9月，日本军队制造事变，入侵中国东北。^[18]

第三次反围剿和第二次反围剿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阶段红军的战斗力已超过了国民党的地方杂牌军。如果兵力集中，再加上天时地利，中央红军甚至可以一次消灭国民党的一个整师。红军所采取的战略终于由小规模游击战发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将军队撤至根据地后方以避免前线盲目作战，集中主要兵力于敌军战线上最薄弱之一点突击；它的特征还表现为将局部胜利转变为全局性胜利的作战能力。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总是可行的，总是成功的。假如第三次围剿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假如国民党军主力能固守他们所攻占的苏区城镇，假如不去追杀红军，假如不撤退兵力以对付反叛的军阀和入侵的日军，那么就极可能形成一种对峙状态。其结果将是在一场持续战中双方均有伤亡。这对于无增援之望而又处于劣势的共产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基于第三次围剿中的事实和此后的第五次围剿的情况来看，上述估计并非简单的假设。

大致在围剿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的同时，安徽和湖北的地方军队正在同鄂豫皖苏区的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苏区的贺龙的红三军作战。但是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将主要兵力和注意力转至江西中央苏区之前，这两支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胜利。1931年国共双方之间的军事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平衡互动状态，这使南京政府陷入两难困境，因为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不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军队，那么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另一方面如果将大部分兵力调集到那一地区就可能给其他地方的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以可乘之机。到1931年底，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已扩大至3万人，贺龙的红三军也扩大至2万人。红军总人数已迅速增至10万人，这是任何一个地方军阀所无法比拟的。^[19]

党中央由上海迁往苏区

虽然李立三路线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正负影响不那么明确，但是它对共产党开展城市工作的负面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李立三冒险主义达到高潮时，包括共青团和工会在内的共产党团体和左翼组织都组成了“行动委员会”，以便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在遭到失败后，红军得以撤回农村根据地，然而这些行动委员会却只能留在城里遭受国民党的直接报复。李立三下台之后，党内斗争激烈，更为国民党逮捕共产党人制造了有利条件。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当时最为强大的一个地方党组织——江苏省委中的何孟雄和他的同志们惨遭逮捕和杀害。1931年初，共产党秘密组织“中央特科”的首领顾顺章、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等一些中共领导人遭到逮捕。有一些人遭到杀害，也有一些人叛变。几乎所有秘密联络点都暴露了，党的城市工作受到严重损害。向忠发的自供词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1931年6月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力量：“现时，包括苏区在内所有的共产党员共计约两万人。这当中的绝大部分虽然被计名在内但只是形式上的党员而不起任何实际作用。在上海有580名党员、270名共青团员和470名工会会员。每月只能收到270块铜元的党费。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弱小。”^[20]

从某种意义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苏维埃运动的高涨和军事斗争的升级在整体上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然而却恶化了上海党中央的处境。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南京政府颁布了各种戒严令，这就使城市里的革命活动极为困难。电讯设备使党中央和苏区红军之间的联络更加有效但也更加脆弱。一旦密码被国民党破译，那么受损失最大的自然不是那边的苏区红军，而是这边城市中的党组织。^[21]

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失败使得上海党中央逐渐成为共产国际和苏区之间的联络站罢了。它渐渐退化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并非有效的领导机构。作为居高临下的监督机构，共产国际没有当时困扰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宗派偏见，所以更容易认清此种现状。在1931年

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首先提议，促使中共中央考虑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22]

一方面可以说党中央是被迫转移到苏区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领导者出现在苏区和红军面前的。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眼里将权力移交给党中央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它们都是在党中央的旗帜下创建并巩固发展起来的。当然，冲突和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一般过程是这样的：新来的党中央领导人一开始就可以获得总领导的职称；他们随后则用革命思想标准来评判和清除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前领导人，并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缺点与错误总是可以轻易找到的。在长期农村工作实践中，苏维埃和军队领导人都容易犯错误，如滥用军政权力，占有私人财产，搞宗派活动，搞男女关系。有些错误，例如在战场上用皮鞭和棍棒抽打士兵的“军阀主义”，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然而在实践上又是必要的。总而言之，在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思想和红军军官及苏区干部所面临的政治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4月份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离开上海去了鄂豫皖苏区，同时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夏曦和徐锡根去了湘鄂西苏区；5月王明由莫斯科返回上海；向忠发于6月被捕；7月份进行改组；11月周恩来去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党中央由学生和工人出身的新干部组成，并没有很高的资历和威望。人们称之为临时党中央，倒也是名副其实。^[23]

49 作为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部队的领导人，有两种从上海党中央来的人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一种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发报员、枪械师和医生；另一种是训练有素的战术指挥官，如叶剑英和刘伯承。他所不需要而且从未要求的是政治领导人。他需要有实践经验的雇员而不是思想上的统帅。虽然从实用角度来看，毛泽东并不需要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人，但他们的到来也对党内关系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对毛泽东而言可以说是利弊参半。

尽管毛泽东的军队越强大，他就越不受地方约束，但是几年来

不论毛泽东的军队走到哪里，它都应服从当地党组织的管辖。从1929年到1930年底，军队同赣西南特委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因此产生了所谓“富田事变”。1930年8月，项英被任命为中央长江局的书记并兼任武汉行动委员会书记，尔后周以栗作为长江局的代表被派到红一方面军。周以栗是毛泽东军队中的第一位常任中央特派员，并很快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有了党中央的特派员，毛泽东似乎可以不受所在地区党组乃至该省党组织的管辖了。

1931年1月，四中全会在米夫的建议下，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但周恩来因公务缠身而不能马上离开上海。项英被任命为代理书记，并于1931年12月离开长江局到达江西苏区。毛泽东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成员受项英的领导。毛泽东的权威首次受到威胁。项英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同毛泽东一样有老党员资格。只是由于李立三路线遭到批判，项英因此而受间接牵连，再加上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项英初来乍到，只能勉强承认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可以从当时苏区中央局有关“富田事变”的决议上看起来。^[24]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共产党领导人并在工会运动中赢得了一定声望。在江西苏区他是代理书记，但不可能仅凭头衔来维持自己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只能在后方做行政管理工作，而前方的毛泽东和红军却像从前一样自由自在。1931年4月，党中央代表团到江西瑞金参加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后，任弼时、顾作霖和王稼祥三位代表留了下来，并进入了苏区中央局。^[25]由于他们三人对于军事似乎既无经验也不感兴趣，所以也只是待在瑞金而已。他们是中央来的钦差，总是要批评人的。而所批评的首先不是远在前方的毛泽东和红军，而是近在后方的项英和苏维埃的工作。于是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因“投降路线”和“右倾主义倾向”而受到严厉批评，以及有关“富田事件”的决议因为没有将该事件明确地定义为“反革命暴动”而受到严厉批评。^[26]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四月会议之后，项英和任弼时之间的矛盾竟使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取代项英成为苏区

中央局书记。

但是，党中央特派员很快就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才是红军和苏维埃的实权人物，从而也是树立中央权威和推行党中央路线的主要障碍。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军事威胁过后，更多的党中央领导人来到江西苏区。在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受到批评。在赣南会议之后召开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但是失去了对红军的实际领导权。红一方面军的称号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均被取消。^[27]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到来使毛泽东必须面对一个比项英和任弼时资格更老、政治军事经验更丰富的人。从长远来看，这倒也使毛泽东避免了政治失败。只要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党的工作，周恩来就会在政治上保留他而不是除掉他。1933年初，当博古和党中央到达江西苏区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种双重影响就愈加明显了。从那时起一直到1934年底江西苏区沦陷，中央苏区内呈现一种多极权力的状态，就如金日平所指出的那样，三个权威人物可以说是当权派博古、反对派毛泽东、中间派周恩来。^[28]

1931年中央领导人到来之前，在资历和能力方面，江西苏区几乎无人可与毛泽东匹敌，他在红军中更是享有绝对权威。在中央领导人陆续到达江西苏区后，毛泽东不得不与他们分享权力。但是也应该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党中央由上海转移到江西本身便是对毛泽东以前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同时又为毛泽东以后竞争中央领导权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盛岳这位过来人的独到见解有助于我们的领会。

党中央转移到江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毛泽东同28个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一个角度来看，党中央移至瑞金削弱了毛泽东的领导权，使他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党中央由大城市转

移到内地较偏远的地区意味着共产党不能依靠工人运动的支持而要依靠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的支持。总之，军队是建立或推翻政权的最重要的工具。秦邦宪集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无法同日益壮大的毛泽东的力量相抗衡，最终兵败南山。^[29]

第四次围剿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930年初，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只有3个师，2000余人。他们并没有引起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视。这对鄂豫皖根据地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党中央并没有严格调令他们攻打大城市。在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盛行时，虽然红一军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总人数还是增加到6000人。在1930年9月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曾中生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书记兼军分区主席。曾中生奉行了一种后来被称为调和主义路线的政策。他努力纠正李立三路线中的明显错误，同时试图改组当地干部队伍以求得平稳发展。^[30]从1930年冬到1931年春，红一军因红十五军的加入而得到加强，队伍壮大为1万人，后改称为红四军。在反对由安徽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的两次围剿的战役中，红四军取得了胜利，队伍扩大到近2万人。它占领了一个拥有180万人口的根据地并成为共产党的第二大势力。^[31]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军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被任命为书记并全权负责。除了在分局作为成员外，沈泽民和陈昌浩还分别被任命为鄂豫皖根据地（当时共产党称之为鄂豫皖省）的省委书记和共青团书记。

张国焘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心目中，他又是一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于王明和博古等青年留苏生并没有抱很大尊重。但是1931年初，他由莫斯科回国，在新的形势下，宣布完全支持新的党中央，尽管当时他的动机也许比较复杂。1931年3月

52 5日，张国焘发表在《实话》杂志上的声明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这些派别观点是最易混淆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而且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都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32]

张国焘是1931年4月由顾顺章亲自护送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或者是出于真实的政治立场态度，或者是出于巩固个人权力的需要——后者更不明显却又更为深切，张国焘下车伊始，便在苏区和红军内展开了一场“两条路线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职位以及他对于中央新路线的称颂显然是他所运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尽管他日后在《我的回忆》中有如下否认：“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深怀不满，而且又不是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唬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尚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形形色色不听话的人。”^[33]

然而，尽管他如此矢口否认，但他的确是充分利用了在中央分局中的职位和中央新的方针路线的“尚方宝剑”，不仅是吓唬，而且是斩杀“土共”。事实正是如此，史料正是如此，恐怕也只能如此。张国焘1931年5月宣布废除鄂豫皖省委并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原省委书记曾中生自动解职。张国焘还撤了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山的职，而让曾中生暂时取而代之：“在他（指曾）完全承认错误与保证将中央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任四军政治委员工作”^[34]。

1931年夏，由于国民党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所以不得不对鄂豫皖苏区采取防御态势。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和扩大自身力量，红四军开始南进。这时红四军和中央分局之间爆发了猛烈的冲突。

红四军的六个团出发了，徐向前任总指挥，曾中生任政治委员。8月初，他们击溃国民党军，攻下了英山。休整两天后，继续向西南长江武穴方向的浠水和罗田挺进，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53 击败了敌军 6 个团并夺下了湖北东部的几个县。然而与此同时，鄂豫皖中央分局下令红四军调头向东进攻安徽省的安庆。^[35]

红四军领导人直接请示党中央，说明将军队远远地调离根据地去攻打安庆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行的。在上海的党中央对此却丝毫也不动心。曾中生不得不调回军队，但同时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英山和安庆相距 400 里，都是山路，而且该地区没有党组织；红军缺乏交通工具、运输人员、情报员以及当地干部；让一个师长驱直入攻打安庆，威逼南京，是极不理智的；如果命令一个月之内攻下安庆，那么这又与李立三两周之内拿下武汉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呢？^[36]

在红四军领导人致党中央的信中，陈昌浩被指名受到严厉批评。这表明张国焘很爱用陈昌浩这种热衷于理论上的争论但却缺乏政治经验的归国留苏生来压取鄂豫皖根据地老干部手中的权力，同时借此来讨好由留苏生掌权的党中央。1931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支持鄂豫皖分局，反对红四军：“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如今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中的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央局直接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这都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37]

陈昌浩很快被派到英山接替曾中生。随后在军队和苏区展开了一场严酷的肃反运动。当时张国焘本人也承认：“被捕者约 600 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处死刑者 20 人，判处各种有期徒刑大约 100 人。”^[38]鄂豫皖中央分局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写道：“现在计共逮捕的反动分子 600 以上（在皖

西北约 100 余人，在黄麻 200 余人，在红四军中约 300 余人）。”^[39]一个月后，陈昌浩在一次讲话中则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革派叛徒 100 人，富农及一切坏分子一千五六百人。”^[40]既然是“肃清”，显然就是杀了。

54 在其规模和方式上，鄂豫皖苏区的党内斗争比江西中央苏区更为严重、更为扩大。我想其中原因之一也许是由于曾中生、余笃山、许继慎等遭排挤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是以前被党中央派去接替地方干部的职位的，他们不像毛泽东那样可能同新来干部抗衡。另一种可以设想的原因是鄂豫皖苏区不像江西中央苏区拥有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互相制约，得以免于过分进行肃反运动。

不过，很难说清这种肃反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事进程。从道义上讲，这种运动是缺乏道义而又荒唐可笑的。在这场运动的牺牲品中，只有寥寥几人确实犯有被指控的罪名。然而这场运动实际上却似乎激发了红军的斗志。不论如何，尽管过去红四军中隐藏了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并得到迅速发展，而现在清除这么多“反革命分子”之后，红四军依旧节节胜利并且继续迅速发展。

1931 年 11 月 7 日，正当江西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际，鄂豫皖根据地也召开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当天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下辖两个军（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计 3 万余人。^[41]只是过后看来，这些活动都为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的内部竞争埋下了伏笔。

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5 月间，红四方面军成功地进行了黄安、商城和苏家埠几次战役并粉碎了又一次敌人的围剿。其中苏家埠战役持续了 48 天并取得大捷。红军包围了该城的 6 000 敌军。当地方军队在厉式鼎的率领下火速赶来救援时，红军设下埋伏一举歼灭这支部队并活捉了厉式鼎。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总而言之，红四军消灭了 3 万敌军，军兵增至 5 万人。^[42]

1932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求得停战之后，蒋介石就发动了野心勃勃的对付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同两年以前相

比，共产党的兵力已有极大增长，几支红军主力部队几乎要连结成片，已经不是一个地区的一支队伍的问题了。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总体战略是先给予北边的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以致命一击，随后再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南边的江西中央苏区。

蒋亲任武汉司令部的总指挥，策划对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参加战斗的三支军队由地方军和中央军组成。左路军对付湘鄂西根据地；由 22 个师和 5 个旅组成的中路和右路军共计 25 万人，用以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由北、西、东数路并进，欲逼红军南撤至长江流域并在那里决一雌雄。

55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的战略与上次相同：二十五军在东线进行防御，红四军主力在西线发动攻势。此次，它试图依旧采取“包围城市，打击援军”的策略。但是敌军过于强大，过去屡试不爽的策略这次却不灵了。7 月到 8 月间，红四方面军在麻城作战一个月，但未能攻下该城。同时，国民党将领徐庭瑶战胜红二十五军，攻下霍邱县城并由东线深入苏区；北线，陈继承军进逼七里坪；西线，卫立煌兵临黄安城下。三支敌军威胁苏区心脏地带，红四军不得不由麻城撤军。^[43]

红四军放弃围攻麻城之后，转而保卫黄安。8 月 11 日至 13 日之间，它同卫立煌部展开激战，双方各损失数千人，但最终国民党军队攻下该城，红军再次后退。红军将主力向北转移，在原苏区腹地七里坪进行了一场战斗。15 日至 18 日之间的战斗是最激烈、最有决定性的，红四军全力以赴，“参谋、政治工作者甚至连厨师都端起枪冲锋陷阵”^[44]。国民党方面参战者有陈继承和卫立煌所率二部共计五六个师。双方各损失约 3 000 人，战争陷入僵局，国民党军队又攻下七里坪和周围的一些市镇，红四军再次被迫向东撤退至安徽西部。徐向前的红四军同蔡申熙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于金家寨，共同在新集又打了一仗，结果仍然是以红军方面失利而告终。

1932 年 7 月至 9 月，红四方面军同国民党军队前后进行了四五次大的战役。每次双方各损失 2 000 人以上。这对国民党来说无关紧要，但对共产党来说却是致命的损失。现在该是张国焘致电党中

56

央请求动员红军和苏区所有人员来支持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除了能将这个要求转达给江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外，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江西苏维埃和军队的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答应在北面发动进攻以示配合。同时，他们又权威性地批评道：“红四方面军不应分散兵力去保护各个地区而应将主力集中到某个有利地区给敌人以致命一击，然后各个歼灭敌军。”^[45]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9月中旬，鄂豫皖苏区的另一个中心金家寨失陷了，红军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放弃根据地并进行长征。1932年的9月下旬，张国焘集中了安徽西部的所有军队，由南线迂回行军于10月初到达湖北东部的河口。在河口地区同追兵进行了几场小型战斗，红军人数降至2万人以下。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在战斗中牺牲。^[46]10月1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举行扩大会议，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第四次反围剿至此已经失败，必须进行外线战略转移。会议初步决定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红四方面军主力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离开根据地。他们当时希望在入侵敌军撤离后，红四方面军很快能伺机返回。^[47]

1932年10月12日深夜，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共计3个师，2万余人，穿过广水和卫家店之间的京汉铁路向西急行军。当务之急是甩掉追兵。10月16日到达湖北随县之后，召开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以决定今后的打仗方针。一部分人主张在湖北北部反击敌人，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打回鄂豫皖根据地；另一部分人主张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贺龙的红三军会合。两个方案都不可行，第一个方案过于冒险，第二个方案由于红三军正陷于困境而被排除。最终没有形成任何决议。红四方面军没有长期打算，继续向西进军。^[48]

一俟得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消息，蒋介石便重新调配军队。他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战略目标只不过是给鄂豫皖苏区以致命一击并以此为集中打击中央苏区做准备，因此他仅调集不到四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蒋介石将这支军队置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麾下，同时还命令湖北和河南两省的军队在途中阻截

红军。

10月19日，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枣阳，再次遭遇国民党追兵和刘镇华所率的河南军队。刘竭尽全力，欲将红军阻于其地盘之外。红军在战场上又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不得不抛弃数以千计的伤病员。事后党中央在致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你们对于伤病兵的处理，真是不可容许的罪恶。第一次想把伤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之内，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将伤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你们这样行动的结果，使1万多伤病员回到苏区的仅有2000多人。”^[49] 57

11月初，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和陕西交界的漫川关，并在那里里遭遇了萧之楚的湖北军和杨虎城的陕西军。他们冲破包围圈进入陕西腹地到达陕西省会西安附近的蓝田和子午镇。显然，这是为当时临时形势所迫而并非出于长远战略上的考虑。在子午镇同杨虎城的部队作战后，他们被迫于1932年12月初向南退至城固。事到如今，共产党人是该认真考虑长期的作战计划了。^[50]

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十分不满，对其向西远撤更为震怒。11月27日，党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停止向西撤退，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进行反攻。后来，党中央警告说如果红四方面军继续西进，将会受到公开谴责。^[51]

红四方面军内部也产生怀疑，有人表示反对意见。曾中生、张琴秋等人计划向中央派代表，送交斥责张国焘和陈昌浩的报告。张国焘回忆说：“他们制造各种混乱和流言，说如果西进远离苏区，那么只会毫无希望。”^[52]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声称，红四方面军先佯攻陕西尔后回师四川是事前周密安排的。这种说法看来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最后把红四方面军带到川北地区极有可能是军事形势的迫使以及党内和军内的压力。^[53] 1932年12月初，红四方面军在古城和西乡召开了两次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军队停止西进；第二次会议决定在 58

冬季到来之前将军队转移到四川。10 天内，红军部队爬过秦岭和巴山抵达四川北部，夺下通江城并在那里安营扎寨。经过 3 个月的长途奔波，此时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已由 22 000 人减至 15 000 人。^[54]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遇到了发展的绝好机会。国民党中央军已开始对江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所以调回当时追击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杨虎城的西北军不打算追击红军至四川境内，他也无权这样做。由于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四川省经济状况极糟，军事力量也极弱。这使得红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1932 年 12 月 29 日，川陕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1933 年 2 月初，召开首次中共党代会和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又一个全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建立起来。^[55]

正当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立足之际，党中央才开始公开指责张国焘。1933 年 1 月 5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抗议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家长制作风和逃跑主义做法。沈泽民带头签了名，鄂豫皖省委的所有领导人都随后签了名。关于从鄂豫皖苏区的撤退，该报告指出：

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行动（指离开鄂豫皖苏区），在我们看来是违背了国际指令、中共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负责者，当为国焘同志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右倾路线。^[56]

两个多月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党中央 3 月 15 日来信中说：“我们仔细审查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决定造成了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57] 这封中央

来信是发给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的，而并非发给四川北部的张国焘的，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时候张国焘在川北已牢固地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因此中央已不便过分谴责他。由于中央还不想撤回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态度，于是就转而指责起沈泽民和中共豫皖省委来了。

将红四方面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所面临的形势和中央红军两年后撤离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相对照，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并没有像在后一种情况下那样发生上层权力变化呢？鉴于张国焘遭到党中央的反对，看起来这一点似乎更难以令人置信。我认为在众多解释之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张国焘在川北的迅速胜利有助于他平息怨恨、消除异见；更重要的是，鄂豫皖分局与党中央有所不同，任何改变现任领导人职务的决定都不能独立进行。为了解除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分局中的职务，曾中生和张琴秋等持不同意见者不得不求助于党中央并耐心等待党中央做出决定。这样中央就成了一种缓冲器。1932年下半年，中央还未对张国焘和陈昌浩十分不满；而在1933年初，开始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时，张、陈的苦难经历又已经结束了。

第四次围剿和红三军的长征

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围剿战役也包括对湘鄂西苏区的进攻。该苏区的军事进程与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进程大同小异；起止时间大体相同，都由1932年5月起至11月止；最初结果相同，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占领了中共根据地，红军主力被迫进行军事转移（长征）。当然，最终有所差异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快扎住了脚跟，红三军则流落到湘黔边境不得着落。

由于1930—1931年国民党军队主要精力放在对江西中央苏区作战上，而且从1931年底日军入侵东北到1932年初入侵上海期间，国民党还要对付日军，所以湘鄂西苏区在一段时间内军事压力不大，从而得以平稳发展。在夏曦和关向应的政治领导下，以及在

60

贺龙和段德昌的军事指挥下，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V”字形势力范围，由南向北穿过湖北省中部。南端在长江边上的洪湖周围，这里是根据地的中心。北部山区的宽阔扇面地带，大致是红军的游击区域，红军在那里攻下了应城、天门和潜江等几个县城作为战略据点对当地政府构成威胁。在1932年5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以前，整个湘鄂西苏区覆盖了大约20个县，共产党的红三军由3个正规师组成，共计15 000人，还有1万多人的赤卫队。^[58]

国民党围剿湘鄂西苏区的部队被通称为左路军，共计10万余人，由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任总指挥，何成浚有本省5个师所组成的东路军和由四川省的军队及当地保安部队组成的西路军。其基本战略计划是，徐源泉指挥的东路军逐渐侵入，王陵基指挥的西路军留做后卫。

第一个月，战争主要在洪湖中心区域展开。尽管在这个阶段，并没有一场战斗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在敌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红军不得不接连放弃城镇，一步步地被迫自东向西撤退。1932年6月，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符合当前形势的一些重大战略决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形成了决议：贺龙领导的两个师去北部外围积极作战，段德昌指挥的一个师和一些地方军队驻在南部制敌，在洪湖根据地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防御阵线。^[59]这样就形成了两条战线：一条在外围展开攻势，另一条在内部进行防御。期望红军在外线获得几次震撼人心的胜利，这样国民党军队自然会由南部苏区撤出。

1932年7月，在北部前线京山地区展开的两场战斗却都是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的。战斗持续了数周，双方各损失了数千人。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不大的损失，然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却意味着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没有被迫退出洪湖，红军主力反而被迫退回洪湖。^[60]

在此紧要关头，红三军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红三军应即刻召集所有兵力，让地方军队和群众游击队阻滞其他敌军，自己则找出敌军兵力虚弱之一点，坚决予以摧毁。以这种方式求得各个歼灭敌人”。但这种话同对张国焘说一样，对贺龙来说也是无济于事。^[61]

8月、9月间红三军未再受到大损失。在一次战役中，段德昌的军队甚至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整旅。只是敌军兵力甚多，逐渐缩小包围圈，使红军的压力越来越大。贺龙首先突破包围圈向北撤到大洪山。随后，段德昌率领所属红军及赤卫队的一些小部队也离开洪湖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于10月下旬被敌军吞没。先后突围的1万来人的部队在湖北北部随县会师之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战略。共产党军队东西南三面受敌，他们一致同意惟一的出路在于向北方迅速转移。在匆匆整编了一下军队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后，红三军于1932年11月初开始了长征。^[62]

61

红三军的这次长征与其说是一种英勇的战绩还不如说是一次紧急情况下的撤退。它对贺龙这位日后的共产党高级将领来说是耻辱而并非荣誉。也许是由于这种原因吧，极少当事人提及这段故事的细致情节。对此事的文献记载既不完整也不确切，所能得到的极为有限的资料只能使我们对此事知其大略，述其大略。

1932年11月中旬，贺龙率部离开湖北北部进入河南南部。他们所用的地图是从高中地理课本上撕下来的。^[63]他们暗自希望在途中能遇到红四方面军或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但他们所遭遇的是马鸿逵指挥的布置在湖北和河南边界上的强大的国民党马军。该月底，红军不得不绕道西行，进入陕西省的洛南地区。在同刘镇华所指挥的西北军发生冲突之后，他们又被迫调头向南。1932年12月，贺龙率部到达川东，那里的政治和军事状况同其他地方一样不利。他们似乎既找不到充足的兵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新根据地，只能继续且行且战，另谋出路。1933年1月，红三军终于从川东折回湖北、湖南边界的石鹤，停下来稍微喘口气。3个月来的长征几乎消耗了他们的一半兵力。^[64]

在贺龙1930年冒险出击攻打武汉之前，湘鄂边界是他的老家，也一直是他的部队的老根据地。远征归来的红军很容易在这里找到“老关系”，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之后安顿下来。^[65]由于战事稍缓，以“肃反”为名的党内斗争又卷土重来了。这场肃反斗争空前地激烈

62

和残酷。这里有客观原因，过去几个月军事失利造成了各种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地方领导人的逃跑叛变等。这里也有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夏曦的主观原因。大批党军高级干部，包括红三军前政治委员万涛，洪湖根据地创始人段德昌，3个师的所有政治委员，几乎所有县的苏维埃政府主席，都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并遭处决。虽然夏本人也是归国留苏生，但他对老同学毫不手软，该杀的就杀。^[66]夏曦的革命激进立场达到极为可笑的程度，他竟然取消了红军和苏维埃中所有的中共党组织，其目的竟是为了纯洁党组织。什么也没了，当然也就纯了！^[67]

虽然湘鄂边境的老根据地有利于红三军挽救危机，但是某些潜在的政治问题完全阻碍了红三军的迅速壮大。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这就是一个大问题。1933年秋，国民党地方部队开始了一次地方围剿，红三军不得不再撤到川东的黔江；在湘川边界徘徊数月之后，红三军又于1934年初到达贵州东北部。届时，队伍只剩下3000人了。甚至连一向对党组织忠心耿耿的贺龙也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如此继续下去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办呢？”^[68]1933年6月19日，在湘黔边界上一个叫枫仙溪的村子里，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恢复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在贵州东部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肃反运动停止了，还适时地采取了依靠当地红军、保护中农和小商人的政策，并且联络上了当地的农民武装“神仙军”。^[69]在同当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竞争中，红三军终于开辟了一片“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此勉强维持下来，直到1934年10月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到达该地区。

综观红三军由洪湖到湘鄂边界继而到黔东这一时期的长征历程，我们不妨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性的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的三大主力红军当时最弱的一支是红三军。1931年它之所以得以稳步发展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在同中央红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而国民党地方军又将注意力集中于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如果只对付当地警察民团，那么红三军是可能取胜的，其根据地也

是可以发展的。但要像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那样对付国民党数省联合组成的围剿部队，红三军依其军事力量是不能胜任的。红三军所实行的大部兵力在外围进攻，小部兵力在内部防守不得成功，与其说是由于战略战术的运用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军队本身的作战实力问题。

反围剿中的军事失利直接导致了红三军的撤退和长征，这是出于求生救亡的目的，而不是出自什么别的远大高尚的目标。红三军的综合战斗能力本来就弱，长征中又遭到极度削弱，到了1932年底，它甚至都难以克服地方保安部队。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张国焘和徐向前在川北成功地建立新根据地而贺龙和夏曦却难以在川东做到这一点。 63

返回湘鄂边区，依靠旧相识，贺龙得以暂时保存兵力。但他却不能指望再在那里有多大的作为。一般说来，革命需要新鲜的地点，为之提供新鲜的人、物资源和新鲜的战斗精神，而这些往往是老根据地所不再具备的。

最后不妨指出，自1930年李立三时期的东征失利之后，特别是1932年经过了第四次反围剿后的长征之后，贺龙的军队已基本上丧失了政治活力。一方面，贺龙本人是一个军事实用主义观念很重的人；另一方面，夏曦又极其注重思想意识，难以切合实际人事。主要军政领导人不能调和弥补这两个极端，这也许构成了湘鄂西苏区溃败和瓦解的主观原因。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江西中央苏区内正式组建了三个最高领导机构：党的方面，建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以任弼时和项英为副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政府方面，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以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军队方面建立了以朱德为主席、以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70]

64 必须看到，党政军各方面的真正的领导机制同这里所列举的名单也许有很大出入，比如张国焘本身并不在场，自然是挂名而已。就实际行动而言，当时苏区有两个领导班子：与流动的红军在一起的“前方工作”的领导班子和留在瑞金的“后方工作”的领导班子。周恩来认识到战争的重要性，尽管名为党的书记，但他决定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转战前线，而让王稼祥和任弼时留下负责日常党务工作。1932年，大多数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的文件都不是由书记周恩来起草的，而是由副书记任弼时所起草的。这种情况对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共文献十分重要。

1932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宣告成立和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的宁都起义中，有2万国民党军队加入共产党阵营）的鼓舞下，红一方面军向江西南部中心城市赣州发动进攻。^[71]守卫赣州的国民党军队只有马昆所率的一个旅和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约7000人。马昆所率军队准备充分，城市防守严密。彭德怀领导的正规部队和陈毅领导的地方武装共约3万人。他们围攻赣州月余，发动了四次突击，但仍不能攻破该城。红军不但未攻下赣州，反而有一个师的部队被敌军全部俘获。^[72]

赣州之战失败之后，红一方面军恢复了军团制度。事实证明由军委直接指挥所有作战部队的做法是难以取得有效指挥和显著战果的。为了吸取以往的教训，总结赣州战役经验，1932年3月在江口圩召开了军事会议。由于毛泽东没有负责赣州战役，局外人说话一身轻，毛泽东自然对此役的失败提出严厉批评。在江口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跟着林彪的红一军团行动，一时间成为这支部队的实际决策人。毛泽东并未按照军委要求进军湘南，而是挥师向东挺进福建，并成功地攻下了沿海大港漳州。同时，由红三军团组成的西路军转战湘南，但结果并不像红一军团那样顺利成功。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重新改组，朱德继续任总司令。稍后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恢复了总政委职务。^[73]

毛泽东乘国民党中央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交战之机，将军队北调至闽赣南部边界，在南丰地区打了几次胜仗。但9月下旬，

毛泽东停止北进。如果说毛泽东故意避免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那就也许把他说得太有反面意图了。然而，毛泽东也确实不想以自己军队的冒险牺牲为代价来救援张国焘，也不习惯于对苏区中央局毕恭毕敬、言听计从。1932年10月初，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他几乎遭到所有与会者的指责，特别是项英和任弼时的批评最为尖刻。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虽然并不惹人注目，但是他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虽不满毛泽东对红军的武断控制和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的做法，但周恩来也不同意剥夺毛泽东的所有领导地位。最终毛泽东又回到苏维埃政府，从那时起与红军便失去了直接联系。^[74]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一步向东北方向挺进。宁都会议后，其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刘伯承（他在宁都会议上取代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一职）的集体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规模不大的胜利。^[75]

65

国民党军队刚结束在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西苏区的军事行动，就按原战略计划开始进攻江西中央苏区。何应钦仍任总司令。总司令部下辖三路大军，共计40个师40万人，其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中有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约15万人作为主攻部队参加战斗，其他部队作为后备军留守后方。^[76]

红军方面有6万正规部队，分成3个军团，另有2万地方部队。朱德照例任总司令，而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任总政委，成为前线最具权威的人物。但由于诸多原因，主要也是由于周恩来的中庸随和的处理人际关系方式，红一方面军内部加强了集体领导，对外也不像毛泽东从前那样独立于上级党组织之外。

中共中央于1932年底撤离上海，1933年初到达瑞金。新来苏区的党中央领导人的核心是几个年轻的归国留苏生，他们充满了革命战斗热情但缺乏军事经验知识。虽然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他们仍坚持全面进攻战略，命令红军继续围攻以求占领南丰。因此1933年初，在周恩来代表的红军前线指挥官和博古代表的后方党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在1933年1月13日和2月7日的两封电报中，周恩来对党中央的命令提出一些异议，建议最好从南丰

撤军。其中1月13日的电报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它既反映了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反映了周恩来本人的个性。在列举了应该从南丰撤军的种种理由之后，周恩来在电报的结尾部分写道：

66

上述意见，朱、王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我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77]

起初，中央局（其实也就是党中央）并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只是红军攻城数周而不破，不得不被迫放弃攻取南丰的计划。1933年2月，第四次围剿的起初阶段，国共两军在江西苏区西北边界上发生了几场小冲突。之后或出于自愿或迫于形势，红军一步步地后退到苏区内部的黎川一带。陈诚所率国民党3个师则由宜黄向广昌自北往南推进，陈诚希望拿下广昌之后，便开始全面的战略攻势。^[78]

1933年2月下旬，李明所率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所率第五十九师闯入红军3个军团组成的埋伏圈。红军于数小时内痛击李明的部队，继而转攻陈时骥，两天内消灭敌军15 000人。陈诚用数周的时间重新整顿了一下部队，然后坚持向南推进。可惜不久最为陈诚所器重的第十一师亦遭红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如此连遭败绩之后，陈诚难以继续战斗。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就这样告以结束^[79]，红军方面受到胜利的鼓舞，开始反击。两支主力部队奉命围攻乐安城，尽管红军有5 000人而敌军只有2 000人，但是红军仍未能攻克该城。直至撤退以前，红军反而损失了2 000人。^[80]

1933年3月底，国民党结束了第四次围剿，留下一些军队来保卫战略城市。同时红军则声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斗志高昂地回到根据地。由于所有的胜利都是在苏区外围地带所取得的，所以新的

战略战术受到大家的认可。看来红军没有必要以苏区的大片土地为代价而诱敌深入，他们可以“御敌于苏区大门之外”。第四次反围剿的结果也是对于新的党中央的实际确认：毛泽东没有参与指挥，但却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之所以能取胜，是由于国民党在江西苏区进行的第四次围剿只是他们对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和对江西苏区所采取的第五次反围剿之间一个过渡性的步骤；这也是由于国民党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并不像前两种情况下那样大大超过中央红军的兵力，对江西苏区来说，形势也不是那样空前严峻。新的中央领导人将胜利一味归结于新的进攻战略是错的。

67

在毛泽东掌权时，中国官方历史学家将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的胜利归结于毛泽东以往战略思想的延续性影响，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毛泽东以往的战略思想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是诱敌深入苏区，内线作战；第二是集中主力，以运动战逐个消灭敌人。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领导人基本上放弃了第一点而大致上保留了第二点。假如他们完全采取了毛泽东的战略，那么他们肯定会失去大部分苏区土地，却难以设想会取得更快更大的胜利。

从国民党角度出发看来，总体上第四次围剿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首先，国民党清除了共产党三个主要根据地中的两个，击溃了共产党三支主要红军中的两支；其次，国民党吸取了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对待红军，必须改变军事战略。蒋介石曾经认为只要中央军投入战斗，自然就会取得胜利。在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成功增加了他的这种自信心。而在中央苏区陈诚部队的失利使他感到震惊，也引起了他的更高度注意，促使他对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采取更严肃认真的态度。与此相反，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江西中共领导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似乎已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是胜利者，当然认为只要一如既往地按老路走下去，就可以继续取得胜利。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以上所说的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自不同的精神状态上入手，去认识在接踵而至的第五次围剿中双方各自不同的战略方式和战争结果。

第四章

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68 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标志着 20 世纪 30 年代国共两党之间军事斗争的高潮顶峰。它从 1933 年 10 月起至 1934 年 10 月止，历时一年之久，双方投入战斗的军队有一二百万之多，进行了数十场激烈的大战役和不计其数的小战斗。仅此一场战争也值得写一部专著。本书限于其论题和篇幅，只求对这一时期略述梗概，集中说明共产党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军事政治形势和战略战术应用。

对第五次围剿的研究可以揭示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第五次围剿可以说是一场以武力最终决定胜负的国共内战，共产党战败主要归咎于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注重政治而轻视军事。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说是一场综合性政治竞争，其胜负取决于各党的综合政治实力和政治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此期间国民党领导人甚至比共产党领导人更重视政治，后者只是喊政治，前者则是干政治。国民党之所以最后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从一开始便有意地建造宽阔的政治舞台以便更好地表演它的独特的军事戏剧。

第五次围剿的开始

甚至早在第五次围剿开始之前，国共双方就开始大搞军事准备和政治宣传。在国民党方面，第五次围剿在方式上显然不同于前几次围剿。蒋介石已是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并为此确定

了一套全新的政略与战略。

蒋介石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以此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总战略。^[1]这是基本的变化。这意味着建立坚实的广泛的政治基础，而且正是前几次围剿所缺乏的。为了全力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政府与入侵中国东北的日军达成妥协。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入侵日军在塘沽签订协定，“塘沽协定”允许日军实际控制长城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日军则保证不再南进。长城和黄河之间定为非武装区，双方军队都不得进入该地区。^[2]出于同一目的，在全国特别是在共产党积极活动的南方各省恢复实行保甲制度，以便使政府控制基层，切断共产党与当地农民的联系。同时国民党制定严格的政策，封锁苏区经济，不允许向苏区私运商品物资。与共产党苏区贸易盐、药或食品者必遭严惩。在城市里，除了就出版物和公众活动制定严格的规定外，还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情绪和倡导儒家道德传统的方式，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3]

国民党雇用了德国顾问以传授野战指挥的先进作战技术；他们还购入了大批现代化武器，特别是重型机枪、飞机、大炮和通讯设备，用来武装中央军和地方军。^[4]1933年6月，在庐山开始了一项军事训练计划，蒋介石亲任督导，陈诚副之。三期训练班结束之后，排长以上的军官约7500人均已完成训练计划。^[5]他们不仅增长了军事知识，而且还受到蒋介石的思想教导：“恢复已失之革命精神，振兴未竟之革命事业。”所有军官不分职衔高低都要穿同样服装，吃同样的食品，住同样的营房，同样在前线作战。

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下，国民党内各军事派别和地方部队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对付红军的围剿战争。事实上，当时共产党急剧增大的力量已对国民党各军各派共同利益造成了一致威胁，致使国民党内部消除异见，一致反共。

1933年10月，一项宏大的战略计划付诸实施。蒋介石亲临南昌任野战司令部总司令，司令部下属四个纵队。北路军是进攻主力，由北向南集中攻击，它由顾祝同指挥，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军组

69

70

成，有 38 个师共计 40 万人；陈济棠任南路军司令，指挥 9 个师，主要由广东军组成，他们是南线防御力量；何键率领西路军 14 个师，同赣江西岸的红六军团作战并防止中央红军西逃；蔡廷锴所指挥的东路军 6 个师在福建一线牵制红军。1934 年初，蔡部发动倒蒋起义失败后，蒋鼎文接管东路军，这支军队也成为进攻部队。^[6]

国民党有 60 个正规师共计约 60 万人，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运输部队等特殊兵种在内，总兵力超过 75 万人。此外，四五个省的地方保安军和警卫队，也给予配合作战。总算起来，可以说国民党方面约有 100 万人投入了这场围剿。^[7] 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问题，应当指出国民党围攻苏区的全部兵力数超过江西苏区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不少中外作者十分重视——也许有些过分重视——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所采取的堡垒工事的新战略及其对于战争结果的影响。这方面有必要稍作说明。蒋介石采取“堡垒政策”同德国顾问冯·赛克特和冯·法尔肯豪森等人的关系并不像一些作者所写的那样大。^[8] 这实际上已不是什么新手段。20 世纪 30 年代初，一些中级军官如戴岳和柳维元等人就已开始试用此法；后来一些高级将领如何应钦、赵观涛等人在庐山训练班上也建议采取堡垒方式；最终为蒋介石所接受并大加推广。^[9]

71 国民党为堡垒的选址、建筑和保护大费心思。一般来讲，堡垒位于对方难以接近的高处，并且要地势开阔以充分利用火力。坚厚的墙壁是以石头和混凝土砌成的。小的堡垒可容纳十几个人，大的可容纳数百人。^[10] 其目的是更有效地对付红军的运动战。堡垒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红军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攻下堡垒就需要投入大量兵力，花费很长时间。公路再将一个个堡垒连接起来。一般说来，国民党军都能守住堡垒，以待公路线上及时运来援军。1933 年至 1934 年，国民党军队在江西中央苏区 1 万平方英里（1 平方英里 = 2.5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约 15 000 个堡垒。^[11]

蒋介石还提出一种新的作战方针，他概括为“战略上的进攻，战术上的防御”^[12]。所有作战部队都要亦步亦趋，步步为营，逐渐

向前推进，紧紧压缩苏区，最终迫使红军决一死战。用陈诚的话来说是“涸泽捕鱼”。这种作战方针加以“堡垒政策”和“公路政策”为补充从而更为完备。部队每到一地，就在所有的战略点建起堡垒。尔后再修建公路以连接各个堡垒和后备军。在还未完全巩固已攻占的地区之前，不允许再攻占新地区。^[13]

正当国民党精心策划围剿之时，共产党领导人也忙着做两件事：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党内斗争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在以博古和张闻天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看来，两项运动都是必要且有益的。它的目的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然而，作为迅即到来的同国民党决战的措施，两者无所裨益。

1932年3月至1933年1月，罗明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在第四次围剿之初，罗明在两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当前形势和党的工作的看法。他写道：在连遭国民党打击之后，福建西部人民感到惊恐和疲惫。“很多边区的群众上山之后又下山，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之后，又陷入恐慌。现在难以召集他们开会和采取军事行动。敌军一天天逼近，群众、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干部都对主动出击失去信心。”^[14]在罗明看来，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缺乏政治宣传、打击反革命运动、进行阶级斗争或加强党的领导权的做法。“必须认清，所有上述说法也许都是对的，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军事指挥不当。具体说来，就是党缺乏灵活的军事作战计划。……在军事指挥方面，党过于机械；以同样的方案和措施应用在不同的县区是行不通的。”^[15]由此出发，罗明反对党中央所盲目号召的“全面出击战略”和“全民军事总动员”，力争采取切合实际的更加灵活的军事策略。他建议对当地红军和福建西部这样的新根据地所采取的政策应与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有所不同。例如，他认为自己难以完成分摊给他所管辖地区的征兵指标。^[16]

罗明提出他的观点只是为了说明当地实际情况，而并非反对党中央的整个政治、军事路线。在闽西，激烈的战事长达数年，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物质资源都已消耗殆尽。罗明在描写闽西形势时或许是准确无误的，然而他公开向新的党中央领导权威进行挑战却似乎

不太明智。博古和张闻天很快就以最具战斗性的马列主义言词对罗明展开批评。^[17]

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使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在面对党内反对派时政治地位得以加强。于是，党中央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党内。反罗明路线的浪潮首先波及到江西的党组织，指向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他们被指责为同情罗明路线，搞小宗派活动。在苏维埃政府内，邓子恢和何叔衡由于“悲观主义”而遭到批判；在红军中，谭震林和萧劲光因“失败主义”而遭惩罚。^[18]

日本历史学家 Kitada Sadao 对反罗明路线做了专门的研究。正如很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也指出该运动其实都是针对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从分析的角度看或许是正确的，但从实际来看，却不完全如此。绝大多数“罗明路线分子”，特别是罗明本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密切。对罗明路线的攻击并没有直接触及毛泽东。此外必须注意到，与江西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相比，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运动则更加激烈和缺乏理智。在这方面，中央苏区还算可以，没有轻易杀人。^[19]

73 对于“查田运动”更需要有一个深入评价。实际上，共产党领导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土改问题创造一个有利于实现自己政治和军事目的的社会群众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苏区生产力的目的只能放在其次。农民为得到土地的物质利益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却又为参加红军、参加战争而丢掉性命的肉体损失感到沮丧。当他们逐渐知道失大于得时，军事热情开始降温。共产党领导人必须通过查田和土地的重新分配来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如果土地改革做得过了头，那么又会产生不利于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作战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下，又必须重新打出反“左”倾主义的旗号。于是 1933 年 6 月至 9 月，田地调查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很多“农民”被划为“地主”。1933 年 10 月至 12 月是整顿阶段，很多“地主”又改划为“农民”。1934 年 1 月至 2 月间，又开始反对右倾主义、反对富农分子。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迫使这场社会群众运动不得不

暂告一回合。^[20]

总体来看，1933年在中共领导层开展的“罗明路线”斗争和在基层民众中开展的“查田运动”激发了党内外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被证明是暂时的、表面的、脆弱的，并不能为第五次反围剿创造确实有利的条件。党中央领导人虽然对即将到来的战事直言不讳，但他们对整体战局形势和具体作战指挥想得不多，也无可靠的良策；相反，他们只是号召征集一批又一批的军队，这种征兵有时因为日益加码的指标而无法完成，有时则征得一批没有战斗力的士兵。他们似乎只懂得大喊大叫“积极出击，全面进攻”。在和平时期，他们倒可以此自娱，但在战争时期，却是于事无补。人们也可以说，这种叫喊在无用的时候有用，在有用的时候无用。^[21]

福建事变、瑞金会议与广昌之战

1933年10月至11月是第五次围剿的起始阶段。双方在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黎川一带都展开了攻势。国共双方也都宣称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一方成功地攻下了黎川，而共产党一方则在洵口击溃敌军一个师。实际上战争暂时处于僵局。这种僵局如果持续下去，对军事上占优势的国民党一方有利；而对共产党来说，则无疑是有弊的。^[22]

11月20日，福建的国民党军营里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在前交通部部长陈铭枢和第十九路军长蔡廷锴的领导下，整个东路军宣布起义反蒋，成立了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和人民生产党。他们占领着福建全省，控制着东线的六个师和大批当地警察，共约10万人。从陈、蔡所率部队与蒋的中央军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各种矛盾来看，这场暴动是事出有因的，但是它当时仍然令人感到震惊。蒋介石很快由北路军调出11个师以解燃眉之急，第五次围剿陷于停顿达两个月之久。^[23]

回顾福建事变，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它为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胜国民党军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中共领导人并

* 对此，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发言中作了最好的引用。他嘲笑那些主张关门主义的党中央领导人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见[日]本庄比佐子（Honjo Hisako）：《福建事变与中央》，载《现代中国研究报告》（日文），1971（15），6页。

没有很好地争取起义者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事件。那么这一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这一问题至今争议尚多。在几次正式场合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党内“左”倾领导人应负全部责任，他们幼稚地反对与福建军联合反蒋。一些历史学家接受这种观点。*

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是毛泽东本人公开反对与十九路军积极配合，因此还受到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纪律处分。^[24]

在共产党开放内部档案并将所有的1933年9月至1934年2月间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案卷（如果真的还有的话）公诸于众之前，恐怕是无法完全断定其真相的。我在此不妨阐明一下我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来源基于我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基于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贯表现的个性和气质的判断，基于对共产党历史活动的一般性认识——我认为共产党历史并不总是黑白分明的，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复杂过程。

共产党在十九路军起义前几个月就已得到消息。为了公开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陈铭枢和蔡廷锴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需要军事联盟。他们起初试图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但所得到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1933年9月，他们向江西苏区派去陈公培作为密使进行谈判。陈公培在福建前线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作为阵地上作战的军人，当然欢迎化敌为友。彭德怀善待陈，但却无权对此事进行决定。他必须向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人朱德和周恩来汇报。朱德和周恩来本能的反应也是欣喜万分。红军司令部把福建起义的消息报告了以博古和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和政治头脑，他们很容易为突如其来的喜讯激动万分。在欣喜和激动之余，总司令部奉命致电彭德怀，责备他对尊贵的福建客人不够热情，招待不周。^[25]

75 一个月之后，当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真的来谈判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了下来，态度也严肃起来。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待了徐铭鸿和他的助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博古却没有屈尊会见令人反感的“人民生产党”的代表人。毛泽东是一个注重实际、随机应变的政治家，

他易生疑心。极有可能就是在此时此刻毛泽东告诫他的同志们不要轻易同福建军结盟签约，建议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讨价还价。党中央接受了这种观点。这并非因为毛泽东还在掌权，而是因为在博古和张闻天看来，这样做是颇有道理的。对于无经验无主见的人，任何建议都是颇有道理的。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周恩来同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徐鸿名经过数日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后，终于在1933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草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双方立刻停火并划定临时分界线，双方均不可越过该线部署主力部队。在福建或苏区和福建交界处，如有军队阻碍该协议的执行，第十九路军必将其驱逐或消灭。

2. 双方应本着互助合作的原则，恢复进出口贸易。

3. 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应即刻释放在押的政治犯。

4. 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应允许一切革命活动，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活动和革命群众的军事化，应允许群众享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的自由。^[26]

显而易见，共产党对福建方面提出了很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事宜，除了双方停战之外，该协议没有任何积极的条款。毛泽东或许想以苛刻的条件使共产党在联盟中占据主动，但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拿协议上的条款句句当真。在随后的一个月中，他们反复不断地指责人民政府没有逐项履行条款。

76

国民党中央军攻入福建，在建瓯和延宁同十九路军作战，并取得了几次具有决定性的胜利。1933年12月，松散的福建人民政府即将崩溃。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当然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才行，这与其说是为了挽救福建军，还不如说是为了充分利用当时的紧急形势以谋取红军利益。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刻采取行动，从苏区东北向浙江中部发起突击。^[27]党中央也改变了态度，但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他们征求了共产国际和驻上海远东局的意见，求教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原理，最终决定对福建政府采取更加对立的态度。到头来福建政府迅速倒台，中共方

面则一无所得。正如李德所说：“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就如何正确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应该发布什么样的军事声明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但是他们却没有采取什么积极行动”^[28]。

在福建政府倾覆之后，中共领导人还在继续加以冷嘲热讽，直到最终他们发现自身正面临着国民党空前猛烈的进攻。^[29]当然他们也没忘记去乘蔡廷锴之危，试图收买蔡的余部，但遭到断然拒绝。^[30]如果说中共中央领导人从福建事变中还赢得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恐怕就是一个来月的自由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他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得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在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巩固自己的权位。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出席者有中央委员会全体正式和候补委员以及各省党委的代表。据李德说，毛泽东故意不参加，说他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出席会议。据说，毛泽东认为自己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应当在中央全会上做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当张闻天受此委任之后，毛泽东受到冒犯，因而不出席会议。^[31]我们在此只能对这次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一些组织问题做些简要评价。

博古在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作为决议被大会集体正式通过。鉴于第五次围剿迫在眉睫的形势，博古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毛泽东所称的“本本主义”的典型，它文字冗长浮夸却不切合实际。报告称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完美无缺；党的主要任务只不过是同那些没有认识到这些大好形势和完美政策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无情的斗争。这就是博古报告的要点。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不觉得有任何问题，也几乎没有谈及什么具体的战略和战术，只是重复着这样一个口号：“巩固和扩大红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造成百万钢铁战士。”^[32]这是1934年1月，大战已迫在眉睫，然而五中全会竟没有一份关于军事问题的正式报告或决议，这不能不令人惊讶。看来，中央内部的权力关系成了注意的焦点。

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博古和张闻天都未被选为中央

委员。数月后，他们双双一跃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32年，大部分中央领导人都已离开，只有三四个政治局委员留在上海，好歹维持临时中央的名义工作。1933年1月，当该机构移至江西苏区并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时，甚至它不能自称为党中央。有时它被称为苏区中央局，有时它被称为中共中央局。显然，新的领导人对党内的权位缺乏安全感。召开这次中央全会当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五中全会上正式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

紧随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从1月22日到2月1日召开了为期10天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苏维埃运动的一次大展销。特意为召开这次大会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会礼堂；在开会仪式上进行阅兵并鸣礼炮；会议日程上包括颁布宪法和法律，成立由数位部长组成的中央政府等等。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放弃任何努力把苏区打扮成为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全国政府，而不像它实际上那样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地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说：来自全国各地的693名代表和83名候补代表出席了大会，此外还有世界各国的来宾1500多人列席了大会。^[33]然而，至少第二个数字被戏剧性地扩大了，否则就得加上那些赶来看热闹的农民观众。^[34]当时，在为数极少的苏维埃根据地中，没有一个有一般省份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并且都被国民党统治区和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着。尽管如此，为了增加这个国家政府的权威性、真实性，大会宣布中央政府成立外交部，并把所有的几个苏区都命名为省。但就“全苏二大”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关系而言，可以说政府机构的正规化也许对红军征兵和争取当地物质资源有些好处，但它却决定了红军的主要目标是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从而无形中也决定了红军的阵地防御战的基本战略方针。

表 4.1 1934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78

正式成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顾作霖
候补成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凯丰、方志敏
常委会或书记处总负责人：博古
成员：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项英 ^[35]

* 参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6日。信中提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我们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都把它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进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成就的纪录。它也反映了毛泽东同志丰富的革命经验”。

** Waller,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 pp. 84 ~ 98. 沃勒在这里提到的人名中，项英和博古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反对者。至于其他人，我们至多只能说他们既不明显拥护毛泽东，也不明显反对毛泽东。沃勒也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或说明。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把方志敏看作是毛泽东的人只是由于方也是地方苏维埃领导人，在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提到过方的名字。如果是这样，那当然不足以得出结论说，就党内斗争关系而言，方就是毛泽东的人。

同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相反，我认为“全苏二大”对于作为中共政治家的毛泽东个人来说是一场胜利而并非失败。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整个活动几乎成了他的独角戏。1月22日，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接受各界人士的热烈祝贺；1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报告全文长达40 000字，是毛泽东迄今为止所作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也是中共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份正式文件。大会参加者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两天的分组讨论之后，1月27日，毛泽东再次发表演讲，对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称赞这些观点，批评那些意见。接下去几天时间用以检讨并计划未来的苏区政府工作、进行选举和改组苏维埃领导机构。2月1日，毛泽东亲自宣布大会胜利闭幕。^[38]

大会使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外群众、党内干部、共产国际、苏联甚至敌人国民党的心目中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代表的地位。在莫斯科，毛泽东在“全苏二大”上的讲话和其他几篇文章很快被编辑成书，其实成为《毛泽东选集》的第一个版本。如果说苏维埃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革命的主要成就的话，毛泽东为其代表的地位可就不容小看了。”

沃勒在一本专著中曾全面地描述了苏维埃“二大”，他认为在“二大”上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中地位下降了，这一点需要作更深层次的理解才行。为了证明毛泽东的地位受到威胁，沃勒将中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的17名成员截然分为毛派和留苏生派。他认为，朱德、林伯渠、方志敏属于前者而项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李维汉、邓发和其他一些人属后者。他进而以张闻天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为证来说明毛泽东被排挤出实际领导层，而被归国留苏生所取代。实际情况显然比沃勒所说的更加复杂，甚至在派别划分和权力分配方面亦是如此。”

总而言之，就它们同第五次围剿的实际关系来说，1934年1月这两次党政大会对于共产党人失大于得。它们没有对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形势有什么正面影响，而军事形势却正是当时决定中共党人根本命运和前途的最具实际意义的东西。从短期看，会议的召开浪费

了宝贵的时间，分散了必要的注意力；从长期看问题更为严峻，它们造就了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战略方针。

然而，这两次会议对党内关系的影响却是不那么明显的。通过这两次会议，博古等人使他们的整个领导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合法化。对毛泽东等人，虽然这些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降低了他们的地位，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使他们的地位也得以巩固。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正式委员。在五中全会和苏维埃“二大”上，他都没有像在宁都会议上那样遭到指名批评。事实上，除了几个例外，很难说清哪位中共领导人是亲毛派或亲博派。绝大多数人都因时因事改变立场。当权的中央领导人只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他们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地位也未必就下降但很可能是下降；若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在军事上不能取得成功，博古将承担责任而毛泽东必然东山再起。在会议之后，党内斗争的战场很快就转移到广昌战场上。国共两军之间的决战也成为毛泽东博古之间的决战。

80

没有任何一位红军军团指挥员从前线参加党中央和苏维埃的会议，然而由于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领导人在瑞金忙着开会，下面难以开展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34年1月，红三军团在东线缓慢前进，但收效不大。红一军团奉命在西线推进，继而调头向北，然而却未能冲破敌军防线，最终迅速后退。^[37]国民党中央军于1月中旬攻下福州之后，便迅速以更强劲的势头和更高昂的士气由东、北两个方向开进中央苏区。

尽管博古满口的马克思主义语录和革命口号，但他在军事指挥方面却缺乏经验，也缺乏自信。1933年10月以前，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指挥军队。周恩来善于兢兢业业地处理日常工作，却不习惯于像毛泽东那样对上层领导硬抗，而对下属人员硬压。在军事指挥方面，周恩来往往依靠各军团的指挥员。1933年10月，第三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叫李德）到达瑞金时，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38]

博古信任李德有种种原因，而李德也确实精通现代战争和现代

化军事技巧。由于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一项基本战略，所以不再需要新的战略了。所要做的只是研究如何在战术和技术上部署实施防御计划。李德的“短促突击”与其说是一种战略，倒不如说是一种战术。只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战略意识，所谓“短促突击”本身也就具有了战略意义。

作为一名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这种忠诚同他作为一名德国军人对于专门军事职业的忠诚一样强烈。在苏维埃大会闭幕后，李德就正式开始了工作。他严格要求自己，仔细研究各路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他也同样严格地要求红军指挥员，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每一项命令，每班每排一枪一炮都必须准确部署在战略地图所指定的位置上。作战指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文学艺术，而对于李德来说则是一种物理科学。^[39]

81 然而经过与国民党两个月的正面交锋，红军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它反而不得不逐渐向南退缩防卫圈。国民党军队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尾追其后，在所占领地区耐心地构筑堡垒，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最终在北线建成了一个严密而广阔的堡垒网。紧接着，他们又缓慢而坚定地向南推进，于1934年3月中旬到达距瑞金150里的广昌。

四月下旬，国共双方在广昌附近展开激烈战斗。双方打了十几仗，僵持了两个星期，最终共产党方面损失5000人，被迫放弃这一地区。1934年5月初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进而占领龙冈和建宁，形成由北部深刻切入苏区的新攻势。整个军事形势对共产党军队变得更加不利。^[40]

从战略战术上看，广昌战役可以说是直接地应用并检验了毛泽东以后所批判的“纯粹防御路线”。虽然周恩来和张闻天当时发表过几篇有关广昌战役的醒目文章，但他们两人，特别是张闻天，都未直接参与战斗。在此战前，专门成立了一个野战司令部。^[41]博古任司令部政委。这一任命即便不是有意剥夺周恩来的军事权力，也在实际上导致了这一后果。由于朱德作为总司令同以往一样，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是博古行使决定权。进而言之，由于博古本人不

懂军事，所以李德成为广昌战役的真正指挥者。当时李德提出了“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口号，据此红军修建了层层防御工事，每层防御工事都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和火力。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为了在短距离内发起迅速反攻，他们就运用了人波战术：一批批战士跳出防御工事，冲向敌军据点或指挥部。有时他们也能够成功地击溃一定数目的国民党军队，有时则在敌军优势兵力和为数众多的援军面前陷于失败。不过即便能够成功，他们也只能像从前一样守住防线罢了；而一旦失败，他们就将被迫放弃防线并撤向下一道防线。总的结果是他们不断由一道防线撤向另一道防线，被迫放弃一个又一个地区。正如彭德怀所回忆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广昌城最终陷落了。

进攻广昌之敌有七个师，加上一个炮兵旅担任轰击，大约三四十架次飞机担任轰炸。敌人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人也没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情况，黄昏后允许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42]

82

关于广昌之战，我们从国民党方面也可找到与此相似的论述。大多数历史学家也都看到中共党人在广昌战役中采用的战略战术与以前有所不同，试图发现不同战略和不同战果之间的关系。李德却有着他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显然不愿承担责任，而是将广昌的陷落归咎于毛泽东对中央“口是心非”、“言听而计不从”的结果。^[43]作为战地总指挥，李德的观点应予以足够重视，但是他对这一历史所应付的直接责任使上述论断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毛泽东和广昌战役能有什么关系呢！

83 尽管广昌是一个战略要地，广昌陷落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就事论事说来也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至关重要。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共产党人曾丢过广昌以及其他更多的城市，但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这次共产党把广昌保卫战当作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事前大造声势，在事后悲痛万分，这种做法反而使广昌战役真的成了大事。换句话说，丢掉了广昌对于共产党人不仅是实际上的重大失败，而且是精神上的更大失败。与其说它打开了通往苏维埃红色首都瑞金的大门，还不如说它打开了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自信心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激烈的辩论，涉及以往的战争责任问题，也涉及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

抗日先遣队的北征

1934年5月、6月间，国民党军队继续深入中央苏区。顾祝同北路军中的三支进攻部队攻下广昌、龙冈和建宁，并进逼瑞金北面不到100里的石城。蒋鼎文的东路军攻下连城后西进汀州；陈济棠的南路军攻下筠门岭，威胁苏维埃首都南部的会昌，看来从根据地内部保卫苏维埃证明是不成功的，而且前景暗淡。一般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开始考虑改变基本的战略方针。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在1934年7月初派遣“抗日先遣队”突围北上。

84 7月7日，红七军团奉红军司令部之紧急命令在瑞金集合，它被重新命名为“抗日北上先遣队”并立即东进福建。这支部队包括三个师，共计7000人。高级领导人包括司令员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及政治部主任刘英。以上所有任命都与红七军团相同。高层领导的惟一变化是党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派来负责监督全军工作。^[44]在抗日先遣队组成几天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发表了一项庄严声明，该声明由苏维埃政府代表毛泽东和红军代表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签署。声明号召全民族爱国人士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我们不会放弃通过与国民党反动派无数次流血斗争建立起来的反帝革命根据地，这一点不容怀疑，然而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也决不能坐视中国落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不能坐视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者的杀害和奸淫，也不能坐视东北抗日义勇军孤军奋战，因此，尽管我们面临与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决战，尽管有各种艰难困苦，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以最大之决心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45]

正如李德事后在回忆录中所说，“北上抗日”，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红军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如此严峻，使得国共双方都不可能相信红七军团北上同抗日有任何联系。^[46]数年后，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在一篇文章中忆起当时中央所发布的一些命令。中央命令要求先遣队“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47]。

换句话说，红七军团的军事行动是共产党领导人最近所讨论的新战略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基本宗旨是到外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以求分散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红七军团离开苏维埃城市瑞金和汀州后，向东挺进福建，在英勇善战的24岁的军团长寻淮洲的指挥下，红军迅速冲破敌人防线并成功地攻下大田和龙溪口等城市，继而渡过闽江深入福建中心地带。8月1日，红军在水口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最终以后者的溃败而告终。寻指挥部队紧追逃兵，逼近省府福州。一段时间内，红军甚至冲入该市中心。^[48]

红军的突袭使蒋介石感到震惊，迅速调集军队解救福州。国民党又增派了两个整师防守福州，使得红军一个军团难以攻破该城。寻淮洲最终不得不召回攻城部队，9月间红军该部由南向北扫荡东部沿海地带，攻下罗源和宁德两个县城随后又弃城而去，进入浙江。尽管在浙闽边界得到一些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增援，但到9月下旬这支队伍只剩下4000人。^[49]由于没有达到任何确定的战略目标，加上又得到中央红军决定从中央苏区撤退的意外消息，红七军

团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央代表曾洪易建议将红军分为小规模游击队，在崇山峻岭间隐蔽作战以等待时机。而军团长寻淮洲却不接受这种悲观的论调，他坚持继续北上。在浙江常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在所属部下的大力支持下，寻占了上风并于10月初将主力部队3000余人拉到了赣东北部的重溪。

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委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方志敏解决红七军团的内部争论并改组抗日先遣队。方志敏等人到达重溪见到红七军团，随即召开了联席会议。在重溪会议上，方志敏扮演了一种监督员和调解员的双重角色，曾洪易和寻淮洲两人均受到批评并被降级。曾被解除了军事职务，留在赣西北任省委书记；寻被任命为红十军团的十九师师长；红七军团和方志敏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担任总的领导。^[50]

1934年10月24日，改组后的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继续北进，也可以说走上长征的第二阶段。1934年下半年的先遣队高级领导人名单见表4.2。

表 4.2 1934 年 10 月的抗日先遣队

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成员：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涂振农
红十军团司令：刘畴西
政委：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
第二十师师长：刘畴西
第二十一师师长：不详 ^[51]

寻淮洲似乎把对同志的满腹怨气化成了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他立即率领部队开始北进。他越过怀玉山，在常山击溃浙江军两个团，挺进距省会杭州90里之处；由此调头西北直插安徽，穿过宁德和江县，直逼长江重镇芜湖。^[52]同时，在方志敏的指挥下大部分抗日先遣队于12月直接由江西西北挺进安徽南部。为了进一步协

同作战，方志敏把寻部调回司令部。12月中旬，全部共1万人会合于安徽汤口。^[53]

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撤退之后，蒋介石可以很容易地召集大部分军队对付抗日先遣队。王耀武是后来指挥击败方志敏部队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根据他回忆，国民党七八个师和若干独立旅共计20万人参加了这场军事行动，此外浙江和安徽的保安部队和当地警察奉命在各省内截击红军。^[54]

红军部队在汤口停留了两天之后继续北上，由于国民党追兵不舍，方志敏和其他指挥员决定予以反击。1934年12月14日，两军在谭家桥展开决战。尽管红军对王耀武所率一个旅进行了伏击，但却未能给予致命打击，经过一天的激烈交火，红军牺牲300人，最为不利的是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英勇战死在疆场上。方志敏被迫下令撤军。^[55]

谭家桥之战的失利和寻淮洲的牺牲使红军士气大跌，并引起领导层之间的各种疑难。方志敏率部在安徽南部一带辗转月余，却看不到继续北上会有何前途，他于是打算回到赣东北老根据地去稍作休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盘踞在赣西北苏区并在那里建造了密密的堡垒岗。^[56]

1935年1月10日，抗日先遣队或者红十军团停止北上开始南下，沿途不断遭到敌人前后夹击。在方志敏、粟裕和刘英的指挥下，保留下来的部队中有700人好歹闯出敌人封锁区。主力2000人，由刘畴西和王如痴率领仍然滞留在怀玉山北侧。为了履行总指挥的责任，方志敏决定单身再次北上，与部队主力并肩作战。经过几次战斗，到1月底方志敏和刘畴西所率2000人又损失了一半，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只好分散隐蔽于树林里，灌木丛中。王耀武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红军的窘迫处境：

在各部出发后，有时听到一阵一阵的枪声，分散潜伏在山地丛林中的红军人员，在严寒的天气里，数日不得饮食，冻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有的想拿枪向国民党军射击，因手冻

僵，扣不动手扳机，打不出去。有的挣扎着向国民党军投掷手榴弹，因臂及手被冻僵，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补充第一旅各团在搜山中所缴送来的红军人员，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57]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在江西德兴地区被捕。方、刘二人后来在南昌遭到杀害，王则为了偷生叛变自首。抗日先遣队历时7个月跨越四个省的长征最终惨遭失败。方志敏一直认为是自己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导致了抗日先遣队的失败。被羁押在南昌监狱期间，他不断回顾自己的军事失误。下面一段话摘自方志敏在南昌狱中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书，表明了方志敏高贵而无私的自我批评。

早晨醒了，还睡在被窝里，睁开眼睛但未起来。这时候，最容易发生回忆。在回忆中最使我感觉苦的，就是想到这次红十军团的失利！当时，不懂得错误在哪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哪些是错了的，哪些是失败的根源。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哪还会失败？自己哪还会做俘虏？正如刘王下棋，忽一个叫起来：“唉！动错了一着！”蠢才！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我在自己骂自己。有时，我捏紧拳头用力地向自己身上捶一拳，独自忿忿的说：打死你这个无用的人！^[58]

实际上，方志敏的北上使命本来就是一种牺牲性质的，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央苏区领导人的最初目的是试图以“抗日先遣队”为代价扰乱敌后，解除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红军主力放弃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后，方志敏的小股队伍更成了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牺牲品。方所领导的军事活动的真正意义，恐怕在于在东部牵制了为数众多的敌军，由此便利了1934年底至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西部的突围活动；除此以外，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

发后，粟裕和刘英所率领的数百人最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作为共产党领导个人，方的悲剧在于起初他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真实使命，最终他也不明白自己行为的真实效果。

红六军团的西征

89

1934年7月，尽管派出寻淮洲的红七军团或曰抗日先遣队突围挺进福建，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仍没有什么重大的转机，国民党方面只有东路军的两三个师被调去增援福州，担任主攻的北路军似乎未受任何影响，薛岳和陈诚所率两路纵队继续向南进逼以压缩包围圈。是月底，红军总部又派出一个军团试图在另一个方向外围作战。在此情况下，西线任弼时的红六军团被委以重任。

由于缺乏有关任弼时西征初期阶段的原始文献资料，所以对这一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行动研究不够确切（除非作为中央总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这一行动本身也许真的不那么重要），甚至在大陆官方史学界都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在最近出版的《伟大的战士任弼时》中，作者就这样写道：“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任弼时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由他率领湘赣地区的红军作为先遣队突围西征，来掩护中央红军的长征。”^[59]

当时同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将领李觉持相同观点。李觉在回忆录中写道，开始对于红六军团西进的目的并不清楚，直到该军团穿过湖南进入广西北部，他和他的同事们才明白其真正的战略目的。“这时，我们才明白前些时红六军团之突然向西行动，是作为替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侦察湘粤桂黔各省情况的先遣队。”^[60]

正如我们后来将要谈到的，直到7月底8月初红六军团开始西征时，中央红军并未决定放弃江西苏区开始长征，更多的事实和逻辑的理由表明，党中央派出红六军团西征，其目的仍是派遣部分兵力在中央苏区外线作战以分散围剿敌军。这样可使红军主力得以克敌于中央苏区内线，借以挽救江西根据地。从党中央当时对红六军团的指示上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以上总的战略目的。红六军团要奉

90 命完成三项战略步骤：一，冲破敌军包围圈到达湖南东南部桂东地区，展开积极的军事活动；二，到达湖南南部的新田和祁阳，开展积极的军事活动并开辟苏维埃新区；三，渡过湘江，挺进湖南中部并在那里扩大革命根据地。^[61]红六军团在湖南中部的频繁积极活动很可能迫使国民党调整围剿兵力，这样可以打破国民党军队逐渐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的计划，导致江西苏区内中央红军的反围剿胜利。

引起这次远征的另一个为人所忽视的现实因素在于，1934年7月底，迫于湘赣边界的军事形势，任弼时的部队已难以继续驻留在当地。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组建的，由北部的第十六师和南部的第十七、十八师构成，沿着湘赣边界部署在中央苏区西线上。在第五次围剿中，他们都遭到国民党东路军何键部队的袭击并有所损兵折将。^[62]

1934年7月，老根据地永新县失守，红军被迫撤至井冈山南麓。如果让他们自择出路，他们或许会决定分散隐蔽于当地崇山峻岭之间，像前些年那样开展游击活动。如果采取一点新战略，他们或许会东渡赣江与中央红军会师，以前他们也曾这样做过。如果是在一年前，中央或许会像对待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团那样，邀请红六军团到中央苏区。然而现在是1934年7月份，中央苏区自身难保，前途未卜，红六军团只好奉命西进，而不是东渡。

1934年8月7日，除了湘鄂赣边区的第十六师和湘赣边界的一些部队外，红六军团的其余主力部队集结于江西遂川整装出发。经过5天的战斗和行军之后，这支15000人的共产党队伍抵达湖南东南部的桂东地区，在那里宣布了西征的领导人员名单。

一听到红军逃向湖南并向东南出击的消息，蒋介石就命令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键围追堵截。广东军不愿采取行动，因为红军并未经过其辖区。由于害怕红军进入其领地，广西军在北部采取了一些防御行动。惟有何键积极响应号召，因为红军正在他的湖南境内活动。在刘建绪的指挥下，湖南军两个师迅速赶赴出事地点。迫于形势，红六军团并未完成中央关于在湖南东南开

展游击战的第一步作战指示，而是很快执行了第二步作战计划。他们穿过水口、东江、郴县和桂阳再向西进发，到达湖南南部湘江岸边的新田。^[63]

表 4.3 1934 年 8 月长征中的红六军团^[64]

91

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
 成员：任弼时 萧克 王震
 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政委：王震
 参谋长：李达
 第十七师师长：萧克 政委：王震
 第十八师师长：龙云 政委：甘泗淇

根据原定计划，红六军团将在湖南南部开展积极游击战，然后穿过湘江，插入湖南中部的溆浦和新化，活动一番，才能造成战略性影响。但有两个敌师紧迫其后，前面有 5 个敌团在湘江渡口上严密防守，红六军团如果坚持完成以上任务会留下难以设想的后患。他们也曾尽力而为，尝试北进湘中，但仍难免失败，于是被迫向西南方向进发，离开湖南前往广西北部。红军穿过广西北端，于 9 月初折回到达湖南西南角的城步和道东，在此期间广西当局曾派出由廖磊率领的两个师阻截红军。^[65]

红六军团越往西走，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就越少，对中央红军的战略影响也就越显得渺茫。于是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即刻停止西进。军委 9 月 8 日命令中写道：“红六军团作战的最佳地点应在湖南的城步、绥宁和武冈一带的山地”，“红六军团最少要于 9 月 20 日前保持在一地区内行动，消灭敌军旅以下部队，并在当地开展苏维埃运动”^[66]。显而易见，这个命令的真正用意是让红六军团作出牺牲，配合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按照该指令，红六军团决定留在湖南西南部，与敌军进行作战。

92

为了使这些南方省份的国民党军队协同战斗，蒋介石任命何键为总司令。在战场前线，廖磊担任了湘粤联军的最高指挥官。这支由任弼时所管辖的红军部队所面临的形势日益险恶起来。^[67]1934 年 9 月，红六军团坚持留在湖南省西南部，多次与敌军遭遇交锋，虽

然也赢了几场胜仗，但却吃了更多的败仗。10月初，红六军团被迫西进至国民党力量看似较弱的贵州省东北部的黎平一带。^[68]

事实上，红六军团所以能顺利到达贵州东部得益于国民党桂军的自私自利。他们追击红军入贵州，只是想把“共产主义妖魔”远远地赶离广西本省，而并不想过多地投入战事。他们一旦发现红军已入贵州腹地，就认为大功告成，于是便停下来构筑防线以防止共产党人卷土重来。国民党湘军的想法和做法大致也是如此。湘桂军队就地驻扎到1934年10月底，才被突然调回，同刚刚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进行战斗。^[69]

当红六军团10月初到达黔东的瓮安时，任弼时和萧克又收到一封中央军委电报，再次命令他们停止西进，就地作战。这时军委的意图也是明显的，无非是要红六军团尽量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红六军团驻留了几日，不知何去何从。10月7日，在与当地敌军的一场激战中，六七百名战士牺牲，红十八师师长龙云战死，全军只剩下不足4000人。^[70]10月10日，任弼时和萧克联名电告中央军委，已不再是为了请求指示，而只是为了通知军委，他们决定自行其是，将部队分成两部分西进，去找贺龙的部队会师。经过两个星期的艰苦战斗和努力行军，红六军团终于到达贵州、四川和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地区，与贺龙的红三军得以会师。^[71]

由于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各自都处境险恶，双方都不能对对方怀有控制的任何野心，看起来他们对于合并作战都感到高兴。相逢不久，他们便在四川境内酉阳地区召开了联合誓师大会。一个月之后，确定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员，作为惟一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代表，任弼时自然而然地担任了联合部队的党委书记即政治委员。由于贺龙的军事资历和声望，他担任了联合部队最高军事指挥官。为了使两支部队显得平起平坐，红三军又恢复了以前红二军团的名义。当时联合部队还没有一种正式的统一称号，全军共计7000人。^[72]

得益于政治上的团结和军事上的巩固——这方面需要归功于任弼时和贺龙两人各自的努力，再加上大部分国民党正规军已被牵制

在东方应付中央红军长征且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不甚强大，这一切使得联合以后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湘鄂黔川边境地带迅速壮大起来。截至 1934 年底，任和贺的联合部队已经发展到 1 万多人，他们还建立了一块拥有大约 100 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两支红军部队都已恢复了它们原来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活力。

中央红军关于长征的决策

迄今为止，关于共产党人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对于一般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谜。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各种复杂的私人关系，特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之间的关系，中共官方史学界似乎仍未能深入地研究这一历史课题。除了发表在当时中共期刊上的公开文章，西方历史学家所运用到的参考资料只是一些原共产党员现在国外的回忆录，其中最著名的是郭华伦和龚楚的回忆录。

尽管文风各异，但郭华伦和龚楚都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在广昌之战失败后，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共党和军队领导人发现难以从内部保卫中央苏区，于是决定突破国民党的包围而到外部作战，也就是说决定长征。1934 年 7 月份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的行动只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罢了。^[73]

当我们发现郭华伦（或者他所谓的消息提供人陈然）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中层中共干部时，我们不仅顿生疑惑。因为他没有资格出席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军委会议，这种会议再扩大也扩大不到他这个层次。至于龚楚，尽管他在红军中的职位要高得多，但他在《我与红军》及《龚楚将军回忆录》中对历史事实所做的一些明显故意歪曲，不能不使细心的读者也怀疑他的陈述。迄今为止，1975 年出版的李德回忆录就此问题做了最为确切和详尽的描述。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错误和偏见，但是李德当时的确是最高军事决策者之一，至少他并不是在故意编造花哨的童话。

94

其实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就曾有过突破国民党包围圈到外线作战的构想，只是当时提出这种想法是主动进攻性的意图，而不是后来那样出于被动防御性的局面。1934年5月初，中央领导人召开了多次会议检讨广昌战役。参加会议的一般是当时在瑞金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张闻天等人同博古等人进行了争论，但主要是追究过去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将来的行动，是关于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当时有谁会想到要放弃中央苏区！^[74]作为会议的结果，前线司令部被解散，博古也丢掉了前线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仍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对军事负总责。周恩来则认为，通过建立更有效的防御在苏区打更多的胜仗，就可以在持久战事中挫败敌人的围剿。^[75]李德因广昌失守招致指责，为了替自己“短促突击”的战术辩解，他写了几篇文章辩护这一战术并劝说一些军团的领导人，特别是林彪和彭德怀也跟着这样做。虽然林彪和彭德怀都不是十分喜欢李德和他的这个口号，但也都分别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76]作为下属军人，彭和林想必是以此举来证明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一般性忠诚罢了，他们当时对中央内部分歧所知甚少，也没去多想。

5月到6月，国民党继续压迫。此时军事行动的变化更具战略性的变化。7月，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才奉命到敌后作战。此举表明了周恩来战略思想的转变，即从希望通过打赢每一场战斗来赢得整个战役，到通过派遣部分红军去分散敌人注意力、外线牺牲部分红军以保证红军主力的内线活动的转变。共产党领导人仍不愿放弃中央苏区，他们不惜代价来拯救它。8月中旬，红六、红七军团并未使形势有大的转机，而北东两线的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认真考虑撤离苏区而整体转移的问题。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对长征的决策过程给予了重要的描述。

政治局要求我起草一份从9月至10月的新的季度作战计划。经周恩来修改，政治局常委通过后，计划的提纲经由上海传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准备该计划期间，我与周恩来之间首

次出现了意见分歧。我最初的想法是让第三军团穿出包围圈，不然就在中央苏区内部进行战略防御。尽管敌人的多层堡垒网使之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可能保证主力返回。至少从长远来看这将使苏区成为一个强大的游击根据地。

现在，周恩来力促脱离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行政机构、后方服务机构、军事设施以及大部分在苏区内部和边界地区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独立地方武装力量。博古同负责实际安排的周恩来达成一些妥协，但周恩来仍是占了上风。据我估计，转移的人数只是略微降低了10%至20%。^[77]

李德并未准确说明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是由于这是在红六军团西征以后不久，所以很可能是发生在8月上中旬。这可以从1934年8月18日周恩来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新形势下的新胜利》一文中得到证实。此文已经公开号召“战略性转移”。周恩来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写道：“我们必须坚决地开辟一条通往敌人后方的道路。在敌后打击敌人……以开创新局面而不是返回老苏区。”^[78]

当时的情况和以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章，并不是在表达已被中央所正式接受的决议，而是在通过宣传寻求对尚未获得正式接受的意见的支持。至此，我们所能断定的长征的决策程序是：先是在8月上中旬，周恩来与李德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后，博古参与协调，三位首脑人物达成了协议，随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项英和陈云讨论并通过，后来便将一份纲要送往莫斯科。8月下旬政治局和军委得知这一决定，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毛泽东被从南方召回瑞金。9月初各军团首长接到通知，但是通知的具体程度只限于“他们在各自辖区需要采取的某些军事行动”^[79]。直到9月底和10月初，下级指战员才略微有所知晓，至于普通战士只到10月中旬决策实施才知道。当然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同他们本身行动有关的内容。

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他发表于《红色中华》的一篇文章

* 实际上，张闻天与博古之间的分歧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时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可参见张发表在《斗争》（1933年5月1日和11月26日）、《红色中华》（1934年5月1日和5月25日）上面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表达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若干意见。

章中明确讲述了关于长征的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章的题目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该文章称，为了赢得苏维埃运动在全国的胜利，可以放弃并撤出部分苏区。^[80]周恩来当时的文章只谈军事问题，而张闻天却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关于党内斗争的观点。张把当时仍持有在苏区内部保卫苏维埃观点的人称为机会主义者。现在看起来，张闻天在这里显然表示了他同有些中共领导人，尤其是博古，持有不同意见。*

为了在军事上绝对保密，同时也为了避免最高领导层之间产生分歧，正式成立了“三人团”，旨在具体执行转移任务，周恩来为总负责人。^[81]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和盛忠亮（即盛岳）先后被捕叛变，向国民党泄露了红军关于转移的基本计划。因为党中央一向是通过上海局电台同共产国际联络的。上海局被破了，电台被缴了，这倒也使中共中央得以摆脱第三国际的纠葛，因为等待第三国际的批准至少会推迟行动。上述因素使得有必要也有可能提前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82]

在西方有关的历史著作中，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后期的地位和表现也是一个谜，不少作者有过分戏剧化的毛病。在这方面，龚楚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据龚楚说，广昌战役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被放逐到江西苏区最南端的于都，毛泽东被撤销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他不能参加任何党和军队的会议，人们对他不屑一顾。书中对他本人同毛泽东的一次偶遇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据说在1934年9月，在龚楚就职赣南军区司令员赴任的路上，碰巧在人群中发现了毛泽东。龚楚说他当时刚领到十块银圆的特殊津贴费，于是就买了一只肥母鸡和两个猪蹄子。他让警卫员先把这些东西送到毛泽东的住处，由毛泽东的妻子做熟，在晚上9点钟，他便独自去与毛泽东共餐共饮。这时故事出现了高潮：“可谓酒后吐真言。我们一起回忆了井冈山的旧时光。毛泽东长叹一声说：龚同志，自从我参加革命，我三次被开除党籍，八次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这次他们又把广昌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给我一人。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他讲到这儿，不禁潸然泪下。他不断轻

97

咳着。在豆油灯微弱光线的映照下，他的双颊显得愈发瘦削和苍白，他的神情极为忧伤。”^[83]

龚楚关于1934年夏毛泽东处境的描述由一个作者传到另一个作者，每一个人再增添上自己的修饰。约翰·路认为毛泽东不仅是被放逐，而且极可能是被囚禁在于都。^[84]

1934年头几个月中，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层中已不再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事实。在苏维埃政府中，毛泽东被笼罩在张闻天的阴影下，这也是事实。但是毛泽东的实际处境并不是那么悲惨可怜，更不用说其潜在影响了。作为政治局和军委的成员，毛泽东知道所有党和军队的重要决定，也有资格参加党和军队的最高层会议，实际上也参加了不少会议。在苏维埃政府里，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作为国家首脑一个作为政府首脑，平分秋色，毛泽东掌握着一定实权。由于所有的政府工作都得服从于战争，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没有什么独特权力，但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闻天也没有什么独特权力。”

广昌战役之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战局已属不可逆转。加之党政军权集中于“三人团”手中，于是毛泽东起初是逃避出席会议，后来又离开瑞金前往前方视察。这一切都出于他个人意愿，同被流放和被监禁谈不上的。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和回忆录可以看出，从广昌战役结束到长征开始以前，毛泽东曾经做过两次外出旅行。5月份，在参加军委和政治局会议之后，他离开瑞金到达苏区南部的会昌。同行的有他的警卫，没有他的妻子。路过会昌城时，毛泽东写了一首相当有名的诗词题为《会昌》，诗文如下：

清平乐

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 至少，毛泽东参与了讨论福建事变、检讨广昌之战、决定红七军团出征等问题的会议。至于张闻天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情况也很复杂。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作为（博古）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这实际是博古‘一箭双雕’的计谋。一方面可以把我从党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载《遵义会议文献》，78～81页，北京，1985。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85]

仅由一首小诗确定毛泽东的整个思想状态或许不太充分。然而我们起码难以看到龚楚所描写的那种极度的伤感和消沉。恰恰相反，诗文反映出作者的远大抱负和坚定意志。在会昌地区，毛泽东接见了当地的苏维埃首脑和红军将领，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似乎都可以发号施令，并不存在那种人不理他他无理人的现象。

6月底，毛泽东回到瑞金附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沙洲坝。他留在红色首都并参加了有关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军事行动的讨论。如果说毛泽东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上签字还可能只是借用名义而已，那么发表在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上关于《目前形势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谈话足以说明他本人实际的活动和作用。^[86]

建宁和连城的迅速陷落阻碍了毛泽东原来想去东部前线的行程。于是，8月初他又离开瑞金郊区的家，同警卫人员一起前往西南线的于都。这次行程并不愉快，主要由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而非由于政治原因。1934年9月，他身染疾病在于都卧床一个多星期。显然在最高领导层的委派下，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亲自前去治疗并照顾毛泽东。毛泽东康复不久，奉命赶回瑞金。当时共产党领导人正在筹划战略大转移，需要同毛泽东商量。^[87]

反驳龚楚的故事虽易，但要说清毛泽东两次外出的真实目的却难。我倒同意李德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出于以后党内斗争考虑而有意避免卷入目前领导事务。在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有权谋的政治家都采取过这种政治手段。*

事情很清楚，自1934年初以来，毛泽东就使自己成为中央反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赣西、赣南逗留在很大程度上是故意的。这有点像袁世凯1909—1911年隐居彰德，蒋介石从1927年到1949年间几次回奉化老家。他们有着同样的目的，形势不利时故意隐退，等待日后的召唤和复出。

对派的主要代表人。如果当权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能打败国民党，粉碎敌军进攻，那么他们还会继续保持住已有的领导权；如果他们不能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取胜，那么他们就必须负责，就难以阻止毛泽东东山再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此时要做的事只是等待。”⁹⁹[88]

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独自一人同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唱对台戏。⁹⁹打了败仗，丢了苏区，各种人事问题就都来了。有些其他高层领导人也产生了不满情绪，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张闻天和王稼祥。正如李德所承认的那样，1934年夏，由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所组成的中央反对派“三人帮”已经开始形成，同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所组成的中央当权派“三人团”越来越明显地对抗起来。^[89]

第五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100

1935年1月，也就是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之后的3个月，共产党人突破乌江天险，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他们在遵义休整了两周左右的时间，并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曾引起中外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兴趣。反过来说，他们对于这一事件的高度重视又增加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性，甚至到了一种夸大的程度。这里不免涉及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或者基本矛盾：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究竟应该是从当时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呢？还是应该从事后的深远影响的角度出发呢？乃至是从现时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呢？对类似问题及其答案，不思考不行，多思考也不行。

在关于遵义会议的卷帙浩繁的中西方著述中，以往有不少基本事实性错误。比如有关会议时间、参加人员，会议进程、会议决议等方面均有明显错误。现在还有一些争议之处，不过不多了。前些年，我曾专文核实和澄清过遵义会议的史实细节。^[1]而本章的主要兴趣则在于，将遵义会议同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予以说明，同时以遵义会议的决议作为基础，比较宽泛地总结一下中央苏区前后中共的军事路线。

长征初期

关于江西苏区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开始时间和参加人数，众说纷纭，而且相互矛盾。我们仔细研究有关论点和根据后就会发现，这里所争议的与其说是确定某个特定的日期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准确定义“长征开始”的问题。

1934年10月10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为“战略转移”作准备和动员的联署命令。与此同时，红军指挥部一些单位受命离开瑞金办公地点，开始向西南方向转移。10月16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完成整编和动员的准备工作，迅速开赴敌人的封锁线。*

10月21日，红一军团占领了新田，两天之后红三军团拿下了古陂。这样，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就被撕开了。同一时期内，党中央和军委全体出动，迅速穿越新田—古陂线，再折西向，渡过信丰河。如此看来，10月10日、16日和21日都可以作为长征开始的日期。我个人认为，由于10月21日这一天中央领导机关和全体红军部队都参加了转移活动，似乎是最为恰当的长征开始时间。

以前说长征最初参加者有100 000人是不准确的。周恩来和李德后来都承认这个数字是出于蒙骗敌人所作的夸大宣传。李德根据个人的笔记，估计人数于75 000人到81 000人之间；大陆官方说法是86 000人。我想还是大陆说法最为准确可靠。李德计算的只是“中央红军纵队”的全部兵力，可能没有包括农民自愿者和受雇佣的挑夫吧。^[2]李德还忘了提及，1个红军正规师，8个独立团，还有一些地方力量，总共30 000人，由项英和陈毅负责指挥，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长征初期红军领导人见表5.1。

101

* 参见《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1934年10月9日，以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1934年10月10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期，148~150页；另参见伍云甫：《长征日记》，载《文史资料》，第72期，1~2页。10月11日，军委和党中央离开梅坑的办公地点，在于都暂作停留。10月21日，迅速赶往古陂和新田。还可参照《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卷中的行程日程附录，423页。红一军团10月16日离开营地，10月21日攻占新田。

表 5.1 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1934 年 10 月）^[3]

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朱德
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总参谋长：刘伯承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第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
政治委员：聂荣臻
第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
政治委员：杨尚昆
第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
政治委员：李卓然
第八军团：
军团长：周昆
政治委员：黄甦
第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
政治委员：蔡树藩
军委第一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
军委第二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

即使真如李德所说，过去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伤及中央红军的基本兵力和高昂士气，但从中央苏区的撤退却显然是由于军事失败的结果。国民党说是红军战败脱逃，也是不无道理的。正如毛泽东本人以后也承认的，长征初期除了逃出国民党的包围、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外，共产党人对前往何处、如何行动并没有什么长期性打算。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有太多的异想天开的想法，而没有一个确定的想法。^[4]

突破第一道堡垒线后，红军直向西行，10月下旬抵达湘赣边界。次日，红军编列成三路纵队：第一、九军团组成左路纵队，第

三、八军团合成右路纵队；这两路纵队的任务是扫清两翼，开辟道路。党中央和军委所在的中央指挥纵队居中，由第五军团殿后保卫。前面是敌人的第二道堡垒线，位于湖南东南部，从桂东一直延伸到汝城。^[5]

汝城和桂东地区正是红六军团两个月前经过之处。中央红军却面临他们带来的更为不利的影响。尽管能从红六军团发来的电报中得到一些讯息情报的帮助，但是国民党在红六军团走后对该地区加强了防备，中央红军遇到了更为顽强的抵抗。幸运的是，这一次共产党人的力量也比前一次强大多了。 102

11月3日，红一军团成功占领了城口，同一天红三军团向南方挺进，占领了汝城。这个红军主力兵团各自把国民党广东军抵制在城口以南，把湖南军抵制在汝城以北，打开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8日，红军指挥纵队迅速从夹缝中穿越封锁线。11月10日，广东军李汉魂部“咬”了红军殿后部队一口，使红五、红九军团在延寿圩附近遭受重大损失。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的首次失利，毛泽东借此开始批评党的领导层。 103

蒋介石从该战役中知道了红军的意图。在此以前，蒋并不能确定共产党是在假搞外围佯攻，还是果真全面撤退。^[6]现在很清楚了，共产党是在进行长途整体转移。蒋为此成立了特别指挥部，第五次“围剿”中的西路军首脑何键任“追剿军”总指挥。何所辖不仅有湖南军队全部，还有薛岳指挥的北路军的十二师。尔后直到1935年秋，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始终是追剿红军的先锋，红军所到的各省的地方军阀部队只起阻击作用。^[7]

在蒋重新部署期间，红军乘机继续西行。在良田和宜章与地方驻军几次冲突后，红军将粤汉铁路沿线的另一道封锁线抛在后面，并于11月中旬进入湖南省南部。在临武和蓝山地区，共产党人赢得了几天喘息时间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两个月以前，红六军团也曾抵达过该地区，任弼时和萧克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下尝试过强渡零陵附近的湘江，去湖南中部开辟苏维埃根据地，结果不行。现在中央红军不再这样设想了。

104 中央红军领导人本来倒是考虑过在湘桂边界创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后来他们抵达该地，发现也根本不可行。从心理上来讲，中央领导人不愿求助于一个下属苏区或红军部队，而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崭新的根据地，据此而同其他苏区和红军队伍保持一种战略协调关系。中央嘛，就得是中央。部分源于此种自负心理，毛泽东提议不能一味避战退却，先对国民党打几个胜仗，才能创造机动和主动。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军事委员会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者中有周恩来、博古、朱德和李德。最后仍决定红军避免与敌人冲突，渡过湘江，继续西行。^[8]

湘江沿岸是国民党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是中央红军迄今为止的长征途中最艰苦的战斗。中央领导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中央指挥纵队的缓慢行进速度，延误了一些时间，截至11月25日，赶来湘江阻击红军的国民党三路大军总共15~20个师200 000人，已各就其位。刘建绪指挥的湖南军队由北抵达湘江岸边的全州城；白崇禧所辖的广西军队在灌阳和湘江边的另一座城市兴安（离全州南约100里），守候红军到来；从东面尾追红军的是由周浑元统领的薛岳部队。^[9]

在这种形势下，林彪的第一军团重新分到右路纵队，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划归于左路纵队。红一军团没有拿下全州城，但是占据了城南江边一个要点，红三军团也在兴安城北夺下了个据点。11月27日，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了湘江约60里长的地带，以便让中央指挥纵队渡江。^[10]

根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党中央和军委所在的中央指挥纵队那天还在距湘江160里外的文市。如果指挥纵队与战斗部队以同样速度前进，就能在一天之内渡过湘江。可惜指挥纵队每天只能以40~50里的速度爬行，所以4天后才抵达湘江。^[11]红一、红三军团指挥员敦促党中央加快渡江速度，而后者则命令前者坚持守住渡江通道。^[12]11月28日至12月1日四天内，为保卫渡江通道畅通，让中央安全通过，剧烈的战斗使红军部队损伤惨重。多亏红军官兵的奋勇战斗，还有桂系军队由南后撤以防止薛岳的中央军趁机侵入

广西地盘，党中央和军委终于渡过了湘江。^[13]

红军方面的损失除去保卫河道部队的大量减员之外，还包括作为后卫的红五军团的两个师和红八军团。加上此前的损失，红军力量由长征开始的 86 000 人降至湘江之战后的大约 40 000 人。

只有李德认为这不算什么重大损失。他在承认红军各部减员后，对湘江之战总结道：“根据周恩来的撤退计划，新编部队主要由没有经验的自愿者组成，而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据总指挥部估计，夺取贵州东部黎平后，新编部队人员损失达 50%。后备师损伤达 25%……久经沙场的红一、三、五、九军团中，牺牲极其轻微。”^[14]

上述说法再次表明这位普鲁士军人信心十足，绝不服输。然而牺牲数目也许不如一些历史学家，如陈志让，估计的那么高。陈把湘江之战称为共产党人的滑铁卢，未免有点过分。

国民党方面的报告同样证实了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15]晏道刚是蒋介石指挥部的侍从室主任，他曾目击了湘江之战：“湘桂边的追堵战役进行的时间将近两周（由 1934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2 日），真正苦战的时间约为 1 周。国民党方面使用兵力二三十个师。在此期间蒋介石聚精会神，行营里函电交驰。此战红军牺牲、损耗很大……惟蒋意犹未尽，责怪桂军避开正面战场，以致功亏一篑。”^[16]

红军把桂军和湘军抛在后面，在湘江东岸又不得不扔掉了笨重的器械。1934 年 12 月初，红军到达湘西南隅角，军事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军离江西苏区根据地越来越远，进入了西南高原。党的领导人注意到，战士们渐生不安情绪，不知他们将往何处，意欲何为。聂荣臻指出兵力补充困难后回忆道：“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前途，说明部队向哪里去。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军团会合。”^[17]

* 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5, p. 189. 作者认为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损兵达 50 000 人，牺牲殆半。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红军长征时人数并没有 10 000 人，且在突破以前几道敌人封锁线时就有牺牲减员。因此，红军损兵至 40 000 人，并不是红军在该次战役中牺牲了 50 000 人或 60 000 人。

并不光是战士们要知道确切答案才放心，其实党的军队领导人也要从中得到慰藉。于是，12月初红军到达湘西南时，出现了向北与贺龙、任弼时会合的说法。一段时间里，全体红军都为该计划所鼓舞，但不久由于国民党的追堵行动，该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便只得放弃了。薛岳没有听从蒋介石的指示，前往新宁与周浑元部会合，然后开向城步追堵红军，而是建议两支部队向西北方向前进，在武冈、洪江、芷江一带守候红军到来。^[18]薛岳的行动使得中央红军不可能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共产党人在湘西南顶端的通道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李德与毛泽东的关于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对立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建议红军暂时原地不动，俟国民党军队离去，部队再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持部队继续向西前进，在贵州北部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次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改变了力量平衡，李德的计划被否决了。12月15日，红军全体抵达贵州黎平，在黎平的两天里，部队得以休整。红五军团与红八军团在湘江之战中损失惨重，两部合为一部，红八军团番号被取消。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会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指挥员林彪和彭德怀应邀参加了会议。向贵州转移的计划被正式采纳。黎平会议除了决定在贵州北部开辟新的根据地外，也已触及到了党内矛盾：“这些矛盾将尽快俟机解决。政治局决定以后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以检讨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与教训。”^[19]

黎平是中央红军重蹈红六军团行军路线的最后一站。此后红六军团折向北进，与红三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则继续西行进入贵州，
107 寻求新的希望。在这片荒凉的高原上，能否成功地建立新根据地尚属次要考虑，贵州敌人力量的空虚至少可以缓解两个月以来的沉重军事压力，补充物资方面的严重匮乏。

经过两个星期的连续行军，红军在1935年新年到来之际抵达乌江沿岸。薛岳的军队已被远远地抛在湘西。红军前面是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疏于防卫，易于攻取。随着1934年的结束，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阶段也告一段落。红军以损兵折将殆半的代价，从国

民党的封锁包围中转移出来。^[20]

遵义会议的召开

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仍在湖南西部的洪江与芷江地区，因此截至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面对的只是贵州地方武装部队。从数量和战斗力上看，贵系军阀部队远不能与红军较量。经过两年的省内混战，到1934年，王家烈好歹名义上算是统一了贵州。王家烈知道，他手头上黔军两个师不足以对付中央红军，于是他就一路尾追共产党从黔东北到黔北地区，不敢与红军认真作战。然后王命令他的人马退回到黔中，保卫省会贵阳，如有必要，甚至准备逃窜到广西去。^[21]驻守在贵州北部的是国民党的另一位地方军阀侯之担，拥有一个师和一些警备部队，不足1万人，其中有4000到5000人散布在乌江沿岸200里长的十几个要塞渡口。该区重镇遵义只有一个旅驻防。^[22]

1935年1月1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了乌江岸边的江界，而中央纵队仍留在100里以外的猴场（现称草塘）。前线工程队正在建浮桥，其他部队正在欢庆新年，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的决议重申在川黔边界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决议指出：“首先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这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23]

猴场会议决议的另一段提到：“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将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4]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共产党在进入遵义前就已决定要召开关于军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中央的现任领导人显然更愿意讨论目前的军事任务，而不是总结过去的军事教训，更不用说追究谁来承担责任了。

尽管事后不少人把抢渡乌江描绘成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样子，实际上没有那么戏剧化。对抗双方兵力和战斗力都很悬殊；红军成功突破乌江，顺利占领遵义，这一点黔系部队和红军方面都早

* 参见 1935 年 1 月 1 日朱德致林、聂、彭、杨等人的电报，载《黔山红迹》，229 页。朱德电文中说：“驻防乌江南岸的是侯之担的三个团。他们绝不可能守住沿岸 100 里的渡口。”侯汉佑是黔军侯之担部负责乌江防务的头目，他回忆道：“当时我们认为红军有 100 000 人之众，我方只有 5 000 人到 6 000 人。我们怎么赢得了红军呢？”载《文史资料选编》，第 62 期，97 页。

就意识到了。”

1 月 2 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夺取了江界和孙家集这两个渡口。侯之担很聪明，不顾部下死活，一人逃跑了；但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由于他的临阵脱逃，几个月后蒋介石逮捕了他，并判处死刑。

随着侯之担部队的溃退，中央红军迅速占领了遵义城。红军进入遵义的准确顺序如下：1 月 7 日，红一军团拿下了遵义城；1 月 8 日，红军总司令部随后入城；1 月 9 日，中央军委和党中央也抵达遵义城。在这种实际情况下，1935 年 1 月 9 日之前，不可能召开共产党的任何高层会议。以前通常认为 1 月 6 日是遵义会议的起始日，这是不正确的，现在中国内地学界已获共识，国外学者也没有道理不接受。^[25]

共产党在遵义城做的第一件事是组成以刘伯承和陈云为首的卫戍司令部，然后他们宣布了对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宽大政策以及约束红军部队和战士的严格纪律。前者包括“部队不得进驻企业商店”、“没有政治部的许可和严格审查，不得没收当地豪绅的财产”；后者包括不经特许任何部队（安全部人员和政治部人员除外）不得擅自进城，严禁官兵“随地大小便，等等”^[26]。

随后共产党人进行了更为实际、具体的工作。他们恢复和改革了遵义城的行政管理系统，以便让一般居民过上正常的生活，并把部队分派驻守在城市周围的各个战略要地。更不用说，共产党人不会忘记共产主义宣传。^[27]上述举措各有自己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都可以把它们视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全面准备工作。遵义会议显然不像有些作者认为的那样是一次仓促发生的军事政变阴谋。^[28]

109

周恩来致刘少奇和李卓然的电报，是遵义会议何时召开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电报内容如下：“少奇、卓然同志：15 日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请速于明天（14 日）赶来遵义（1 月 13 日 24 时）。 ”^[29]以该电文为基础的进一步研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最有可能是在 1 月 15 日晚间开始的。^[30]

除了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伍修权（李德的翻译）和邓小平（会议记录员）以外，党和军队的 18 名高级领导干部都正式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选拔会议的正式参加者有以下两个具体标准：政治局正式或候补委员，中央军委或主要军团的领导人。比较抽象地说，他们都是党和军队中居核心地位最具实权的人物。遵义会议参加人员见表 5.2。

表 5.2 遵义会议的参加者^[31]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央军委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
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

值得予以说明的是，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而红军八个军团领导人中，有五个出席了会议。由于红一、红三军团是红军的主力，因此这两个军团的四个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了会议，虽然林彪和聂荣臻还不是中央委员。红五、红九军团新近组建，力量较弱，这两个军团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李卓然是个例外。李卓然是中央委员，又是兵力相对强大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所以他也参加了遵义会议。从出席会议的人选看，遵义会议的召开有政治和军事双重考虑，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权力构成。严峻的局势迫使共产党人把党务重心从政治转向军事，这一点也可以从遵义会议参加者构成上得以体现。饶有趣味的是，中国官方有关遵义会议的文本把邓小平和伍修权也列为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实际上，当时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并不符合参加会议的任一标准。他是作为会议记录员出席会议的。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更是单纯服务性质的。如果李德会中文，就不需要伍修权了。我们使用“参加”和“出席”两个单词，在英语中也许区别不大，但在汉语中区别较大，而在这里的实际区别则更大。陈云有关会议的手稿的权威性和确切性不容置疑。将邓、伍两人列为会议参加者，显然是因为他俩都是

110

现任中共领导人，官方历史学家宁愿让历史研究服从于政治需要。^[32]

1月15日到18日，这18位党军领导人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情况下连夜开会。遵义会议的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三次讲话，讲话记录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过情况很明显，已经出现了对现任中央领导的三种态度：维护、调和和挑战。

博古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表讲话。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他代表政治局作总的政治报告。他的讲话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对1934年党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进步的冗长的陈述。谈到无可否认的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时，他强调面对百万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各种困难，企图为政治局和他本人开脱责任。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他代表中央军委作军事报告或曰补充报告。尽管周恩来名义上不是军委主席，但作为党中央代表人长期主持军事工作。他不得不更多地谈到过去一年中军事工作的失败和军事领导的失误，但是他避免把错误说成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则直言不讳，作为会议的第三位发言者，他作了精心准备的、长篇大论的讲话，回顾并批判了政治局和军委的错误军事路线。

111 会议第二阶段，会场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讲话后，其他政治局委员相继发言。他们的发言先后顺序没有准确记录下来，难以确定。很可能是这样的：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和何克全。前四位发言人都不同程度上应声附和毛泽东，批评中央领导人的军事错误，只有何克全在会上明确支持博古和李德。

在这一阶段后期，讨论气氛热烈起来。非政治局成员的军队干部也觉得是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以往打了败仗，不能朝下怨士兵，就得朝上怨官长。彭德怀抱怨李德瞎指挥；刘伯承批判了过去的军事行动，并对今后行动提出了建议；聂荣臻也作了类似的发言。李德无力招架，只是垂头丧气，一言不发，闷在会议大厅一角抽着烟。显然整个局面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及代言人毛泽东。^[33]

会议第三阶段，朱德和周恩来公开表态，形势更加明朗化。周恩来作了第二次发言，他这次不是像上次那样作为党和军队代表，而是作为个人发言，把以往的军事指挥上升到错误军事路线的认识上。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位尊权重，又是军委实际负责人，他的表态对双方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会议桌前唇枪舌剑之余，毛泽东还聪明地去做了周恩来夫人的“家庭工作”^[34]。一旦朱德、周恩来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联合起来，博古和他的人就没有希望再挽回颓势。会议没有举行投票和选举，大家都赞同毛泽东的说法，即政治局和军委应对错误的军事路线承担责任。会议第三阶段可以说到此结束。

会议正式决议以及政治局和军委领导的重新组建应该是，实际上也是，在政治局成员的军团干部离会返回各自部队后，由政治局单独完成的。红军各军团领导人，如彭、林、聂、杨和李都在1月17日晚上离开会场，次日即1月18日早晨政治局成员的讨论构成了遵义会议的第四阶段，也是会议的最后阶段。

几个军团领导人离开遵义会议会场也是出于当时军事形势的迫切需要。中共领导人开会期间，薛岳的中央军已经赶到贵阳，督促王家烈的黔系部队开始从乌江向遵义发起进攻。彭德怀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国民党军队渡过了乌江，从南面进攻遵义，他因此离开会场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35]根据有关的国民党档案材料表明，彭德怀提到的战斗发生在1月17日下午，红三军团和黔系部队在刀靶水地区展开了激烈战斗。^[36] 112

1月18日政治局就会议决议和人事职责作出了一些具体决定。这些决定可以从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起草的长达12页的手稿中看出来。陈云手稿是为了对党和军队的基层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而写的，后来带到了苏联，是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交给北京的档案材料中的一件。根据陈云手稿，政治局会议作出以下最主要的几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再发到党支部中去讨论。

三、会后常委会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同志是他的主要助手。^[37]

需要进一步指出，遵义会议期间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凑在一起，还就若干实际工作作出若干书面或口头决定，比如红军近期的活动方向和作战计划，党和军队基层干部的调整，红军单位的整编缩编，同江西苏区和其他红军部队以及大城市中地下党的联络，等等。这些决议及其贯彻，可从会后不久、特别是在1月19日到2月8日期间，党中央和军委发布的电报、命令、通知和宣言中得到证实。尽管遵义会议中最突出的内容是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完全忽视现在和将来的工作任务。^[38]

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军事经验的总结

如果没有国民党的进攻，遵义会议还会多开几天——这种形势类似于1934年1月底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出于同样的原因，会议上未能通过任何正式成文决议。现有档案材料表明，遵义会议有两份书面决议。但是这两份决议都是在会后一个月才完成的。第一份决议名为《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包括14个部分，长达15 000字。^[39]第二份决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包括8个部分，约3 000字。^[40]从两份文件的措辞和内容来看，第二份决议（决议大纲）可能是限定在中共领导干部中分发的扼要提纲。第一份决议（总结决议）可能是在第二份决议的基础上扩大而形成的，目的是为了在党和军队干部中广为散发。总结决议肯定是由张闻天起草的，而决议

大纲很可能是张闻天和毛泽东二人合作的产物。两份文件都是在1935年2月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以及张的补充讲话为基础而起草完成的。*

不少中共中央重大会议的决议，是在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因而成为会议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遵义会议的两份书面决议则完全不同，它们都是在会后才完成的，自然对会议本身没有直接影响。这两份决议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本节主要目的是从共产党军事经验的历史角度去分析这两份决议的内容，反之亦然。

一、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

两份决议都认为以往党中央执行的军事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正如决议大纲清楚地指出：“军事领导层的纯粹防御路线只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但是两份文件不同程度地宣称，尽管党和军队领导层犯有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党的政治路线却是十分正确的。“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博古同志应对这些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决议大纲告诉我们：“但是同时必须指出，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错误。”^[41]颇为可笑的是，似乎正是因为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这表现在成功地招集10万名农民参加红军队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支援战争，形成了最为有利的、赢得反围剿胜利的“客观形势”——正因如此，党中央领导人出于其“主观错误”造成的以往军事失败或者“错误的军事路线”才是不容辩驳的，不可饶恕的。^[42]

我们应该提到，在1940年初期延安整风运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1931—1935年的党的领导进行了一次新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过去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的政治路线不再是“十分正确”了，其军事错误也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这种基本立场的改变和张闻天作为起草人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其他臆测的原因），总结决议不再收入20世纪50年代

*一般中共历史学家认为第二份文件是第一份文件的缩写本，目的是为了在基层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这里起码有一个明显的矛盾，该文件点明了被批评人的真实姓名，而第一份文件只是用××和×××代替。参见 Benjamin Yang, “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Quarterly*, June 1986, p. 262.

以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43]

在中共政治术语中，政治路线就是总路线。因此，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党中央就是错误的党中央。遵义会议召开之际，出于许多原因，不可能对当时的党中央作如此严厉的批判。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全党政治信誉的考虑，当然也有个人的作用存在。例如，周恩来，他以前曾是党和军队领导层中的主要一员，在遵义会议上又跃至更高的位置。张闻天也曾与过去的党中央有直接联系，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他从一个普通干部升至党中央高级领导人，正是他起草了决议。即使是毛泽东，虽然他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但也曾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也与过去盛赞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宣传口号和实际活动有着各种关系。况且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权力以至于可以反对党中央的总路线，即使他心里想这么做。

更为实际的是，长征途中形势紧迫，扩大党内斗争将损害党和军队的集体工作效率，如果做了是不明智的。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一方面有利于党的领导层的一般性调整，另一方面不利于对党中央及其总路线的根本否定。这样做需要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此外，除了中央红军，还有其他红军部队存在，这种情况也使得完全否定现任党中央不宜进行，整个中央都错了，同它们的关系怎么摆？对此，后面涉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还会详细讨论。

上述原因可能都起作用，但更深层的解释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关系经常是渐进地发展，而不是短暂地爆发。遵义会议召开时，总体形势不允许党的领导层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从个人心理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话，我们不妨可以说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不是要排斥所有的现任中央领导人，而只是希望把他们调置于自己的战略和权威之下而已，后来几年内他也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

115 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对博古进行的批判，人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似乎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在乎遵义会议的决议，开始攻击他的对手。以前说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现在成为错误的了；以前的右倾机会主义变成“左”倾机会主义了。但是我们所

关心的核心问题却在于，怎样公正地合理地认识 1931—1935 年间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博古的领导下，共产党被国民党击败了，党的武装力量遭到削弱，苏区根据地沦陷，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也被迫推迟了。从军事上看，共产党当然是失败了。问题是军事失败造成的后果到底有多大？军事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治发展？政治号召和社会纲领的成绩是否可以抵消军事上的失利？

毛泽东很清楚——过后看来实际情况也很清楚——既然共产党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在战争中失败的党中央就不是正确的党中央，其总路线或者政治路线也就不是正确的路线，不管他们如何执行社会民众纲领，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宣传革命理论。

* 1935 年 5 月会议以后，陈云被派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机关；1935 年 6 月，陈云从上海去了莫斯科。

二、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遵义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解释共产党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失败。两个决议和陈云的手稿对此作了同样的回答。《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这样说的：“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44]

116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用更强的语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导致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执行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路线，忽视了中国国内战争的基本战略和战术原则。”^[45]陈云手稿旨在将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广大干部，因此在表述上述基本观点的同时，又增加了更多的假设色彩：“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执行正确的军事指挥，就一定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中国的局势将会大为改观；革命运动和苏区将得到发展。”^[46]

实际上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博古在他的报告中并没有否认军事

指挥中的主观错误，他也没有公开讲这些主观错误是次要的。但是对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博古的这种态度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希望他承认军事指挥上的各种错误构成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正是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沦陷。基于此，毛泽东才可以按他的意图重新改组当时的军事指挥机构。

陈云在手稿中写道：“A同志（指李德）完全拒绝任何对他的批评。”^[47]李德的这种顽强态度在十几年后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中依然毫不减色，未免令人叹止！他甚至坚持1934年7月红军就已经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是一支完备的军队进行的一次精心安排的战略行动，而不是什么军事失败。^[48]

战争结果是参战双方或者多方的人力物力相互消耗的结果。研究1927—1934年国共军事冲突，必须注意双方的情况才行。1927年后的许多年里，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只是一个反对党。蒋介石把共产党当作他需要对付的若干麻烦事之一，而共产党则只有一个集中目标，那就是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彼此的注意力是不平等的。共产党在最初几次反围剿中的胜利主要归因于此。一旦蒋介石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当时任何苏区的红军队伍都很难取胜了。第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所有大城市和大部分领土。共产党方面的损失远比1934年的广昌战役惨重。国民党最后从第三次围剿中撤走，主要因为出现了别的危机形势。8月发生的两广政变，9月发生的奉天事变，似乎都比红军的事重要。

第四次围剿中，国民党成功地击败了三支主力红军中的两支。第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没有什么变化，也曾集中兵力于西线，也曾想“围城打援”。结果西线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来东线防守崩溃，国民党日益逼近，最后第四方面军只得向西撤退。在湘西根据地，红三军准备把主要兵力置于北部外线对敌积极作战，而留下段德昌部防守洪湖根据地，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外线和内线作战均未成功。红三军也只得离开根据地，开始

向西长征。第四次围剿对中央苏区来说是个过渡时期，蒋介石只用小部分人马投入战斗，挫折后便回去好生准备，下次又卷土重来。

在1933年底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集中了大量兵力和精力，10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压迫过来，形势如果不是无望，也远比所有中共领导人估计的要严重得多。遵义会议决议提出了粉碎国民党围剿的“马后炮”设想，要点是红军应该冲破敌人的堡垒线，到敌人后方去作战，这样一种战略方针是不同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党中央的做法，但是也不同于前几次反围剿中毛泽东使用过的做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间接地提到了这一战略发展方针：“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粉碎‘堡垒主义’的惟一方法是运动战——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49]

两份决议都没能提出具体分析，即中央红军应在何时以及应如何突破国民党的堡垒线、转到敌人的后方地区去呢？只是两年以后，毛泽东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书是毛泽东系统地表现其政治哲学和军事思想最早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中既表达了毛泽东的现实主义的周密计算，又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中似乎才填补了这一空白。毛泽东写道：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50]

118

毛泽东以上假设性方案有很多优点，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也

*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与红十军取得了联系，当时党中央要求红十军参加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实际上，红七军团就是1933年在红十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来，方志敏集结赣西北苏区的地方部队，重组了一支军队，又叫红十军。1934年10月，新的红十军受命与寻淮洲的红七军团合并，开赴国民党后方从事攻击活动。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惯以本身的现时利益为先；第二，召进和派出红军部队均不足以保证中央苏区的胜利。

有一连串强制性的假设条件使其通往胜利之路上坑坑洼洼地布满了“地雷”。若要使毛泽东的方案更加充实、更加形象、更加具体，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如果”：（1）如果以上行动在1933年11月或12月初福建事变正在高潮时进行；（2）如果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联合出击，从建宁、黎川和泰宁到达浙赣边境；（3）如果他们得到方志敏的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的人全力支持后，挺进浙江中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4）如果他们成功地占领一两个主要城市，如杭州、芜湖乃至南京，这样能迫使国民党北路军回师；（5）如果红军设法消灭国民党的几师人马；（6）和（7）如果福建的19路军继续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同时，还与红军保持友好的关系；（8）和（9）如果红军主力从江西苏区转移后，陈济棠不从南线入侵，何键也不从西线进犯；（10）如果红军回师江西，沮丧的蒋介石停止围剿，宣布撤退——那么就可以完全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不幸的是，上述每个“如果”都很容易变成“否则”。

若照此设想推论，红军倒是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如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所料想的那样。谈到1933年底的团村、洵口战役，彭略带愠色地说：“既然我们已在洵口消灭敌人的四个团，如果红一、红三军团密切配合作战，团村战役将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很可能会再消灭敌人的十二个团的兵力。如果敌人失去了十六个团，第五次围剿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51]。不幸的是，即使从纯军事角度看，形势也不那么乐观，问题也不那么简单。

无论从一般理论上说，还是从涉及的具体实践上说，都需要一个“实证”问题。以前的实战经验证明，即使红一、红三军团联合起来，也难以夺取把守森严的城市，如吉安、赣州或乐安，更不用说拿下杭州和南京。即使红军能够穿越堡垒线，进入东部地区，在“白区”也并非有益无害。因为有那么多国民党军队尾追着，共产党人难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也难以大量招募新兵，兵力将会遭到消耗。如果福建事变很快被平息下来，陈济棠和何键从南线、西线占领江西苏区，红军就不得不与国民党中央军在长江流域或东部沿海

地区连续作战。后果将极其严重。寻淮洲和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曾在小规模上重复了这一悲剧。在同一部著作中，毛泽东提出过另一建议如下：“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52]

这里谈到的时间应该是在1934年6月或7月，即在广昌战役之后。在毛泽东看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应采取红六军团同样的行动。任弼时确实曾满怀希望地尝试过这一战略方针。如前文所说，红六军团到达湘南后，任弼时和萧克试图从零陵渡过湘江，进入湖南中部，但是从开始就行不通。即使如毛泽东所愿，红一、红三军团果真抵达湖南中部，他们也难以牵制全部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可何键的西路军不是一支进攻部队，而主要是守备力量。顾祝同的北路军极可能继续进攻，江西苏区会迅速失守无疑——从广昌到瑞金只有一天的行军距离。湖南中部的综合形势对共产党也并非有利无弊。同样可怕的局面很可能是：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红军在一片陌生的地区没有可能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和招募新兵，只能不断转战消耗。1935年初期的作战结果表明，即使毛泽东亲自指挥，也难以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更难以创建新的根据地。

历史分析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测。毛泽东所假设的战略和我们对该战略的批评性研究都不是定论。事实上，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不是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力量上的绝对优势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基于此，可以得出两个很有意思的结论：第一，博古把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可以说是对的，如果他不是当事人的话；第二，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被剥夺直接指挥权，这是他的厄运，更是他的幸运，这可以使他一身轻松地向现任党和军队领导人挑战和夺权。

三、单纯防御路线与进攻防御路线

遵义会议决议对两条军事路线进行了对比，高度赞扬“进攻防

120 御”路线，极力贬低“单纯防御”路线。对于前者，会议决议大为推崇，称“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53]。对于后者，决议写道：“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为了对两种军事战略的主要方面进行比较，我们引用毛泽东的比较法扼要列举如下^[54]：

单纯防御路线	积极防御路线
分散兵力守城	集中兵力杀敌
阵地战	运动战
消耗战	歼灭战
持久战	速决战
短促突击	大进大退

对第五次反围剿来说，采用“积极防御路线”只能是一种假说，谁也难说一经运用，就产生根本不同的结果。最好是把这留给支持毛泽东的建议的人去遐想。我们还是像吴天威在他关于遵义会议的大作中所作的那样，回到实际问题上来。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真是像遵义会议指责的那样吗？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第五次反围剿所运用的战术与前几次反围剿所运用的战术有没有不同？如果真有，这种区别对共产党的军事进程产生了多大程度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呢？^[55]

前三次反围剿战役一直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所用的战略技术大致也是相同的。在敌人的强大攻势面前，红军主动或被迫放弃了苏区的一些领土，退回到根据地；然后红军悄悄地集中主要兵力，设法对敌人的一个师发动伏击或奇袭；然后扩大战果，再逐个痛击几个敌师；敌撤退时，大踏步积极追歼一番。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有所不同，这次红军选择苏区外沿地区作为战场，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时遭到伏击，红军消灭了陈诚两个师的兵力，围剿也就暂

停了。

1934年第五次围剿初期，中央苏区自视为一个正规国家，哪能把大片国土交出以诱敌深入？同时国民党的“堡垒政策”也使红军难以从中得利。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决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尽管出于政治宣传目的，但也反映了当时江西苏区的党政军民的一致意见和立场，毛泽东本人事前事后也都没有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就应该诱敌深入。

121

广昌战役中，博古和李德采取了与毛泽东尖锐对立的作战方针。在“保卫红都大门广昌”的口号下，依靠“红色堡垒”，进行“短促突击”——广昌战役中除去它那令人反感的名称外，“单纯防御路线”得到了充分贯彻。一场接一场地进行阵地防御战，每场战斗中，红军都要损失2 000~3 000人；一个又一个城市陷落，一个比一个更逼近首都，各个防守势在必行。于是“保卫建宁”、“保卫驿前”和“保卫石城”的呼声先后出现了。同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积极做法相比，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整个路线方针战术显得截然不同。这一方面固然是总的形势所迫，但另一方面这也同博古和李德的“主观错误”有分不开的关系。尽管李德坚持他的战术，周恩来等人却渐生怀疑，迅速改变整个军事战略方针。7月，红六、红七军团被派到苏区外围作战。从6月广昌会战结束到10月长征开始，情况完全不同了，难以在以前的毛泽东的路线和当时的党中央路线之间作清楚的对比。当时的战局形势和共产党的反应，同前三次反围剿时的情况难以比较，不能简单地用“积极防御路线”和“消极防御路线”的黑白对照予以说明。如果严格区分两个“路线”，寻淮洲和任弼时的行动，应该归结到哪条路线上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31—1934年间，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不是突然从一个正确路线跳到一个错误路线上去的。虽然如此，鉴于前后采用战略战术确有不同之处，前几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当然会在遵义会议上发难，遵义会议也自然会在决议中对两者进行比较，而决议也有夸大和不实之词。

四、长征初期的军事争论

122 1935年1月，共产党领导人仍认为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一部分，遵义会议决议也对长征初期的军事路线作出了评价。决议主要对下述两点提出了批评：长征初期的问题是行动迟缓，已经作了战略转移的决定，红军却仍继续与国民党进行毫无目的的战斗，消耗了红军大量的时间和有生力量。由于计划不周和联络不够，从苏区的转移又成了“惊惶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和群众中也没有就战略转移进行解释工作。针对红军西进途中的问题，决议又批评说，庞大的、没有战斗力的指挥纵队行军和战斗都十分笨拙，迫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由于没有积极有效地与敌作战，红军继续处于被动地位，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攻击。^[56]

长征是形势所迫，遵义会议决议从“单纯防御”和“进攻防御”两条路线对立的角度对长征时期的军事指挥进行批评似乎更站不住脚。红军撤退之前的兴国的汀州保卫战不应该受到不公平的指责——因为此种军事行动显然并非毫无目的、毫无作用，而是红军作为一个整体从容转移所必要的。1934年8月底到10月初周恩来主管战略转移的各种准备工作，不存在惊惶失措逃跑的样子。即便真是如此，那也是近一年来红军军事上的失利。颇有意思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同时又指责说，既然早已作出转移的决定，就应该立即执行。这样就产生了相互矛盾的批评：一方面指责延误时机，动作太慢了；另一方面又责难仓皇逃跑，动作太快了。至于决议抱怨中央没有同干部、群众通气，这一批评也是不对的。这可能反映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嫉妒心理，并不是战士们的怨愤之情。后来毛泽东本人接到长征的通知，他甚至不把这一高度机密告诉林彪和聂荣臻，更甭说让一般干部和群众知道了。^[57]

会议决议还提到长征路上非战斗部队行动迟缓、大型装备影响作战效率，这最多可以说是无心之错。长征初期目标不定，一般认为是临时转移而已，于是带上了印刷机、货币、重炮和大量军火。那时候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知道他们最后不

得不远离江西，跑到陕西去，他们是想把大部分家当带上留着以后使用的。最后，决议指责当时领导人在长征途中不求与敌作战，但求贯彻“逃跑主义路线”，这也是不公平的。红军从开始长征到抵达黔北，没有可能对敌发起攻势。红军也许可能击败追堵的敌军某部，但这要失去宝贵的时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贵州和四川很想打几个大仗，结果并不理想。

123

总体来说，遵义会议决议对长征初期的军事路线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把这一时期的红军行动说成是“单纯防御”路线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反对派领导人，毛泽东对于当权派领导人的批评是自然的，在某种根本意义上也是应该的。博古是失败者，失败了就得担负责任。简言之，负责人就得负责任！

毛泽东的崛起

遵义会议的总态势对毛泽东有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可以立刻掌握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大权。如果他真想那么做的话，结果会适得其反，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几乎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尽管遵义会议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层有所调整，但幅度不大，没有人突上突下。取消“三人团”最直接的后果是李德永远失去了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后不久，李德离开中央纵队军委，下放到了红一军团。博古是遵义会议的另一个主要批评对象，他被免除军事指挥权，政治权威也遭到削弱。^[58]

周恩来对以前军事路线有很大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他现在被置于一个独特的（虽然证明是暂时性的）崇高地位上，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但就周恩来个人来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59]尽管没有正式头衔，周恩来曾长时间行使军事最后决策权，然而一旦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这一正式头衔，他却又失去了这一实际作用，为毛泽东所取代。问题也很简单，尽管博古在党内、朱德在军中身居名位，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各自都有明显弱点，这就使周恩来掌握了实际军事领

124

导权。名义上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但毛泽东既有军事经验，又有政治雄心，加上遵义会议后形势对周恩来不利，他就被推到了一边。

那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什么呢？一个恰当的回答是：他得到的不那么多。事实并不像人们曾认为的那样，他既不是军委主席，也不是政治局主席，他只是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周恩来的军事助手。另一个恰当的回答是：毛泽东得到了很多。在他的共产党员生涯中，首次成了党的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并获得了决定全党全军最重大行动的权力。更重要的潜在意义是，他成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的惟一代表，将来能领导党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惟一人选。用李德的话来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取得党和军队领导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60]。这第一步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取得了最高领导权。

对过去的领导人口头谴责是一回事，成功地行使现有的领导权又是另外一回事。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胜败对新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仍有最终判决权。1935年初，由四个人行使红军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总负责人；朱德，名义上的、又是必要的总司令；毛泽东，总的战略顾问；刘伯承，具体战役策略的制定者。

遵义会议要求实现两大目标，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已是长期计划了，当务之急是对敌采取“进攻防御”。1935年2月至3月的战事并不如毛泽东料想的那么好，也不像参加过长征的人后来回忆的那么棒，战斗结果大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罢了。出于许多原因，包括领导层和战略的调整，红军在历次战斗中有胜有负，而毛泽东的地位倒是稳步上升。

共产党人召开遵义会议、在黔北重组部队时期，薛岳和他的第二路军两个纵队共有8个师约10万兵力进入了贵州省府贵阳。薛岳首先从王家烈那里夺取了军事指挥权，然后又督促黔军向北追击红军。1月19日，黔系部队两个师渡过乌江以后，红军没有抵抗就放弃了遵义城，分兵三路向西北行进。1935年1月20日向赤水前

进途中，红军总部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这是一份遵义会议之后最高领导层首次发布的重要军事和政治文件。该计划分三个部分：形势估计、作战方针和首要的任务。关于作战总方针，该计划称：

我野战军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以二、六军团行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实行总的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夺取四川，并争取四川赤化。^[61]

作战计划具体提出：“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该计划之最后关键”，“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62]根据该计划，政治局和军委迅速致电第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要求他们协同行动，积极出击。

红军抵达川黔边界的赤水后，受到川军顽强的抵抗。以刘湘为总指挥的川军，在当地拥有兵力强大的3个师、6个旅的部队。此外，黔军在此亦有6个团就地驻防。1月底，红军与川军打了几仗，结果很不好。1月28日的土城战役是最糟糕的一次，所有的红军主力军团都参加了战斗，却没能打败敌人三个旅，而且自身损失惨重（大约4 000至5 000人），只得离开战场。^[63]此后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原计划，转而渡过赤水，继续西行。1935年2月初，红军到达了云南境内的威信。

1935年2月3日至2月11日间，中央红军一直留在威信地区。因为人员损失，军委命令把师的编制缩改成团，直属军团领导。同时按照遵义会议决定重新分配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张闻天正式取代博古“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的两个决议都已起草完备，以不同形式分发给党和军队的干部。^[64]

这显然是出自毛泽东的主张，2月底红军又潜回黔北俟机与尾追之敌决战，并企图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扎下脚来。^[65]20日中

* 尽管“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军委”听起来更具权威性，但是当时它们显然不能控制除中央红军以外的其他红军部队。现在，前敌司令部已主管所有中央红军军团，总司令部仅剩一些警卫部队和非战斗部队可管了。

中央红军主力再渡赤水，25日夺取桐梓，27日再克遵义。2月28日至3月1日，红军在桐梓和遵义地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胜仗，吴奇伟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被完全击溃，共产党俘敌约3000人，缴获枪支2000支。^[66]

在遵义之战胜利的鼓舞下，3月4日，红军恢复了旧的前敌司令部，这显然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毛泽东担任前敌司令部的政治委员，朱德任司令员。前敌司令部随同红一军团行进，负责所有红军军团的总军事指挥，这样就显然减少了、甚至架空了红军总部的实际权限。*

这一安排使毛泽东恢复了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指挥权，他是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失去这一军事指挥权的。

3月5日，也就是前敌司令部刚刚成立后第二天，前敌司令部立即发布作战命令。该命令无疑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带有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混合个性。命令全文共有六条。指明了当时红军的战略，要求红军的三个军团准备打大仗，消灭周浑元的3个师，毛泽东在命令后半部分中写道：

3. 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4. 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5. 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附记：通讯联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67]

127 毛泽东竟然可以以前敌司令部的名义指派“总后方”，也就是党中央和军委的行动。不难看出，他对赢得几个仗的热忱和信心同样高涨。实际结果是红军既没有取得什么胜仗，任何敌师也未在3月6日至7日被“解决”。10天后在鲁班场，红军的确与周浑元部打了一仗，但只是一次各有损失的小的对峙战，只是“一堆火”

而已。^[68]

3月底和4月初，毛泽东又有惊人之举。红军第九军团留守乌江以北迷惑敌人，独立作战达1月之久。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突破乌江，向南插入贵州心脏地带。红军一度逼近省会贵阳仅距几里，使得蒋介石匆忙从重庆赶至贵阳督战，调令滇军驰援。这时，红军却折向西南，进入云南境内。^[69]

后来毛泽东多次骄傲地回忆，1935年2月至4月红军在川黔滇的作战是他一生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70]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他的支持者都承认他的军事指挥天才。遵义会议以后3个月里，毛泽东指挥红军继续转战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红军生存了下来，但它仍在追求生存。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消灭大部敌人的两项战略目标均未实现。”

毛泽东坚持与敌周旋作战的意见，在云南境内又零零星打了几个小遭遇战。当时的军事文件表明，截至4月中旬毛泽东仍然固执己见，而党和军队领导中却渐生普遍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博古、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和林彪等人日益骚满腹，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过毛泽东。^[71]

张闻天是一个温良的“学者型”人物，他一度曾打算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一度又想本人离开红军回上海去。林彪对红军似乎毫无目的地兜圈子大为不满，他和聂荣臻以第一军团的名义致电军委主席朱德，强烈要求改变现行军事方针。”

林彪还写信给军委要求以彭德怀为首组成新的前敌司令部，当然是要取代毛泽东。^[72]这些情况发生在4月中下旬，红军已离开贵州跑到云南东部。4月29日，军委和政治局联名发布指示，肯定了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但是要求迅速渡过金沙江。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谈及开辟川西根据地，只是他们仍不愿拉下面子向红四方面军求助。^[73]

金沙江位于云南北部，是长江的上游。此地国民党主力所及的势力范围之外。经过7天的艰苦奋斗，红军渡江成功，全部到达了金沙江北岸。1935年5月12日，共产党在会理城郊又召开了一

* 根据国民党方面诸将领，如中央军的薛岳、四川部队的潘文华和云南部队的孙渡等人的军事报告，我们可以肯定，1935年3月至4月期间，在新的领导下中央红军起码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参见《红军长征在贵州》，636～68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另见《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123～129页，成都，1986。

** 聂书中此处和其他处都先入为主地指责林彪。实际上，1935年4月底，聂也加入到了抗议毛的新领导的队伍中，4月25日晚10点，一份由聂和林共同签名的电报向军委抱怨道：“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电报要求“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1），62页。

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每个人都为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成功和即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前途感到欢欣鼓舞。会理会议不再重申在川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里已经是川西了——而是提出中央红军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党中央领导人首次放弃独立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幻想，他们已经不得不求助于下属单位了。也可以说，至此中央已经放弃所有何去何从的目标，只剩下一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想法。会理会议上，所有反毛泽东的情绪都被压制下去，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靶子。毛泽东也严厉责备了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74]前有四川军阀刘文辉地方部队挡道，后有薛岳的人马远远追来，1935年5月至6月，共产党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敌人的军事压力，不过这一点已成为次要，更为严峻的是西部高原上恶劣的地理环境的挑战。沿着川康边界线，红军部队爬高山、渡大河，向北跋涉进军。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终于在夹金山下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经过8个月的转战，中央红军没有实现原定的基本战略目标，红军人数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至遵义会议时的4万人，而现在他们不足2万人了。^[75]与力量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给党中央领导人带来了欢欣和希望，同时也挫伤了他们原有的自尊心，压抑了他们独立的想象力。在失望和希望之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起来了，两支主力红军部队开始了长征的新阶段。

第六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5年6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
129
中国西部高原上开始是欢欣的会师，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冲突，最终再次分裂，分道扬镳。鉴于两支最大的红军队伍以往多年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历尽的艰辛，眼下又处于国民党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这两支红军部队的分裂斗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两支部队的首要领导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共产党的元老；都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多年；都瞧不起党中央领导层中的青年“留学生”；毛泽东、张国焘两人都曾几次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

1935年6月初，还在会师以前，两支部队正在互相靠近。李德回忆道：“博古对此反应复杂，一方面，他希望红军主力部队胜利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采纳张国焘的政治路线，更进一步给政治局施加压力。何况毛泽东最近的建议极似张国焘的路线。”^[1]事后证明博古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事态恰恰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非但没有联起手来，反对博古及其同伙，他们两人之间反倒产生了对立，而且对立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而毛泽东和博古倒是站在一起了。

撇开各自涉及的各种琐碎情节因由，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和博古的争端与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争端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毛泽东与博古的分歧主要是党的路线和政策问题，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当然最后还是实践结果解决了理论争执。毛、博之争虽然也涉及了党
130

内领导权，但主要是关于外部问题，即怎样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怎样进行革命活动。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冲突就不同了，实际上是纯粹的党内权力斗争，他们争执的焦点主要是谁该占据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虽然也免不了涉及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对敌斗争策略和革命方针政策问题。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下，1932年12月底到达川北。这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凑到一起了。2年后共产党的活动在四川省有了惊人的发展。四川是个人口稠密的大盆地，位于西南高原与华东平原之间，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在中国历史上，四川也以频繁战乱著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从1911年清王朝覆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和混战状态。1912—1933年间，地方军阀与军事集团的武装冲突多达470余起，平均每个月就有两起战事^[2]，由于军阀混战，四川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处在毁灭性的边缘，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生活水平可从“田赋预征税制”中窥见一斑。

作为无休止地榨取战争费用的一种手段，四川军阀竞相将名目繁多的“预征税”强加给各自辖区的农民。除每年已定税额外，他们还提前征收一年或几年后的税额。雪球越滚越大，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年征十几年的税，一些地区的农民已被迫交21世纪的税了*。

* 下表反映出了四川省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形势。

1934年四川军阀与田赋预征税

县份	所属地区	征收军名	所属军阀	预征税年份
南充	中部	20军	杨森	1965年
犍为	东南	21军	刘湘	1975年
越西	西南	24军	刘文辉	1985年
安县	东北	29军	田颂尧	1983年
灌县	西北	29军	邓锡侯	1991年

资料来源：匡珊吉：《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1），82～83页。

为摆脱困境，四川一部分农民放弃种植庄稼，转而培植非法的但利润高昂的鸦片。局势更坏时，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据资料记载，1929—1932年4年间，四川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即2400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省。^[3]毋须赘言，这种形势对于共产党武装革命倒是极其有利的。

1932年红四方面军抵达川北时，四川省的大部分区域被6个本省军阀瓜分割据着。各军阀拥兵自重，占地为王。一些地方力量和盗匪除外，光是军阀部队人数共达50万到60万人之多。^[4]尽管一些军阀可能在一些政治口号（通常也是幼稚可笑的）下进行战斗，但是他们大致上除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眼前利益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道德标准。于是乎同学打同学，老乡打老乡，亲戚打亲戚。1932年10月，四川爆发的一场省内大战，可以称为一起刘氏家族纠纷。四川省省长刘文辉为一方，同他的侄子刘湘及一些小军阀陈兵开仗。12月，战争在四川省会成都达到了高潮。川北军阀田颂尧是刘湘的一个支持者，将其全部人马拉到成都附近，与刘文辉决战，仅剩1000人的部队留守后方，这些人很快成了共产党队伍的牺牲品。^[5] 131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表示，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他已决定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教条形式，采取了“人民政府”的新政策。张称他还制定了名为“约法三章”或“入川十大纲领”的政治宣言，强调与地方势力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维持现有的行政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坚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和实施其他激进的革命措施。张又称因为中央反对他的纲领，他不得不改变立场，又回到了苏维埃旧路上。最后，张深表惋惜地说道：“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个人温和的性格。”^[6] 仔细研究后就发现情况更为复杂，张国焘的自我辩解充其量不过是一面之词。顺便言之，本人自白除外，没有其他文献资料和回忆录证明张是一个温和的人。

成百份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川陕苏维埃运动的档案材料被公布出来了，绝大部分在当时是保密文件，其中并没有张国焘所称的入川宣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像张国焘那样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公然取消苏维埃制度，确实是一种过分胆大的行动，令人难以置信。此外档案材料也显示，在 1932 年 12 月至 1933 年 2 月间，没有可能进行如此根本的政策转变。12 月 17 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了两河口镇苏维埃政府；12 月 21 日，又建立了赤北县苏维埃政府；1933 年 1 月 6 日，西乡一城固县苏维埃政府随之成立；1 月 20 日至 27 日，发布了《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手册，号召土地革命；2 月 7 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7]所有这些事件和材料都表明他们一直宣传苏维埃，而人民政府一词则查无实据。

尽管如此，当红四方面军首次越过大别山，到达四川北部之后，由于过去受到敌人的追击和担心未来前途，他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生存下来，而不是考虑什么革命的神圣宗旨。一般红军战士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而张国焘作为一个老练成熟的中共老领导人，也可能考虑过在新的形势下寻找新的路子，以取代旧办法：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不妨与一些敌军达成休战协定；如果当地政权结构稳固，号召立刻推翻一切现行政权是不明智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和行政基础，分配土地既不可行，也不有利。出于以上各种临时权宜的考虑，张国焘采用了一些适中的具体政策。

1933 年初，党中央刚在江西苏区执政，中央红军也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辉煌的胜利，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既不能从实际出发理解张的立场，也不能从理论上容忍张的做法。张国焘显然受到了批评。至于后来张国焘由政治保守立场转回到革命激进立场，这不仅是由于党中央对他有所责难，更主要是出于局势的变化和他本人的实际考虑。

红四方面军的和平呼吁，在一些四川军阀中产生了积极效果。田颂尧由于自己的领土受到了直接侵犯，断然拒绝了红军的建议，但是他在川北的留守部队又远不能与红军抗衡。令双方都感到出乎意料的是，田军如此无能，而红军如此厉害，不到 1 个月就占领了

3个县，轻而易举地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共根据地。共产党在川北一站稳脚跟，政策就立刻变得激进和“左”倾起来，旧的政权被推翻，从川陕两省到各县、区和村一级，相继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或称工农兵代表委员会；斗争矛头直指各种反动势力，声势无所不及，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全面展开，措施比江西苏区还要激进；身强力壮的农民应征加入红军队伍，青少年组成了赤卫队和青年兵团。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政权，出于红四方面军本身的实际需要，与党中央的指令关系不大。^[8] 133

一方面，地方军阀间的争斗让红军得以乘虚而入；另一方面，红军势力的壮大暂时缓解了军阀间的冲突。1933年1月，刘文辉、田颂尧和邓锡侯在成都达成协议，决定从各部中抽调一个团在成都布防，共同守卫和管理成都。2月，南京政府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返回川北对付共产党。^[9]

田颂尧宣布组成前线指挥部，由他的副手直接指挥，把他的6万人马分成三个攻击纵队，去川北讨伐红军。3月8日，田的军队攻取巴中，3月8日又占领南江，4月29日夺取通江^[10]，共产党人被迫退回到川陕西边区。正当田宣布共产党全线崩溃，准备进行最后致命打击时，军阀间的混战在成都又起来了。刘文辉把邓锡侯的部队赶出成都，开始向北地攻至嘉陵江，侵入邓的势力范围并危及田的后方。这种形势下，田颂尧迅速回师西南方。红军趁机进行反攻。5月21日至24日，红军在空山坝包围田颂尧军的13个团，经过3天激战，田军一半人马（约5000）人被消灭，另一半人马逃散，田军完全崩溃了。仅10天内，田丢光了前3个月的全部所得。红军追击溃退的敌军再度占领了三个苏维埃地区。20天后，红军所占地区又扩大了一倍。^[11]

不加仔细研究，一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敌人空虚地区，共产党能轻而易举地发展，国民党军队越少，共产党取得胜利就越容易。这并不完全正确。四川军阀割据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益于红军：一是阻碍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省的军队（如陕西的杨虎城和河南的刘茂恩）入川追击红军；二是四川军阀战斗力不强，很容易被打

134 败。红军在军事上打败川军，一方面可以武装自己，另一方面易于鼓动四川人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一般来说，地方武装力量不能太强，也不能全无，红军才可以从中最大受益。只要共产党能在武装斗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最好是有点地方军阀作为对手才行。这种理想的形势恰好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川北地区。

打败田颂尧后，红四方面军在南江的木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由徐向前主持。木门会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把运动战策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会议决定将 4 个师扩充为 4 个军，每个军有 1 万人。1933 年 8 月起，共产党又组织了三次进攻，南战杨森，西击邓锡侯，东打刘存厚。^[12]红军夺取了更多的领土，获取了充足的物资，不在乎违反了与军阀杨森签订的互不侵犯协议。1933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力量达到了顶峰。川陕边区苏维埃拥有 21 个地区，500 万人口。^[13]红四方面军拥有 5 个军，分成 15 个师，人数多达 8 万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见表 6.1。

135 表 6.1 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 (1933 年 10 月)^[14]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
川陕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书记：张国焘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熊国炳
红四方面军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
总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傅钟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
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
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 ^[15]

136 红四方面军的激进路线使它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它在苏维埃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胜利又强化了红四方面军的过激倾向。这种过激政策不仅用于对敌方面，而且用来对付党内和军内的自己同志。1933 年 6 月，反对右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兴起。1933

年这次在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中清除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情况复杂。在基层，它针对的是地主富农、土匪、叛徒及其他容易分辨的坏分子；在高层，张国焘决定处罚那些过去曾反对过他领导的人和现在有碍其权力的干部。高级干部中，卞继勋、舒玉章被杀害，而曾中生、朱光被监禁，身陷囹圄^[16]，他们无一例外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里张国焘并不反对党中央的“左”倾路线，相反是运用这一路线从中渔利。

共产党已成了四川军阀共同一致的大威胁。1933年10月，刘湘彻底打败刘文辉后，便开始了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对共产党的军事战役。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除刘文辉外的所有其他四川军阀均参加了“剿共”战役，他们分兵六路，共有20万人。^[17]该次四川“围剿”行动，与国民党中央军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战几乎同时进行，两次“围剿”战的初期进展也颇为类似。刘湘的军队深入川陕苏区，到1934年夏，红四方面军被赶至川东北隅角，川陕苏区的城镇几乎全部沦陷。有些党的军队领导干部开始想退回陕西南部去。^[18]

四川战事的最终结局与江西却大为不同。双方在川东北战略重镇万源僵持了2个月之后，红四方面军再次成功地突破了刘存厚第六路军的薄弱处，出现在敌人的后方线上。接下来一周内，红军分别击溃了敌人第五、六两路军，歼敌15 000人，收复了大部分失地。8月24日，刘湘致电南京承认责任，请辞总司令一职。^[19]蒋介石一方面因共产党在四川的胜利感到不安，同时又为他可以乘机派遣中央军入川控制局势感到心喜。蒋把刘召到南京，维持刘在四川的领导名义。同时，蒋迫使刘接受一项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川军必须与中央军和一些其他省份的军队合作剿共。^[20]

红四方面军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胜利不容易，也不是无代价的。在长达10个月的战斗中，红军方面损失了3万人。尽管红军设法补充了大致同样数目的人员，但是在夺取土地和扩充兵力两方面，红四方面军再也不能如当年打败田颂尧后那样取得突飞猛进的胜利。共产党人把反围剿胜利归因于“压缩战场，进行决定性

反攻”的战略方针。^[21]其实也不尽如此。起码这次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单方面的，还有国民党军卷入江西战事不能抽身西顾、四川军阀反对外省势力插足本省事务等等不一的原因。川军的内讧对红军的胜利亦有很大的帮助。刘文辉和刘存厚并不把所有兵力交给刘湘指挥；甚至在刘湘军内，也有派系争斗，如王陵基与刘光瑜在关键时刻发生冲突。^[22]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养成的强大战斗力对红军取胜至为重要，仅从战斗力看，川军不是红军的敌手。

1935年1月20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拟订了作战计划，该计划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关系。国民党中央军要让四川军阀卷入全国内战，中央红军也想要红四方面军参加到全国反围剿的斗争中来。国共双方中央都认为，四川已丧失了独立地位，它逐渐成了国共双方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大舞台。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指出：“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23]两天后，即1月22日，政治局和军委再次急电红四方面军，电报命令道：“若无障碍，我们将于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24]

情况相当明显，用意也相当清楚。计划和命令要求红四方面军攻击四川敌军，牢牢牵制川军的兵力和注意力，以此协助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的渡江战役。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一收到电报，就立即决定从苍溪强渡嘉陵江，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张国焘没有率部南击刘湘，也没有立即强渡嘉陵江，而是不顾党中央的恳求，在1935年1月底到3月初率部北上，展开了“陕南战役”。红四方面军也不顾曾与陕军指挥官孙蔚如所订的协议，进入汉中平原，开始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以后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几度冲突不利，遂停止北袭，回师四川。^[25]直到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才渡过嘉陵江西进，此时中央红军已离开川南，在云南、贵州两省远远游弋。红四

方面军的渡江西进，充其量不过是对党中央号召的迟到的响应。

1935年初，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省份的军队集结四川，川军围剿红四方面军。形势极其恶劣，张国焘本人承认：“与其被国民党赶走，不如我们主动放弃四川。”经过两年艰苦的战争已把川北经济和精神耗尽了，用张自己的话说，川北已是“榨干了的柠檬”^[26]。张国焘主张离开川北向西进军，在西康和青海开辟新的苏区；如果形势更不利，就撤到新疆和苏联去；公平地说，倒也曾考虑与中央红军会师。 138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渡过嘉陵江。同时张国焘忙于部署从川陕苏区的全面撤退。他召集了所有的地方武装，把他们集中起来编成5个师，其中包括一个妇女团；还带上了所有的乡级以上地方干部，只留下一个地委书记，一个营级指挥员，还有约300人坚持游击战。从川北撤出的全部红军队伍，包括党和苏区干部，有8万多人。共产党撤出后，川军马上涌入该地区，填补真空。^[27]

4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和北川建立了总指挥部，后又向西移到茂县和理县地区。新形势下，张国焘再次提出温和的政权形式，即“西北联邦政府”。5月15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28]从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也确实可以发现一些适中的政策，比如号召与所有的少数民族联合，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一路线的转变要归功于张国焘，“出于以往本人本部艰难得来的经验教训，而非出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令”。但是有两点同张的说法有所出入。西北联邦政府仍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像张国焘以及有些历史学家断言的那样（尽管他们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完全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对抗。^[29]

张国焘在宣言中显然瞧不起中央红军，这是他对党中央权威提出的首次挑战。宣言声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表示，战无不胜的红四方面军正在从事伟大的西征，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西北地区革命正在迅猛发展。”^[30]宣言也列举了其他红军部队的胜利，惟独只字不提红一方面军。《西北联邦政府第一 139

号声明》走得更远，竟然宣布该政府“将领导红四方面军的 30 万英勇战士，领导陕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九军和川南的红三十九军，实现赤化四川和西北部的彻底胜利”^[31]。换言之，它公然宣布对西部广大地区所有的共产党力量的领导权。党中央领导人理应对此反感抱怨，这些宣言没有经过中央审批，况且它是一个其组织形式也没有经过中央审批的下属单位，更况且党中央眼下正是处境不佳的情势之下。

1935 年 5 月至 6 月间，张国焘立足于川西，向四面八方派遣部队，占取各地战略要点。至于他派部队去川西南和川康边区欢迎党中央的中央红军带有多少诚意，那就很难说了。这仍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无论如何，张派部队前往川西南，占领地盘，扩大势力，对他来说并无不利。他在周围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做的。^[32]

会师——两河口会议

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由湖南向贵州进发，寻求扎根之地时，红四方面军安逸地待在川北，两大红军主力保持着经常性电报联络。中央红军需要西南省份的一般军政情况，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从国民党电台截获的情报。^[33]但是，遵义会议之后的 3 个月里，中央红军正与国民党云贵地方部队艰苦战斗，红四方面军则已向陕南进军，双方都忙于自己的事务，无暇保持联络。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电报往来。1935 年 5 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了嘉陵江，向红四方面军靠近时，又对红四方面军产生了巨大兴趣。

党中央或军委的电报直接发给张国焘，张可能把部分电报和部分内容转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徐向前和陈昌浩，徐、陈也可能把部分内容传达给各处有关的部队单位——其中每一步都是有条件限制的。因此，当红军两大主力部队——具体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第七十四团——于 1935 年 6 月 12 日相遇时，双方都互不相识，并有些吃惊。起初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的部队，并发生了交火，后来他们通过军号和呼喊才联络

通。几个小时后，他们就相互热情拥抱了。^[34]次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到了达维，6月14日，红军举行了庆祝会师群众大会，周恩来主持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讲话，随后是两支队伍欢呼、唱歌、跳舞。战士们狂欢之际，毛泽东没有忘记专门接见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进行私下谈话接触。^[35] 141

6月15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再向北行进，抵达了一个较大的村子懋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电告军委汇报战事和战况，并表示“代表红四方面军致以最热烈的欢迎”，“以千万倍的热情和诚意欢迎我们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36]。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前来迎接党和红军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又同李先念进行了私下会谈。共产党领导人在懋功稍停了几天，以便分析新的形势，也让行军疲劳的部队休整一番。红四方面军刚由北方返回，党中央领导人从他们那里得知一些当前全国的政治和军事情况。日本人已经侵入华北，国民党妥协退让，签订了《何梅协定》。6月15日，党中央发布全国抗日宣言。^[37]这一宣言的目的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表明共产党的独立立场。到后来党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争论时，该问题再度被提出，成为红军北上抗日的理由之一。徐向前从理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赶到懋功，与毛泽东及其他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会晤。但是，中央红军领导人不久就发现，张国焘才是红四方面军掌握实权的人，没有张参加，达不成任何联合行动的计划。

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可能在懋功召开了一次会议，李德回忆录中隐约提到了该次会议，说是非正式的讨论会。从1935年6月中旬发布的文件来判断，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确实开过会，根据新情况和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策略。^[38]政治局和军委邀请李德与会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利用他作桥梁，将来继续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保持联系；二是利用他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使其中央在全党和全军中的地位具有合法性的象征，因为已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点就需要想到了。

6月16日，党中央致电仍在茂县北的张国焘，提出进攻川陕 142

甘、去岷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计划。饶有趣味的是，电文中的称呼不用共产党人常用的“同志”，而特别称呼张为“兄”。这里既有奉承的意思，也有疏远的意味。电文说：“目前计划是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的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并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39]

这份电报的真实目的不难理解。电报要求张国焘部署部队击败北面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向东进入川北地区。电报希望在川陕甘边界地区开辟新的苏区，这样的话，张就不必放弃他的川北根据地，也不必调动全军来与中央红军会师。次日张国焘回电，强调向东进军已不可能，建议继续西进或转向南进。张打算让中央红军去打成都平原。这样的话，中央红军又何必自南朝北赶这段路程呢？几次电报往来，均未达成一致。党中央要求张立即赶到懋功商讨并决定统一军事行动事宜。^[40]

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到达两河口。1935年6月24日，张国焘在一队骑兵卫士的簇拥下，终于来到两河口。一座高台已经搭起，聚集着一大堆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其他党和红军领导人冒大雨等候着。^[41]张国焘本人回忆道：“我一看见人群，就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红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42]当天，张应邀与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一起参加晚上的聚餐，餐桌上充满了笑谈趣言，欢欣一片。然后张国焘和朱德进行了一次诚恳的彻夜长谈。朱赞扬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又说，只要周恩来、毛泽东和张都同意的计划和行动，就没有人反对。张反过来也称颂朱和中央红军的英雄精神，并代表红四方面军承诺，抽调一部分战士和弹药补充红一方面军。^[43]

尽管前面已有烦人的问题，尽管随后又有不快的经历，尽管最

近的回忆录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两支红军主力部队会师之初的相互感情和敬意——包括两支部队最重要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都还是相当真实和相当真诚的。共同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想把他们多年联结在一起。团结是他们会合初期的主要方面。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整个事件有着复杂的关系，分歧是逐渐产生的。

红四方面军的几乎一切高级干部，包括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之所以能取得他们的领导地位，不仅~~仅~~是由于个人努力，而主要是党中央派遣的结果。在鄂豫皖和在川北苏区，在地方干部和下属士兵面前，他们总是利用党中央的权力和名义来巩固自己的威信。^{*}

红四方面军一般官兵对党中央、中央苏区和军委寄托了多年的忠诚和希望。他们对党中央的渴望已经成了一种宗教信仰——党中央是他们的崇拜物。换言之，他们是来完成自己的精神使命的。

中央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行军和战斗，几乎陷入了绝境。过去的8个月里，部队损失了五分之四的人员。他们失去了原来的根据地，长征路上到处遇敌，历尽艰辛，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根据地。现在中央红军突然发现了8万多人的强大兄弟部队和一块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根据地，简直可以说是绝路逢生。中央红军从上到下都视红四方面军为他们的拯救者。换言之，中央红军对红四方面军的尊重是基于实际的和物质的需要。

不论有何种原因，双方并不是在玩弄阴谋诡计和施展外交手法，他们真的都对会师重逢感到欢欣鼓舞，双方都竭力用自以为最好的方式对待对方。即便是张国焘和毛泽东，作为中共政治家有分歧，但也有共同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所属部队的利益，以及面对共同的国民党敌人的全党全军的利益，这三层关系的联系是微妙的。

张国焘到达后的次日早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从严格意义上说，会议是不是政治局会议尚属存疑，该会后来以两河口会议著称。会议的目的很明确，即决定两支共产党军队统一后的军事行动

^{*}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和政府工作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34年11月11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405～410页。在这次讲话中，张告诉他的部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有100多个县的广袤土地，现有10个大的苏维埃根据地，眼下他们的根据地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央苏区有5个红军军团，是眼下他们红军人数的5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有38万名党员，如此等等。张夸大其词，抬高党中央地位，是为了鼓舞他的部下的士气，加强他本人的威望。但是同时，他又在红四方面军中创造了一种对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宗教式的崇高信仰。

的方针。两河口会议的参加者（也有略微不同的其他说法）是所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还包括红军司令部领导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和张国焘。李德和徐向前可能也应邀参加了会议。邓小平也出席了两河口会议，像在遵义会议上那样，他仍是记录员。红军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林彪和聂荣臻也可能出席了会议。*

*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50页，上海，1982。该书中共列有15名参加会议人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刘伯承、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和李富春。

张国焘回忆道，6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参加了会议。李德说他本人参加了两河口会议，但会议没有邀请不相关的人——李德是不会把自己看作无关紧要的人的。如果没有更多的文献材料，很难列出准确的与会人员名单。但是，出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当时的敏感关系，我想毛泽东和党中央不至于如此粗暴地把自己一方的这么多军人塞进政治局会议，而排除张国焘的所有人吧。

周恩来是日常军事工作负责人，他主持会议，表明两河口会议不是一次政治性会议，该会主要是关于军事问题。周被选作会议主持人，是因为即使是张国焘看来，周恩来也是个无可争议的党和红军的老干部，博古和张闻天主持会议可能会令张感到不快。然而，张国焘和毛泽东是两个最关键的人物。这是两个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首次会议，尽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向何处去和应该如何行动，深层的问题却是怎样把两支部队置于统一的、至少是联合的领导之下。后来很清楚，张国焘对于北上决议的恼火程度，比不上对于会后没有同他商量便起草了正式决议的恼火程度。^[44]

两河口会议涉及三个急迫的军事问题，即战略方针、行动计划和军事指挥权。周恩来指出，会师前两个方面军各有不同的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要向西穿越西康；中央红军想向东渡过岷江。现在，上述两个计划均不妥。因此党中央建议会师后的部队先向东北进入甘南，然后在川陕甘边界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45]

周恩来报告说的战略方向比以前有所折中，但仍然是明显站在中央红军一边的一一而且是会前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共同商量过的。张国焘和毛泽东随后发言。张代表红四方面军反对周的计划。他认为，既然敌军130个团陈兵东线，红军自然没有理由去那里纠缠。向北是广袤的草地和高山，路途遥遥，而且胡宗南的中央军20个团之众挡在途中。即使红军能克服重重障碍到达目的地，也无力与地方军阀部队战斗，更不能创建新的苏区。因此，张建议红军进一步向西略有所进，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以西藏高原为背景，抵制胡宗南南犯。然后根据未来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

而决定红军的去向，要么向西北进军，接近苏联；要么向南攻打成都。毛泽东当然支持周恩来的建议，并用更强硬的语气为之辩护，毛泽东主张红军不但要立刻北上，而且要打败胡宗南，攻克松潘城。毛泽东要求两军统一指挥，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统一负责（这两个机构没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46]

总起来看，会议进行得平和有礼。张讲话时，毛泽东和其他人静静地做笔记。多数与会者赞成周恩来的主张，但所有人都明白，张不仅是只有一票的与会者，而且是力量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争论了一番后，毛泽东说：“我们再从长计议吧！”会议不欢而散。^[47]

会后张国焘立即离开两河口，赶回茂县。张闻天受命起草会议决定。现存的两河口会议决定不是会上提出并通过的，过后张国焘说会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该决定明显倾向于政治局和中央红军，但也是调和与妥协的产物，决定共分五段，前三段如下：

（1）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以便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3）应该派出一个小部分队伍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48]

前两点决定支持周所代表的中央红军的主张，第三点是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作让步。会议确定军事指挥权必须统一集中于军委，所有红军部队编成左、中、右三路，分别由林彪、彭德怀和徐向前指挥。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红军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员，却支配着三分之二的编制，红四方面军有六分之五的人员，只有三分之一的编制。^[49]

两河口会议后，共产党人开始北上，但是不像决定中要求的那么快。在1935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1个月内，红军整体上只前进了200里。这一缓慢行军可能有其他原因，但最明显的原因是名位崇高的中央红军及其领导人毛泽东与势力雄厚的红四方面军及其领导人张国焘之间日益突出的不协调、不合作。

冲突——芦花会议 沙窝会议 毛儿盖会议

1934年底，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迅速壮大，气势颇为壮观。1935年初，红二、红六军团从东南，红四方面军从北面，红一方面从南面对四川形成了三面威胁，这成为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该省绝好的借口，进而结束了四川长达数十年的同全国政局隔离的局面。^[50]很难说清楚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追剿共产党还是为了控制四川军阀，也许在蒋的考虑中两者同样重要。1934年12月，蒋命令胡宗南部进驻川北，又任命贺国光（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一局局长）为顾问团团长，常驻成都督战。此后不久，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和杨森公开将他们的“防区”交给省政府或中央政府。1935年3月2日，蒋亲自飞到成都，庆贺四川省的统一，并急令展开全面改革运动。蒋不仅要求四川省军事统一，而且——不论出于高尚目的还是狡猾手段——呼吁政府进行改革和社会经济建设。从多方面看来，1935年是四川现代史的极具变化的一年。^[51]

1935年夏天，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待在成都，他把川军当作防卫力量，沿岷江严密布防，防止红军卷土重来，向东逃窜；西北方向胡宗南部伸延到了松潘一带，朱绍良（另一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从北方封锁住陕甘。最后，蒋把薛岳部队召到成都，先作为把四川置于南京政府控制之下的军事支柱，后又把薛部派往文县地区，阻击川西的共产党人。蒋仍旧采用缓慢而扎实的作战计划对付红军，他的基本方针是切断红军的物资供应，阻止红军逃跑，在川西高原上消耗红军的力量。^[52]在此期间，共产党人对军事局势并不感到急迫，他们有足够时间考虑以后的行动。1935年6月至9月间，军事问题

成为党内斗争的挡箭牌。

1935年6月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时，对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实力有不同的估计，仔细研究最可靠的材料就会发现，红一方面军有1万到1.5万人，而红四方面军有6万到7万人，他们的比例约为1:5，力量差别相当大。*

从武器弹药和物资供给来看，红四方面军也有明显的优越。但是，虽然两河口会议后作了调整，中央红军的领导人——无论在中央政治局、军委，还是在红军司令部，比起红四方面军的人来，都占绝对优势。中央政治局中，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惟一代表，他也是军委三位副主席之一，军委主席和其他两位副主席都来自红一方面军。红军总司令部根本没有红四方面军的人。

两方面军的战士们和下层军官对两军会师表达了真诚的欢欣，也正是他们最有可能表露彼此的不满和怨恨，他们习惯于为饮食、弹药、道路、宿营地、服装、徽章、毛主席和张主席的称号等琐事发生激烈争吵。^[53]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双方谁比谁强，是实力较大的红四方面军，还是资格较高的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官兵们把党中央当作他们祈祷的上帝，而不是他们必须服从的上司，多年来战士们习惯于服从连排级领导，师级指挥员习惯于服从军级领导。他们所在部队的光荣是战士们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动力，也是他们骄傲自负、轻视其他部队的根源所在。

148

普通战士和下级军官就像马蜂窝。两军高层领导行为克制、行事隐晦，但是实际上，战士们中的混乱争吵大多是因领导人为了派系目的而捅起来的：战士们一旦被挑动，小争吵变成了大纠纷。红

*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首次会师时，对于双方力量的估计有不同的说法。以下是我在研究过程中信手记下的几种说法：

	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
李德	15 000~20 000	50 000
蔡孝乾	8 000~10 000	70 000
郭华伦	10 000	70 000
张国焘	10 000	45 000
埃德加·斯诺	45 000	50 000

一方面军领导人——由于他们已经身居高位，因而镇定自若，公开行事；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党军领导层的合法性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进行激烈挑战，使用非常手法。

6月29日，中央军委公布“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要求红军北上，击败胡宗南部，占领松潘城，打开进入甘肃的通道。^[54]红四方面军部队此时正驻扎在北边，靠近松潘，更利于与胡部作战。张国焘不愿执行他未曾同意的计划，更不愿牺牲他自己的人马。于是，张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在原地待命。只有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北进，他们爬过几座高山，也到了离松潘不远的毛儿盖。^[55]如果毛泽东愿意的话，现在他可以指挥自己的部队再朝北走，超越红四方面军的驻区，去找胡宗南在松潘作战好了。他当然不愿如此，他不得不停下来同张谈判。

毛泽东敦促张国焘采取行动，张国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用毛泽东的建议，“既然我们要同国民党打仗，就得解决军事指挥统一问题”。陈昌浩年轻气盛，更敢直言，他以红四方面军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提议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统一军事指挥。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陈昌浩出任红军总司令部政委。中央红军领导人作出了让步，但没有一让到底，他们拒绝了陈昌浩，而是在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离开他的总部，向北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在芦花会谈。他们立刻在此召开了另一次会议。^[56]

芦花会议没有留下正式决议，也许根本就没有书面决议^[57]，这次会议完全是为了权力分配而进行的一场谈判。会议结果是张国焘获得了全军指挥权，这从芦花会议后改组的军事体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详见表6.2。

表 6.2 芦花会议后红军的军事体制^[58]

总司令部
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
前敌指挥部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
红一军
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

红三军
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
红五军
军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
红三十二军
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
红四军
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
红九军
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
红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红三十一军
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
红三十三军
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

该表反映了张国焘和他的人在军事领导体制中得到提升。芦花会议规定，总司令部对军事指挥有惟一决定权。而在总司令部里，朱德从来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是张国焘取代周恩来成为军事上的最后决定者。前敌指挥部负责战斗指挥，它的总指挥和政治委员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 150

毛泽东在“三人团”中的身份自然被取消了，他作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的身份也没有了，前敌指挥部政委一职给了陈昌浩，毛泽东在军队中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和头衔。不过，他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代言人的作用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突出了。张国焘的实力使善于斡旋的周恩来屈服了；他的军事权力的上升也压服了朱德、刘伯承等职业军人；但是他确定无疑地激怒了毛泽东和“留苏生”们，使他们反而更紧密地联合在一条抗张路线上，他们有许多不同点但有一个共同点：都习惯于党内斗争。

得到总政委一职后，张才命令联合部队北上。1935年7月底，由彭德怀、林彪和徐向前指挥的先头部队已经集结在毛儿盖地区。张本人在芦花会议后赶到毛儿盖，主持红军总司令部，而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仍在南边的卓克基地区。^[59]

151 张国焘对芦花会议的结果仍感不满。他和他的人获得的军权似乎仍然不够明确，红军总司令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的从属关系仍然有问题；由于以前周恩来和毛泽东以党的身份指挥军队，红军总司令部不是一个人员充足、装备齐全、任务明确的指挥机构；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难以对红一方面军部队行使指挥权；如此等等。进一步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特别是张国焘和陈昌浩，不仅仅对军事问题感兴趣，作为共产党人，他们也很热衷于政治问题，更热衷于党中央的地位。正因如此，他们要求召开党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政治问题。

1935年8月5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许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最重要的事件。这是惟一一次正式处理总的政治问题的会议。其实双方都希望召开这一会议：毛泽东方面希望利用党中央的多数席位迫使张立即北上；张国焘方面想利用江西苏区和长征路上的失败批评中央红军的政治路线，以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结构。从超派别的整体角度，总的形势也迫切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协调一致，以便顺利结束眼下的长征，落实到一个新地点去开创新局面。

参加沙窝会议的有所有能到会的政治局成员。红四方面军方面，除了张国焘，陈昌浩和傅钟（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也出席了会议。由于各自军务在身，也由于会议的政治性质，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和徐向前等军队领导人没有参加会议。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权力平衡与两河口会议相比，显然不同了。张国焘曾回忆，陈昌浩骑马赶到会议地点，被拒之门外，这是没有的事；至于他说决议草案在会前就起草好了，这倒是事实。^[60]

张闻天以党中央总负责人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宣读了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总报告。报告批评了张国焘放弃川北苏区、擅自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行为，特别是他执行北上计划不力。张国焘和陈昌浩立即处于守势，毕竟他们在党中央和政治局中占少数。^[61]

张国焘为自己和红四方面军找了一些理由作辩护，然后马上把话题转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犯的政治和军事错误：江西中央苏区

全部沦陷，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部队损失如此惨重，红一方面军方面怎么还能吹嘘自己的总路线是正确的？^[62]对于这种争议，会议只能达成谅解性的协定。与会者决定修改决议草案，删去双方相互间的指责，进而强调全党和全军团结的重要性，沙窝会议最后决议用了相当篇幅强调团结问题：

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63]

同决议草案和会议发言相反，正式决议从一般抽象意义上赞扬了两军各自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成就；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只能是正确的，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也是对的；并对两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感到满意。决议接下来认为，既然形势这么有利，红军就应北上抗日，创建川甘陕苏维埃。沙窝会议决议再次强调了全军北上方针，这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当时取得的最大胜利。^[64]

沙窝会议决议号召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无疑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生长着，这对于执行党目前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65]张国焘可以据此指责毛泽东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毛泽东不相信红军能打败此地的敌人和守住现在的苏区。毛泽东也可以认定张为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张不敢与胡宗南作战，不敢北上抗日，只愿留在现在的根据地，或者逃到更远的西部去。张国焘倒是利用反右倾口号杀害了他在红四方面军内的老对

152

153

手曾中生。曾自 1933 年起一直被关押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几次试图向党中央提出申诉。^[66]

会上谈到加强党中央领导时，张国焘变得更为积极，更为强硬起来。他提议他的手下人进入党中央。一番讨价还价后，陈昌浩进入了政治局，徐向前和其他几人成了中央委员。张成功地争到了更多的军事指挥权。明确规定，只有总司令部才能行使军事指挥权，而政治局和军委的作用仅是进行总的指导，不得实际指挥。张受命改组总司令部和各部队体制，原中央红军的“军团”一律改称“军”；沙窝会议后不久，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分成两路，分别由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指挥（参见表 6.3）。

表 6.3 沙窝会议后红军兵分两路

左路军	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军
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	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右路军	第一、三、四和三十军
前敌指挥部	
总指挥：	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
参谋长：	叶剑英
党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	^[67]

沙窝会议总的结果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保住了中央名义上的领导权，张和红四方面军在实际权力上占优势。至于军事方面，毛泽东关于北上的提议获得正式通过，但仍得由张率领军队去执行。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变成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比较统一了，实际上更加对立了。

现在北上计划已经既成事实了，北上行动也得开始了。由于左路军和绝大部分后方力量仍在南边，沙窝会议后 1935 年 8 月 20 日，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返回卓克基。张改组总司令部，并指挥左路军北上，他们带上了所有的电台、密码和技术人员。各部队与党中央、军委的电讯联络被取消，所有红军部队只能直接同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联络，并听命于他们调动。^[68]同一时期内，右路军仍在毛儿盖附近党中央所在地。右路军计划穿过班佑和巴西地区，

折向东北突破甘川边界敌人的封锁线，然后转向西北进入甘肃洮河流域。左路军拟定向西北前进到达阿坝地区，然后向东北前进与右路军会合，或者继续向北穿过草地和川甘边界，再折向东北进入甘夏河流域。要是那样，两路军就在甘南的洮夏两河地区会合或靠拢，在当地创建一个苏维埃根据地。^[69]

右路军自组成后就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和陈昌浩得听命于总司令部的朱德和张国焘；另一方面，徐、陈同党中央和军委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在一起，也得对后者负责。共产党的老规矩，包括沙窝会议决议，从来也没有说军队可以不听命于党的。右路军的一半部队，即林彪的第一军和彭德怀的第三军，原属于中央红军，徐、陈不好硬性指挥他们。况且由于处在新的党军编制中，他们本身的感情有些变化：刚刚成为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徐、陈也该满意；能看到所有的部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徐、陈也高兴，他们不愿单独对付胡宗南。

8月20日，右路军开始北上之前，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另一次会议，后来叫做“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实，倒可以叫做“政治局缩小会议”。朱德和张国焘远在南边，周恩来因为健康欠佳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显然是毛泽东力主召开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右路军高级指挥员（如徐向前、陈昌浩、林彪、聂荣臻等人）也参加了毛儿盖会议，彭德怀和杨尚昆因为在前线，他们没有到会。^[70] 154

周恩来不参加会议不可能是因为身体问题，他人在当地。按照周这个人的一贯做法，对这种会议只要人死不了，即使担架抬着也得去参加——如果他认为该去的话。为避免被指责为违背刚刚开过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不谈政治，只讨论军事工作。这方面又有问题，不是规定军事指挥一概由红军总部去管吗？从毛泽东的立场看，这次会议却是一定得开的。党中央就连召集徐向前和林彪开一次作战动员会的权力也没有了吗？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主席，又是决议起草人。毛儿盖会议决议 155

有三个部分，可归纳如下：（1）目前战略方针是北上，占领以甘南

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由此而扩大影响至陕甘东部；（2）第一步是组织一次成功的战役，突破国民党在松潘封锁线；（3）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西北僻远地区是不妥当的。^[71]更值得注意的是决议要求在松潘进行战斗。

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败，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于为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72]

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激励部队，特别是使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和徐向前去作战。陈、徐在党中央资历太浅，不会轻率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他俩对最近在党中央的升迁也感到满意。陈是年轻的归国留苏学生，容易闹对抗，也容易被说服。而徐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职业军人气质多于政治气质。既然他们现在是右路军指挥员，必然要遭遇国民党敌军，他们也想打一仗，用胜利证明他们的才能。毛儿盖会议开得很顺利，没有人反对毛泽东，会议也真像一次正常的战前动员。

经过3个月的犹豫不决和争吵不休，共产党人终于离开川西营地，总算是正式开始他们的北上征程。右路军从毛儿盖向北偏东开近松潘地区，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向北偏西开往阿坝地区。

分裂——巴西会议

共产党人忙于内部争吵，难以执行作战计划，而国民党却有时间布置包围行动。到8月底，川军130个团沿岷江布防，阻止共产

党人潜回川东；川军之后是第二道防卫线，是新到的由徐庭瑶指挥的湖北军。南面，杨森和刘文辉尾追共产党，占领了懋功和抚边。北面，胡宗南派兵把守松潘一线，再后面还有陕西朱绍良和甘肃于学忠作大后方防卫。在成都驻防1个月协助稳定四川政局后，薛岳率军前往平武和汶县，从东北方向阻击共产党，防止红军逃到陕南同那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合。西面没有国民党军队，但那一面最不用担心，主要是因为荒凉的西康高原是任何军队长期驻留所难以克服的障碍。总之，除了南面的刘文辉和杨森追随红军占领了毛儿盖地区之外，国民党军只是静候红军到来，没有发动任何攻势。^[73]

陈昌浩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连同党中央，于8月21日离开毛儿盖，进入广袤泥泞的草地。红一、四、三十军和前敌指挥部在前，红三军和党中央随后。经过7天艰苦的行军，右路军到达了四川省西北角的班佑、包座和巴西，过草地时红军牺牲了不少战士。^[74]

包座城位于巴西以东30里，驻有胡宗南中央军的一个团，是北上必经之地。打包座，陈、徐自告奋勇，指定红四方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投入包座战斗，毛泽东当然没有意见。红四军包围包座，红三十军打援，这是他们的鄂豫皖苏区老战术。胡宗南派来一个师的兵力增援守城部队，遇上了红三十军。战斗开始于8月29日，持续了1天，红军损失了几千人^[75]，国民党的一个师被消灭了，共产党人夺取了包座城。

北上的道路已被打通，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红一军自包座继续北上，前敌指挥部和党中央留在巴西，彭德怀的红三军就近驻防，等待红一军扫清前面的道路。同时，右路军也需要与左路军取得联系，协调北进行动。

8月20日，张国焘和朱德指挥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向西北进军。8月25日，左路军也从马尔康进入了环境恶劣的山林和草丛地带。8月底，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该处向东离巴西的右路军约200里。^{*}

两军之间才是真正的大草地。因为张国焘本来就没有认真考虑

* 参见伍云甫：《长征日记选》，载《文史资料》，第72期，37页。伍云甫的日记可以用来纠正张国焘回忆录中的若干错误。左路军行军经过的卓克基到阿坝地区，并不是真正的草地，而是杂草丛生、树林茂密的丘陵地带。

*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71页；伍云甫：《长征日记选》，载《文史资料》，第72期，38页。伍的如下日记表明，1935年8月30日至9月1日，左路军确遇大雨3天。大雨是导致张国焘决定返回的直接原因。

8月31日大雨。

9月1日大雨，前面30里处河水涨，不能徒涉。

9月2日原地休息。

9月3日晴：原地休息。

9月4日前面河水不便架桥，回转向阿坝前进。

北上，所以现在不知如何是好。张在阿坝地区停留了几天，包座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张则是悲喜交加，而且悲多于喜：高兴的是消灭了敌人，北上通道已经打通，但更令张悲痛的是红四方面军独自作战，遭受损失。^[76]

从阿坝地区出发，如果愿意，左路军有两条路北上。一是直接向北，经青海和甘肃边界前往夏河；二是折向东与右路军会合，然后一起北上去洮河，两条道路在地理上都有障碍。张国焘命令部队向东靠近右路军，这样左路军就要艰难地走过阿坝和巴西之间的广阔的草地。更糟的是，8月30日至9月2日间，连续下了几天倾盆大雨。左路军在草地上跋涉了3天，噶曲河洪水上涨，他们在此停了下来。左路军几次尝试架桥，均未成功，这样就被困在大草地了。*

此种局势强化了张回头的愿望——不仅是要回阿坝，而且是要回军南方。左路军在退回阿坝前，以红军司令部的名义给右路军发了一封电报：

1. 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3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

2. 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3. 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77]

158

电报听起来仍然模棱两可，右路军没有多理会它，仍按原计划行动。9月4日，红一军继续北进，次日抵达俄界，前敌指挥部和党中央领导人仍在巴西。随后几天内，右路军的党中央和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部通过电报展开了争论。中央和军委回电给张国焘或曰

红军总司令部，坚持原定北上的计划不得改变，要左路军向巴西靠拢，或者至少是直接北上，与右路军在甘肃会合。9月8日，陈昌浩和徐向前也对张国焘提出劝告：“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与我们会合为上策，转向南去为下策。”^[78]

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长而具体的电报，为新战略方针辩护。电报认为，既然红军一部已经进入东北部，吸引了敌人向北的注意力，红军主力就应该乘机南下，击败川军。电报还认为，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四川要比在陌生的北方可能性大得多。^[79]

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和徐向前收到电报，情绪复杂。他们过去都是张国焘的老部下，现在又是其总司令部下属部队的指挥员，按理他们应服从军令，站在张一边。但是，陈、徐又是中央委员，按职责起码得把情况汇报给党中央。党中央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电。因为知道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总部里不起作用，电报直接称呼张国焘本人。

国焘同志：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边界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80]

张国焘次日的确回电，但不是回给党中央，而是给他自己的人，即前敌指挥部的陈昌浩和徐向前。这份电报在中共党史上至今仍是谜，并在学界引起了争论。一些人相信，张在电报中命令陈、徐采取行动，强迫毛泽东和党中央南下，如有必要，不惜采用武力方式。另一些人反驳道，电报没有如此胆大妄为的内容，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张要右路军南下，已不是温和的建议，而是严肃的命令，让陈、徐在党中央和总司令部之间进行选择。陈、徐当

* 以前的红军老干部和后起的党史学家曾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参见吕黎平：《对〈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质疑〉的回答》，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5月20日；王年一：《再谈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6月20日。吕称他是左路军的参谋人员，当时亲自读过电报原文，而王采访了当时左、右路军无线电台的两位台长，都记不起有这样的电报内容。最后，中央权威部门指示不要再讨论下去，争论遂告结束。

**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02～204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71～1173页。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137～139。尽管李德和博古对毛泽东所说的张国焘企图发动政变劫持党中央心里十分怀疑，两人却不得不听从毛的主意率部脱逃，走上上策。

然要接受总司令部的命令。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获知电报的内容后，立刻把消息告诉党中央。*

当时，毛泽东和大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仍在巴西军队指挥部，生病卧床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在附近几里外的红三军处。毛泽东匆忙来见徐、陈，他以找周和王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为借口，同张闻天、博古秘密离开巴西，深夜跑到红三军营地找到周、王。9月10日夜里，几个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很难给巴西会议起上一个官方名字。像众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一样，巴西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正式文件，但却具有明显的作用。几个党中央领导人只能听“应急专家”毛泽东的。博古和张闻天没有时间去查阅马列著作寻求答案了，周恩来也没有余地表现外交风度了。毛泽东建议立即秘密率部逃离，其他人一致赞成。^[81]他们发了一份电报给红一军，要林彪原地待命。翌日凌晨，叶剑英也设法从前敌指挥部逃了出来，他和手下人甚至偷来了一些军用地图。党中央领导人命令红三军紧急出发，他们仍未忘记给张国焘发出一份最后通牒：

国焘同志：

1. 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命令你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2. 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3. 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82]

得知红三军离开后，陈昌浩致信彭德怀，要他停止行动。彭把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告诉他后会有期。”李特是张国焘的部下，回国留苏学生，他骑马赶到红三军，对指战员大喊服从总司令部的命令南下。李特与毛泽东激烈争论。当时李德也在场，这次他也站在毛泽东一边。强壮的李德硬是把李特揪下马背，两人用俄语吵骂，周围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不过除了那些早就和中央红军合并

在一起的单位外，绝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人都听从李特的招呼留了下来，没有跟着中央红军一起走。^[83]

一整天不间断的行军，毛泽东和其他人到了俄界的红一军处。在俄界，他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批判张国焘。从此中央红军开始了自己的北上征程。次日在阿坝，张国焘也召开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然后带部队西南下，返回川康边区。红一、红四方面军3个月前戏剧性地会师，最后又更戏剧般地分裂了。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分裂之初，很难从实际形势上判断谁是谁非，也就是说谁更可能取得胜利。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章节中详细研究。这里只简要地探讨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从党的原则和红军纪律看，谁对谁错。既然双方都在为自己辩护，我们最好是看看他们各自对立的观点。

徐向前生动地总结了张国焘向党中央挑战的情况，他后来回忆道：“伸手要权一分庭抗礼一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84]毫无疑问，张一直凭借其军事实力要求政治权力，凭借其军队轻视党中央。这也不尽是张的阴谋诡计，他有他的理由。中央红军曾是最为强大的红军部队，但是两年中丢弃了中央苏区，军力遭到明显削弱。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利用这一失败指责当时党和军队的领导层。那么，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现在不能要求中央红军承担整体责任呢？如果遵义会议后的新任领导的确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央红军的力量遭到更进一步的削弱呢？至于说到最后的分裂，张国焘和红军总司令部有权调动任何下属部队，毛泽东没有正当理由同右路军指挥部玩弄计谋，偷着把自己的部队拉出来，从红四方面军奋战牺牲后开辟的通道上走过。

在毛泽东看来，张国焘从不承认党中央对于所有红军的合法领导权。张多次参加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北上方针是张本人在场时制定的，但是最后张以暴雨、洪水为借口，不但阻止左路军北上，而且要召回右路军南下。最后连中央的电报都不直接答复了，而是要通过自己的部队迫使中央行动。^{*}

不少人曾过分强调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南下与毛泽东红一方面军

*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8页。于硬说张是以天气状况为借口，这是不公正的。如前所说，据伍云甫日记记载，当时确有大雨，左路军也曾试图架桥渡过噶曲河。

北上的对抗争执，我想问题最好这样提出来：双方究竟曾如何支持各自的战略方针？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北上或南下的问题。6月会师时，中央红军建议东渡岷江，后来坚持北上，但是“北上”的方向和目的地几经变化。张国焘起初没有考虑长途转移，只是想在西部就地扩大影响。张一直没有确定的方向，有时想南下攻成都，有时想西征去青海乃至新疆，有时又要向西北进军，进入甘肃的夏河。后面还要专章说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是张国焘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七章

落脚陕北

162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最终驻足陕北黄土高原，立马长城脚下，这不但使外界觉得奇怪，就连共产党人自己也始料未及。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不久，适逢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从南方赶到这里。出现这种结局，并不是由于双方的预先共同协商，甚至不是由于任何一方的预先安排，也不纯粹是一种偶然巧合。

两支红军队伍初来到这块异域之地，旋即显示出各自的政治异趣。单就军事任务而言，他们并无不同：他们不但立即同国民党军队较量，而且在这方面各自都表现得尽职尽责、技术娴熟。但是，从一开始他们的政治策略就有所不同，而且可以说是相对的，红二十五军继军事成功之后，发动一场党内肃反运动，这场运动将当地党和军队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央红军在取得初步军事胜利的基础上精心求治，在新根据地同各方力量协调相处，很快获得根据地的壮大巩固，并将势力迅速发展至外围地带。

这两支新到的红军力量有共同的目标：都想要站稳自己的脚跟，不同的是实际做法上有差异。的确，这些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二十五军抱住以往的极端革命模式不放，中央红军则能在政治方略方面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也许某些客观偶然因素影响了党中央领导人的决策，并且促成了决策的后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思想已经改变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执行的政治策略和工作方法，即便是在寄居陕北的最初之年也能被窥见到新思

维模式的特征。

从绝望走向希望

163

1935年9月，和红四方面军的分裂给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及其所率领的中央红军造成最为严峻的历史考验。如果陈昌浩和徐向前的部队果真用武力拦截毛泽东，那么也许会同意向张国焘让步，并随之南下。^[1]虽然这类事件未必会发生，但毛泽东依然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命令他在党中央的人和红三军于凌晨时分撤离巴西，禁止任何人点起火把或使用灯具。第二天上午他们抵达安西，又马不停蹄向北继续行军一整天到达红一军团驻地俄界。他们饥饿难忍，疲惫不堪。^[2]在士兵们休整的间隙，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应付紧急情况。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的形势实实在在代表了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为黑暗的一刻”^[3]。包座之战和两路红军到达巴西、阿坝之后的几周，国民党军确实将它的注意力转向北方。胡宗南和薛岳从东、东北、东南三个方面构筑起一道迂回的封锁线直接应战，在甘肃、陕西的后方还驻扎着20万~30万军队。^[4]国民党把大部分军队调集北方，红军的主力却折回南下，使得毛泽东的两个军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是羊肠小道和通向甘肃南部的深山河谷了，即便红军能够斩将夺关抵达甘肃一带，朱绍良与于学忠的国民党军队还在等着他们呢。

巴西分裂时，毛泽东允许已在红三军的红四方面军成员可以离开，大多数人也确实回到了他们以前的队伍。毛泽东的红五、红九军与红军总部的刘伯承、朱德等都留在了右路军；总共有4000人到5000人跟着张国焘走了。毛泽东明显输给了张国焘，当时红一、红三军兵力加起来只剩下大约8000人。^{*}

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军队人数降到了1928年初红四军在井冈山初创时期的程度；就敌军力量及其所处位置而言，现时的军事形势与井冈山时的形势相比远为险恶。

* 川西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团约4000人并入红一方面军。一个时期内，由第一、三、五、九军组成的红一方面军总数大约有16000人。后来的两军分裂带走第五、九军约6000人，红四方面军的少数已经合并到红一方面军里的人留下来了，加上减员，后者大约得有9000人向北进发。

同时也有许多积极方面的因素。经过多年的奋斗，广大官兵已经磨炼得无比坚强，领导人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更加增强。最重要之处还在于同井冈山时期相比，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已得以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全军的主导路线。作为中共政治家的毛泽东的个人利益与共产党和红军的整体利益并不总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在党和军队遭受军事失败之后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赢得个人领导地位；也正是由于张国焘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严重挑战，毛泽东才成为党和中央红军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面对此种非同寻常的挑战，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其他人物均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周缺乏顽强，朱少方略，张显得能力不够。周是位灵活的外交家，朱是位忠厚的军人，张是位思辨的学究，只有毛泽东才是一位全面的政治家。1935年9月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处于他们长征中所有经历的最低潮，而毛泽东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具主导影响力。

164

有21人参加了俄界会议，包括全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军事机关的领导人及红一、红三军的四位领导。即使被称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也似乎过于扩大了。^[5]会议第一个行动就是对张国焘的谴责，一致通过批判张国焘的决议。以前曾不想批评张的那些党和军队领导人现在更起劲地攻击张。但毛泽东反而淡化了他过去的强硬，提议保留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在乎张个人，却很在乎张手中还控制着的军队。于是，一封措辞相当温和的电报送到了张国焘的手中，电报说：“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6]

电报表达了一线模糊的希望，张国焘还能够从此北上；同时也为毛泽东从巴西率部脱离制造了一种借口。与这种不失礼貌的温和辞令相比，俄界会议通过的书面决定则把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严厉谴责为失败主义、分裂主义、军阀主义、汉族沙文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决议最后写道：

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7]

165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俄界会议决议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与张国焘做斗争，但决议文本根本没有电传到红四方面军内，即使在红一方面军里边也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一级。决议的实际影响不过是促进中央红军高层领导人更加团结一致，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合法地位得以更加巩固罢了。^[8]

比起谴责张国焘来，更为重要的是决定如何应付目前不利的形势问题。张国焘把大部分队伍带走以后，国民党的注意力进而北移，中央红军人单力薄，独自北上，环境恶劣，前途难测。对中央红军来说，这是最为危险、最令人沮丧的生死关头。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惟一能设想的出路就是投奔苏联，求得暂时的保护。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的一段发言记录，是当时摆在中央红军面前不利形势的最好见证，也是毛泽东在酸楚形势下绝望苦斗的个人性格的表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表现这种个性的机会只有那么几次，但是为数不多。毛泽东说道：

中央仍坚持这样的方针，即继续北上的方针。但是《补充决定》上说向黄河以东，这个方针应该有所改变。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认为一、四方面军等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所以应该明白指出：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然后再求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错误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

就会无休止地打游击战，我们会成为瓮中之鳖。^[9]

由于朱德的离开，彭德怀成为最高的军事首脑。俄界会议根据彭的建议，要求对军队的机构进行彻底改编，司令部减至130人，政治部为60人。军改为纵队，每个纵队由四个团组成。取消原来营的编制，每个团直辖四个步兵连。红一方面军改名为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主管军事领导。新成立整编委员会，由李德担任主任。基本战略方针是从陕甘北部“继续北上”，“打通国际路线”。^[10]

166

显然，在新成立的整编委员会中李德被委任为主任，这是考虑到李德具有共产国际的象征意义，在与苏联接触方面能发挥作用。虽然毛泽东讲话中没有指明中央向苏联边界移动的具体方位，但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最可能的方案是，在陕甘交界地带渡过黄河，穿越河西走廊，经新疆向苏联靠近。这正是张国焘以前提过的意见，也是西路军后来的实际行军路线。

俄界会议以后红军迅速北上，进入甘肃境内。为了穿过甘南崇山峻岭，抵达洮河峡谷平原，红军不得不夺取战略要地腊子口。我们不妨对腊子口战斗作以简要介绍，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红军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种士气和战斗力同样表现在长征路上许许多多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当中，以及许许多多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中。

单就字面意义而言，腊子口意谓蜡烛式的关口。它是白龙江的一个支流从中湍流而过的峡谷的一部分。河水深约3米，宽约30米，峡谷两岸陡峭险峻的石峰高达500米。关口位于峡谷最狭窄处，一独木桥连接两岸，桥两端均有防御工事。用聂荣臻的话来说，“整个地方就像一座高峻浑圆的蜡烛山从中间被劈为两半”。国民党甘肃军阀鲁大昌统率的两个营防守在这里的两个桥头堡上。^[11]

夺取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军第二师第四团。这个团在长征中曾因不怕牺牲、充当先遣队而赫赫有名。红军战士先从山前发动

五次正面冲锋，均未成功。随后他们召开了“士兵会议”。像通常一样，所有的党员自愿接受最为艰苦的任务。他们选出了 20 人组成突击队，由一个藏族人带路，解下腰带，系上绳索，由突击队长和向导先从右峰攀登而上，用绳索将队员一个接一个拉上去，并在峰顶埋伏下来。几小时之后，午夜刚刚过去，听到正面发起攻击后，突击队的队员从山顶向下面的敌人投掷手榴弹，开枪射击。浓浓的枪炮声和红军战士“缴枪不杀”的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国民党守军受到重大打击后撤退，红军占领了腊子口，乘胜追敌。^[12]

腊子口战斗仅是长征当中诸多战斗之一，因为本书的主要论题不在于此，故而不能逐一详细说明。作为一般性原则，我们应当指出，基层官兵的战斗力总是最为关键的作战因素。基层官兵没有战斗力，任何将军都得惨败；缺乏这种力量，一个训练有素的战争指挥官也必输无疑；具有了这种力量，即便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指挥官也可能赢。进而言之，官兵的士气又是构成基本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传统战争或常规战争中更是如此。在这方面，国民党军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明显逊色于共产党军队。

红军从甘南山区冲出后，进入洮河流域平原地带。9 月 20 日到达哈达铺，在这个贸易小镇屯驻两天并完成部队休整任务。中央红军改名“陕甘支队”，红一、红三军改编为三个支队，参见表 7.1 所示。

表 7.1 整编后的中央红军中国抗日军陕甘支队^[13]

司令部
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纵队
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第二纵队
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李富春
第三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蔡树藩

在哈达铺，党中央领导人首次确知在陕北地区现已存在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和一支红军部队。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发现一则国民党的报纸上有关于“剿灭共匪”的报道。当然，共产党人知道如何解释这种新闻报道。国民党方面将围剿胜利说得越大，他们会推断反围剿的红军力量就越大。聂荣臻把报纸呈送给毛泽东，这更坚定了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决心。^[14]在哈达铺一座庙宇里，召开了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及许多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讲话。毛泽东的讲话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15]

168

毛泽东似乎不言而喻地收回了以前往西退却投靠苏联的主张。毛泽东当初想依赖外国势力，本来就是出于一种在绝望中作最后选择的考虑。另一种毛泽东从未详加说明过的思想是，为了掩饰他的军队的存在，毛泽东降低了所辖部队的对外称号，以便减少国民党的注意力。既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注意力是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将注意力转向张国焘南下的部队。张的部队当时依旧热衷于打着“红军总司令部”这面大旗。

事实上，俄界会议也曾提到过转战陕北的计划。但那时只是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取得向苏联靠拢目标而采取的一个过渡步骤。他们既没打算去陕北同日本人作战，也没打算久留该地，而只是经陕北向西北挺进；在哈达铺也并没有作出红军留守陕北、开辟新根据地的正式决定，而是一周以后在榜罗镇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作出了这个决策。

169

哈达铺以北属国民党的防区内线，从天水沿渭水向西直达兰州。1935年9月，朱绍良从南方调来主政甘肃；杨虎城坐镇陕西，是统率全省军队的本地人；日军入侵北平以后，从北平撤到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负责联省军务。^[16]红军靠近的时候，国民党

将它的很大一部分兵力集中在兰州天水一线，以确保后方大城市的安全。其余的军队集中力量，全力守卫各个县城，中间地带空隙甚多。红军乘机轻松突破渭河封锁线，在武山、漳县两县城之间涉过渭水，于1935年9月27日顺利到达榜罗镇。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只有少数政治局常委参加，就他们的最终去向作出决定。当时如果他们真想远走西北，与苏联取得联系，他们就应当继续向宁夏、甘肃北部一线挺进，从那里渡过黄河，沿河西走廊直奔新疆。要不然，他们就应转向东北去陕北，与那里的地方红军会师。如今越来越清楚的是，在陕北确有一支强大的红军、一块广阔的苏维埃根据地，故而他们选择了后者。

到目前为止，关于榜罗镇会议还没有可资利用的书面决议或会议记录。但是应该清楚的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人在哈达铺就已经“意识到”了的决定，而且下决心挺进陕北，不是把陕北作为一块临时性跳板，而是作为永恒的根据地。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1个月以后的一次谈话中得到印证。在谈到榜罗镇会议时，毛泽东说道：“我们在俄界会议上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然后以游击战争去同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有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我们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来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17]

170 共产党人全力以赴突破渭河防线，击败国民党正规部队，从此他们面对的就只剩下地方土匪、警察和地主军阀的阻拦了。这些地方势力几乎无力阻挡红军。虽然从榜罗镇到陕北相距500里，红军还是在3周之内迅速跨越了这段距离。他们首先清除掉两条公路封锁线上的地方军队——一条是从会宁到庆宁，另一条是从平凉到固原——然后翻越六盘山往东北方向而行。中央红军或称陕甘支队于10月18日抵达陕北的吴起镇，几天后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样就结束了长征。^[18]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希望，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上，不由得诗兴大发，因而又是一首“清平乐”。

清平乐

六盘山

(1935年9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19]

好歹勿论，中国古典诗词总是采用一种文笔微妙朦胧的表达方式。毛泽东填写的这首词也不例外。毛泽东说“今日长缨在手”，那么何为长缨？又在何人之手？是不是党和军队已在毛泽东的手中呢？何谓苍龙？是指日本人？是指蒋介石？还是指国家权力？对于最后这两句诗，大陆官方的解释指谓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或者中国人民的解放，但这首诗词的浪漫情调似乎与这种生硬解释不甚相吻合。不过，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长征临近尾声，毛泽东满怀信心，意志坚定。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邂逅的红十五军团，实际上是由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此前1个月合并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那时红二十五军也刚刚从南方抵达陕北，红二十六军则是几年来陕西本地的一支共产党武装力量。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支红军部队与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关系，为了介绍这两支部队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独特的经验，在此作一些专门介绍还是有必要的。

171

1932年10月份，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国民党从该地区拨出它的主要进攻力量围攻江西苏维埃，只留下地方保安部队与共产党游击队周旋。因此，共产党人又被拖回到1930年以前的境地。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力量系由鄂豫皖省委统一领导，沈泽民担任书记。实际上的军事力量是活动于皖西的游击队（由徐海东指挥）和鄂东的游击队（由吴焕先指挥）。沈泽民是一位归国留苏生，属于“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精通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对共产国际忠心耿耿。他与党中央领导人的密切私人关系有助于维持鄂豫皖苏区在党中央心目中的显要地位，虽然这种地位在红四方面军撤离以后明显降低了。^[20]沈泽民领导的鄂豫皖省委同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沈本人的革命热情在当地军事干部中赢得了很高的尊敬，而他在党中央的崇高资格又使他能当地政治干部中成为一个权威。从地理渊源和个人性格上说，这里级别较低的共产党人大致可划分为知识分子型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士兵型两类。前者主要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人，因而他们更易于发动肃反运动来纯洁他们的阶级队伍；后者大多数专心于军事事务，对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尽心尽力、用智用谋。

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把各个游击队合并，统称红二十五军。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围剿又把共产党军队一分为二，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1934年，沈泽民患肺炎而死，党中央对这块苏维埃根据地的关注更为减低。沈泽民的党内书记一职传给了徐宝珊，所有的部队再次合并，恢复原红二十五军的统一称号，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21]由于与党中央的联系变得疏松了，其政治特点也减弱了，鄂豫皖根据地变得更加独立，军事上更加自由。1934年，红二十五军占领战略城市太湖，打乱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围剿计划，在一次战斗中就俘获3700多人——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共产党人也许又会走1931年的迅猛发展的路子。但是经过多年的战争，整个根据地确实衰落了，而本地共产党领导人的保守心态，使他们在政治上要更上一层楼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独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站在心理的立场上讲，像徐宝珊、吴焕

先那样的地方领导人很难获得资深中央领导人物如张国焘、沈泽民等人早先具有的独立自主意识。

1934年7月底，党中央派遣红六、红七军团在江西中央苏区外围作战，同时给鄂豫皖省委发出电报，指示他们采取积极步骤，出击苏区外围，展开运动战。这个指示的宗旨也是出于把国民党围剿部队从江西中央苏区调开的考虑。于是，程子华作为党中央的代表被派往鄂豫皖苏区。^[22]

程子华秘密地从瑞金出发，途经汕头、上海、汉口，1934年9月到达鄂东苏区。^[23]10月初党中央决定冲出国民党封锁，从江西苏区全面撤退。同时号召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也进行西征。这个命令主要还是考虑到当时同中央红军的战略配合关系。11月上旬，位于鄂东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位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传信，通知他们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他们全体撤离。^{*}

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出发西进，突破几道敌人封锁线，穿越几百里地，5天之后到达鄂东地区。^[24]

在鄂东的花山举行了党和军队的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鄂豫皖省委领导人、红二十五军的将领、鄂东区委及党中央代表，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以及其他若干人。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最后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撤离被战争拖垮了的现有地区，突出外围，创造新的前景。程子华接替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改任副军长。会议作出决议，留下少数队伍继续在当地展开游击活动——3年之后这些队伍成为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一支部队。^{**}

经过几天的准备，红二十五军四个团3000人告别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开拔，开始了长征，他们的旗号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25]。他们的前进目标是相当模糊的，除了沿着两年前红四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前进以外，未曾考虑选择其他的路线。能否将来在某处开辟新的根据地或者投入到红四方面军中，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长远设想。眼下他们只是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形迹匆匆往西而去。

* 参见胡华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辑，234页；同时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94页，北京，1983。程子华个人认为——许多中共历史学家也都相信——他是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苏区指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这并不尽准确。程于1935年7月离开江西，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不迟于8月或9月。红二十五军开始西征决定直到11月初才作出，时间上难以解释。在各种可能性当中，可以设想又有党中央较新指示，或者与此决定相关的鄂豫皖领导人有更实际的理由。

** 同上。徐海东说他一开始就主动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程子华，因为程以前是中央红军的一个师长。这种看法也不能毫无分析地接受下来。实际上，程子华并没有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过这么高的军队职位，程作为党中央代表代替徐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可能出自鄂豫皖省委的决定，而不是出自徐海东个人的慷慨。

红二十五军最后的远征决策受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它开始决定长征，并不是由于作战失利或根据地丧失，而是因为党中央发出指令，而它也打算踏着它的老上级单位红四方面军的足迹前进。因此像红六、红七军团一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行动。它率先离开苏维埃根据地，不是因为直接战败的形势逼迫出来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并没有紧迫追击他们。大凡红二十五军沿途经过的地方，当地国民党保安部队和乡镇民团构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

红二十五军首先越过京汉铁路进入鄂豫交界处的桐柏山区。由于这里紧靠铁路干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并不理想。红二十五军此时没有沿着红四方面军西进路线继续前进，而是调头北上，1934年11月末进入河南省伏牛山地区。伏牛山是一块崭新的地区，从来没有共产党人活动过，也从未受到过革命的任何影响。该地地方民团愚钝顽强，不容易克服；老百姓憨厚迟钝，也不容易发动。进入该地区的共产党人发觉自己大战不多，小战不少，被动受制，处处防御，一时难有立足之地。他们所擅长的政治理论在伏牛山区曲高和寡，而他们多数人对地方军事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刚到这里的外生人程子华、政治工作者徐宝珊和吴焕先等都自然滑落到了一种只挂名不做事的地步，而土生土长的中共军人徐海东逐步承担起控制全局的担子。^[26]

徐海东是一介军人，几乎没受到过正规教育，但他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的冒死精神人所共知。与其说他是位共产党员，倒不如说他是位绿林好汉，他具有更多的后者的仗义勇为，而更少前者的教条原则。他身上有五六处伤疤，有的子弹还留在体内；他最拿手的战略方针是在与敌人交锋中亲自冲锋陷阵。他本人不怕死，也不能容忍他的士兵怕死。他的部队对他充满尊敬与畏惧，甚至随军的党政领导人也认可了徐海东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回忆录里，徐将军谈到红二十五军在伏牛山区的一场恶战。

夹击，这是我们第一次打败仗。部队当时处在混乱状态。那些受伤的士兵躺在那里，可几乎没有担架员去抬他们。一整天我滴水未进。天在下着雨。我本人抬着担架走了五六里。整个部队精疲力竭，饥饿难忍。第二天早晨我派卫兵去召集大家集合。全都在睡觉，没一个人起来。我拣起一根木棍跑进村子，先打团长、团政委，再打营连官长，最后打士兵。就是这样，两百人被我很快赶了起来。^[27]

1934年1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汉中和安康地区。这里有几个有利的条件：地势平坦，人口稠密，多年来因川陕两地军阀你争我夺，人心浮动。重要的是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曾经过这里，在村寨里留下了一些秘密党支部和游击队，其中一支还树起了红军的旗号。更为便利的是，当张国焘听说红二十五军要来，就调遣他的川北红军主力部队在1935年1月发动了陕南战役。这个举措将杨虎城的陕西军队吸引过去，故而整整两月，红二十五军在汉中和安康得以彻底休整。虽然红二十五军未能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却很快打破了国民党对本地的围剿，在陕南两个县、几百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拥有4000人的红军兵力；另外，在豫陕交界地带建立4支游击支队，在陕鄂交界区建立6支游击支队，总共有大约3000人的兵力。^[28]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跨过嘉陵江，向川西方向移动，红二十五军又面临着新的军事压力。不管是出于被动军事形势，还是出自积极战略决策，红二十五军开始大规模运动战，与敌人进行较量。共产党军队朝关中方向往北发起攻击，沿途获得大量的食物、衣料和弹药供应，随后又退回陕南。他们赢得了几次战斗，暂时打破了包围圈，但本身也消耗了大量兵力。当国民党方面再次发动围剿时，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以前曾在鄂豫皖苏区一样的潜在危险。^[29]

就在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犹豫不决，是坚守该地还是突围南下去川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他们从国民党报纸上获知，红四

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合了，这个消息很快被他们的地下情报人员所证实。他们进而获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两股主力正在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再也没有必要南下了；于是他们一致决定，应当调头进入甘肃南部，等待红军主力。后来，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称这一决定的目标是，以他们的牺牲来迎接党中央。这种说法倒也是真实的，不过需作一些解释。实际上，红二十五军自身极想加入红军主力，像从前一样想得到红军主力的护卫。在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心目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固然崇高，红四方面军却更加亲切。它主要还是去迎接红四方面军，虽然当时不清楚上级层面的对立和矛盾。^[30]

1935年7月15日，党和军事领导人在岷河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再次实施战略转移，撤离目前所在地，只留下几支游击队继续活动。第二天，红二十五军4000人踏上了西去的征程。8月1日他们到达陕甘交界的双石铺，在那里击败胡宗南四个步兵连，俘获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从他口里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正从松潘往北行进。于是红二十五军加速步伐，直奔渭水，逼近天水市。

红二十五军沿渭水一线同敌人打过几次失利战后，被迫进一步向北挺进，于8月中旬抵达甘肃东北部的泾水。在那里等候好几天，没有发现任何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到来的音讯。跟马鸿逵的骑兵几次冲突，使部队多有损伤。他们打算渡过泾川河。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中，吴焕先身亡。从此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徐海东重新回到他的岗位任军长。8月末，红二十五军被迫调头，往东北方向前进。在煞费苦心地试图加入红军主力的无望努力之后，红二十五军出人意料地于9月上旬到达了陕北苏区，遇到了一支红军主力！

1935年9月18日，徐海东、程子华为首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高岗为首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会师^[31]，并很快合并成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这种任命意味着新来者占据了优势，原主人降到从属的地位。两军合并刚刚1个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也就抵达

了陕北。^[32]

陕西的共产党人

176

1935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几乎没有什么正规军事力量，除了那些同日本侵略者及他们在东北的傀儡政权作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以外，惟一明显的共产党军队就在陕西。在诸多的理由当中，这种独特的局面与“基督将军”冯玉祥有很大干系。冯玉祥在 1926—1927 年间依靠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成功地投入大革命，而后投入蒋介石的怀抱，镇压共产党人。由于在冯玉祥的部队中有原来的组织基础，加上党中央的新近指示，陕西的共产党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举行了数次报复性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很快被扑灭，但共产党在冯的军队和部分农村地区的影响仍未消失。1930 年当冯玉祥同国民党中央政府打输以后，他在陕西的统治位置转到了他原来的部下之一杨虎城的手中。在后来的年月里，陕西的形势由于政治混乱和军事骚动而日益恶化，共产党人对杨虎城部队的渗透，也一天比一天加强了。^[33]

位于华北平原与西部高原之间的陕西，历史上称为关中。黄河与华山使它与华北隔开，而潼关要道是东去的主要出口。从陕西通往西北以远是“丝绸之路”或称河西走廊。该省虽属隔离状态，不论往东还是往西也都不是处于完全的孤立状态。它有三大地理因素：平坦而富饶的渭河河谷居中，南有多山地区，北有黄土高原。一般来说，共产党人起事之初或受挫之后，在兵力不强或被动挨打时都往南北两端而去，一旦变得强大或处于胜利时期又会择机居中，逼迫省会西安。

共产党在陕西的再起，早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军队起事，或称兵变。共产党在敌人军队和当地军阀当中安插自己的人，或利用各种内线关系，巧借这些敌军内部的不和与矛盾，于 1930—1932 年间共在该省鼓动起 70 多次兵变。^[34]有一次，成功的兵变使得国民党几个连队甚至一整团的人马起义，颇为壮大的红军力量随即出

* 陕西大多数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杨国栋、郭洪涛、南汉宸、潘自力和王炳南等，都出身于当地地主或士绅家庭。这种情形特别归入一个基本事实，即早期陕西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一些负担得起涉足南下因而转变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学生。

现。但这种兵变总是易受贿赂或威胁，刚刚建立的中共部队又会很快土崩瓦解。结果是，昨夜的一名国民党的军官今朝成为一员红军指挥官，明日可能又回到国民党的军队当中。

陕西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是当地人。除很少例外，他们几乎都来自清一色富裕的地主家庭或名门望族。颇为奇怪的是，这些共产党人通过鼓动农民造地主和地方精英的反，赢得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之所以深受本地农民的尊敬和追随，原因也在于他们较高阶级出身的名誉和声望。同时，他们的家庭背景与知识才干也有助于共产党人与当地军队和政府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

一般而言，他们会冒军队兵变或农民起义的风险来建立武装力量，再开到较为安全的乡下占领一块地方，然后根据形势的变化或者进而求发展，或者退而求自保。与南方的革命运动大潮相隔绝的陕西共产党人从事的这种活动，恰巧与地方军事主义或军阀主义的形式相吻合，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确实在很多方面是共产主义者。一个有趣的现象倒是，有时这些共产党人越是与党中央隔离，越不能取得高水准的思想独立和政治独立，也就越盲目信奉共产主义理论教条。

1931年，最大的一块军事根据地处于陕甘交界处南梁周围，刘志丹指挥这一股游击力量。第二年秋冬季节，当省军队与红四军方面军在陕南交锋，又一起兵变成功地将敌人的两个连拉到共产党一边的时候，刘志丹指挥着他的人马向南攻取姚县和召津，向关中逼近，在该地建立起一块新苏维埃根据地，他给部队编号红二十六军。^[35]

1933年5月，这些共产党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想发动一场南征，进军西安。于是，由刘志丹和杜衡率领的红二十六军深入渭河河谷，在该省中部地区迅速开辟出一块“华渭苏维埃”。不幸的是，他们很快被杨虎城的省军打败，几乎全军覆灭，只有几个高级领导人设法逃回召津。1934年2月，刘志丹和他的部队北撤，又回到南梁地区，左冲右突，求存图生，直到一支新到达的兄弟部队才帮他们恢复了元气。^[36]

直到1933年底，陕北共产党人的活动要比陕甘交界地带的共产党人的活动逊色得多。虽然兵变也不失为一种颇具效力的战略，但共产党人在该地区的努力明显带有农民造反和农村自治的印痕。经过“几年的酝酿”，出现了12个地方性的游击支队。1934年上半年，谢子长受陕西地下省委的派遣，接管全盘领导。谢把所有游击力量组织起来，一致反对当地军阀井岳秀。这次军事战役持续4个月之久，从1934年的8月直到12月，战役结束时谢子长身负重伤，但共产党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共产党人非常兴奋，立即把他们游击部队的番号提升为红二十七军。^[37]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在全省统一协调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惠子俊和郭洪涛被任命为工作委员会正副书记，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的正副主席。谢、刘两支部队在陕北地区得以合并，统称红军二十六军，但两支力量合在一起也不过三个团，总人数2000人。谢留在后方治疗，不久即死于伤疾，军事指挥的任务就落到了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和政治委员高岗的肩上。^[38]

1935年初，红军在“第二次围剿陕北战役”中与杨虎城接火。经过几个月的交战，共产党人取得了几次战斗的胜利，并使敌人的进攻告一段落。陕甘边界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块根据地，领土扩大到覆盖20个县，人口90万，常规兵力4000人^[39]，当然，这些胜利不能仅仅理解成是由好运气带来的。事实上，正是红军主力部队与国民党主力部队在南方的殊死拼战，才使陕西地方红军力量迅速壮大有了可能，虽然作战双方都好像是很难明白这种国内的政治平衡作用。

作为蒋介石重新组织发动全国反共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学良受命坐镇西安指挥。他带领东北军5个军、20个师，约20万人。^[40]实施这一决策是出于红军两度撤离以后，鄂豫皖地区已大致平安无事的考虑，也是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从川西北上的企图。就在这期间邵力子到了陕西，取代杨虎城作了省主席，张学良的一个将领于学忠到达甘肃的天水，主持西北四省的“剿匪事

179 宜”，从而使得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作用黯然失色。总之，1935 年下半年诺大一块西北地域全部落入张学良控制之手。^[41]

张学良可能也同意蒋介石的想法，把共产党从陕西连根除掉。但他除了这个目的以外，还另有一种考虑。他渴望在共产党被赶出去以后，在陕西为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无家可归的东北人和东北军营造一块领地。1935 年 7 月，张学良刚刚走马上任不久，就开始在陕北发动了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多省联合军事行动，集中了几省军队、不同派系，大约 10 万人投入战斗，张学良的基本战术是，调用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和山西阎锡山的军队在北线截击红军，他自己的东北军则在南线分担主攻任务。^[42]

共产党这边的情况是，红二十六军部署在陕北一线，抵御宁夏、山西军队，双方在多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各有输赢。南线东北军稳扎稳打，向苏维埃根据地推进。红二十六军仅仅是一支由游击力量组成的部队，大战役几无有染，故而此时形势对刘志丹和高岗极为不利。幸亏在这个节骨眼上，徐海东与程子华从南方长征到达陕北，他们的红二十五军不但训练有素，而且精于和国民党正规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43]

国民党方面，张学良的部队过去很少有过与红军直接交手的经历。他们采取一种正规战术。在几条线上向前推进，围而合击。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的军长，得知红军围攻甘泉市之后，立即调遣一个师的兵力前来增援，结果恰好中了红军设置的“围点打援”战术，这种战术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多次采用的老战术。王以哲的这个师在劳山遭红军伏击，数时内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身亡。红军乘胜追击，摧毁东北军的另一个团，团长高福源被俘。伴随着反围剿的共同胜利，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合二为一，联合组成红十五军团。^[44]

劳山战役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南方老根据地开拔出来的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却同时构成了对国民党和陕北地方红军的双重威胁。随着红二十五军变为红二十六军的一个“实力约制”措施，朱理治、郭洪涛、聂为军、戴季英等一些老资格政治

领导人物取得了更大优势，他们热衷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更重的分量。于是乎，军队与党之间、陕甘边界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之间、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之间的各种矛盾很快地暴露出来。当年曾对陕西共产党人的军事成功有过益处的地方红军领导人同当地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暧昧关系，此时此刻在政治原则上变得有懈可击了。^{*}

包括刘志丹和高岗在内的红二十六军的某些官员被发现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或与其结过盟，而一些国民党的俘虏说他们自己也是红军的伙伴或助手。按照严格的阶级标准和革命身份来判断，这些现象显然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可饶恕的背叛行为。劳山战斗之后，刘志丹和高岗被中共安全保卫局逮捕，当时戴季英主管安全局的工作，从此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就很快展开了。^[45]

陕西省委的政治领导人及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干部中，多数人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肃反运动。他们当中多数认为自己就是党中央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而另外许多人包括肃反受害者也都这么认为。仅仅1个月之后，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这些人才吃惊地看到，事情正好相反。党中央不再是几年前他们心目中所想象的党中央，党中央执行的路线也不再是他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革命路线。^[46]

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第二天，共产党人发动了一次挫败马鸿逵一个骑兵团的袭击战，并一路追敌，他们的口号是“不给苏区带来尾巴”^[47]。他们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靠近陕北苏维埃中心地带，毛泽东亲自到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会见从前线被召回来的程子华和徐海东。毛泽东与徐海东会谈气氛融洽，并送给徐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和几个话务员，然后很礼貌地请他们返回作战前线。与此同时，一封以党中央名义发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他们停止肃反运动，立即释放刘志丹和高岗。以毛泽东的丰富

^{*} 参见《西北局关于肃反工作的调查决议》，1935年11月26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辑，229页；高岗：《中共边区历史问题回顾》，1942年11月，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96～97页。高岗激动地回忆起陕西党和军队间的冲突，以及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对内部关系的影响。

政治经验，对于徐海东的实际军事力量和本地人刘志丹和高岗的潜在影响力，他不能有所忽略。几天之后，毛泽东与徐进行了另一次谈话，就党和军队的具体问题向他咨询。徐告诉他，红二十五军中还有 300 人左右的政治犯和政治嫌疑犯，毛泽东立即回答：“立即全部释放他们，恢复他们的党籍。经历过长征的艰难困苦的人，没有一个会是反革命。”^[48]

181 毛泽东和徐海东之间的亲密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喜爱像徐这样思想单纯、举止粗犷的军官，他们于军事上有益，政治上却无害。至于刘志丹和高岗，从监狱获释以后，自然对党中央满怀感激之情。惟独那些省委政治干部，对党中央的到来并不觉得有多少高兴情绪，不过相对说来，他们缺少实际权力，显得无足轻重，用不着为他们担忧。在那一帮最积极开展肃反运动的人当中，戴季英受到周恩来的嘲笑：“如果刘志丹是反革命，我们倒很希望有许多这样的反革命；如果说你戴季英是一个革命者的话，像你这样的革命者我们一个都不想要。”^[49]但对于朱、郭、聂、戴等人的处理，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显得相当的宽容。他们的革命动机得到承认，他们的错误行为只受到轻微的批评，而他们作为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则被坚决地削弱了。然而，正如在 1935 年 11 月党中央作出的《关于西北局肃反工作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人也还是得到适当的使用。朱、郭等人留任地方党领导岗位，他们与中央北方局有着一定的关系，同时在陕西党的干部中间颇有影响力，这都是今后有用途的。

1935 年 11 月 11 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被委任为军委副主席一职，随后又进入政治局，明显是由于朱德走后他在红军当中担任总指挥^[50]一职起了作用。毛泽东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位，实际行政由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负责管理，博古担任主任。在党中央，张闻天以总负责人的名义主持日常工作，所有重大的决策概由毛泽东作出。总之，初到陕北的党中央稳妥地控制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作为领袖在党、苏维埃和军队的稳固地位建立

起来了。^[51]

为了保卫陕北苏维埃根据地，也为了提高内部威信，初到陕北的这些南方人需要成功地完成一次对国民党的作战任务。毛泽东比别人更加清楚这种战斗的必要性。王以哲在劳山丢失一个师以后，教训牢记心头，停止了在南线针对红军的行动。但另一个东北军将领董英斌从甘肃向根据地西线推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第一、十五军团后撤，“诱敌深入”，准备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董英斌并不懂得南方老苏区红军的招术，故继续向里推进，没有任何防备，致使牛元峰的一〇八师被两支红军包围在直罗镇。经过一天的艰苦作战，这支东北军劲旅被彻底歼灭。师长牛元峰发疯自杀。毛泽东称直罗镇战役是建立“中国革命西北大本营的一个奠基礼”。

182

到达陕西有助于共产党领导人了解过去一年长征路上已经陌生了的国际国内形势，他们很快取得了同党的北方局的联系，并且获知日本全面入侵华北，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抗日态度暧昧，河北察哈尔省汉奸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北平兴起大中学生抗议风潮等等。日本人入侵华北，无论是对于民族之存亡还是对共产党人之兴衰都已成为目前压倒一切的紧迫局势。”

1935年11月末，张浩（本名林育英）^[52]自苏联经蒙古沙漠来到了陕北。他向共产党领导人通报了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八一宣言”，也传达了上半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的内容。“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同时强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个政策给中共中央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政治视野。须知，他们是以党中央的名义而不是以前陕西地方干部的身份听取以上通报的。以往那些山区陕西干部只不过是地方上的一支势力，既无兴趣也没有地位将国际国内事务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联系起来。各方面来的消息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似乎颇有鼓励。党中央领导人已是相当精明，他们把握时局，审时度势，不但要巩固陕北根据地，同时还要在全国发动革命运动。他们的基本目标很明确：把这些客观形势当作有利的因素，利用这些条件最大限度地为扩大本党的势力，夺取全国

* 应当注意，陕西省委很长时期是中央北方局的一个支部。朱理治本人在1934年作为北方局代表来陕西前曾任北方局书记。部分是由于朱与北方局的特殊关系，他未受中央的批评，在后来同党中央和华北方面的接触中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权而奋斗，不久，他们将这些考虑转变成了正式的决议。

1935年12月末，共产党人在瓦窑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明确日期未见记载，很可能会议由几个正式或非正式议程构成），开了好几天，然后作出了书面决议。^[53]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不但标志着中共国内战争战略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的政策从此面向抗日民族战争——而且也足以看出中共整体的政治成熟。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出现了一种基本的精神转变，那么这次会议实际上则是转变的一个正式宣言。

183 出席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及张浩等人。前面的7个人是政治局常委或候补委员，属于法定参加人，紧接着的两人是中央委员，张浩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代表，郭洪涛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54]与以往不同，几乎没有军队领导人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参加人员的这种构成表明，一旦军事危机过去，党的政治领导又成为关键。此次会议还表明，毛泽东乐意使用政治干部在彭德怀和林彪等军事干部之间维持某种整体平衡。

同瓦窑堡会议相关的有三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会议的政治决议，题为“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个是军事决议，题为“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最后一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是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为党的积极分子所做的一个个人讲话。

作为对国内外形势的总体估计，会议的政治决议认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与战争的前夜。”为了应付目前形势，党中央制定了总路线或总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5]

更为具体的是，决议号召建立全国动议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转向人民共和国，号召从以前的阶级政策转变到社会革命的政策上来。决议规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在农村中实行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决议表示共产党将向所有阶级开放，而不只是城市产业工人和贫农佃农，“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们，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新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56]。

184

人的思想究竟是客观物质的反映呢，或者只是主观精神的表现，这恐怕是一个最不易解决的哲学命题。一个人关于某个事物的新观念，到底是直接由客体的实际变化而引起的呢，还是这种变化单纯地或主导地存在于主体的心灵变化之中呢？这个问题仍然不好回答。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主要是形成于日本人的入侵，还是来源于一种新式的共产党立场呢？这个问题倒比较容易。从1931年以来日本人大肆侵入中国，1933年日本人已经占据平津，至于日本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企图更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以后的19世纪末。1935年底，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对于政治和中国政治的态度在1935年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依靠自身的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利用一切现有因素增强军事权力，应付各种政治现实，放弃各种书本教条，正是中共政治哲学的这个转变促成了瓦窑堡会议上政策范畴的转变。

瓦窑堡会议决议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同时视为反对的目标，蒋介石被轻描淡写地贴上一个民族叛徒的标签。长征的严酷经历在共产党人的心里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并没有忽视或轻视发展

他们自己的根据地和军队。决议当然地认为：“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的扩大巩固与善于使用，才能保证反日战争的胜利……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必须扩大数百万红军才能济事，首先是扩大一百万。……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扩大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即抗日红军的根据地，是不能成功的。”^[57]

很明显，不论是从手段还是从目标而言，共产党必须增强它的军事实力，扩大它的根据地面积。抗日不但是一个真诚的意图，而且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号召。决议同时提出发展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中共党员。

政治决议的另一个显著的内容是把“‘左’倾关门主义”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看作是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决议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有三种有害的根源：（1）它并不理解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因而不能理解改变我们的战略以适应新形势的必要性；（2）它不能把党的一般性口号和纲领同具体情况下的口号和纲领联系起来；（3）根本上说，它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来崇拜，并不能够灵活地把他们运用到中国独特的具体环境中来。^[58]在这里，中国的权宜政治实践被当作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不是高唱革命的抽象教条。这标志着一个基本思想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甚至比任何单纯的实际事务显得更为重要。

从瓦窑堡会议的军事决议中可以看到有关红军在当时采取的更为紧迫的一系列措施。虽然反对日本人的民族战争再一次得到强调，但决议所描绘的真实意图却是保存并扩大共产党军队的实力。这一点在下面的一段文字里表述得很详细：“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20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5万人。”^[59]

在相关的军事决议当中，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把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结合起来。红军的战略任务是“跳出外线同日本人作战”，

“巩固并扩大苏维埃根据地”；红军应当“把第一个目标作为主要的任务，同时紧密地与第二个目标联系起来”。具体来说，军事决议把陕西东部、绥远北部两个方向作为红军军事出击和苏维埃根据地拓展的路径。^[60]

军事决议还提到了在日本占领区或日本的傀儡地区从常规战争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移问题。“所有的游击队都应当以民族战争的名义开展斗争，一切土地革命也应当在民族战争的旗号下进行。”^[61]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详细阐述这个问题显得为时尚早，但基本的观点这时已经诞生了。两年以后，共产党领导人完全意识到开展游击战争对他们党派利益所具有的绝大好处。

1935年12月27日，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讲话之前，很少有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能像这次一样更好地表明他的政治才华和迷人个性。这次谈话可以说是对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一次口头传达。毛泽东的讲话铿锵有力，自信洋溢，倒不一定富于逻辑和推理。站在过去的角度或站在博古的立场看，长征是一个失败，但着眼于未来或从毛泽东的立场看，长征是一次胜利。所有能想到的古典的谚语和市井的俏皮话都结合起来，拿来嘲弄前者教条主义的领导作风，亦谐亦庄，无所不及。毛泽东就国际关系而发的评论，尤其引人注目。与几个月前称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红军要向中苏边界退兵寻求支援相反，他现在宣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62]

186

瓦窑堡会议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开端，但更为重要的在于它证明了共产党总的精神取向的转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苏联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没有认识到——甚至目前也不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惟有借助于他们对留在莫斯科的王明直接间接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才得以建立起来。下面的引述来源于两位苏联官方历史学家1975年出版的一本书，算是对这种态度的一个例证：

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人，由于复杂的形势暂时脱离了共产国际，因而不能独立地跳出旧政策的框子。1935年8月初召开的、由毛泽东起主导作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根本没有考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935年8月1日的宣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的决议，反映了两条相互对立的政治路线。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才使中国共产党转而采取了有效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放弃了“左”倾宗派主义路线。^[63]

瓦窑堡会议刚刚结束，刘少奇就离开陕北，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一职。他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允许那些关在北京和天津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为了获释写出“坦白书”在报纸上发表，毛泽东赞同这个决定。出狱的几十人都成为党在北方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北京和天津的大批青年学生被吸收入党，或者在各地为党秘密工作，或者直接进入陕北根据地。1936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共同苏联的接触变得正常起来了。同年早些时候，刘长胜从莫斯科经蒙古到达陕北，带回新的秘密电码，从此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恢复正常。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邓发又受命作为中共代表经新疆前往莫斯科。这样的接触，对于新中央领导人赢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对于他们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合法性都是十分必要的。^[64]

187 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了巩固红军和根据地政权，共产党人不得不努力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寻求和平共处。他们当前的争取对象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直罗镇战役取胜后，毛泽东给战败的东北军董英斌军长写了一封谦和恭敬的信，建议休战。张学良当时人在南京，故董氏不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给杨虎城发出一封个人信件。经过一番热诚款待与耐心教育之后，共产党释放了所有国民党战俘，他们中间就有甘泉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通过高的劝说工作，王以哲和张学良同意和红军举行秘密谈判。1936年2

月，中国共产党派李克农为代表在延安会见王以哲，他们双方达成了一个口头协定，互不侵犯，互相进行物资贸易和信息交流。3月份，李克农设法在西安拜会张学良。1个月之后，周恩来亲赴延安，与张学良举行单独会谈。^[65]

杨虎城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因此，共产党同杨虎城的再次交往与同张学良的交往比较起来开始得要早一些，商定起来要容易一些。甚至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前夕，南汉宸就飞往南京与杨虎城举行秘密会谈。1935年12月，汪锋再度前往西安拜见杨虎城，转给他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另一中共干部王世英与杨虎城在天津举行了另一轮会谈，之后双方达成协议，互派秘密代表团，建立秘密电台，保持通讯联系，开出一条秘密路线输送弹药。^[66]

共产党已经在陕北建立起一块稳固的立足点，不过也仅此而已。就暂时而言，没有强大的敌人来惹他们的麻烦，但是他们却得去惹人家的麻烦。陕北根据地虽说地域广阔，但毕竟人口稀少，红军招募兵源尚属艰难，而且全部根据地极其贫瘠，不可能找到足够的物质给养。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说，共产主义革命意味着进攻。

1936年2月27日，红军总指挥部发布一个公开告示，名为《东征宣言》，宣告中国人民抗日先遣队成立。至宣言发表时，红军早已有15 000人渡过黄河，深入山西。宣言庄严宣布“红军将东渡黄河抵抗日本侵略军”^[67]。然而，他们的真正目的与这种公开说法不甚协调。阎锡山为人狡诈奸猾，当然不会误信共产党的这些堂皇口号，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视红军的行动为对他地盘的侵犯。对于广大民众，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却像他们期望的一样富有效果。

“东征”开始之前，共产党内领导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在那些对于由毛泽东提出的东征建议持反对意见的人当中，彭德怀就是一员。的确，部队需要衣服、子弹和银元；也需要物质给养，更需要增补兵员，所有这一切彭德怀作为一员老红军指挥家心里是清楚的。他难以吃准的是毛泽东富有哲思的那些话，比如“只有通

过发展才会达到巩固”。彭并没有被说服。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很有权威的地位，不能直接顶撞了，但是彭德怀还是提出他自己的忧虑来：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一旦陕西后方根据地被敌人占领，黄河被切断，红军将不能保证再返回来怎么办？长征的苦涩经历——游离不定，缺家少粮——应作为教训时刻铭记在心才是。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他颇为逼真的个性的一个反映：“你说保证？我什么事也不能保证！”似乎为表现他的英豪侠义精神，毛泽东宣布，他将亲自领导东征，留下党和政府在后方的工作给王稼祥、周恩来和博古去干。^[68]

抗日先锋队偷渡黄河，先来到山西中部的孝义。在那里部队一分为三：红十五军团向东北方向进发，逼近山西省会太原，阎锡山赶紧跟来后，部队又调头往山西西北移动，将敌军吸引前往，但回避直接交战；毛泽东和彭德怀率一个团 500 人居中指挥——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游击经验使他成功地采取了这样的冒险；红一军团主力立即挥师南下，沿太原——同蒲铁路线进入到物产丰饶、人口稠密的晋南汾河流域。红军主力在此地打败了少数敌军，但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大量钱、物、粮食、武器弹药及兵力补充。^[69]阎锡山和他的军队陷入恐慌之中，蒋介石在 5 月急忙调他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共产党人则发表一份措辞严正的声明，谴责蒋介石和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并表示不愿同自己的同胞火并，接着便把部队撤回黄河西岸。^{*}

在晋南地区，光是红一军团就取得了 40 万银元，扩充了兵员 5 000 人，得到大量的物质给养。共产党还沿途向农民分发粮食，宣传中共政策，并建立起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给游击队留下枪支弹药，为以后“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实际上，所有阎锡山的军队从黄河西岸完全退了回来，以防卫山西本省，这样一来，陕北根据地的处境更为安全了。^[70]在一定意义上说，革命攻势的发动不但源自于道义的力量，而且有着各种实际的缘由。作为中共政治家的毛泽东比军事领导人彭德怀具有更加深邃的眼光：通过率领部队在外成功作战，倒能加强本人在党内的权威。

* 在离开山西返回陕西之前，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发表一个抗议书，《中国人民红军先遣支队关于民族的叛徒蒋介石、阎锡山阻挠东进反击日本、搔挠其后方的声明》，1936 年 4 月 5 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7 辑，752 页。返回陕北根据地后，他们又发表《关于停战和谈联合抗日宣言》，1936 年 5 月 5 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762 页。

红军部队返回到陕北后，在相国寺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总结了这次东征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批评了第一军团内他自己的人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严厉地批评他们无意支持其他红军部队尤其是第十五军团。毛泽东表现得大公无私、宽宏大量。他很清楚，这里他对自己部队的批评对于巩固他在整个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是必要的。他同时也发动了一场进一步对“自由主义行动”的批评：有些红军军官和士兵死背着抗日口号，一心只想着一路往东去，穿过山西去河北跟日本人打仗。他们并不懂得“打通抗日路线”对毛泽东来说只是一种对外用的口号，而不是真正的目标。^[71]

东征1个月之后，毛泽东又号召一次“西征”。这次行动似乎更难以对外解释。如果东征可以被解释成是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话，则很难说明西征的合理性，因为西部根本就没有日本人的痕迹。不过，对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家而言，这一点并不成问题。他们说，为了准备反对日本人的战争，他们必须要肃清那些汉奸队伍和反动分子，巩固抗日后方根据地。对于友好的张学良，共产党人较为坦诚地说他们是为了去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这一次毛泽东没再亲自去，彭德怀被委任为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72]

西征是在5月14日正式宣布的，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征野战军”。整个军队兵分两路：第十五军团组成右路军，第一军团组成左路军。左路军突破甘肃东部，占领环县、庆阳，摧毁马鸿逵地方军队一个旅。随后，左路军继续西进，进入宁夏，8月末抵达黄河九曲回肠的东岸。同一时间，右路军沿长城一线前进，占领盐池和“三边”：靖边、安边和定边。从该地继续西行到达同心城，接近海原地区。

3个月内，红军行军400里，占领12座城池，将9个县并入根据地版图内。与东北军和马鸿逵部队相比，红军这次显示了自己强大的作战力。红军一举粉碎了何柱国指挥的东北军的四个连，随后又派出代表立即进行谈判，最后何柱国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允许红军自由通过他的防区。^[73]

在努力巩固陕甘苏维埃根据地，恢复同共产国际和苏联接触的

* 1935 年秋，陕北根据地大致扩大到 20 个县，900 000 人口。1936 年夏季西征其间，该根据地占有 15 个县，能有效控制的有 10 个县。陕西红二十六军的正规部队大约 4 000 人。红二十五军到达后增添了 5 000 人，中央红军带进 7 000 人。共加在一起应当有 15 000 人的队伍在东征当中，他们损失了 2 000 人，但增补 7 000 人。因此，1936 年时陕北根据地的领土粗略算有 30 个县，军事实力有 20 000 人。参见《陕西大事记》，252、264 页。

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劝说张国焘北上。西征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欢迎那时还在自南北上在长征路上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产党人普遍希望所有共产党力量能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更会给身处北方的毛泽东与党中央带来好处。

截至 1936 年下半年，一个新的共产党的大本营正式于中国西北方形成：陕甘宁边区几乎覆盖 30 县，拥有 2 万红军部队，150 万人口。*

这个大本营在其四周都显得安全牢固：两次军事远征巩固了东西防线；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秘密协定保证了南部防线；北部防线是大戈壁滩，比任何人工防御体系都来得结实保险。除非国民党中央军再发动一场强大的围剿运动，国民党各省地方部队都不可能与共产党人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

至关重要的还在于，陕北的毛泽东和他的陕北同志们事实上已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真正合法的领导中心。他们具有诸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等一些堂皇称号；他们获得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承认；他们在北方各地党组织的权威地位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与南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正在发展之中。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被接受了。尽管张国焘可能属于那些最早想到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必要性的中共领袖之一，但正是在 1935 年和 1936 年初，张国焘仍旧被困于西南山区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西北通过一系列党中央的会议和文件正式确定了这个总路线。在新的中央领导和政治方针指引下，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已是非常醒目，而他们将要达到的成就更是令人咋舌！

第八章

红军大会师

从希望到绝望

191

1935年9月11日，红一、红三军秘密撤离巴西，在处于阿坝的左路军当中引起一场普遍骚动。陈昌浩和徐向前及时来电通报和抗议毛泽东率部擅自撤离，红四方面军官兵争先恐后数落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事过几十年后，张国焘仍不忘用一种积愤轻鄙的言辞表达他对毛泽东违抗红军总司令部命令、率部北上的自私举动的态度。在他的回忆录里，张说：

毛泽东之所以能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一方面因为他的失败主义思想在作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哲学：宁可我负人，绝不人负我。在这种权术哲学观念的指导下，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德信念都抛弃了。只有毛泽东才会耍这种阴谋诡计。现在非常清楚，自从两军会合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玩弄政治阴谋。那些顽固天真的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利用的工具而已。^[1]

虽然张国焘也许没有充分理解毛泽东无论作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的全部含义，但

是他无疑捕捉到了毛泽东人生哲学中的一个方面。一则由于毛泽东的行为确实不可辩护，再则因为自己作为军人在政治上具有依赖性，多数留在左路军的原中央红军的军队领导人——比如朱德和刘伯承——也都是能听从张国焘的，不论他们在当时私下怎么想，过后怎么说。事实上，这些军事干部通常都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往往介于党内斗争两极的中间，随从大流而动。^[2]

192 9月13日至14日，在阿坝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新形势下的新对策。现在有些人说这是一次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另一些人说是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其实两者都谈不上，倒不妨简单称为阿坝会议更好。从实际情况上看，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一次正规的、高层次的党内会议，还不如说是一次凑集的群众集会。大约有100来人挤在一个喇嘛寺院里面，沸腾激昂的举动和煽动性的大喊大叫充斥会场。张国焘是会议的中心人物，会议首要内容是谴责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都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他们的北上被宣布为“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3]张国焘很乐于看到，有些发言人也给朱德施加压力。张再装作一个温和派，说几句缓冲话为朱开脱一下。这一次张国焘使用的是归国留苏生黄超作为传声筒，夸大事实，愤怒斥责，然后张本人出来圆场。作为一名政治家，张国焘像毛泽东所作的一样，也遵循着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4]

同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一样，张国焘也不得不把话题移开，从一味谴责对手转到安排自己的活动上来。9月15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一份“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基本内容是主张挥师南下，向四川省会成都进军，创建全川苏维埃根据地。为了提高士气，张国焘也不得不放弃高尚的革命语言，使用低俗的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去”。这种俗气的实际口号比起那些神圣的革命言辞来，似乎更能怂恿他的部队。与此同时，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也受命调头南下，向左路军靠近。^[5]

回顾起来，毛泽东的俄界会议和张国焘的阿坝会议在性质上大异其趣。前者是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未来军事计

划的一次会议，而后者更有点群众示威的味道，军事计划也不过是骚乱冲动后的一种结果。毛泽东、张国焘两位政治家的这种立场差异构成了两支红军部队在这两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不同的命运和归宿。

经过几日的准备，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中央红军的第五、九军构成）在总司令部的领导下，动身南下。他们沿大金川到达卓克基地区。^[6]10月上旬在此地与右路军第四、三十军会师。部队人数上升到8万人，包括3000名干部和指挥员。10月5日，他们在卓木堡召开了一次更为重要的会议，解决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总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目前中共领导人和历史学家在如何看待卓木堡会议上仍然面临着两难困境。他们愿意援引这次活动作为谴责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证据，但又必须慎重地对待它，因为当代的中共领导人如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和李先念都牵涉在内。结果是，此次会议的文件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作为机密情报，甚至国内的历史学家也接触不到。至于张国焘，他好像有意在回忆录中隐瞒会议细节，大概是因为这次事件的确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企图。^[7]卓木堡会议的基本意义还是相当清楚的，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正式宣告另行成立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在卓木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以及新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成为党中央和政治局的主席。这次会议还通过一个决议，解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并把他们从党中央驱逐出去。除此之外，还宣布对他们进行通缉法办。^[8]目前没有可以运用的原始记录来说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确切成员，但毫无疑问红四方面军的人控制着新中央高层位置的绝大部分。根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中共部分领导人的采访，似乎王明、林彪、聂荣臻都在新的党中央的名单上。我个人设想，朱德和刘伯承更可能参加到党中央和军委会里，再就是傅钟、李卓然等人。*

与此同时，整个军队进行彻底的重新组织，采取更加集中的领

*对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有不同的统计材料。《艰苦的斗争》约80000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则认为有100000人。我个人认为前者更确切一些。

**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 pp. 311~312. 但在张国焘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将党中央称作是由中央红军8位委员和7位候补委员、红四方面军7位委员和3位候补委员以及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构成。我们有可能从这种历史事实当中获得更切实的信息，而不仅限于接受现任党的领导人的说法。毋庸置疑，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原始文献资料。

导方式。张国焘和他的同伙们为了加强全面控制，采取了许多措施改变军事编制。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虽名义上被提拔为政治部副主任，但作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的实际权力被张国焘的人黄超所取代。何长工也同样被从第九军团政治委员的位置上解除了。此外，这两支中央红军部队被更名为红九军和红三十三军。因此，在红四方面军，甚至一定意义上在整个党和军队里，张国焘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在1935年的10月份，比以前任何时候张都似乎处在一个更加受到拥戴的优越地位。^[9]

194 这时候军事形势发展也似乎非常顺利。当毛泽东还在带领8 000人马艰难北上的时候，在川西的张国焘和他的8万人似乎非常愉快。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沿甘肃、四川边界一线部署，薛岳部沿四川、陕西一线部署，这两支部队在此阻击红军北上。大多数川军被部署在沿岷江一线的东部前线，其余少数部队留守南部懋功地区。以上国民党所有部队都处于静止受备状态。红一方面军的迅速北上，使国民党军队一时不知所措。这种国民党方面的战略不确定性暂时给张国焘造成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处境。

事后回顾起来，张国焘和他的部队当时本来有几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向：（1）追随毛泽东的足迹向东北方向前进，这可能是最理想的，特别是在9月末的时候，因为他可以轻易地沿着已开辟的路线赶上中央红军，并将以前分裂而引起的非难推到毛泽东身上。（2）向西北方向按原计划抵达夏河河谷。这个计划也不错，其中的困难是川甘西部山地横亘在他们面前，到达甘肃又是前途难料。（3）留在川西北地区，在周围寻求发展壮大，等候局势变化，张国焘以前也曾这么想过。这一选择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很容易维持目前的军事安全，而它的劣势是这块不毛之地的物质给养匮乏。（4）正如他们实际行动一样，挥师大举南下，攻取成都平原，据此而将四川中部变为一块新根据地。

实际上，围绕阿坝会议而发生的政治热烈气氛，诸如反逃跑主义、反失败主义之类，使得张国焘很快采取最后一种选择方案，没

有深思熟虑，也没有向他的高级干部和指挥官进行足够的咨询。1935 年最后几个月，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多半是政治情绪的直接反映，没有多少详细的军事研究。10 月 7 日，总指挥部发布《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留下两支部队保卫卓克基后方，大部队兵分两路纵队，沿大金川挥戈南下出击。刘文辉的川军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对手：后者轻易占据以上几县，并将战线迅速推进到 4 个月前的状态。10 月 20 日，又制定了一个更具雄心和进攻性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并且立即付诸行动。^[10]

该计划在开始实施时也很成功。10 月末 11 月初，红军占领了大多数预定的县份，杀伤川军 5 000 人，抵达成都平原的边缘，距成都只有 200 里。要不是迟疑耽误，红四方面军可能会迅速攻下这座城市。^[11]张国焘于此犯下一个战术上的大错误。徐、陈率领部队突飞猛进，张留在后方，但他说了算，他既未能号召部队迅速发动对川军的致命打击，也未能果断停止进攻，就地巩固整顿，等待全国形势的变化。与毛泽东不同，张国焘从未带兵作过战，缺乏一个政治领袖承担这类责任应具备的直接军事指挥的知识和经验。 195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蒋介石成功地将整个四川省恢复到比较统一的状态，红军对四川中部地区的严重威胁进一步增强了四川军阀之间的凝聚力。刘湘调集 80 个团，共 20 万人的兵力来制止红军的进攻。经过几场小规模战斗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于 11 月 12 日到 19 日在名山县百丈打响了。通常来看，川军并没有红四方面军那样的战斗力，但这一次因具有明显的人数优势，又处于防御位置，刘湘成功地挫败了张国焘的先头部队。刘损兵 15 000 人，张损失 10 000 人。比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红军的进攻势头没有了，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次失势是崩溃前的预兆，而对于川军而言，它只意味着稳住了阵脚，等待援军。^[12]

在川中南与刘湘的临时休战，给张国焘一个错觉，误认为在四川、西康边界新的军事根据地能够或者已经打开了，红四方面军目前正驻扎该区。1935 年 12 月 5 日，他发给陕北中央领导人的电报，

同时证实了他的政治野心和他差劲的政治判断。电报内容如下：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的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采用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称均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陕甘政府的政权组织状况报来，以便批准。^[13]

196 对于这种公开挑衅性的要求，毛泽东忍住愤怒，没有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党中央对张国焘的挑战有两月余毫无公开反应。在此之前，中央对这种名位上的要求置之不理，只在其他一些紧迫的实际问题上同张继续保持着联系。1936年1月16日至18日，张国焘召开“全川苏维埃筹备会议”。他本人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号召在全四川建立苏维埃政权。召开这样的会议可以达到几个具体目的：加强张作为党内、军内和苏维埃领袖的合法地位，鼓舞他的部队中广大干部和士兵，激励当地人民加入到他的暴动事业中来。可以说这是张国焘1933年早期在川北成功的一次重复行动。但是，由于共产党及其敌人的境况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其结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动。张国焘在会议上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外一无所获，而不久他就不得不为此付出致命代价。^[14]

1935年10月份，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西，蒋介石召集主管剿共事务的所有高级将领讨论全国的战略安排问题。他们决定由张学良指挥西安总部，对付陕甘中央红军；顾祝同坐镇重庆，对付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陈诚坐镇宜昌，进攻湘鄂川黔边界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由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移到了边疆地区，蒋介石更加关心贺龙与任弼时的部队。于是薛岳的4个军调往东面四川湖北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六军团。但是，1935年10月末，四川中心地带红四方面军的大规模进攻结果改变了这种部署。薛岳

在他东去的路上又被召回，调往川西南增援川军与红四方面军作战。^[15]

1935年11月末，薛岳率部进入成都，他旗下有2个纵队、4个军、6个师共约10万大军。从1935年12月中旬到1936年1月，薛岳和他的部下吴奇伟、周浑元发动荣经之战，扭转了战局。红四方面军损失约5000人。在天全和芦山地区，2月份的一次战役持续一周，这次作战红军以数量众多的损失而告终，2000人被俘，4000人被杀。凭借强大的炮兵、空军和对付共产党的丰富经验，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论战斗能力同红四方面军不相上下。而且，每当占领一个地区，这些国民党军队构筑堡垒，编制当地人民，这正是他们在江西时期的成功之处。他们甚至从共产党那里学会了如何优待俘虏：留下有用的专业人员为他们服务，释放一般官兵，发给回家足够的路费。从1936年3月起，薛岳命令他的部队停止追击，就地休整，让红军在荒凉的西部高原遭受自然环境给他们的困苦。薛岳直至1936年6月一直滞留川西南，直到广西、广东两省叛乱事变爆发起义，他应召东调对付紧急局势。^[16]

197

就红军方面而言，张国焘的所有错误起因于他的整体战略，而不是作战技术失误。早在南下长征的初期，红四方面军就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要么留在川康边界环绕懋功和宝兴一带，该地地势崎岖，居民不多，军事上较为安全，但缺乏给养；要么向前推进到成都平原，物丰人稠，物质供应和兵员补充方面都有好处，但面对着国民党优势兵力。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遭到川军的阻击，于1936年2月输给国民党中央军，此后，他们完全丧失进攻势头，不得不退到西康求生图存。

1936年2月末，荣经、天全会战之后，张国焘首先指挥他的部队北上退回懋功。到那里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在他们以前4个月留驻期间，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的一切都被消耗光了，特别是食品奇缺。3月，他们不得不调头西去。翻越夹金山，渡过大金川，越过丹巴和道孚，最后到达了甘孜镇。^[17]尽管国民党军队被远远抛在南部和西部，他们占据了康、藏交界的大片地区，但在这个游牧的少

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对他们极度不利。

许多南下的红四方面军的幸存者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叙述当中，都曾回想起在康藏地区噩梦般的饥荒。即使这些描述有某些夸张之处，出于谴责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以及表达对党中央的忠诚，他们异口同声对红四方面军的痛苦经历的记述表明，那的确是极其可怕的。郑维山对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部队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给养。百丈关会战后，冬天到了，还是无法找到东西为部队添装衣服。战士们把剥下来的树皮装在单衬衣里取暖。翻越夹金山的前后，一些部队穿着牛、羊的生皮作为上衣。过雪山和草地的时候，在川西要进行激烈的战斗，没有吃的、喝的，每个人面色苍白消瘦，看上去十分疲乏。回想到6个月之前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的情况，我们看到形势发生了多么大变化啊！虽然我们在甘孜和芦花有过一段时期的停滞，但这个地区土地广袤，人口稀少，是少数民族的居聚地，野草丛生，但不长庄稼。没有任何办法给几万人的部队找到可吃的东西，我们只能靠野果填饱肚子。^[18]

* 参见1936年4月1日张国焘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标题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张国焘在那里不惜运用一些低俗的煽动言辞，比如“那里有的是女人，何不抓个当老婆”，这类比喻旨在把成都平原说成是一块诱人之地，借以鼓舞部队士气。载《张国焘问题资料》，539～540页。

其他的不利因素主要还有怀有敌意的藏族部落和传染性疾病的袭击。领导人看不到前途，军队上下失去了活力，这对革命而言是最致命的。从数量上说，1936年早期在西康的红四方面军倒还没有下降到一个所谓“崩溃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地位也没有受到明显挑战。红军部队的状况还算不错，只是队伍人数从8万下降到4万。在甘孜，共产党人举行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所有司令部及下属单位人员继续执行日常军事职能，宣传工作和文体娱乐活动也在进行着，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种植谷物，纺织毛线，克服实际困难。^[19]但是，所有这些努力，远不像张国焘本人后来所说的那样，南下取得了成功。*

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显然是失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红军

部队产生了一种不满情绪，要求尽可能地调整进军方向。实际上，他们也从未有过久留甘孜的意图。就在领导人再次考虑转移的当儿，1936年6月，两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忽然传来了：两广事变爆发，薛岳的中央军调离四川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抵达贵州、云南，已距离四川不远，这样与红军另一支部队的会师指日可待。^[20]

红二、红六军团重登征途

1932年到1936年这段时期内，有多次共产党军队会师，会师之后不产生矛盾的不多。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于1934年10月的会合可以说是矛盾和冲突最少的例子了。尽管有一点儿夸张，贺龙本人也回忆起会合后的良好关系：“两支部队的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虽然有个别冲突事件发生，但这些不过就像大海之中的一个水泡。”^[21]这样的形势并不仅仅是由于如贺龙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忠诚，主要还在于两支队伍在实际条件下的相互依赖、相互利用。正如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坦率所言：“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22]在经过了3个月的长征和战斗之后，红六军团从9800人锐减到3300人，陷入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急需得到增援和休整。红三军在国民党围剿的3年时间里，以及在他们的内部肃反运动中，经受了更加恶劣的困难和牺牲，他们同样物资匮乏，精神疲倦，亟待援助。两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气质和关系也有助于顺利的联合。一方面，虽然任弼时是红六军团无可争辩的政治权威，但在军事指挥方面他既无丰富的经验，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积累起来的老行伍资历，贺龙在红三军的军事指挥作用无人可以代替。作为一名军人，贺龙没有也不想谋求党的政治权力。这两位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在联合部队中相互补充，密切配合。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任弼时、贺龙的资历职位，还是他们各自部队的实际力量，都不足以奢求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在党中央领导面前的“低下意识”，实际上反把他们拉到了一起。

199

两军团联合后力量成倍增长，任、贺二人率领联合部队于1934年11月从贵州东部返回湖南西部。那个时候，大多数湘军正忙于同湖南南部刚刚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作战，只有地方军阀陈渠珍带领约1万人留守湘西。共产党人没费多大劲就将敌人赶走，不到两个月工夫占领云山、桑植、大庸三座县城以及周围地区。因此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交界地带一个新型的军事根据地发展起来。^[23]

紧接着军事胜利以后，党和军队的积极分子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夏曦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报复以前红三军团在夏曦的政治控制下给军事领导带来的不利影响，贺龙积极参加这起活动。任弼时出于树立对联合部队的政治领导地位的考虑，也赞成这个活动。夏被讽刺性地看作是主张右倾路线、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人。任弼时批评了夏曦，但没有同意贺龙解除夏曦的一切领导职位的要求。任宁可保夏，来抑制贺及其军事人员的势力。夏被调到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200

贺龙要求严惩夏曦并非完全合理。在前几年，他并没有阻止夏曦杀害段德昌，段是洪湖根据地的创建人，对于时任湘鄂根据地领导的贺龙来说是个竞争者。任弼时将夏曦降级为下级政治领导人，但不想灭夏而助贺。不论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些共产党人都卷入了一场政治权力游戏之中。无论如何，以上这些分析不应过分偏执，以致忽视如下事实：通过对夏曦肃反过火的批判，一个更加强大、理性的领导就在联合军队中出现了，而贺、任二人之间的不和从没有达到在共同的工作当中公开辩论和分裂的程度。

陈渠珍的失败，红二、红六军团的发展壮大，以及中央红军撤离湖南等因素使国民党在1935年1月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这一地带发动一场剿共战役。参与这次进剿的大约有80个团，10万人，都是湖南、湖北本省军队。他们分成六个突袭纵队，由何健任总指挥。^[24]敌人预定中的围剿的消息传到红二、红六军团之时，恰好是它们收到党中央和军委发来的电报之日。后者刚刚开完遵义会议，正准备强渡长江，要求予以战略配合。电报署名日期是1935年1

月 20 日，包含一项与红二、红六军团相关的特别内容：

为了促进该计划的完成，二、六军团应当迅速推进，驻扎秀山、乾江、彭水、松涛、阴江和延河一带。应当调出部分兵力扩大咸丰、来凤、华能和恩施面积，发动游击战争，为挺进四川东部地区、威胁扬子江下游河谷的水陆交通，牵制并分散蒋介石的包围，帮助该地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力夺四川。^[25]

10 天之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给红二、红六军团又发来一封电报，要求他们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在湘西、鄂西、贵州和四川“如有可能，运用红军主力打破敌人包围，深入贵州和四川的广大地区”^[26]。自然，这些计划均对配合中央红军有好处。像张国焘、徐向前一样，任弼时与贺龙也没有遵守这种指示。就任、贺而言，敌人的围剿迫在眉睫，自家防守都不及，还谈得上什么出击呢！实际上，党中央很快就改变了自己北渡长江入川的打算，南进云贵去了，以上的命令也就不了了之。面对国民党的两省会剿，红二、红六军团首先向东撤退，那里敌人力量较弱，更容易击破。红军终于在那里找到机会，于 2 月份击败了敌军一个师，3 月份又摧毁敌人另一个旅。随后回师向西，重新占领大多数丢失的土地。这样，第一次围剿最终以有利于共产党而结束。^[27]

1935 年 6 月上旬，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围剿，8 月下旬结束。这一次虽有湖南、湖北两省的较前更为紧密的配合，共产党联合部队还是设法取得了胜利。在北部边界地带，他们采用运动战战略，消除了敌两个师。国民党第四十四师师长张振汉被俘，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被杀。共产党最初把张振汉作为军事技术教员留在军中使用，然后作为人质待赎回去。后来，他们把他一路长征带到延安，1937 年与国民党新一轮合作开始时，才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予以释放。^[28]

在第二次围剿取胜以后，红二、红六军团的总人数升至 21 000 人，几乎相当于一年前在湖南北部会合时的 3 倍，作战能力也获得

显著的增长。这种情况再次证明，单单依靠省地军队是很难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为了在此地战胜红军，国民党不仅需要统一指挥，还需要有中央军的参与。

1935年10月，在蒋介石主持的成都军事会议上，陈诚受命为宜昌行辕主任，负责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红二、红六军团驻扎华中战略要地，蒋对此尤为关切。^[29]第三次围剿当中，陈诚使用了湖南、湖北两省军队80个团作为阻击力量，北、南、西三面部署，又调集国民党中央军40个团，以及曾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围剿的部分北方军队，从东面发起攻击。共产党人处境非常危险。在经过最初的几次不成功的遭遇战之后，他们开始考虑改变基本战略。为此，贺龙与任弼时像往常一样请示中央。^[30]

202 1934年7月至10月间，红六军团一直保持着同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与红三军会师以后，他们将所有无线电设备带了过来。1935年7月，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突然中断——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由于张国焘接管红军总司令部的缘故。1935年9月底，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刚刚分裂不久，毛泽东、周恩来便设法与任弼时、贺龙取得了联系。但由于他们使用的密码留在红军总部了，只能使用明码。电报以周恩来的名义发出，周是前任军委会和红军司令部主持人。任弼时当然要用密码回复周恩来的电报，于是红军总部收到了这封电报，到了张国焘的手中。张国焘和朱德用密码以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了回电。虽然是首先想到另外一支红军的存在，但一经张国焘提醒，也绝不是一塌糊涂，以至于完全忽略这码事的。^[31]无论如何，在敌人新一轮围剿面前，要回答红二、红六军团战略转移的问题，张国焘充其量只能提供一个含糊其辞的建议：“在现小地区内因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32]

这封电报和其他由张国焘拍给任弼时的电报表示，张国焘并不十分关注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向他们提供怎样的建议，他本人也是含糊不清的，他的意见听起来欠缺认真考虑。从政治和军事两

方面来说，张国焘显然并未完全意识到红二、红六军团作为第三支最强大的共产党力量的分量。1935年10月，张国焘依旧陶醉在不切实际的梦想之中，以为他的红四方面军可以单独占领四川，开创一番新局面。

当红军司令部已经大致同意了外围作战计划，而国民党军队又迅速进逼的时候，红二、红六军团党和军队联席会议于1935年11月召开。会议决定冲破敌人的包围，到根据地外围作战。起初，他们只打算向湖南、贵州交界或贵州东部进发——贺龙的红三军以前曾经在这里活动过——但形势的严峻性逐渐迫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长征的道路。^[33] 203

11月19日这一天，两支红军军团突破由湖南将官李觉守卫的漓江，向东南进发，渡过皖河，进入富庶的湘中地区溆浦和新化。这种军事行动先将敌人的注意力分散到东南部，红军部队可以获取物质给养和兵员补充。这对他们后来向西开辟湖、贵边界根据地是必要的。首先，这个策略获得了成功。共产党人随后离开湘中西进，于1935年12月末巧取芷江和迁阳。国民党调集14个师、70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尾追而来。为了在这一带取得一个立足之地，共产党只好应战，希望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但樊崧甫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红军两军团打得特别顽强，共产党在边水一战损失了1000人，不得已又继续向西撤离。^[34]在黔东的江口，与张振坤部队会合。张部本是留在根据地里一个红军师，在国民党占领根据地以后，张难以承受重压，只好也冲出根据地往西南而去，总算加入了主力部队。

1936年1月中旬，任弼时、贺龙率部到达黔东的江口和石阡，那里是他们于1934年10月初次相遇的地方。强大的追敌逐步靠上来，加之边水之战造成的兵力损失，他们只好放弃原定驻留该地的打算。在一个时期里，他们曾面对着敌人多达130个团的兵力。他们朝西跑，通过余庆、瓮安、修文、黔西和大定（今大方），最终来到贵州西部的毕节。经过与追敌几次不成功的较量，特别是在与国民党中央军樊崧甫的较量后，再进入云南。绕开同孙渡的云南军

队的接触，沿云贵边界长驱南下，于1936年3月底到达了盘江河谷。^[35]

在盘江河谷，红二、红六军团同红军总司令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摩擦。联合部队想驻留该地，开辟苏维埃根据地。他们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此处三面环河，跨两省地界，远离任何战略城市，不受敌人重视；地方军阀尤国才部弱小无能，缺乏作战经验；当地人口稠密，粮食充足；至关重要的是，除孙渡指挥的云南军之外，大多数追随而来的敌军正适逢两广起义爆发前夜，对军事形势感到迷惘，既对在此边缘地区剿共缺乏兴趣，又担忧他们家乡的安危。实际政治形势是国民党部队的剿共远征为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创造了空隙，于是酝酿叛乱行动，果然两月之后就爆发了两广事变。任弼时把当时的形势报告给了红军总部：

我们周围敌只剩孙、郭、李、樊、郝各部，共有五十余团。川军还在长江北岸，黔军一部已撤出包围，增援黔桂边界对桂军的防务。敌军已极苦疲惫，数量锐减，士气低落，增援无望。因广东与南京有摩擦，桂军消极应付，部队乏力。李、郭二人称人员损失过半，请求返回湖南，只有孙渡一人稍有精神。此形势于敌不利，此次远征条件也似最为成熟。我们计划打败孙、郭二部，开辟新根据地，创造新形势。^[36]

经过3个月远征后，红二、红六军团依旧维持着原来18000人的兵力，他们一路上的损失被新征的兵员弥补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也促使任弼时、贺龙和其他人认为，他们可以打败地方军阀，在盘江河谷开创新的局面。想法毕竟是想而已：他们仍旧难以确定何去何从。任弼时发给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并没有十分肯定的语调。

1936年3月份，红四方面军进攻四川东南部失败，退到康藏边界。张国焘的部队垂头丧气，缺乏自信，期待外援。此时此刻，红二、红六军团收到了一封红军总部电报，建议他们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任弼时于3月29日这一天以模棱两可的意见

回电。他首先说明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可能性，并表示他的确希望这样做；接下来，他又说他的部队渡江北上在技术上没有多大问题，完全可以做到。实质上他在请求中央军委或红军总部替他们作出一个更明确的决定。任弼时的电报内容有一个颇具意思的结尾：

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以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以上望一二天内电告。^[37] 205

其他方面暂且勿论，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了红二、红六军团作为一支较小的红军部队的依附立场，也表明性格温存的任弼时作为一位较低的中共领导人的依赖心态。贺龙则属于那种坚决反对北上者之一。实际上，当时贺龙最关心的大概不是国内外的大局势，而是他个人的部队独立行动的问题。他后来对这段插曲的论述似乎与他本人的性格是相当一致的：

为什么过金沙江？第一个电报有争论，叫我们准备生姜、辣子、衣服等，我们不同意。第二个电报指出了五个渡口。第三个电报命令渡江。这是有命令才走的。一部分同志不愿过。理由只有一个，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38]

红二、红六军团在红军主力部队中是比较弱的一支，任弼时与贺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职位比较低，他们更容易依靠上面来的指令来决定他们的战略行动。第二天，红军总司令部——或者说是张国焘——发回一封有关决定的军事电报。电报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介绍有些故意做作而且含混不清，但在表达其真实目的时却很少有错。在掩盖自己面临的绝望形势的同时，张国焘更为言辞急切地表示，

希望任弼时与贺龙能够北上，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来。

1. 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

2. 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3. 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

4. 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39]

206 尽管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有许多犹豫和迟疑，但一经确定了的事情，任弼时和贺龙会很快付诸实施。他们从1936年4月1日出发，经过为期3个星期的跋涉，从云南中部纵贯而过，历经12个县，包括曲靖、马龙、徐店、板桥、元谋、盐丰、宾川和鹤庆。他们每天行军100多里，4月24日，红二军团到达石鼓渡口，红六军团到了巨甸渡口，准备渡河。尾随而来的敌军只有方寸之距，巨甸只有一条船，只能一次装运40人。为了提高摆渡能力，红军战士给船上捆上一个树干，另外20人抓着树干，尾随船后淌水而过。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工夫，所有的红军全部运送到了金沙江北岸。^[40]4月29日，他们抵达云南省西北角的中甸，把追敌远远抛在了后面。

他们走过长征的最后一段向红四方面军而来，在两个多月时间内纵横中国西部高原雪山，蹚过条条湍急的河流，经过藏族部落居住区。丢掉了敌人的军队，却碰上了怀有敌意的藏族部落。饥饿难耐，病魔缠身，这对于他们比敌军还要危险。翻越中甸时两军团尚且有17 000人的兵力，但在最后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锐减到14 000人。红二、红六军团在这次远征中总共损失了大约4 000人，他们中间有3 000或四分之三的人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丢失在青藏高原上。^[41]在总结这次经历的经验时，任弼时后来向

党中央汇报说，像这样的远征，红军为了阻击敌人的追赶，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应付战斗并且赢得一些胜利，不得不努力取得物质给养，不得不在路经之地补充新的兵员。任建议党不要轻易进入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42]

不可避免的北上之路

红四方面军没能在四川西部地区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退居遥远的西康高原，物质与精神都枯竭了。整个部队急迫地——也许过于急迫地——想找到一条出路。领导人正在思考另外的战略出路，虽然他们也不清楚应该在何方、如何去执行。正在这时，他们尽力诱使红二、红六军团加入他们行列。从表面上看，这两件事似乎是不矛盾的：一旦这两支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共同进行新的长征。

在与红一方面军不愉快的经历中汲取了苦涩的教训，这次红四方面军较妥善地处理这第二次会师，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1936年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群众集会上，张国焘告诫他的部下，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反对任何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出言不逊，“我们应当教育每一位警卫员和马夫”，张国焘说，“也许由于他们一两句不负责任、不适当的闲言碎语，都可能引起两支军队之间难以预料的纠纷”^[43]。

红三十二军和红四军的一部被调往南部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这四方面的部队击败了李抱冰率领的国民党军队，4月中旬占领了雅江。然后从雅江往西，到达理化镇，在雅砻江西岸广大地区为他们即将到来的同志们打开了一条通道。张国焘迫切期待着这次会师。但从总体上看，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以及随后在统一的党和军队里，这种会师对张的地位将会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呢？目前这个问题他也来不及多想。^[44]

虽然1935年9月的突然分裂给各自带来了一些敌意，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仍保持着电报联络。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

* 尽管决议包括一些强烈的反对意见，如“张国焘同志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党、对革命的背叛”，但这个文件根本也没有送到张国焘的手里。参见《关于张国焘同志另立中央的决议》，1936年1月22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6页。

毕竟只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无论是从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斗争方面，还是从他们试图控制对方，建立自己在党和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来看，这种联络都是必要的。在他们的通电中，双方特别是毛泽东方面，保持着一种克制又不失策略的姿态。1935年12月，张国焘宣布成立自己的党中央，要求解散陕北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同伴相当克制，没有立即对这种污辱作出激烈反应。他们只是以张闻天的名义给张国焘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他放弃党中央的名义。直到1936年2月份，红一方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打了败仗，中央政治局才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谴责张国焘私立“伪中央”。*

208

自从林育英于1935年11月末抵达陕北以来，由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地位和热心，也由于陕北党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他在双方之间充当了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林把“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摘要用电报传给了张国焘，通知了他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45]张国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较少空想、多些实际的新政策。仅仅在四川苏维埃预备会议开过10天之后——当时苏维埃革命还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张国焘就在1935年1月28日举行的党和军队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热烈欢迎“联合一切队伍、一切党派和一切武装力量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新政策。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相应取消。^[46]这次对向新路线的转移接受得很快，几无障碍，是因为有共产国际施加的影响，也由于张国焘本人的一贯立场使然。张国焘和毛泽东长期以来都坚决反对“激进的唯心论”，这方面他们之间从来没有问题。

就党的领导权力而言，张国焘与毛泽东则是处处对抗为敌。革命理想主义同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兴许容易解决，因为他们的论争都集中在正确与错误的战略方针区分之上；但在重现实的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却很难解决，同往常一样，这种矛盾集中在党的领导权上，也就是谁服从谁的问题上。可以几个人同时执行一条政治路线，但不可以几个人同时当最高领袖。因此，张国焘讲话的最后建议是，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临时联合中央，再在将来的党的七大

上解决组织争端问题。在此之前，他进一步提议，由毛泽东领导西北局，张国焘领导西南局，都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领导。为此双方应当收回各自党中央的称号。^[47]这听起来或许不失为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建议和折中，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在他的伙伴眼里，甚至在张本人看来，张国焘的党中央从来没有过像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那样具有合法性。现在，这位处于不利地位的下级，企图折中寻求一个平等地位也就满意了。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建议无动于衷，既未正式接受，也没有正式反对。双方仍然各行其是，都意识到外在的军事表现最终决定内部的政治地位。1936年春季时的不同在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发展顺利，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四川的征途中损失惨重。在撤退到西康、西藏边界地区时，张国焘还支撑着他的党中央架子，继续谴责毛泽东及其同伴。这样做维护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巩固了他在军队中的领导，已不意味着热衷于要求对陕北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鉴于这种心态，1936年4月1日，在党和军队的另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张国焘说：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
209
经过8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整，同时正当主力红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左倾口号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他们总是吹嘘和说大话，甚至在擅离中央苏区之后还不断颂扬他们攻击敌人所获得的胜利，丝毫没有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判断。^[48]

但是，就在红二、红六军团从南面靠近红四方面军的时候，张国焘批评党中央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在另一支红军部队即将到来之际，如此公然谴责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又如此傲慢地宣布自己代表党中央，将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1936年6月6日，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一次党和军队积极分子会议，适逢罗炳辉的红三十二军和萧克

的红六军团在理化会师，张国焘在会上发表了一次有趣的讲话，在讲话里面，他试图用两则“令人高兴的消息”先给听众一个惊喜。自然，第一条消息是与红六军团的会师，第二条张国焘描述如下：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归于统一了。去年12月时候，我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同时不论哪一方面——陕北或二、六军也好，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这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管哪方面的党，都是艰苦的为实现这一决议的精神而斗争，并且已收获了显著的成绩。最近我们和陕北方面的关系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已得到了一致，并且在实际行动和军事战略方针上，都能够一致地行动了。^[49]

更具体地讲，张国焘对陕北中央红军和西康红四方面军之间达成的一份双边协定作了若干说明。这样的协定实际上在双方之间是否真正存在过吗？如果有的话，它又是怎样设计出来的？是在谁的名义下签署的呢？这些问题张本人没有说明，历史学界至今也依旧悬而未决。张国焘这个讲话肯定存在着派别偏见，但是它作为一份历史文献材料的参考价值却是极其重要，不容忽视的。该讲话继续说道：

210

双方商定不再使用“中央”名义，让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临时中央，负起中央责任。大家知道，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受陈绍禹同志领导，另外还有许多同志，现在，林育英同志已经回国。陕北中共有八位委员，七位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位委员，三位候补委员，在共产国际还有二十位同志。这样，陕北的可称作“北方局”，负责那个地区的党务和军事。另外，还有位于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现在是“西北局”。^[50]

就党中央的成员数目与权威性而言，张国焘明显处于劣势，同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卓木堡会议上宣布成立的党中央缺少合法性，所以他乐于为争取一个平等的地位而奋斗。但是由于张国焘在红军当中占有优势，他不允许任何人分享他的最高军事领导权——既不允许毛泽东和他的陕北党中央，也不允许王明和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出于此种考虑，张国焘在同一次讲话中宣布：

对军事的统一领导不变，军事组织形式和一、四方面军联合时的一样。朱德同志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同志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即将成立的三支前线部队是：陕北一方面军，指挥彭德怀；二、六军团组成的二方面军，指挥贺龙；四、五、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军属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51]

那么究竟是哪边正确，哪边错误呢？张国焘免不了提到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个问题曾长期存在，而且曾以非常公开的方式争论过，不便完全避而不谈。关于这一点，张国焘惟一对自己和红四方面军的同伴们予以安慰鼓励的是，他们方面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支持者，而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只到后来才转到国际路线上来。“我们以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是正确的，”张国焘说，“但是陕北的同志们既然已经回到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上来了，我们就应该联合他们，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52]也许张国焘的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他的部下，也许他讲这些话毛泽东和陕北方面人根本不可能听见。作为对往事的记录，张国焘的讲话或许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惜不幸的是，他讲这些话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回顾过去，而在于为他目前摇摇欲坠的地位辩护。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本应对眼下的形势充满自信才是，而不只是像阿 Q 那样一味回顾他往昔的光荣。恰恰是眼下的形势正在困扰着他！直到 6 月份张国焘一直顽固

地坚持以上立场。任弼时与贺龙的“第三者”到达之后，张国焘连这点自我安慰的立场也保持不住了，虽出人意料却是自然而然。

6月初，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终于和红六军团的第十六师于理化南部的甲洼会师。不久之后，红二、红六军团全部抵达甘孜。6月底，任弼时、贺龙与张国焘、朱德会面。在长征途中又出现一次欢快的会师场面，一切看起来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这也只是开始和表面的现象，问题总还是有的。^[53]

在党和军队中，处于两大强大的对立面中间，任弼时无法拥有多少独立性。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也由于此他才充当着一个怀柔者和调停人的角色，极力维持一种独立持中、不偏不倚的立场。也许这可以被认为是在政治游戏上“第三者”所起的一般作用。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后，与红四方面军的接触使他们得到了食品与弹药的补充供应，但同时也得到了有关党内斗争的政治宣传。一些政治地位较低的军队干部如萧克等人，更容易接受张国焘的劝说。萧克很快就接受了红四方面军的立场，倾向于认为红一方面军丢了苏区损了红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

任弼时则在政治方面显得更加小心谨慎，甚至还在会师之前，他就写信给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给他特别的提示。他禁止听取红四方面军中全党全军分歧的言论，严禁评论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之间闹分裂的流言飞语，张国焘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任何文件不予传达。当两支军队最终在甘孜会师的时候，张国焘建议召开一次党的联席会议。任弼时反驳说：谁来做总报告？一旦发生分歧谁又做结论？以何种组织的名义召集会议？^[54]在这么多异议面前，张国焘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召开正式的党大会的计划。不过话又说回来，任弼时的这种态度并非像后来许多内地史学家说的那样，是有意支持毛泽东而反对张国焘，而只不过是维持“第三者”的位置的基本条件罢了。

212

1936年7月初，两支红军部队的联席会议在甘孜召开，解决会师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甘孜会议被称为党和军队的积极分子会议之一，会议没有正式党组织的名义。几乎双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都

参加了这次会议。除还在前线打仗的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外，大约有十几位与会者，包括红四方面军党委的成员和红二、红六军团军委的成员。除张国焘、陈昌浩、朱德、任弼时、贺龙和关向应外，其他与会者还可能有李卓然、傅钟、萧克、王震以及其他几个人。^[55]通观这次会议，所有可能导致党中央内部争论的敏感问题都避开了，只有最为紧迫的问题，如联合后的组织问题，联合的军事工作问题等被提出来加以讨论。除了各自有一定的保留以外，令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是，红二、红六军团从此正式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单位，称为红二方面军，贺龙被任命为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应当毫不迟疑地迅速北上，这个决定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北上的途中，红四方面军将分为三个纵队前行，红二方面军作为一个纵队断后。^[56]

甘孜会议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之间、毛泽东党中央和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部之间的不和与摩擦，但这种不和与摩擦仍然是潜在的，而有些实际问题又是与此相连，不能忽略不顾的。例如，他们认为是属于哪一类的正式党组织呢？毕竟他们是共产党，他们只能树起党的旗号，无论党中央或者四川省委这类旗号似乎对他们都不合适。为了使这支联合在一起的共产党军队有一个合法的称号，任弼时等人建议组建中央西北局——这本身已表示马上北上——但这样的“西北局”必须得到他们以外的“中央”权威的认可才说得过去。一个更加深刻而艰涩的问题是，张国焘和他的部队的军事行动不但与国民党敌人有关，而且也同他们党内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他们的军事安排同陕北的中央红军之间具有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也是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

1936年6月之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已经合并了，张国焘也很少就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错误发表什么意见了。与此同时，两支部队的结合微妙地改变了权力结构，因为两大军事力量之间现在互相牵制，政治影响更加主导军事实力。具体点说，张国焘的个人控制削弱了，朱德的影响力有些上升；在红二方面军内，作

为政治发言人的任弼时的地位更加巩固了，而贺龙的军事权威则进一步减少。^[57]

213 同时更要看到，两军的联合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军事行动的计划。张国焘既没有及时地预料，也没有详细地盘算过这个影响。他试图劝说红二、红六军团放弃他们的根据地，加入到红四方面军来的尝试很明显是加强他受挫部队力量的一个妙想，但这个尝试却也预定了他的军事计划。如果两广事变能提前几个月爆发，不是6月份而是4月份，张国焘或许能默认任弼时和贺龙的要求，让他们继续留在南方而不是北上。在那种形势下，薛岳在川西南的部队和卫立煌在云贵边界的部队也会被立即召回，而这两支红军队伍一定会分别出击，乘机利用国民党军人之间的矛盾，在诸如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各省重新发动成功的反攻，在西南方形成一种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战略配合的局面。在这种条件下，张国焘仍旧能够在党中央内获得和毛泽东同样有利和平等的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北上，这个可能性也就自然不复存在了。两支红军合二为一，已把立刻北上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曾有那么一刻，张国焘还倾向于留在西康地区几个月，以等待国内外形势各种可能的转机，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他在这一点上又不甚果断，而且也是两支队伍共同的思想情绪，包括他自己部下的情绪所不能相容的。

调头北上自然地意味着张国焘南下的失败和向陕北方面的屈服，不论张国焘为开释自己编造什么理由。联合后的队伍已没留下任何使张国焘能够实施自己决定的可能性。由于红二方面军拖着后腿，红四方面军已很难拒绝中央红军诱人的召唤。在他们北上的途中，联合部队甚至不能不沿着毛泽东先前所走过的道路向东北方向进军，而不是按照张国焘曾提出过的转向西北的方案行动。^[58]

7月上旬，联合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带路，从甘孜向东北方向进发（参见表8.1）。张国焘也许会说，他的部队走在前头，肩负着敌人攻击的担子，但贺龙和任弼时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军事抵抗，但自然条件却偏偏不尽如人意。红四方面军

的仁慈似乎像是对红二方面军的一个阴谋，因为后者行进在后面，发现找到足够的物质给养相当困难，张国焘的先头部队夺占了所有食物，给任弼时和贺龙的人什么吃的也没有留下。这种惊人的饥饿状况在张子意的《长征日记》中有所反映：

表 8.1 红二、红四方面军联合部队

中央西北局：

书记：张国焘；副书记：任弼时

成员：张国焘、任弼时、朱德、贺龙、陈昌浩、徐向前、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辖第四、五、九、三十、三十一军）

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张国焘；副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参谋长：刘伯承

红二方面军指挥部（辖第二、六、三十二军）

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

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59]

7月23日，晴。

214

第十七师和模范师从西群寺出发。多数部队一点吃的都没有，沿途也找不到；他们不得已吃野果子，吃腐尸。大家十分疲劳，一点力气都没有，仅在第二师一个师里就损失了200人。^[60]

日记里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从汉语的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腐尸”一词所指为人而不是动物尸体。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无疑为长征增添了一些伟大的悲剧性或悲壮的伟大性。但是，张子意日记出版的时候，编辑者故意专门指出，其中所描写的“腐尸”仅指马骨，这是被先头部队扔下的，颇有点此地无银的意味。

1936年7月下旬，共产党人到了阿坝，从那里渡过噶曲河——张国焘一年前说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倒是可能了——涉过大草地，来到包座和巴西地区。在这里他们收到了陕北发来的一封电报，正式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陈昌浩和徐向前作委员。尽管张国焘可能怀疑这是

215

否真的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或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甚至是国际代表张浩（原名林育英）的决定——在张国焘看来，张浩本人在陕北的人身自由都值得怀疑——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命，至少为了在目前控制这两支红军队伍起见。接受陕北的任命，自然也就等于放弃了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权威的挑战。^[61]

8月份，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沿着红一方面军所走过的路线，通过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同样令人鼓舞的地理形势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很高兴找到了稻谷，见到了热情的汉人。正是在这个时候，每支红军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起来，中止继续共同北上。他们宁愿留在当地，充分享用便利的条件。在开始时，贺龙指挥他的部队东进，很快占领陕西西南部四个富裕县。他们获得了大量物品，并被争先恐后的参军热潮所鼓舞。如果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在9月初回师阻击他们，他们也许会继续在陕西南部发展下去。^[62]

张国焘也率领他的部队向西而去，占领了洮河流域，开辟出他自己在甘肃南部一块临时根据地。在总指挥部里，只有朱德急于继续北上，以便加入他原来的中央红军，即现在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征军；张国焘则更有兴趣西进；任弼时也对自己的部队在东面的成功感到满意。因此，9月19日召开了一次西北局会议，为的是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岷州会议的参加者总算达成协议，决定联合发动“会宁和静宁战役”，要求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参加这次联合军事行动，由红二方面军断后。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国焘仍不愿北上：如果会宁和静宁战斗失利，肯定会损失他自己的力量；要是战斗打赢了，将意味着毛泽东的陕北根据地的扩大。因此，他倾向于调他的部队进一步西进，寻找新的前程。他的前线指挥陈昌浩好像更倾心于留在目前地区，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对于北方和西方都不感兴趣。^[63]几支红军队伍之间的利害冲突，加上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分歧，使他们的共同军事行动拖延了一个星期，各自为政，不得协调，于是在漳县召开另一次会议。朱德以个人名义给陕北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这次延误的原因并解释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可以说是向陕北方面表达过去一年跟随张国焘的内疚：

甲：西北局拟定的会（宁）一静（宁）战役计划目前已开始实施，但仍有个别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想丢弃作战计划。

乙：我将召集全体同志在漳县作进一步讨论，讨论结果随后电告。

丙：我本人坚决执行原定计划，万一不能实施，与我没有责任。^[64]

张国焘的自私宗派立场非常顽固，难以劝阻，同时又过于露骨而得不到普遍支持。漳县会议与会者再次决定，红四方面军应当立即按原计划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发动一场会战占领宁夏；红二方面军应当追随其后前进，作为后卫力量。说是这么说了，做是另一码事。要不是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三路红军之间的争执也许会长期存在下去。

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两广事变于1936年6月初爆发。尽管这次起义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最主要的是南京政府同红军长期、大规模的作战，北方日本人扩大侵略战争，南方的军阀们乘机扩大势力的野心使然。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两股势力共有30万军队，蒋介石不得不调集他的全部中央军从反共前线转移到东南方，以应付当前面临的形势。川西的薛岳、云南东部的樊崧甫、云贵边界的卫立煌和甘肃南部的胡宗南，统统被召回应急。^[65] 蒋介石按照一贯做法，使用军事威胁，加上金钱收买，1936年8月下旬分化平息了这次叛乱行动。国民党地方军阀的这种反叛纯粹是一种军事行为，没有什么远大政治目标或高尚意识形态。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对付这种派系斗争富有手腕，轻车熟路。^[66]

9月初两广事变平息后，胡宗南的国民党中央军从南方调头返回陕西南部，那里在贺龙的统率下，红二方面军正在热火朝天地扩军征粮，扩大势力影响。胡宗南把贺龙的部队看作是他发动进攻的第一目标。不到一周时间，贺龙连续输掉四场战斗，他的部队损失惨重。后来，他把责任归咎于张国焘：

217

张国焘西逃，国民党三支部队过了河。敌人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四个师投入战斗也不能扭转局面。唐祥芬投降，易先宾被俘。张国焘耍弄阴谋造成这么大损失，丢了第十七团。四方面军开走了以后我们才接到通知，让我们撤离北上。形势紧急，我们匆匆忙忙渡河，六支队侧翼受到攻击，严富胜受了伤。一路上又与敌遭遇，二军团的一个团损失了。在海原，我们又遇上一次灾难，我自己差一点被炸死。^[67]

贺龙回忆说这个时期是他长征当中最为危险的一个时刻。实际上，他也不必过于怨天尤人。人世间总是有所得必有所失。作为介于两大红军主力中间的“第三者”，贺龙部队，既分享了过去优越，又遭受了目前的困境。直到1936年10月末，红二方面军才北上抵达将台堡，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

国民党中央军从南方突进，倒是帮了共产党消除内部犹豫，采取立即行动的大忙。张国焘被敌所迫不得不北上，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同彭德怀在甘肃省会宁县的同心城会师。这个日期也同样标志着三路红军主力的大会师。虽然贺龙部队还没有来，但任弼时作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一直留在总指挥部里。在会师以后，陕北共产党领导人还想组织一次联合军事会战占领宁夏。由于胡宗南部从南方迅速赶来，而张国焘又把自己人马的三分之二撤离渡过黄河西进，终使这个计划成为泡影。三支红军队伍只好一起东撤，返回陕北根据地。一路上，所有的红军部队都尽力避免派自己的队伍作战。最后，红一方面军只好承担起主要作战责任，阻击尾随的敌军。这次战斗在红一方面军的领地上展开，也是为红一方面军的得失而进行，它应该是责无旁贷的。聂荣臻当时是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他回忆这次发生在10月底的山城堡战斗时说：“在和敌人的战斗中，又发生了以前的混乱事件。有些是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造成的，还有的某些部队指挥员缺乏果断决心造成的。左权告诉我，杨得志第二师已经投入战斗了，而其他部队还没有到达预定地点。我听后急坏了。我只好把这个情况紧急报告给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

怀同志。”^[68]

就是这样，三支红军主力部队合在一起，总算消灭了国民党胡宗南军的两个团。山城堡会战对共产党人来说还是成功的，可以看作是大会师之后的一次胜仗。胡宗南以外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东北军，不愿意主动介入对红军作战，承担风险，遭受损失。胡宗南只好率本部孤军追踪而来，他在山城堡的失败虽说不是十分惨痛，但也足以使他认识到，单独深入共产党根据地作战，对他并没好处。^[69]

毛泽东先派遣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去迎接新到达的红军同志。11月初，周恩来也赶来了，并在洪德会见了张国焘、任弼时和贺龙。这位党的外交家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三支部队会合以后怎么办呢？”直率的贺龙脱口而出：“让彭德怀来指挥好了！”于是组成前敌总指挥部，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总指挥。张国焘、朱德率红军总部，偕同周恩来到陕北保安。随即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一职，朱德、张国焘任副主席。^[70]实际上，张国焘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与军事指挥失去了直接的联系。除开红四方面军的渡河西征军部队外，他的政治命运现在全系于林育英和任弼时两位协调人物身上，只可惜他们两位打开始时就不怎么靠得住。撇开张国焘个人的升降去留不说，共产党和红军作为整体体现在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从南方向北方的大战略转移。

第九章

219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最终在甘肃省会宁会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这令人振奋鼓舞的时刻发布了一个公开的庆祝声明。该声明庄严地宣称全体红军将士为中华民族英雄，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中央委员会预言这将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个崭新的胜利时代的开端。^[1]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确实可以为他们过去两年的成功而自豪。在长征过程中，尽管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部队围追堵截，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生存下来，基本保住了大量有生的军事力量，并迅速地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新的立足点。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也正在兴高采烈地庆祝他的50岁生日。本来蒋特意离开南京前往洛阳是为了回避专门为他生日举行的庆典，但是他发现一大群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还是尾随他来到洛阳。蒋大元帅穿着缀满勋章的军服，蒋夫人穿着镶着珠宝的貂皮外套，被这群官员和将军包围着，聚集在洛阳连续三天举行宴会和音乐会。他们不仅庆祝蒋的生日，而且也庆祝对共产党围剿的胜利。^[2]

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有理由庆祝胜利。仅仅两三年前，共产党人还拥有30万部队，并且在中国南方占有将近100个县份。现在他们已统统被赶到了荒凉的西北高原上，而他们的正规部队已被消耗到总数不足6万人。似乎有迹象表明国民党人正处在对共产党人作

战大功告成的边缘，蒋介石只需在陕北再发动一次致命围剿，就可以完全消灭他们了。

如果说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前景并不那么清楚的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无论在名义上和实际中可是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在中央领导层中的超凡魅力都是没有疑问的。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细大不捐地监督着所有管理业务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外部事务如谈判、竞争、宣传和广告；内部事务如人事组织、任务分配和革命教育。他非常懂得对下属雇员的用人之道，善于把每个人团结在他的手下。他严格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职守。他注意谨慎地投资，在萧条时期维持最低业务，一旦市场红火，他便进行充满希望的冒险，以求迅速发展。

毛泽东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富有远见而不是心胸狭隘的企业家。他除了教给同事们专业技术上的技能外，还给他们讲授创家立业所需的基本道德伦理。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如同新教徒引用圣经一样——两者都是作为实践活动所必要的精神鼓舞——而从来不相信无论马克思还是上帝会保佑那些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人。^[3]

面对盟友——西安事变

1936年初，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和平。与这些国民党地方军休战，不仅能消除对红军的直接威胁，而且还会形成一个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的缓冲区。在这个时刻、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他的部队的生存和安全。至于说长远未来的结果，似乎因为过于复杂还很难预料。当时的毛泽东既练达又自信，在复杂局势面前从不退缩。情况越复杂，机会也就越多。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以全体红军的名义，给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回顾了东北军将士们在

过去几年里的痛苦经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而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并且在信中打抱不平，抗议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歧视。公开信说：“蒋介石把东北军今天调到鄂豫皖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4]该信使用了最中肯的语言和最谦和的语调，号召东北军立刻与红军实行休战。

221 经过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6年春天建立了初步的联系。4月9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周恩来秘密去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正式的会谈。^[5]张学良作为“少帅”，是从他军阀父亲那儿继承了对东北军的领导权。他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延安。张学良思想浪漫，但缺少政治经验，在会谈中完全被周恩来的外交魅力所征服，以至于他实际上已忘却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国民党将军的身份。“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怎么搞也没用。”张学良向周恩来坦言说：“对中国来说，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6]周恩来有足够的经验来应付这位少帅——外表上作为私人身份坦率而真挚，内心则忠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种利益和原则。从共产党的立场看，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张学良不仅同意停止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而且答应开放与红军的粮食和弹药贸易。为了显示他的慷慨大度，张学良还捐献了2万两银元作为个人的礼物送给红军。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文件限在党内传阅。就总的原则而言，该文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7]

与3年前处理福建起义时的态度大不相同了，共产党人现在已能熟练地掌握政治谈判的技巧。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国人可以普遍接受的爱国口号，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抗日而战”，而不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过高的立场，而另一方面私下施展一些小计谋。

党中央这个指示没有忘记采取具体的措施，它号召要通过“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结合”，以及“外部方式与内部方式相结合”来做东北军的工作。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仅要与东北军的上层官员谈判，而且要在东北军的各级官兵中进行鼓动，既要公开地对东北军进行宣传，也要在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组织机构。它坚持“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以及“东北军中建立的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之间不可发生横的联系”^[8]。更为高明的是，该指示还强调，在必要的和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为了维持联盟必须对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9]。最后，这个指示描述了中共“经理”毛泽东对他的东北军“顾客”的态度如下：

222

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10]

一旦他们成功地获得和平并与东北军结成同盟，共产党人就开始一步步把张学良向前推进，不仅着眼于巩固他们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把这种双边关系的影响扩展到全国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一个步骤是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鼓动他们公开反抗蒋介石的命令。与这种情形相联系，很有意思的是，当他们与张、杨的联盟还不巩固而张、杨奋起反抗蒋介石的机

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但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的机会已确实存在时，共产党人却降低了他们谴责蒋的调门。正如后来所证明，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鼓动张、杨反蒋的途径。中共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可以从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中看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11]

223 与中共的秘密合作引起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乎张学良的想象之外，却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张学良被拽进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越来越深的冲突之中。在这些冲突中，“八二九”事件和山城堡战斗是最有爆炸性的。作为中共与东北军联合的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飞到西安并参加了张、杨的部队，他们公开和秘密的活动，自然引起了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的关注。8月29日，国民党警察侦查到在张学良部队中名叫宋黎的共产党员，随即将他逮捕。但是在回警察局的路，杨虎城的警卫部队同时扣押了被捕者和捕捉者。张学良命令立刻释放宋黎。由于担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整理有关他和共产党接触的材料和报告，张学良派部队到省党部，没收那里所有的秘密档案材料。事后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原谅，由于当时两广事变处于高峰时刻，蒋介石不能不默默地吞下这粒苦丸。^[12]

在1936年10月末的山城堡战斗中，张学良的部队是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一部分。但东北军前线将领王以哲在与胡宗南共同反击红军的战役中，编造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当胡宗南的一个师最终陷入

共产党的埋伏之中时，附近的东北军也不来救援，王以哲甚至拒不接收胡宗南打来的加急军事电报。当胡宗南在战后把这个问题告知南京时，张学良不得不再次为他部下的“疏忽大意”表示道歉而请求原谅。^[13]

12月初，蒋介石飞去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他为张、杨指出两种可能性，即要么所有部队开赴前线与共产党作战，要么把他们的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好让国民党中央军进来剿共。这两个建议都不能被张、杨所接受。他们既不愿与共产党作战，也不愿退出他们自己的陕西地盘。这样，西安事变就成为中共和东北军联合的一个必然后果了。^[14]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已渗入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西安的大中学生中。从9月到12月，西安发生了多起群众集会。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众集会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12月9日，发生了有近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针对共产党的内战，实行联合抗日。当学生赶到临潼时，蒋介石命令他的警卫部队做好开枪的准备，同时打电话告诉张学良要他阻止学生。张学良匆忙赶上游行队伍，却被东北大学学生的口号和标语所深深感动。学生振臂高呼“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少帅热泪盈眶，最后答应学生们“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现在已很清楚，这次学生示威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组织的。^[15]

张学良兑现了他的诺言。三天后（12月12日）他与西北军的杨虎城一道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劫持了临潼的蒋介石和他在西安的副官们。这次政变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领导人最初是从他们在东北军的联络代表那里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次日，当蒋介石已被扣押并带回西安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保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告知他们的立场并要求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6]

当然，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甚至党内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高喊“杀掉蒋介石”，随后立

即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庆祝大会。^[17]但是所有这些情绪性的反应并不能作为中共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适当立场。中共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的立场可以从党中央给北方局的电报中看出来。1936年12月12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中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的审判。^[18]两天以后，另一封电报则说道：“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19]简单地说，中共的最初立场是支持张、杨；要求对蒋进行公审；分化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便在这最初阶段，共产党领导人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原文现在仍未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里面有不少自我标榜的话，把这次事变说成是他们“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胜利，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等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立即给以答复，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苏联和斯大林的决定，如果不是完全依赖的话。

225

苏联最初是从它自己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则主要依据它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它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20]3天后，这个俄共官方喉舌甚至走得更远，它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来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21]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也觉得把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22]。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回电。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试图把苏联与中共的相反立场撮合在一起。但这封电报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首先建议中国共产党采

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文如下：

根据你们的电报，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下列立场：

1. 不论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损害全国反日战线上所有力量的团结。
2. 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23]

延安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已到达西安。周恩来 12 月 15 日离开保安，次日到达延安，从那里周乘坐由张学良提供的专机于 1936 年 12 月 16 日下午到达西安。起初，周恩来认为他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国际尚未回电。16 日或 17 日，收到共产国际来电，18 日又收到党中央的指示。这时，周恩来坚定了寻求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立场。^[24]

苏联和中共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个反对，一个支持。对苏联的外交利益来说，中国和中共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方面；但是对中共来说，西安事变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非常谨慎。经过共产国际的协调，最终苏联和中共都同意寻求和平解决。如何保全蒋介石个人的生命问题，这时已变得非常容易，只要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并不反对释放蒋介石个人。周恩来的真正使命不在于劝说释放蒋介石，而在于向蒋介石榨取出共产党人的各种要求。从 12 月 16 日到 25 日，中共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而展开的。

226

浪漫而好感情用事的少帅张学良先是最希望扣押蒋介石，而后又最着急释放蒋。杨虎城是老军阀，更显得深谋远虑。起初，他对这次冒险行动表示忧虑；现在，他又担心蒋介石进行报复，所以不想在蒋介石没有作出书面允诺的情况下释放他。不过，中共与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杨虎城人寡兵少，只能被说服，改变了自己的主意。^[25]

无独有偶，尽管释放蒋介石的实际决定是由张学良作出的，但是事变的整个剧目从头到尾却都是由共产党人导演的。如上所述，毛泽东的政治才干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张学良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他的骑士精神竟然促使他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经过几番政治表演和法律仪式之后，张被判处 10 年监禁。事实上，他遭到了终身监禁，蒋死之前他在台湾仍不得自由。

张学良离开后西安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先是东北军内部发生暴乱，接着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又发生冲突。杨虎城及其手下无力控制局势。通过何种方式营救张学良？同南京进行谈判，还是动用武力？西安方面陷入激烈争论。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共本身同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和平停战协定上面。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也参加了所有对南京的抗议活动，并答应为了张学良的释放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行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努力都被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纷争给毁灭了，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26]

对张、杨来说，西安事变意味着他们军队的毁灭和他们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对共产党而言，他们从蒋那里得到了热切期望的保证和平的承诺，他们将不再担心自己生存受到威胁。在 1937 年 1 月 7 日，中共发出了另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这一文件很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其要点如下：

227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

在张氏特赦之后，应即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27]

毛泽东要求南京政府不仅要对他们现时卷入西安事变给予谅解，而且要保证将来不再镇压共产党及其红军部队。实际上，毛泽东和共产党经过西安事变完全实现了他们的这一目标。

西安事变后，遭受直接惩罚的目标也只能是向蒋介石造反的部下。当东北军被调离并在1937年2月初被解散时，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接收它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到自己的队伍中，并公开宣布这是“不忘老朋友”。笔者的父亲便是这个时候从东北军加入红军的。

乘西安事变后讨伐南京政府营救张学良之机会，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延安，那里随即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达10年之久，并扩展他们的领土到西安北部十几英里（1英里=1.6093公里）的三原地区。他们赢得了很大的战略性成功，来自南京政府对中共在北方存在的致命军事威胁，就这样被解除了，而且取得了若干宣传和实际上的进步。^[28]

将1933年的福建事变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作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共立场的变化。在前者的情况下，当已经准备好的优惠提供给共产党人时，他们拒绝或者未能成功地利用它。在后面的事件中，尽管事件极其复杂艰难，共产党却成功地利用了它并设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第一次机会中，博古中央应用了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比如阶级划分、第三党团、改良主义路线等等）作为它们现实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共产党学得聪明多了。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高喊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是为他们的实际决策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毛泽东决不会让书本的教条来拖住他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成功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成功一样多，通过精心的投资和运用自身的权力，毛泽东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增殖。

228

面对同志——西路军

1936年初，当红四方面军仍在西康地区的甘孜逗留时，张国焘

和另外一些领导人已经考虑北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加入陕北毛泽东的部队，相反张国焘计划直接北上到甘肃中部，从那里向西开辟一个他自己的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不得不同意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线向甘肃东南部前进。当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9月到达甘肃南部的平原地区后，张国焘再次建议西进。但陈昌浩却宁愿留在当地，就在甘肃南部建立一块新根据地。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愿北上去从属于毛泽东。在红军司令部内部有朱德和任弼时的阻挠，在外部有国民党中央军从南面施压的情况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作了妥协并指挥红四方面军向甘肃北部移动。此时此刻，张国焘和陈昌浩不得不作出他们的最后抉择。或者是跟随彭德怀向东，或者是向西寻找他们自己的出路，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后一选择。^[29]

毛泽东似乎也不情愿让张国焘和他的人马一股脑儿涌到陕北来。张国焘带着他在红军总司令部的头衔到达，再加上他的优势兵力会动摇毛泽东在这个新根据地的主导权威。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范围狭小而又荒凉的陕北根据地如何来养活一支算起来达五六万人的部队？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都不能不权衡一番。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又要考虑各自在党内的地位问题。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心态也非常复杂。毛泽东既为红四方面军作为增援力量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又为维持他们的给养而犯愁。此外，他还不能不为张国焘将要侵犯他的权力而担心。在张国焘方面，他也担心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也担心陕北缺乏物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在1936年10月打一场宁夏战役，以期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其先头部队宁夏地方军，夺取甘肃和宁夏北部黄河沿岸地区。这样，不仅毛泽东可以视为老根据地的扩大，而且张国焘也可以视为自己的新根据地的建立。此外，毛泽东还希望借此打开一条通过宁夏的国际通道，以便接受苏联的物资援助，而张国焘对此倒也无反对意见。根据宁夏战役的需要和张国焘的建议，红四方面军将转移到黄河西岸。张国焘

还想带领他自己的部队跨过黄河深入到甘肃西部和青海，乃至新疆和苏联。在毛泽东看来，这也不妨作为一种考虑。

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陕北的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集中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一举歼灭甘肃北部的国民党军队，夺取宁夏，通过内蒙和外蒙与苏联进行联络。十月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部野战军全部及定远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夏。^[30]

该计划还进一步要求在北部进攻力量中，中央红军应从黄河东部挺进，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应从西部挺进。因此，红四方面军受命为渡河做准备，建造船只和木筏，并在中卫和靖远之间夺取渡口，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31]

当时的形势是，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主要面对东北军，比较好办；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南面对付由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当棘手。10月22日，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32]10月25日，军委又电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33]。很明显，这是要求红四方面军来同南面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作战。

虽然张国焘不太情愿，但是军委不断打电报来，敦促红四方面军执行十月作战计划。这时，张国焘正忙于筹划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黄河而进一步向西北移动。渡河后，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分别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继续西进。董振堂率领的较小的红五军留下来负责保卫渡口和船只。1936年10月26日，军委电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34]10月29日，毛泽

东和周恩来再次电告朱德和张国焘：“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了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35]毛泽东的打算还是用张国焘的部队去进攻国民党军。但张国焘派他的部分军队去了黄河西岸，也有自己的打算。中国俗话说“同床异梦”，这句话用来描述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

从10月到11月初，国民党中央军向北压来，王均占领了黄河沿岸的所有渡口。胡宗南追击红四方面军直到甘肃东北部，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当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大部红四方面军西进时，张国焘和朱德带领剩下的部队，在黄河东岸绕过中央红军的防地北上，以甩开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36]

根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当时的来往电报分析，红四方面军渡河的行动是官方形式上执行毛泽东也就是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不是张国焘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一点不同于后来中共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张国焘接受和执行“十月计划”也是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希望为他自己的部队获得新的西部领土，而不是为了参加中央红军的宁夏战役。这样，西渡黄河在10月末提前进行，而宁夏战役计划则推迟到11月初。原因很简单，双方都回避同国民党军队正面开战，以保存各自的实力。

231

彭德怀回忆说他曾两次建议设埋伏来消灭王均的追击部队，但每次都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37]张国焘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第一，他可以说他的红军总司令部有权指挥所有红军部队而彭没有权力决定任何战斗；第二，他还可以说，既然红四方面军当时是在南面，而红一方面军在北面，任何与国民党追击部队在南方的战斗将直接意味着张国焘的人马有较大的牺牲。由于双方各有打算，宁夏战役被迫推迟并最终放弃。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军推进到甘肃北部，夺回所有黄河渡口，并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马是已渡过黄河在西岸的部队，另一部分是留在东岸根本无法渡河的部队。

1936年11月5日，在红四方面军司令部，陈昌浩和徐向前接

到了一份军事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张国焘控制的红军总司令部直接打来的。从这份电报看来，他们被派往西岸的战略意义似乎完全改变了。已经不是为了共同进攻宁夏，而是追求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而且字里行间有一种同军委计划作对的意思。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重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果断。……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8]

232

根据张国焘的电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于11月6日制订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占领以上指定地区，在甘肃中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11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不得不发布了一个“新作战方案”。这一次，红一、红二方面军被指定组成南路军，在黄河东岸的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红四方面军在黄河西岸的三支部队组成西路军。该作战方案强调：“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部队被称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创立河西根据地，打开通向远方的通道。”^[39]换句话说，西路军将孤军深入到甘肃走廊，然后西进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远方”就是他们所指的苏联。

甘肃省是一个两头宽阔中间狭长达1000里，形状像哑铃的西部省份，中间最狭窄处不到100里宽。该省位于中国西北海拔4000米高的高原上，人烟稀少，主要由从事农业的汉族人和游牧业的穆斯林回族人混合组成。西路军很快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丧失了政治上的革命性优势。他们与当地穆斯林军阀的对峙变成了纯粹武力的较量，其后果完全取决于物质上的互相消耗。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1936年11月初开始他们的西征。他们在一些小冲突中取胜并在甘肃走廊东端夺得了战略要地古浪。11月末，在古浪发生了第一场大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消灭了5000

233 余敌军，而自己也牺牲了差不多同样的人数。共产党人牺牲了红九军的参谋长和两个师的师长。同时穆斯林将领马步青也损失了他的前线总指挥。对共产党人最坏的预兆在于，他们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样就不得不放弃这个战略要地。他们继续向西转移然后在12月初到达河西走廊中部。西路军的三支部队被分散在永昌到山丹100里的地带。整个部队在一个半月内从21 000人减少到15 000人。^[40]

12月14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同时，军委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做好准备回头向东，赶回陕西。毛泽东的目的是把他们召回来加强同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的军事力量，以准备应付南京方面的进攻。西路军留在原地一个星期左右以等待更具体的指示。^[41]几天后，军委发来另一个命令，回头向东的计划被取消了。西路军被命令继续执行它的西征计划。毛泽东的电报强调了“打通远方”的战略意义，但没有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新热情耽搁了西路军在关键时刻的近10天时间。如果他们当时回头向东，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两个星期内即可到达兰州。当时的兰州城处在友好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管辖之下，不会有任何问题。^[42]

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他们的部队继续西进。到了新年元旦，他们到达了高台地区，距离新疆仍有400多里。他们真正需要到达新疆以求助于苏联吗？或者他们就应该在这个走廊里开辟一块根据地吗？两种选择都是极其困难的。但犹豫不决更为糟糕，像他们实际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在西方作战，却始终挂念着东方。这种情况拖延了他们的脚步。陈昌浩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悲剧在于他常常追求独立，但同时又对独立缺乏心理和实际准备。

对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来说，甘肃和青海是他们的老窝。他们宁愿倾尽全力从他们的老家消灭或驱逐出红军，并不需考虑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和解关系。^[43]1月中旬，正是隆冬时节，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陷入重围，并在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联合进攻下陷于失败。红五军的3 000多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董振堂自杀，

政委杨克明被杀。高台战役标志着暂时的平衡被打破，西路军陷入严重的危机。陈昌浩不得不向延安呼救。^[44]

经过几天的犹豫，援西军在军委指示下正式成立，刘伯承做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为了援救西路军，新组成的部队从离高台1500里的陕西北部三原出发，在2月初到达了黄河东岸。^[45]陈昌浩和徐向前把他们的部队向东移动100里来接应援军。他们打败了一些地方武装，并俘虏了800名警察。但很明显的是太晚了，他们离增援军还有700里，并且沿途有敌军重兵布防。2月底，他们被迫再次调头向西转移。最致命的战斗终于在3月初发生在甘肃西部的倪家营子。西路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2000人。在石窝子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返回延安，西路军由王树声、李先念等人员负责指挥。^[46]

保留下来的部队被分成两个游击支队。李先念成功地率领他的左支队通过祁连山脉，到达戈壁沙漠，进入新疆。终于从那里，他们被莫斯科回途中的陈云带领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又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陕北。^[47]王树声带领他的右支队在甘肃西部进行游击活动。他们不断受到敌军打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人。这些人在山洞里藏了几天后，决定停止活动，他们当中有7人化装回到了延安。^[48]这就是西路军最终的命运。起初，它有21000人出发；最后，返回到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不足1000人。

将军马步芳和马步青根本不讲什么道德信仰之类，不管是儒家道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倪家营子之战结束后，有1000多红军俘虏被活埋；3000多人被编成兵团去服苦役；老弱病残者，统统杀害——为了节省子弹而用刀砍头或者干脆活埋；大约有1000多人被送到南京政府去完成征兵名额，送红军当白军也无所谓的；女红军战士和护士被按照她们的年龄和容貌分配给各级官兵做小老婆。从最高尚的理想到最残忍的现实，从共产主义革命派到职业反革命派，西路军的命运是对于人类肉体的承受力和灵魂的伸缩性的一场悲剧性考验！^[49]

西路军的毁灭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毛泽

235

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权力平衡。张国焘于1936年11月初跟随周恩来到达陕西北部的保安。回到毛泽东控制的地盘后，张国焘发现他已没有任何地位对军事指挥发号施令。从军事实力角度来讲，当时陕北大约有4万红军部队，其中红一方面军有2万人，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自1万人。很明显，张国焘在这方面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就职务名称而言，张处于更大的劣势。到1936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在党、政府和军队中确立了他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至于两个以前的中介协调人，任弼时留在前线，张浩被重新分配去做工会工作。西南局和西北局都已自动取消，不值一提。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忙于处理内外各种事务，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

张国焘与毛泽东讨价还价的惟一救命稻草就是西路军。如果西路军能够顺利地到达新疆，在那儿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密切的联系，张国焘仍会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如果陕北的毛泽东同时被蒋介石围剿压迫进行另一次向西长征，张国焘也许会再次获得他的优越地位。^[50]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前的红二十五军（本来属于张国焘的部队）、任弼时和红二方面军，以及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张浩，也许都会转向张国焘。毛泽东与归国留苏生之间，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乃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间的一切矛盾，也许将会有助于张国焘。所有一切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两大军队派别（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各自干得好坏。如果双方都干得很出色，那么党内矛盾就会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双方都失败了，那么共产党本身将走向毁灭；若是有一方干得好，而另一方干得不好，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将发生倾斜。设想毕竟是设想，现实情况是到1936年底，毛泽东已经确定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这种结果是对他的红一方面军过去一年中努力和成功的公正奖赏，而西路军完全失败了，张国焘作为共产党政治家的命运也随之终结。先是毛泽东发起了对张国焘的批判，然后又是毛泽东出面要求对张国焘给予宽大处分。这同蒋介石对待张学良的做法大同小异。^[51]这里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作为政治家似乎也具有相同的手段：剥夺了挑

战者的政治影响，保留其肉体存在也许是必要的。关于西路军的军事失败同他本人在党内的政治失败的密切联系，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说道：

236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明毛式党内斗争的极端残忍性。^[52]

尽管张国焘指责毛泽东自私自利，但是他本人的自私野心是同样显而易见的。首先，他避免参加宁夏战役，仅仅是为了保存他自己的部队；然后他又派西路军出发开辟他自己的军事根据地，再把剩下的部队控制在手中来与毛泽东竞争最高领导权。这些做法最终被证明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不明智的。更应受谴责的也许是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心思过分纠缠于党内斗争，以致使他不能认识到，只有通过外部的成功才能获得内部的权力。

再者，西路军也提供了它自己的教训。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从华南转移到华北是必需的。但是，对“北方”这个词须作有限的定义才是。只有避免“过远的北上”，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最终在北方站住脚跟。如果像西路军那样打算走到遥远的西北边境新疆去，将会脱离中国本土的政治舞台中心，导致对苏联的完全依赖，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丧失它的个体性和自主性。这样的后果似乎违背了中国现代史的“天命”，如果读者诸君允许我给历史研究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的话。

237

面对竞争者——第二次国共合作

尽管国共两党彼此公开谩骂攻击，但是早在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不久，共产党与南京政府之间就进行了秘密接触。更有趣的是，国民党首先表示了这种可能性。1932年10月莫斯科和

南京之间恢复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考虑是改善他同苏联的关系以牵制日益加深的日本侵略。恰当地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就被看作一种对苏联求助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已被 10 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证明。^[53]

1935 年初，邓文仪赴莫斯科担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在同年秋天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真诚态度。邓随即被委任以促进与苏联友好关系的特殊使命返回莫斯科。在他的回忆录中，邓文仪这样说道：

在我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了繁忙的武官处日常工作外，我设法和大批的苏联军官接触。这些人过去曾经作为军事顾问来过中国，现在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我也会见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我们进行坦率而诚恳的交谈。^[54]

在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会见中，邓文仪建议国共双方进行双边谈判。王明回答说既然两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在国内，会谈就应该在国内举行而不是莫斯科。为了这个目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共产党这边的代表。邓和潘第一次见面定在莫斯科，然后潘回到上海并开始同国民党的代表张冲作进一步的会谈。^[55]

238 另一条联系渠道大约同时开通，在国民党一边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副部长曾养甫的高级助理谌小岑，在谌和曾之上是陈果夫，而后者是国民党内少数几个权威人物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是中共北平委员会的吕振羽和周小舟，还有北方局的王世英。双方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幕后背景谈判了几个月。这样相互摸底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似乎比蒋介石更着急。1936 年 1 月，周小舟去南京与曾养甫进行非正式会谈，交给他一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写给陈果夫的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时致信给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如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和宋庆龄等。不久，两个秘密特使带着财政部的证件，被宋子文派往西安。从那里他们又被张学良的人护送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热情地

接待了他们。通过他们给南京带去了更多的信息。^[56]

从5月开始，“半正式”会谈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继续举行。1936年8月，陈果夫在杭州以个人身份接待潘汉年。陈代表蒋介石告诉潘：中共的政权必须取缔；红军可以保留3000人，但所有师以上的高级军官必须解职并送出国。很自然，潘不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陈果夫又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由蒋和周面谈”^[57]。

到目前为止，国共谈判没有任何成果，但也不是完全无益——至少对共产党来说是如此。他们建立了与南京政府的各种联系，并获得了大量经验。在193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像一条章鱼，在各个方面伸展它的触须来寻找所有可能捕捉到的目标。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当张学良频繁周旋于他的洋人教师威廉·端纳和女性朋友蒋夫人时，中共代表团正忙于利用一切机会与南京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的接触。这种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件中看到。指示信的第一部分列举了释放蒋介石的六种条件；第二部分突然转到似乎不相干的若干事情上。指示信要求周恩来不仅要“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及二陈派等谈判”，“争取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菽甫、董钊等进行接洽”；“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而且还“招致英美顾问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58]。

这里很清楚的是，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要把西安事变看作从根本上改善与国民党关系的宝贵机会，要越过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更加宽广的政治前景。事实上，周恩来大致实现了这一目标。宋子文要求中共派特别代表到上海与他保持秘密接触。蒋介石以个人身份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进行更多的双边正式会谈。^[59]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领导并没有由于这次事变变得趾高气扬和贪得无厌，相反在国民党的代表面前表现得更加谦恭忍让。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要求国民党：“（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

政治犯；（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履行以下四项承诺：“（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0]

电文的措辞是谦和有礼的，它所提的几项条件似乎都比较合理动听。最后两项显然不属于本质的东西。它所提出的四项承诺听起来确实是对他们过去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激烈政策的重大退让。2月15日，党中央发出了一个内部文件，专门解释了这条新的政治路线：“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61]。然而，这份内部指示还继续说道：

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62]

240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既要维持已获得的实质的东西，又要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正式的合法地位。这便是毛泽东追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目标。在二三月份，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和张冲在西安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停止进攻西路军，反过来，作为回报，共产党同意（一）陕甘苏维埃改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二）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进行普选，这意味着它们将控制选举；（三）把红军改名为国

民革命军，降低3个方面军为3个师，每师包括15 000人，加起来共45 000人。实际上，红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部队。^[63]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要求：（一）苏维埃区域的管辖权应该重新安排，它的官员由相关的省政府重新分配；（二）共产党应该有3个团而不是3个师，各团应该不超过5 000人；（三）正如任何一个主权政府所做的一样，南京政府应该有权重新任命这些部队所有的指挥官。这些要求远远超出毛泽东可能作出的退让范围，会谈被迫中断。中共拒绝与顾、贺在西安进行任何会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会见。在3月末，周恩来在杭州见到了蒋介石。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具体的细节似乎不感兴趣，他避免达成任何具体的条款协议，但同意发表一个两党联合声明。^[64]

6月4日，周恩来去庐山再次见蒋介石。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提名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国民革命联盟”，他自己为主席，来决定所有对外宣传和内部事项，进而建立一个联合的党派以便与共产国际发展共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可以保留3个师，每个师10 000人。某些共产党人可以被任命为师领导人，但朱德和毛泽东必须出国。红军总司令必须由国民党政治指导机关任命，共产党边区首领必须由国民党政府任命，而副主席可以由当地人民选举。就蒋这方面的让步而言，他同意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召集南方的中共游击队，并允许共产党人参加国防会议。^[65]

6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共产党人建议进一步退让，希望国民党方面同意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联盟。至于将来，也不反对建立一个联合党派和在这个党名义下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方面同意由以下三个国民党人之一来主持陕甘宁边区：张继、宋子文或者于右任。他们拒绝妥协的惟一事情在于中共不能放弃对自己军事力量完全的控制。因此，坚决拒绝由国民党任命共产党部队的总司令。^[66]换句话说，毛泽东可以取消所有头衔和名义，但决不放弃对根据地的牢固控制，最重要的是决不放弃对军队的牢固控制。因为国民党过于傲慢自恃，也过于消极被动，他们自己提不出任何适当的建议，不得不逐渐改变立场来迎合共产党人的建议。

241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红军再次去庐山胜地提出退让条件。这次周有三个要求：第一，开始全国抗日战争，恢复失去的领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二，举行一个全国会议来起草一部宪法，并制定一个全国救济政策；第三，保证人民的生计。第一和第三条要求，国民党几乎没有理由争议。甚至第二条听起来也相当合理尽理，尽管其内在含义是赋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的参政权利和合法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妥协条件。它们是：

- (1) 接受“三民主义”作为全中国的指导思想；
- (2) 废除所有起义行动和土地革命；
- (3) 废除苏维埃制度和它的所有政策；
- (4) 变更“红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67]

在这场有趣的算术游戏中，以前五项要求和四项承诺现在变为三项要求和四项承诺。这里毛泽东似乎已出卖了所有党性，但实际上，他忠于这样的原则，即绝不交出他部队中的一支枪和一个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国民党人来指挥和控制他的部队。除了这个条件之外，毛泽东似乎愿意对一切作出让步，甚至他的马列主义的信仰。

242 如果不是随着1937年7月日本大规模侵略华北的紧急事态的出现，突然结束停滞状态和推动南京政府的前进，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争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日本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共产党人不断的宣传及多方让步，对南京政府起着推动作用。最后，蒋介石接受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和苏维埃区域作为国民党政府管辖的一部分，尽管蒋介石派遣政治监督员去共产党部队的建议再次被拒绝，但是共产党还是接受了红军名义上服从于国民党北方战区的指挥。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7年9月15日正式宣告实现了。

尽管形式上有不少相似性，但这次国共合作与10年前的那次相比，存在着若干基本的不同之处。在第一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性，在实际上却始终处于不独立的地位。

这一次正好相反，共产党人似乎迫切希望放弃它的革命性质而统一于国民政府，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维护其政治和军事上的自治地位。他们开始渴望追求合作，但后来并不在乎合作。他们不停地要求进入统一战线，一旦进入了，他们从不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已经懂得了如何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游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也与第一次合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灾难性的失败，而第二次被证明对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和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面对敌人——抗日战争

政治现象往往涉及多种互动关系，不总是服从于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说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立招致日本侵略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推动了国共之间的合作。抗日战争（1937—1945年），出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条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仅赋予幸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的一种偶然机遇而已。尽管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和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无论从深远的背景上看，还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68]

日本大规模的入侵打破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僵局。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当被告知日本军队侵占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召见并指示他的副官康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共产党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组了，不要等待我们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员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宣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70]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敦促国民党宣布抗日战争开始，并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部队东进和日本人作战。这一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从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承认的愿望，而较少地是出于同日本战斗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既然最终得到他所要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东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对同日本战斗的现实问题。有一阵子毛泽东是有所

犹豫的，共产党人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目标是应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八路军建立后的新形势，参加这次会议有全部政治局委员和一些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共22或23人。^[71]

对共产党来说，并不难做到发布新的政治宣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这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扩大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进行抗战，何时把八路军开赴前线，开向何方何处，留下多少部队保护后方根据地，在同日本战斗时运用什么战略战术等等，这一切对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而避免在民族战争中过大的牺牲，而这是他们一直公开和长期呼吁的。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

会议上也存在一些对毛泽东建议的温和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来自军队干部和外交干部的意见。既然全国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红军已经变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为了共产党利益而不去实现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那样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拖延或取消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给。仅仅进行游击活动而不同日本军队进行任何大的交战，也会损害党和军队在中国人民眼中的形象。^[72]经过几天的讨论，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得以强调，但是与此同时，也确定了一系列得体适中的实际措施。8月25日，洛川会议后不久，八路军正式宣布成立（参见表9.1）。

表 9.1 1937 年 8 月八路军指挥序列^[73]

246

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主任	邓小平
115 师，辖 14 000 人			
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120 师，辖 6 000 人			
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129 师，辖 6 000 人			
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			
政训处主任：张浩			
后方留守部队，辖 6 000 人			
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			

三师人马在 8 月末从陕西开赴山西。115 师开往山西东北部，120 师开赴山西西北部，129 师开赴山西东南部。的确，中共的军队在战斗中显示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和风格。在 9、10 月间，他们共进行了大约 100 次战斗，打败了 10 000 多日本人，缴获了 1 000 支枪。其中最著名的胜利包括山西平型关战役。在那里，115 师歼灭了一个日本旅，歼灭日军 1 000 多人。另一个是山西阳明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29 师袭击了敌人的机场，毁坏了 24 架敌机。^[74]这些胜利被中国人民普遍欢呼。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家收到这些消息后，心情颇为复杂，他愿意赞扬在他的总领导下取得的这些胜利，却试图降低对共产党的宣传。无论如何，现在他不得不根据他的承诺提供军需品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毛泽东接到胜利的消息也带着高兴和担忧的双重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以这些胜利作为中共忠于民族战争的证据而骄傲自豪。但在内部，他又提醒他的军事指挥官不要拿自己的部队冒险与日本人搏斗。

侵华日军采取“闪电战略”，企图在 3 个月内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话），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很快被打败。到 1937 年底，日本人向南追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几乎所有

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深入中国腹地，虽然如此，他们仅仅能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留下县级以下的城镇和乡村的空白，实际上等待着被共产党人所填补。^[75]聂荣臻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247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76]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正如以前国民党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一样，只是规模更大和延续时间更长。共产党人的革命性质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充分体现。他们严格的纪律和崇高的士气、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们以民族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以及以阶级斗争反对汉奸恶霸土豪地主的切实行动——所有这些使共产党人上演一场活泼发展的“话剧”成为可能，而这场话剧是以国民党人与日本人交战所造成的局面为“舞台”的。

不是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要求的集中所有共产党部队于一个战场那样，毛泽东建议八路军应该分散在不同的山区乡村据点。在一两个月军事行动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强调在战略上要从正规的运动战转向基本上的游击战。1937年9月后，毛泽东向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个又一个电报，有时直接给各个师的师长发电，提醒他们运用游击策略，警告他们要反对任何不顾后果的集中作战行为。

9月21日，他电告前线司令部：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77]

这里很明显，毛泽东是担心他的将领们会真指挥部队同日本拼死战斗，牺牲红军部队。当然，他的游击战略的目的不仅是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和保存他的部队，而主要在于为了深入到广阔的农村去发展。在9月25日，当115师正在进行平型关战斗时，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朱、彭和刘伯承，敦促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在电报中，毛泽东发出了更严厉的命令，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78]

248

毛泽东为了国民宣传的目的，公开地赞扬平型关大捷。但这次战役以后，毛泽东迅速命令115师分兵，把这个师的主力转移到山西南部太行山区，留下2000人在五台山。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其他的红军部队从铁路沿线转移到偏僻的农村地区，120师转移到晋东北的关清山区，129师转移到晋东南的吕梁山区。所有共产党部队都被指示隐蔽在山区里，执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同时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壮大中共军事力量。这些构成了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的战略代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普遍

地接受了。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某些策略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坚定地赞成红军要迅速独立地发展自己。事实上，作为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也只能这么做。日本军占领太原后不久，周恩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建议做如下一些事情：

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即刘少奇——作者注）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79]

249 王明和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7个成员于1937年11月末飞回延安。有一段时间里，王明构成对毛泽东权威和政策的挑战。1937年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王明强调一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来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和平、民主和抗战”^[80]。确实，早在两年前，王明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反抗日本的思想。所以他坚持这个原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王明的立场常常反映的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和苏联的利益，而较少反映中共的决定和中国的利益。与毛泽东形成对比，王明明显地缺乏中共独立的意识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特使的威望和他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雄辩引证在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及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关注面前黯然失色了。王明对毛泽东的挑战也许不像有些中外历史学家理解的那么严峻。^[81]事实上，王明的右倾态度和活动，如某些军事人员的“左”倾态度和活动一样，构成了1937到1938年中共政治大方向的组成部分。在政治总方向上，毛泽东是核心代表人物。换句话说，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在实践过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二者可以帮助促成总路线，也可以说是“中间路线”。某些人可以采取左翼或激进的立场，另一些人可以采取右翼或保守的立场，但只要“总经理”

毛泽东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维持左右的平衡，坏事有时也可以变成好事。对外界来说，“左”倾或右倾则变成一种伪装，用以掩盖中国共产党蓬勃向前发展的谋略。左和右在整个前进过程中，像道路的转弯一样，它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来源于向着大方向前进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令人惊异的增长，恰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灾难性崩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当国民党的正规军从华北向西南方向退却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地从西北到华北冒出来。到1938年底，四支八路军部队中每一支都开辟了一个敌后根据地。他们的队伍总数从1937年初的40 000人发展到1937年末的90 000人，再到1938年底进而达到180 000人。^[82]

由于这样令人鼓舞的成功——更不要提毛泽东的政治技巧了——毛泽东和他的理所应当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被王明及其新回来的几个人所动摇。在1938年9月28日到11月6日召开的中央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被党中央正式采用，王明被撇在一边。六中全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着毛泽东的战略和权威在共产党内最终确立了。^[83]

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通过国际因素取得的。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对中国人来说，起码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和恢复所有国土。从有关军事能力和以往作战结果上看，取胜于日本华北军似乎是困难的，驱逐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更远远超出国共两党各自或加起来的军事力量。^{*}

在类比和虚设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可取的方法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更易于崩溃乃至投降。具体的例证和详细的分析会远超出本书的篇幅限制。而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中部队的游击战争构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最主要障碍和最让日军头痛的事。只要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遍布农村，它几乎作为农村社会和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日本人就很难宣称它已经完全征服了中国。这种对中共甜蜜的赞扬并不意味着（正如共产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经常宣称的那样）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不想和日本人作战。但

250

* 1945年的时候，仍有100万日军在中国内地，50万日军在东北三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打的胜仗并不多，平型关之战共产党人称之为“大捷”，只消灭日军不足2 000人，台儿庄大战国民党人大加渲染，但也只歼灭日军2万余人。从1939年起进行的战役，中国方面损失10万余人有几次，而日军损失超过几千人的无一次。如此说来，若没有国际上的干预，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或者二者相加）要驱逐日军出中国，起码需要更长的时间。

是我最多也只能说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最大，收获最少。*

共产党享有某些有利条件，而这些是国民党人不能轻易模仿或与之竞争的。国民党部队必须依赖来自政府的军备和粮食供给。他们被布防在指定地区，被命令保卫特别地点，他们进行的只能是阵地战。失败了，他们就撤退；被包围了，他们就投降——正如任何正规部队所做的一样。对共产党部队来说，“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抵抗日军，不仅仅意味着在战场上直接战斗，而且那里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加强我方也就意味着削弱了敌方，这总不能说是不对的。

251

日本人也有日本人的问题。在军事上，日本人在与国民党对抗中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他们低估了国民党部队的抵抗力，以为打上一两次“闪电战”，国民党就会垮台。在政治上，日本人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们从未料到共产党游击队竟会变成它们最强有力的对手。他们从敌对的国民党人手中辛苦夺得的华北土地，竟然全都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更加敌对的共产党人的王国！”

* 虽然以下事实是真实的，即至少从军事上来看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比共产党严重——前者损失了100万军队和百余名将军，后者损失兵力不多，而且只有一名相当于将军级别的军事指挥官牺牲——但是这似乎不能完全算作国民党的光荣。只要想一想如下情况，即敌占区的傀儡政府和伪军都是前国民党人、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蒋介石也曾与日本人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以及亚洲和欧洲其他许多民族政府投降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者或与之合作，我们就可以推断，国民党就其本质和立场而言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比共产党更加脆弱。关于国民党与日本人的秘密接触，请参见吴湘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一书，第一卷，532～541页。

** 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部队抵抗了64%的日军和95%的伪军。这话虽然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共产党的军队（包括正规军和游击队）确实对日本侵略者构成了主要威胁。一方面，毛泽东为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而避免与日本作战的做法可能会受到责难；但另一方面，他深入农村，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的做法也值得钦佩。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43～10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十章

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252

本书的前九章基本上是对中国共产党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事实进行的描述和解释。在作为结束语的本章，我不想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再把已经叙述过的分散片段串联起来，进行一番扼要的回顾，而想要把长征放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据此对共产主义政治做一些整体分析。这也许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尝试。我首先考虑到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要充分估价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就必须与该研究范围之外的其他一些事件相联系。但是，探讨的范围越深越广，也就越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看起来，在历史研究中，既没有终点可言，也没有定论可下。历史研究充其量只不过是深度和广度的层层关系及网络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其终点又似乎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使得有些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本身并无意义，只是历史学家赋予它某种意义罢了。^[1]

尽管如此，在我个人看来，只要历史学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足以对所探讨的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判断，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比历史上的人物看得更广些、更深些，只要我们能更恰如其分地理解他们已经做了些什么，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们将要做些什么，我们的努力就不会白费。也正是在这种相对的意义

上，存在着某种历史研究的绝对标准。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上，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存在着大量颇有争论的问题。比如：

导致中共失败和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多，还是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多？毛泽东更像是一个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还是更像是一位传统的农民起义领袖？如此等等。

本章将涉及所有这一类的问题，但又尽量不被每一个问题所蒙蔽，以至于脱离总的研究方向。在历史研究中，事实描述上的错误比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更经常出现，也更容易解决。事实描述就像拳击，目标是干净利落地击倒对手；理论分析则更像是马拉松，赢者只需坚持跑自己的路，任凭其他人因脱离路线、中途退出或落后到达而败北。^[2]

作为过渡时期的长征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平静、内向、保守的北方与多变、开放、进取的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 世纪初期，中国南方一次次地发生起义和革命，而中国北方却一直是一座反动堡垒。但是，也许是因为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找到更加实际的途径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情绪，所以，那里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化上的抗争。与此相反，在北京这个北方的政治中心，每隔几年都会看到知识界的一次新的骚动。正是经过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列宁主义实践^[3]的学说才被介绍到中国来。然而，当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政治上产生较大影响时，它却向南移到上海，于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那里，共产党人又进一步南下广州，加入国民党，开展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华南的国共联盟与华北的军阀势力之间在华中长江流域进行的殊死之战，以军阀势力的失败而告终。也正是在这一地区，革命联盟于 1927 年发生了分裂：国民党人发动了上海政变，而共产党人用南昌起义来回应。共产党人起初打算把起义部队带回广东，再进行一次北伐，并把希望寄托在广州的工会组织和海陆丰的农民协会

身上。但是没有成功，也几乎不能不如此。华南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做好再次革命的准备。李立三党中央号召对武汉发动全面进攻，不只是意味着共产党人的战略攻势，它也反映了共产党人从南方的撤退。于是海陆丰根据地被放弃，广西红七军被召回江西。

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结束之后，紧接着便是国共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其结果是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虽然各红军部队都有其悲壮的经历和英雄的业绩，但是共产党人从整体上已被逐出南方，并被一直赶到大西北。他们在华南的影响差不多丧失殆尽。

254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北方迅速发展起来，部分归因于以下事实：日本人的入侵扫清了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障碍，使广大农村变成了共产党可以填补的政治真空。但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华北的乡村社会在一个世纪里没有被触动过，因而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在抵抗日本入侵的过程中，它的所有以往的反动特征在共产党的革命鼓动下完全翻转过来。到日本战败而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对抗时，它在北方已集聚了不可征服的军事力量。它在国共内战中熟练地运用这种能力，从北方到南方迅速夺取了全中国政权。

因此，我们不妨把长征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南方到北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中南地区到大西北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不言而喻，这种转移并不意味着长征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转变过程。共产党人在这次长征之前就进行了其他一些“长征”：1927年，叶挺与贺龙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两个月行进2000里，最终陷于失败；1930—1931年间，张云逸带领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也艰难跋涉了几千里。尽管红七军的行动现在可以被看作是北撤的象征，但在当时却加强了共产党在中南地区的大本营。

南方共产党的力量从建设到毁灭的根本转变是从1932年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开始的。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的红三军都被赶出了自己的老根据地，并被逼至西南地区。他们在西南部获得

了一定的发展，但不久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与红六军团的远征失败，在于他们执行了替罪羊的任务，尽管方志敏和任弼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同程度的败况——方志敏全军覆没，任弼时因与贺龙会合而获救——不是因为他们的指挥能力不同，而是由于他们进军的路线方向不同。

255 江西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人把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归因于自己在军事上的错误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然而更为内在的原因也许是，共产主义运动从总体上已难以在南方立足。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中的其他领导人一直想停下来，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因为他们不愿离开南方的根据地太远。然而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发现当地的条件不够合适，于是，不得不把希望又寄托在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正当他们处于绝望边缘的时候，他们闯进了陕北并在那里重新扎下了根。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没打算到陕北，却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与其说这是一种偶遇巧合，不如说是历史注定如此的一种体现。

照此看来，张国焘转而南下不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更为严重的方向上的错误。陈昌浩的西路军的命运也可以从这种深层意义上理解：既然你想离开中国的中心政治舞台，而去遥远边疆地区，那么你就只能在中国的政治竞赛中走向失败。然而，就具体的军事计划而言，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解释。我想还将会有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出来表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覆灭负有更为直接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份，当时大约有50多名党员。在随后的两年内，它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是在1924年与国民党开始合作之后才实现的。1927年4月召开中共五大时，登记在册的党员人数近6万名。但由于国共冲突，这个数字在随后的两个月内骤减为1万。共产党人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们转向农村搞武装割据。共产党人逐渐聚集自己的力量，到1933年就已发展到30万名党员和30万人军队。此后，国民党的围剿和共产党的长征使苏区丧失了十分之九，党员人数和红军队

伍也分别减少到 1937 年初的各 3 万人。

伴随着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到 1937 年底，中共已拥有 10 万名党员和 9 万人的部队。中共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它已发展到 120 万名党员，其正规军总数已超过 90 万人。此外，还有几百万民兵。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 1946—1949 年的内战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其党员队伍和武装力量继续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中共党员已达 500 余万，人民解放军也已达 400 余万。

在长达 28 年之久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可以用下面注释所列的表格来显示。*

* 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变化（1921—1949 年）

年月	党（人）	军队（人）
1921	50	0
1923	400	0
1925	1 000	0
1927. 4	58 000	0
1927. 8	10 000	30 000
1927. 10	—	8 000
1928	40 000	10 000
1930. 1	—	50 000
1930. 6	—	100 000
1930. 10	—	80 000
1933	300 000	300 000
1936	50 000	40 000
1937. 1	400 000	30 000
1937. 12	—	90 000
1938	—	180 000
1940	800 000	500 000
1941	—	440 000
1944	—	780 000
1945	1 200 000	900 000
1946	—	1 200 000
1947	2 700 000	2 000 000
1948	—	3 000 000
1949	4 500 000	4 000 000

资料来源：《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707、733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468 页；其他一些零散材料。

尽管这些统计数字还不够准确，但是它们已足以证明下面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岁月中获得发展的同时，曾遭受过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在1927年，另一次是在1933—1936年；1937年以后，共产党成功地获得了持续发展，几乎没有任何中断。在这种意义上，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长征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由失败走向成功的分水岭。

256 一个政党的兴衰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一般说来，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尽管这样划分肯定会立刻招致相反的意见——任何政党都有某种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即使是党的领袖也难以改变它，因此“主观行为”的一些部分实际上就是“客观条件”；而由于政治领导人在决策时又都必须考虑各方面的条件，正视或无视党内因素也是“主观行为”的一部分。

正如国民党在革命性质上优于北方军阀一样，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的革命性也优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马列主义不仅强调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强调各国的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共产党人的革命性使得他们能够保持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而那些社会经济革命的纲领给共产党人带来了生机和迅猛发展的潜力。这些因素导致共产党人在不受外部阻挠或阻碍较少的情况下，通过其社会经济纲领而在工农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发展自己的力量。共产党的这种革命性从根本上造成了其对国民党的优势。

但是实际上，社会和经济革命只不过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共产党的社会经济革命纲领势必要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控制发生对抗。共产党毕竟是一个政治党派，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毕竟构成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两年的努力，共产党人就成功地发动了城市工人运动，但随后他们必须面临一场政治上的考验：必须在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作出抉择。起初，共产党领导人不愿加入，尽管当时的合作是有利的；而后合作对共产党人不利时，他们却又不愿意退出。事实上，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活动是

由共产国际策划的，并由国民党所决定的。中共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独立的作用。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共产党人的失败有两个明显的原因：一是在军事上采取了纯粹防御路线；二是他们不愿与福建起义的国民党人合作。但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缺陷，即博古党中央执著于革命立场，不能恰当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及党在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257

在总结以往这些失败的原因时，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当时共产党还处在幼稚时期。上述各时期的失败有着某些共同的根源：革命热情太多，政治经验太少；领导人过分热心于革命而忽略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主观理想主义太多，客观现实主义太少；固守马克思主义教条，忽视中国的实际问题。^[4]

长征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基本立场发生了变化。起初共产党人真诚地呼吁同国民党再次合作，但当合作局面形成后，他们又不愿让合作“束缚自己的手脚”，并随时在有利时与国民党发生有节制的“摩擦”。他们高声谈论与日本人作战，并确实顽强地战斗过，但是他们也知道应怎样在与日本人对抗时避免自己的牺牲，懂得如何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其结果是，他们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扶摇直上。

国共内战时期表面上是两军激烈较量，实则不尽然。虽然1946—1949年的内战规模史无前例，但是对中共来说，其核心问题不是与国民党的军事战争，而是与国民党的外交谈判。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多年来共产党人在战场得到的一切，有可能一天之内就在谈判桌上失去。尽管在国民党、美国，甚至苏联方面存在着轻视或怀疑共产党力量的倾向，但在1946年没有一个人比毛泽东更清楚这样的事实：国民党仅凭军事手段已不可能再次打败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作出的决策是：在与国民党作战并夺取全国政权的同时，与之进行谈判，创造一切有利的国际国内政治条件。打仗本身是军事问题，决定打仗却是政治问题，谈判则更是政治问

题。从精神上讲，毛泽东高出蒋介石一筹，更不用说对中国问题不甚关心，也不甚了解的杜鲁门和斯大林。最后结果是，共产党不但没有通过谈判而被征服，反而充分利用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并取得了明显优势。^[5]

毛泽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正是利用这“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显然，毛泽东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都属于政治“形式”的范畴，而不属于革命“内容”的范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最初 28 年的历史（1921—1949 年）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到毛泽东主义政治的转变过程的话，那么也可以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进行的长征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明显的里程碑。^[6]

革命与政治

我在本书研究中这么频繁地使用“革命”与“政治”二词，那么一个问题也就自然来了：何谓革命？何谓政治？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革命与政治二词（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非学术性的），所以要给它们下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定义也许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尽力而为。

从广义上讲，政治可以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的内部关系。政治涉及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它不仅仅是指社会管理和国家统治而已。^{*}

相反，革命则可以理解为现在状态的剧烈变化，或者说是运动形式的剧烈变化，而它不仅限于政治乃至人类活动。^[7] 为了更加明确地对二者加以区分，我们可以说政治代表人类现象的一个领域，而革命则代表一种运动的方式，二者之间可以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从更狭窄、更普通的意义上讲，政治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综合运作，而革命则是这些机构及其运作的剧烈变化。根据这种狭窄的定义，革命与政治被带进了同一研究领域

* 要给像政治这样的术语下一个众人可以一致接受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同意这样的说法：在政治与人类现象和人类活动与其他领域之间存在着“外延的联系”，如经济生产、哲学文化等；在政治领域中，如家庭、社会、国家等，存在着“内涵的联系”。我在这里所下的定义，倒也不是完全独出心裁，可参见 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1950. 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把政治定义为：“个人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据此，显然可以把家庭关系当成政治的一部分才是。

之中。^[8]

上述各种见解可能会引起争论并招致不同的看法。然而须知，每种见解无论在其原始定义上还是在其最终分析上都有其道理，有其价值。

政治是现状的综合运作，因此也是对现状的认可。相反，革命是现状的改变，因此也是对现状的否定。由于政治认可现状，所以它与现实联系较多；革命否认现状，因此常常反映未来的想象。由此，政治与革命形成对比，从而产生了政治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之分。^[9]上述见解也可能引起争论，但是这些见解在定义和分析上同样各有其价值。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革命代表着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与政治形成对照。因此，革命与革命家、政治与政治家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治家也要求变化，有时是剧烈的变化。尽管所有的政治家都倾向于把现实条件当作出发点，但他们却很少有人完全满足于现状，也很少有不需要变化的政府。因此，最优秀、最有远见的政治家可能会成为最出色、最小心谨慎的革命家，而最愚笨的政治家则可能变成最拙劣的革命家。但是一般的政治家却很少会成为一般的革命家。同样，革命家也需要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妥协，以便使革命走向成功。杰出的革命家能变成出色的政治家，末流的革命者会变成末流的政治家，而一般的革命家与一般的政治家之间仍保持其不同。

259

“综合运作”与“剧烈变化”这类的词汇也可能有些含混不清，需要有所解释。就“综合”一词而言，我认为它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是指对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社会，一个党派或一个国家——可以说任何一个人类集合体——的内部各方面的抽象综合，而不是对每方面的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它表示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对外与其他社会或国家发生关系。“剧烈”一词不仅指在客观上非同寻常，而且是指超出人们的主观预期之外。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革命所及的整个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来说肯定是一个冲击或惊讶。

革命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正是通过这一舞台产生影响的。

此外，“运作”与“变化”二词也应该按照它们的双重含义来加以解释，或者是作为对过去某种情况进行客观观察和反映的结果，或者是当作对未来某种情况进行主观想象和创造的目标。政治是一门艺术或一门科学，对它感兴趣的人可能是政治参与者，也可能是政治观察家。实际上，有关政治的这两类分析同样适用于革命，革命也可以是一门艺术或科学。比如笔者本人对政治感兴趣，对革命也感兴趣，便是作为科学从研究角度出发的，大多数读者可能也如此。

有些学者曾说，定义革命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运用暴力剥夺敌对者的权力；二是对国家和社会制度进行彻底改造。简言之，暴力是手段，改造是目的。暴力使革命与改良和演变区别开来，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改造又使革命不同于一般的政变和暴动。^[10]

260

然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讲，革命不可能把这两个前提条件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付诸实现。例如，一个政党要想实现改变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的计划，它就必须通过军事对抗或选举竞争，来获取政权才行。换言之，为了改变国家政权，又必须运用政权机构。这种运用实质上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革命意义上的行为。一个政党上台执政以后，它所提出的所有“革命纲领”在下述意义上将失去其革命性质：采用这些纲领基本上是为了巩固而不是推翻整个政权和政治秩序。这些纲领的实施，已经变成了某种社会改良，如苏联共产党在1936年和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的社会经济改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这对革命和革命家来说是一种两难选择：凡是革命家，无一不同时需要担当政治家的角色；革命也不能长期脱离政治。

革命家也常常会在自己的队伍中实行温和的政策来巩固其自身的地位，以便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进行有效的竞争，比如在控制一个地方或一个党派的基础上，去争夺全国的权力，然后又在此基础上争夺世界霸权。他们宣传将来革命，以便眼下鼓励本党同志和

发动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而成为执政党之后，他们也许会真的改变某些社会制度以兑现从前的一些许诺，但也主要还是为了加强他们现在的地位。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新政权的领袖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之类的动作，不仅会损害国家和党的利益，而且会危及他们个人的地位。即使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做一个不忠诚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家也比做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的革命家要好。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暴力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形式，它与革命无关。但是另外意义上也可以做相反的解释：暴力本身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形式，它与政治无关。历史上也有许多没用多少暴力就使国家和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化的事件，如西欧的工业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是，更多的历史事件表明，只有使用暴力（武装起义或国内战争），才能使国家和社会得到明显的改造。

虽然革命与政治关系复杂，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采用二分法，将它们两相对照，加以区分。现将二者的区别列表如下，想必会有一些参考价值（参见表 10.1）。需要再说一遍，本节的理论探讨并不企图同本书的事实内容截然脱离，而只求从更深广的思索的基础上认识一番中共长征，或者从中共长征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思索一番罢了。

表 10.1

政治/政治家	革命/革命家
人类的内部关系	剧烈的变化方式
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运作为秩序而改变	国家和社会机构的改造为改变而秩序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稳健的职业作风	鼓动的超凡魅力
国家权力	社会力量
全面维持	派别对抗
按规则办事	凭愿望行事
立足现实	着眼未来
妥协性、零碎改进	强制性、整体变革

261 过渡中的共产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最杰出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然而也正是毛泽东保持了革命的理想主义。这有点讽刺意味，也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实际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 30 年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政治成了革命的一部分，中共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革命。^[11]

262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由反叛时期进入了执政时期。1949 年前，共产党人的目的是夺取全国政权；1949 年后，共产党人掌握了国家政权，权力反而成了手段。于是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什么是新的目的？什么是党和国家的新方向？是从事经济建设，继续社会革命，还是开辟世界革命？对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代表者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他终身为之艰苦奋斗的究竟是什么？^[12]毛泽东是个利用革命活动实现他做皇帝的政治野心家，还是为缔造乌托邦社会而奋斗的真正革命者？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我个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头 30 年历史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不惜中国所付出的灾难性的现实政治代价。

263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梦魇中惊醒过来，又回到了政治现实中。虽然不排除这一转变过程中有个人作用存在，但应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转变进程。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是一个公认的现实主义者。邓小平宣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国内政策以“一国两制”著称，即给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引入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如私营企业、市场价值和利润刺激；邓小平对外交事务的新态度同样引人注目，那就是“开放政策”，即引进西方的钱财和技术，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是非姑且勿论，这些政策改变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革命和政治对于目前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然是一对基本矛盾。如果党和国家所关心的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怎么可以说比资本主义的美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和修正主义的苏联更为优越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中国内地。如果中共领导人被迫放弃革命理想主义，不能创造出新的政治职业精神，他们任何为自己作为中国惟一统治精英的合法性怎样得以维护呢？更为迫切的是，革命意味着理想主义，一旦革命理想被放弃，政治腐化随之滋生蔓延。要么革命，要么腐化，这是困扰高度集中体制的一个两难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今的中国。^[13]

20 世纪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可以说具有三大基本动力：以 264
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公有国家和没有国籍的大同世界为奋斗目标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提高劳动阶级的生活待遇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有坚强国际背景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组织。出于各种具体原因，共产主义运动也有过多次倒退，这些原因一般是政治条件的。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学者型”人物，缺乏实践活动经验。随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逐渐政治化的历史，在此期间出现过不少“叛变的信徒”和“忠实的叛徒”。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德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力量最为强大，又最有前途。然而总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德共积累了自身的力量，而在一些关键时刻，德共又很快丧失了自己的力量。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受到俾斯麦主义的国家政治的抑制，难以取得成功。世纪转折之际，第二国际的德国共产党是对外独立的，但它内部不统一；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内部统一了，对外又不再独立了；总是不得成功。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反衬出俄国共产党的胜利，也许在此种国际政治关系上才能更好地评价这个时代的德国共产党人。^[14]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由于蛇咬怕井绳般的预防西方列强进攻苏联（因此有了“一切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以及左派斯大林和右派季诺维也夫的苏共内斗，第三国际制定了一条极端革命主义路线，剥夺了其成员党的思想独立性和政治灵活性。这种独立性和

灵活性，是一个政党成功的必备条件。由于一味强调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德国共产党把德国社会党视为主要敌人，无视纳粹主义兴起，有几年甚至支持纳粹党。1933年希特勒政变上台，德国共产党人即刻遭受无情镇压，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永远丧失了生机与活力。^[15]

265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然而，斯大林又与希特勒达成了秘密合作协定，这极大地嘲弄了欧洲共产党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欧洲共产党人才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抵抗法西斯运动中，并取得了辉煌的功绩。除了某些偏执反共分子，极少有历史学家否认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的坚定立场和关键作用。但是，许多历史学家都不清楚，共产党人坚定有效的抵抗运动直接源自于他们的内在革命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后，苏联与西方盟国的权力之争导致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性对抗。有些国家成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另一些国家依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有许多因素发挥作用，但是事实表明，某些国家共产党的既定军事力量和政治技巧运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美国的军事管制，日本共产党人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由于苏联的控制，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自然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亚欧一些国家，没有受到苏联或西方国家的直接控制，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建立了一些根据地，也拥有一些武装力量，但是共产党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政权。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治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对这些国家也更有研究兴趣。

20世纪40年代初期，抵抗运动的艰难岁月里，法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为最有影响的武装力量。1944年底，英美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并迅速向德国北部推进之际，正如中国形势一样，当时形势对法国共产党人极为有利。只是法共游击队听命于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全力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而戴高乐将军则伺机夺取了各级政权，建立了国家机构。战后，法共交出10万武装部队，换取加入政府和参加全国大选，起初，法共赢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总书记

多列士等一些法共领导人在政府中担任部长的职务。一年后，法共及其领导人被排除出政府；这其中也有多种原因，政治是从不吝啬给失败者以口实安慰的。

266

意大利共产党的遭遇与法国共产党类似。它也解散了武装力量，加入政府。意大利共产党人除得到了不少感谢和赞扬之外，还有几个内阁职位。起初共产党人也十分活跃，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冷战开始了，由于苏联集团与西方集团的对抗，意共不可避免地夹在其中，于是和政府摩擦不断。1947年，意共终于被赶出了国家政府。这是根本出乎共产党人意料之外的，而出乎意料也就是政治失败，这对于法共和意共都是适用的。^[16]

希腊共产党的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1944年底，德军撤离巴尔干半岛（即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这给共产党游击队留下了活动空间。共产党人由于绝对军事优势夺取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而希腊共产党却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而失败。1944年9月，希腊共产党响应盟军司令部的号召，参加了伦敦新组建的希腊政府。英军护送希腊政府接管雅典之前，希共一直是安分守己，没有轻举妄动的。得知希腊政府和英国想让他们交出军队和根据地，希共才愤怒起来。1944年12月，希共发动起义，1945年2月以前，他们与英国援军僵持不下。和平谈判中，共产党答应放弃军队，以换取合法的地位。1946年希腊大选中，希共失败了，后来又受到镇压。1949年，希共再度集聚军队发动起义，结果被政府军粉碎。第二次内战结束了希共在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也完全清除了共产党在希腊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整个过程很好地说明了下述真理：政治游戏的规则，对于蔑视它们的革命者，发挥的最为有效。比较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在大战后“谈谈打打”中的经历和命运，不难发现希共缺乏中共的政治干练。^[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与西欧共产党人的区别就表现出来了：中共更有独立精神，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斗争更为有力，结果取得了胜利。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共产党人在和平谈判和军事对抗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失败了。这一切固然

267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在苏联的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特别是在193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召开了联共第八次党代会，颁布了苏维埃宪法，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农业集体化。

也可以说是全球政治形势所导致的结果。这也有一定道理，其实并不尽然。更深层的主观因素在于，战前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缺乏类似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同国家政府打交道的经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过，后又分裂了；在国内战争中胜利过，也遭受过失败，这种政治经验是重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艰苦而有益的长征，以此为契机改变了全党的总精神和总方针。大战后的做法无非是此种精神和方针的体现罢了。

当代共产主义世界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尽管这一转变因时因地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共产主义世界转变的动力已主要源于政治规范，而非革命理想，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利益，而非马列主义原则。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在社会和政治体制方面很少有重大的变动。这说明苏联共产党人在国内已经丧失了革命的中心目标，他们的革命方向只能转向外交事务，即西方人士所称的“扩张主义”。*

国内经济停滞、意识形态的僵硬和东欧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构成苏联政治防御性的一面；正是在亚、非、拉、欧各地区的对外影响使得苏联政权敢于声称它仍有革命的活力。只是苏联坚持争取“世界革命”，以及苏美两方的“冷战对立”，维持住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中国也想加入到“世界革命”的行列进程，但是由于严峻的经济落后形势，中国注定要有一段“国家收缩”时期，致力于自身经济建设，为此导致党的革命性的削弱，国家的政治性的增强。当前中国和苏联的改革运动反映出了共产主义世界的转变趋势，但它们的国内和国际后果也许会大不相同。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似乎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形势。

268

大战后的历史表明，一个共产党政权拥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经验越多，它就更独立于苏联，而只有经过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争论，它才会最终落实到与苏联作为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不是以苏共作为党的革命关系上来。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亚洲的蒙古等国仍然受到正统的共产主义教条的束缚，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它们变成政治傀儡角色，惟有无

助无望地依靠着苏联。它们崇高的革命理论白白变成了低俗的政治笑柄，这些国家领导人有时自己也对此心生厌恶之情。朝鲜和罗马尼亚处于苏共和中共这两种极端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中显得立场适中，言辞温和；而在国内截然相反，金日成和齐奥塞斯库实行家族统治，几乎已经倒退到中世纪君主专制时代了。

西欧共产党可能会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更多的共产主义特征，而东欧国家将会放松共产主义体制，以求助于资本主义。这不是它们最想走的路，也是将来它们一定得走的路。非洲和南美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就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正统理论关系不大，成了当今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非洲和南美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始理由传统殖民地国家和社会的不公正，经济水平落后于现代国际标准是运动兴盛的推动力之所在。非洲和南美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会对西方列强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

共产主义运动从革命转向政治，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可以安心坐等苏联和中国完全“由共产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表明，一旦共产党坚守革命的意识形态，他们就与对手互不相容；但是，一旦共产党人政治上变得更现实，他们与对手有更多的共同点，同时也更富有挑战性。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或者称之为西方世界、自由世界等等，它本身也将经历深刻的变化。现在很清楚，一旦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受到进一步的挫败，将会引起诸多的国内冲突变化。

不论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都不会认为笔者现在的研究对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鼓励作用，正如此项研究并不对其先辈以往的所作所为过于直接的称颂赞扬一样。当代政治家和以往政治家同样，他们正满怀信心，以自由的步伐走着世界政治和世界历史的必然之路。我敢说，整个人类仍在进行着新长征！*

* 简单回顾一下过去的某些天才的预言家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得出相当消极的结论。能够预见长远未来的人毕竟不多。我们所能期望的惟一一件事就是用既非暴力也非革命的方式解决目前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苏联与美国之间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问题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解决。我们仍然生活在革命政治的时代，但愿我们的后代不再如此。作为与人类期望和计划相违背的革命，和作为限制人类集中注意力于自己内部关系的政治，应当而且终将退出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

附录一

长征大事记

（这个大事记的编写主要是为了表明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及影响，对于一般西方读者还可以澄清若干不太准确的历史事实。出处自然只能从略）。

1930 年

4 月 28 日：蒋、冯、阎大战爆发。战争持续 4 个月，涉及十几个省，双方卷入大战的军队近 200 万人。

6 月 11 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7 月 27 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并占领至 8 月 5 日。

8 月 23 日：红一方面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8 月 24 日—9 月 12 日：第二次攻打长沙，但没有成功。

9 月 24 日—28 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召开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采纳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逐个击破”的军事战略方针。

11 月 25 日：李立三被正式开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30 日：红一方面军取得龙岗大捷，不久就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监督指导下召开的。会上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此前不久，项英已抵达江西苏区。

4 月：王稼祥、顾作霖、任弼时三人离开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三人赴鄂豫皖苏区；夏曦、徐锡根二人赴湘鄂西苏区。

4 月 16 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瑞金举行。

5 月 16 日—30 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6 月 22 日：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24 日被杀害。

7 月 10 日—9 月 15 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侵占中国东北。

11 月 1 日—5 日：赣南会议又称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继续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1 月 7 日—20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11 月 7 日：鄂豫皖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

11 月 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朱德担任军委主席。

12 月 14 日：宁都起义爆发，1.7 万余人的起义部队加入了红军。

12 月底：周恩来抵达江西苏区。

1932 年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决议，要求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1 月 21 日：贺龙的红三军主动出击，取得龙王集战斗的胜利；

25 日在孝感又取得一场胜利。

2 月 4 日—3 月 7 日：彭德怀指挥红军围攻赣州，未果。

3 月 21 日—5 月 2 日：红四方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6 月：国民党政府对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8 月 8 日：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 月 15 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战役中失败。

8 月 30 日：红三军在洪湖地区战败。

10 月 8 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受到严厉批评，23 日，周恩来代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0 月 11 日：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开始西征。

10 月 19 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鄂豫两省边界地区，在枣阳之战中败北。

11 月 11 日：红四方面军在漫关战役中再次受挫，被迫转移到陕西境内；27 日：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待在陕南，不再西移。

12 月 12 日：苏联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恢复外交关系。

12 月 25 日：红四方面军攻占通江，落脚川北。

12 月 30 日：贺龙率红三军抵达湘鄂边界西边的鹤峰。

1933 年

1 月：由博古、张闻天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

1 月 3 日：日本夺取山海关，开始入侵华北。

2 月 26 日—28 日：红一方面军取得宜黄战斗的胜利，3 月 21 日又赢得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2 月 15 日：江西中央苏区开始了反罗明路线运动。

5 月 21 日—24 日：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与川北军阀田颂尧展开激战，并取得胜利。

5 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占

领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

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7月18日：蒋介石开始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9月：国民党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28日，黎川失守，这对红一方面军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

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抵达中央苏区。

10月4日：刘湘召集四川省各军阀势力，宣布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六路围攻”。

10月26日：红军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签订秘密协定。

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国民党内十九路军反叛。

1934年

1月15日—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

1月22日—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1月15日：福州被国民党中央军攻陷，福建事变失败。

4月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先锋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向湖北、四川两省边界地区转移。

4月28日：中央红军在广昌战役中败退。

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纠正了激进政策，以适应黔东的现实。

7月7日：红七军团或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开始突围出击。

7月23日：红六军团从湘赣边区出发，开始西征。

8月9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万源之战的胜利，并进而打破了刘湘的六路围攻。

9月4日：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被迫继续西进。

9月12日：红二十五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

9月20日：红六军团攻占黎平；26日，在涧河输掉一仗。

10月7日—10日：在甘溪再次失守后，红六军团转而北进；25日，在印江与红三军会合。

同月：上海的党组织被国民党捣毁，瑞金的中央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失去了电讯联系。

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23日：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正式合编。

1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4日：抗日先遣队加入赣东北红十军，在方志敏的领导下，共同北上。

11月11日：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线被中央红军攻破。

11月12日：方志敏的部队在谭家桥战役中惨败。

11月29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虽然减员很重但毕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成立，任弼时为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任司令员。

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通道会议；18日又在黎平召开会议；取消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

1935年

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会议。

1月15日—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军事领导；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川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1月22日：党中央打电报给红四方面军，要求配合渡江战役。

1月24日：红四方面军北进，发动陕南战役，持续了一个月。

1月24日—26日：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川军打了一仗，未能取

胜；29日，折师西向，一渡赤水。

2月5日：陕西省的共产党游击队发展为两个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

2月8日：中央红军抵达云南省的威信。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任，主管中央常务领导工作。

2月18日—19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返回黔北；28日至3月1日，在桐梓、遵义一带取得战斗的胜利。

3月4日：中央红军成立前线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

3月16日—17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西进川南。

3月21日—22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折回贵州，并南下云南东部。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离开川北向川西转移。

5月1日—9日：中央红军穿过金沙江，进入西南。

5月5日：张国焘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会议，反毛情绪得以克服。

6月13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29日，军委起草了“松潘战役计划”。

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确立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7月28日：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

8月1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的全国统一战线。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分歧问题。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重申了毛泽东的北上作战方针。

9月9日：毛泽东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本部，继续北上。

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俄界会议，并决定继续北上；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决计南下。

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完成了他们的长征，抵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永平会师；18日，两军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决定向陕北进军。

10月15日：张国焘在卓木堡召开会议，另立“中共中央”，自封为“主席”。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

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发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

11月18日：红二、六军团再次出发，21日，强渡沅江，开始西征。

11月21日：张浩（原名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11月21日—22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联手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12月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6年

1月1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贵州东部的玉屏；在江口受挫后，于11日西进石阡。

1月6日—14日：张浩与张国焘电讯往来。

2月11日—23日：红四军从川西天全撤退，向康藏边界的甘孜转移。

2月17日：中央红军宣布东征。

3月18日：张学良飞往延安与周恩来密谈。

3月28日：红二、六军团抵达黔滇边界的盘江地区，在那里收到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鼓励他们北上会合。

4月28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

5月5日：中央红军从东征途中撤回；14日开始西征。

5月28日：发生两广事变，公开反蒋。

6月3日：红二、六军团在理化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联席会议，两军开始共同北上。

7月18日：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平息。

9月19日：中共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9月27日：朱德打电报给党中央卸责。不久，中共西北局漳州会议再次作出北上决定。

10月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

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11月10日：西路军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1月16日—18日：西路军在古浪作战失利。

11月21日：彭德怀率红军联合部队在山城堡战斗中歼灭一部分国民党中央军。

12月：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2月7日：毛泽东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6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指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

1月12日：西路军中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被歼灭。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三中全会，提议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2月26日—3月11日：倪家营子战役使西路军全军覆没。

3月12日：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未获成功，返回延安。

3月2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延安会议，批判张国焘。

5月2日—14日：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6月16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的谈判未获成功，返回延安。

7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讲演：“实践论”与“矛盾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

8月23日—24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抗战的方针政策。

8月25日：中央军委宣布成立八路军。

8月26日：南京和莫斯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9月22日：国共合作的联合公报发表。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毛泽东致电周、朱、彭，要求避免正面作战，提倡开展游击战。

10月2日：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治委员。

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诞生。

11月8日：山西省城太原被日军攻陷。

11月12日：毛泽东出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强调要在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

11月27日：王明从莫斯科飞回延安。

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趾高气扬，大出风头，对毛泽东不屑一顾。但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决议。

1938年

1月11日：聂荣臻率115师的部分军队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

2月27日—3月1日：政治局召开三月会议，毛泽东与王明相持不下，未作任何正式决议。

3月18日：罗荣桓率115师的主力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3月16日：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4月1日：贺龙、关向应率120师开辟晋绥根据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129师开辟晋冀豫根据地。

4月4日：张国焘逃离延安，投靠国民党。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9月14日：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而不是王明应该做党的领袖。

9月26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的权威和战略得到全党的正式确认。

附录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

萧 军

由于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外学者在考察、研究中共党史时，都要或详或略地加以描述和评析。本文旨在回顾美国人考察、研究中国红军长征史的历史进程，并对其作一简要评析。

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眼中的红军长征

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美国国内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主要原因有四：（一）中国共产党同领导过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国民党相比，显得势单力薄；（二）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和“非法”状态；（三）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大肆歪曲中共形象，恶毒谩骂中国共产党是“一伙十恶不赦的土匪”^[1]；（四）国民党军队的多次疯狂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于 1934 年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在一般人眼里，中国红军的气数到此已尽，无须挂齿。美国政府也因此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切大为减低，而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日愈加重的神秘感，成为美国民间的热门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1936 年西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报道都“模糊不清和笼统概括”。尽管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撰写、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章，但对中共和红军方面的问题几乎不屑一顾，或大都迎合国

民党的官方舆论。另外，实地考察中国苏维埃地区更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这样，美国的远东问题专家既不能直接也无法间接获取有关中共活动的可靠材料和信息，只能在“近乎全然无知的条件下”^[2]，试图系统评价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3]。

对于历时两年的中国红军长征，美国人知之更少。1934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在第6版上用四行字歪曲报道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说有4万共产党军队撤离江西、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1百英里长、20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3个星期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4]这两则报道可能是西方世界对长征的最早披露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同红军一起长征的有3位外国人：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瑞士传教士薄复礼（Alfred Bosshardt）和阿诺利斯·海曼（Arnolis Hayman）。李德和薄复礼事后都写了回忆录，叙述这一不同寻常的经历。1936年4月12日，薄复礼被红军释放，离开长征队伍。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书：《监禁之手：在中国为基督而被俘》，于1936年8月在英国伦敦出版^[5]。这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惟一的印象记，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6]。这本书问世后受到一定的欢迎，但“没有引起远东问题权威们和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注意”。因为，薄复礼在书中“除了对残匪论进行了尖锐批评以外，几乎没有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

其实，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军事大转移后，有少数美国人不相信国民党一再宣扬的“残匪论”。在中国工作的诺曼·汉韦尔（Norman Hanwell）认为，既然国民党不得不“在作战地图上翻来覆去地标记、筹划”，那么，所谓残余土匪的宣传就一钱不值。相反，这说明红军在长征途中采取的政策很灵活，好像在拽着国民党的鼻子东奔西突。1936年，汉韦尔把自己的工作搁置一边，走访了很多地方，并且亲自游历、考察红军长征途经的一些地区。汉韦尔的调查结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

《亚洲》杂志的编辑们说这些文章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红军的最详尽、最可靠的报道”^[7]。可连汉韦尔本人都认为自己主要依据的第二手材料仍然极不可靠。一些美国外交官也力图查明共产党人退却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结果。可是，美国外事部门综合了近150份报告，得出的结论竟然是：长征路线是西去再转北上，最后将自行消失。当然，也有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共产党“有胜任的领导，有高昂的士气，对群众有吸引力”，共产党力量将变得更加强大。总的说来，在1936年以前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是“一幅混乱的画”^[8]。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讲，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被世界遗忘，反而在想方设法打破蒋介石的铁幕封锁。在长征结束后，他们决定邀请西方记者特别是对中国颇为友好的美国记者来西北苏区访问。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事态的发展，已有一些外国人士确信蒋介石的所谓“残匪论”破产了。他们渴望用事实证明经历了大退却的红军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里应外合的大趋势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幸运地成为深入红区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1936年6月，即已胜利完成长征的中央红军尚在等待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斯诺在中共的周密安排下来到了保安，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他回到北平后，首先为英美报刊撰写了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通讯报道。已有十几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似乎直到这时才被斯诺“发现”，才被世界“发现”。在当时这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成为震撼世界的成就。

斯诺在采访中从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那里，搜集了丰富的有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在他的系列报道中，有关长征的内容非常引人注目。斯诺在其通讯报道的基础上，抓紧撰写一本全面、系统介绍中共及其红军的书，这就是1937年10月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问世后迅即风靡世界。长征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高潮部分，当时在美国“差不多每一位评论家都选出斯诺对长征的描述加以评论”^[9]。《红星照耀中国》不仅首次向国外全面报道了红军长征，就连中国人也是在该书于1938年译

成中文本《西行漫记》后，才首次读到了长征这一英雄史诗。《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种中译本取名为《长征 25000 里》，从这一点也显示了长征在书中的分量。《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成功不仅体现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引发的“爆炸性”新闻轰动效应，而且迄今为止它仍不失为研究长征以及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书中有关长征的报道是建立在斯诺同长征亲历者直接交谈的基础上，因而，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是无可挑剔的。1966 年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指出：第一本最有说服力的叙述长征的书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在写《红星照耀中国》的“长征”篇时，只利用了他所搜集的相关资料的大部分。后来，他曾试图充分利用所存的宝贵资料，写一本长征专史，可惜未能遂愿。1957 年在费正清的积极倡导和鼎力协助下，哈佛大学出版社把斯诺散存的一些珍贵材料汇编成《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书中的有些内容是第一次公布于众，从长征这一角度来看，有力地补充了《红星照耀中国》中略写的内容。比如，毛泽东、朱德等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动所作的艰辛斗争；对红军长征途中所受损失的具体估算……

继斯诺敲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后，一些美国记者、作家、学者尽力寻求机会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红区热”。事后，他们在撰写文章时都没有忘记要写一写长征。其中，较为有名的包括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笔名）的《红色中国内幕》、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这些引人入胜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属于具有新闻性质的纪实报告。书中有关长征的内容大都是采访时的笔录，作者们只略加评点而已。就长征而言，在这些纪实性著作中，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当属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和《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长征”篇也是《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高潮”部分。从政治角度来看，该书“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10]。

以斯诺为代表的美国左翼人士揭开红色中国之谜后，美国政府官员无须像从前那样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沮丧地喟叹：实际上我们对共产主义中国一无所知。1945年，美国战争部军事情报组（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of the War Department）在日本战败投降的新形势下，决定对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作一全面的调查和评估。在吸收2500多份官方和非官方材料的基础上，于1945年7月完成了一份综合报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6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公之于世^[11]。据美方声称，此报告非常客观地概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我看来，尽管报告的基调是反共、反俄的，但确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共的一些情况，不得不承认有关红军长征的一些事实。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还谈不上对中国红军长征进行了什么学术研究，只是作了一些生动的纪实性叙述。美国人普遍赞同斯诺的分析和评价：长征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当然，长征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向抗日前线进军”这一政治信念是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12]。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的著作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长征、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甚至堪称经典的史料。因为在那种非凡的年月，共产党保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寥寥无几，可见的资料多数是以追述方式写出来的。并且，当时有关共产党的比较客观的报道为数极少，历史学家只得较多地依赖旁观者写的相关报道，尤其是那些深入红区的西方人士采集的资料、获取的信息。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学者笔下的红军长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之中，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成为相当急迫的战略

任务。于是，美国政府不得不组织力量研究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这一官方现实需要的刺激下，一些美国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探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轨迹。那么，作为中共发展史上重要转折点之一的长征就不能忽略而过了。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费正清利用在华机会实地考察了共产党的活动。194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名著《美国与中国》。该书一问世就得到了美国政界、学界和广大公众的高度评价，它差不多成了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入门书。书中有3段文字概述了长征，字里行间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把长征同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是最后的胜利者。费正清的这一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扩展成了一种模式，后来的美国学者几乎都沿袭这一模式。权力斗争成了美国学界研究长征乃至整个中共党史的一根主线。

除了费正清，还有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F. V. 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这些新一代汉学家、中国问题以及亚洲问题专家，能够正视中国现实，比较清醒、客观地评估经历长征后而重新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主张美国政府不要义无反顾地同正在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捆绑在一个战车上。可惜，这些有进步倾向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20世纪50年代被打入冷宫。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本不可能正常开展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是深深地打上了反共的烙印。直到50年代末期，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变后，遭受严重摧残的中国学研究才开始复兴、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学研究迅速发展成一门“显学”。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乘势开展起来，而中国红军长征也开始占据学术领域的一席之地。

据笔者初步统计，1950—1979年美国出版的对长征泼墨较多的中共党史著作约有25本。其中，只有一本长征方面的专著，即1971年问世的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13]。该书是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

专著，试图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究。本书的纪实色彩较浓，对长征的描述颇为经典。现在，仍有不少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1966年出版的斯图尔特·施拉姆的著作《毛泽东》也很引人注目。施拉姆用10页的篇幅叙述、分析长征的全过程，并附有比较详细的“1934年10月—1935年10月长征路线”图。当然，毛泽东的沉浮是贯穿本书的主线，作者在评述长征时也是侧重于这一点。另外，还有少量不错的专题论文。比如，发表在1965年第22期《中国季刊》上的《长征》一文。这是一篇“全面的、有用的文章”，但是他引用的文献大部分是西方的新闻报道，因而根据不足。^[14]

对美国学者来说，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已有条件挖掘、利用中西文材料，并且，长征这一史诗已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历史学家能够较为冷静地对长征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再局限于生动的叙述上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把长征同毛泽东的崛起和党内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二是遵义会议成为论述的重点，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遵义会议着墨不多，甚至完全忽略了。像《红星照耀中国》和《伟大的道路》这类名著就没有提及遵义会议，《中国人征服中国》中的陆定一回顾中共党史时指出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性作用。不过，这一阶段对遵义会议的研究也是侧重于权力斗争方面，对会议本身的细节，如时间、与会者、会议进程、决议等则不予深挖。此外，多数著作对遵义会议的描述大同小异，对若干事件的叙述比较模糊，甚至包含着基本类似的史实错误。比如，有学者不敢明确断定刘少奇是否参加了长征，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都能找到可信的依据。事实上，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参加了长征，并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不少著作中提到：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取代周恩来而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周没有担任过军委主席这一职务……出现诸如此类的史实错误，其症结主要在于文献档案资料的严重缺乏。

三、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对红军长征的研究

1978 年中共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一新形势之下，中美学术文化交流方兴未艾。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涌出中国，同时，外国学者还能亲临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这为美国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红军长征创造了新的机会。1980—1990 年，美国大约出版了 18 部较多涉猎红军长征的著作，其间，不乏有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论文。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如下：

（一）在中国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试图全面、生动地展现长征历史画卷的专著。

这类著作主要包括：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夏洛特·Y·索尔兹伯里（Charlotte Y. Salisbury）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15]和简·弗瑞兹（Jean Fritz）的《中国的长征：6000 英里的险遇》^[16]。这三部书都文情并茂、引人入胜。1985 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则轰动全美读书界，而且，许多欧亚国家竞相翻印出版。该书生动、翔实地再现了长征这一“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17]，是“哈里森热”切实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是重踏长征英雄足迹的产物。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如遇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就把不同的说法列在注释中。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及作者坦率地进行评述，也是本书的两大特色。不过，从学术研究这一角度来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过分依赖口述材料；其次，没有把大量带有反共倾向的相关资料列为比较参照系。

伴随哈里森踏踩红军长征之路的夏洛特夫人撰写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完整地叙述了他们在中国的远征。由于夏洛特生动地讲述了他们沿长征路线跋涉的经历和所遇之人的故事，因而，

从另一个层面提供了较为可信的长征方面的资料。继哈里森等人的长征之行后，1986年简·弗瑞兹来到中国，采访了长征的幸存者，简根据所收集的口述材料，写了一本饶有兴味的通俗读物，即《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遇》。

（二）对长征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微观化。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研讨遵义会议的高潮，本杰明·杨（Benjamin Yang）、陈志让（Jerome Ch'en）、托马斯·坎彭（Thomas Kampen）等长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积极参与其间，争论颇为激烈。特别是本杰明·杨和陈志让以《中国季刊》为阵地，相互间展开了“回合式”的论争。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1. 遵义会议的会期和与会代表。2. 召开遵义会议的目的和会议决议。3. 谁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从而使军事领导层的变动成为可能。

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成果和重要历史地位，美国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他们认为遵义会议是中共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毛泽东成功地将军事危机变为政治优势”的关键^[18]，但遵义会议只是毛泽东登上权力高峰的重要“一步”。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如果不是共同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斗争，中央红军和政治局的稳定，以及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领导地位的巩固将需要更长的时间。^[19]

（三）开始全面、系统地考察长征的来龙去脉，并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框架或模式。

自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全面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后，陆续问世了一些纪实性长征专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迪克·威尔逊的《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遗憾的，在很长时期内没有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直到1990年出版了本杰明·杨（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20]，才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该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1. 利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2. 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把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工作留给别人；

3. 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revolutionary idealism）和“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时刻，是毛泽东走在前头”^{99[21]}。遵义会议是转折点，因而作者很注意探根溯源，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考察长征。本杰明·杨指出：就长征的时限而言，长征开始的时间应提前到1932年10月，即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第三军团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而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时间。长征结束的时间应延伸至1937年春，即西路军“西征”失败的时间。当然，长征的高潮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转战到陕西的全过程。本杰明·杨甚至认为，长征应从一个更广泛、更抽象的意义上界定——把长征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从华南转移至华北的整个过程。

（四）长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对于这一点，美国学界没有歧义，但在具体分析上，侧重点略有不同：1. 普遍强调长征的重大政治意义。长征虽然是由于“毁灭性的失败而造成的一场灾难性撤退”^{99[22]}，但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99[23]}。2. 长征具有重大的心理影响。对毛泽东来说，长征经验增加了他的唯意志信念；对于幸存者以及深受长征故事鼓舞的人们来说，长征给人增添新的希望和更大的使命感。在长征中，许多人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未来，获得了信心，滋生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另外，长征堪称生死之争中“最大、最后的考验”，这种“心理遗产”有助于延安精神的形成，并已融于其间。

（五）美国学者研究长征依然以毛泽东为轴心，不过，对长征中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刘少奇、林彪……的研究已在逐步展开。

（六）大力肯定长征对红军和共产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七）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仍不时地出现。《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

泽东的中国》^[24]在西方世界被誉为反映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之一，可书中仍然出现早已被批驳过的史实错误：1935年1月，毛泽东成为中共政治局的主席。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不过，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的研究存在两个天然的不足：1. 原始资料的占有不如中国学者丰富。2. 美国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研究中共党史，一方面有助于独辟蹊径，扩展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易于过分依赖所谓“旁观者”提供的资料。比如，叛离了中国革命的张国焘、郭华伦等撰写的回忆录被视为“信史”，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中。

总而言之，尽管一些美国学者极力强调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强调根据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准绳去衡量、观察他们的言行。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历史，持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的烙印。不过，倘若中美史学界、党史学界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术交流，则有助于两国学者取长补短，尽可能地缩减学术上的差异。

参考文献

英文书目

Borkenau, Franz. *World Commu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Braun, Otto.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Translated by Jeane Moore. Stanford, 1982.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7.

Chen, Changfeng. *On the Long March with Chairman Mao*.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2.

Chen, Jerome.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i, Hsi shen.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Fairbank, Joh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Harrison, James.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Herz, John.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Hsiao, Tso 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Iss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Kim, Ilp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Kuo, Warren. *A Study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d. .

Lasswell, Harold.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8.

Lasswell, Harold,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Levenson, Joseph.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Liu, Po-cheng and others. *Recalling the Long Marc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Li, Tien-min. *Chou En-lai*.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0.

Liu, F.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Lotveit, Trygve. *Chinese Communism, 1931—1934*.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3 .

MacFarquhar, Re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Mao, Zedong. *Poems of Mao Tse-tung*. Translated by Wong Man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Eastern Horizon Press, 1966.

Pak, Hyobom.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7—1930*.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Payne, Robert. *Mao Tse-tung*. New York: Weyside &

Talley, 1969.

Popper, Karl.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66.

Pye, Lucian. *Mao Tse-tung: the Man in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Rue, John.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Salisbur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Schram, Stuart.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3.

——, *Mao Tse-tu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Schwartz, Benjamin.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eton-Watson, Hugh.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 New York: Praeger, 1960.

——, *Neither War Nor Peace*. New York: Praeger, 1960.

Sheng, Yueh.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Memoir*.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3.

Smedley, Agnes.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Stein, Gunther.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Swarup, Shanti.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Terrill, Ross. *Ma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Wakeman, Frederic. *History and Wi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Waller, Derek.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wo National Congresses of 1931 and 193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Wang, Ming. *Mao's Betrayal*. Translated by Vic Schneiers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 1975.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Wei, William. *The Counter-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Wilson, Dick.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Avon Books, 1971.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 *Mao Tse-tung and the Tsunyi Conference*. Washington, D. C.: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4.

中文书目

蔡廷锴. 蔡廷锴自传.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蔡孝先. 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 台北: 中共研究社, 1970

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 1931—1934.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 1969

陈独秀. 陈独秀自传. 香港: 当代文化出版社, 年月不详

程世才. 悲壮的历程. 沈阳: 东风出版社, 1959

重庆谈判史料. 重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3

川陕革命根据地文献选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邓文仪. 从军报国记. 台北: 中正出版社, 1979

董汉河. 董振堂.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方德田.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方志敏.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方志敏传.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赣东北红区的斗争.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0

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 1898—1949.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高军. 伟大的战士任弼时.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龚楚. 我与红军. 香港: 南风出版社, 1954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6

红旗飘飘.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红军长征过广西.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红军长征在贵州.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3

红军转战贵州: 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回忆贺龙.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江立新. 张国焘的彷徨与觉醒. 台北: 幼狮出版社, 1981

苦难的历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郭华伦. 中共史论.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 1969

李汉云. 从容共到清党. 台北: 精英出版社, 1966

李守孔. 国民革命史. 台北: 文物出版社, 1965

六大以来: 党内秘密文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罗瑞卿等.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马玉清. 红军长征中的七次会师.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毛泽东. 毛泽东集. 东京: 索索书社, 日本人用中文编辑多卷本

民国以来四川动乱史料编辑. 香港: 远东出版社, 1977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 北京: 战士出版社, 1983—1985

彭德怀. 彭德怀自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黔山红迹.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

申伯纯. 西安事变纪实.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四川农村经济. 上海：出版社不详，1936

四川省情.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司马璐.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

王健民. 中国共产党史稿. 台北：中央政治大学出版社，1966

王健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1

王沛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稿.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吴吉清.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吴湘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台北：中央政治大学出版社，1973

伍修权. 我的历程：1908—1949.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向青.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星火燎原. 北京：战士出版社，195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徐海东. 我的自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许世友. 我在红军十年.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薛岳. 剿匪纪实. 出版社不详，1937

杨成武. 忆长征.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杨云若.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于吉楠.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张国焘. 我的回忆. 香港：明报出版社，1973

张林. 徐海东将军传.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

张国焘问题资料.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中共党史稿.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中共党史研究文选.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中共党史资料.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2
-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3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3
- 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 上海: 复旦大学学刊, 1979
- 钟易谋. 海陆丰农民运动.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周开庆. 民国川事纪要. 台北: 四川文献社, 1974
- 朱建华, 宋春.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遵义会议文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日俄文书目

- [日] 德田助之. 毛泽东的政治动能. 日文. 东京: 庆应大学出版社, 1978
- [日] 波野多乾一. 中国共产党史. 日文. 东京. 1964
- 季米特洛夫: 杰出的国际共运领袖. 俄文. 莫斯科. 1972
- 联共党中央. 简明联共党史. 俄文. 莫斯科: 政治出版社, 1950
- [苏] 亚历山大·切列潘诺夫. 一名在华军事顾问. 俄文. 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 1976

报刊杂志

China Quarterly, 伦敦

New York Times, 纽约

《亚洲研究》，东京

《近代中国研究报告》，东京

《真理报》，莫斯科

《布尔什维克》，北京

《斗争》，北京

《探索》，纽约

《革命与战争》，北京

《红旗》，北京

《红色中华》，北京

《共产国际》，北京

《实话》，北京

《苏维埃》，北京

《党史研究》，北京

《党史通讯》，北京

《大公报》，上海

《人民日报》，北京

《明报月刊》，香港

《今日大陆》，台北

注 释

第一章 引言

[1] 参见 Benjamin Yang:《长征的幸存者仍然主宰着中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4（12）。

[2] 已有许多描写长征的新闻性著作，最著名的有 Edgar Snow 的 *Red Star over China*（1938）、Dick Wilson 的 *The Long March*（1970）和 Harrison Salisbury 的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1985）。

[3] 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载《共产国际》，第7卷，第1～2期，45页；另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写于1935年2月或3月，发表于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4]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9～10页，台北，1969；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01～205页，台北，1970。

[5]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9～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卷，附录，北京，1958。

[7]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1974, p. 12.

[8] Chalme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1964, p. 7.

[9] Ilpyong Kim,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 Berkeley, 1973, p. 201.

[10] Chalme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p. 8.

[11] Benjamin Schwartz,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79, pp. 189~190.

[12] 同上。

[13] Shanti Swarup,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5*, Stanford, 1966, p. 266.

[14]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p. 309~310.

[15] John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3, p. 547.

[16] Derek Waller,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 Berkeley, 1973.

[17] 参见龚楚：《我与红军》，389~394页，香港，1953。颇为奇怪的是，有些以前的共产党领导人极力否认他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又吹嘘甚至极力夸大他们以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8] John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Stanford, 1966, p. 263.

[19] 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1971, pp. 135~136; Jerome Ch'en, "Resolution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 in *China Quarterly*, October 1969, pp. 18~19.

[20] Noriyuki Tokuda, *Mo Takuto shugi no seiji rikigaku* (《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 5、8~127页，东京，1977。Tokuda把毛泽东在中央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2）由掌握领导权逐步转变为形成权威——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3）个人的绝对权威——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我赞同Tokuda的总体分析，但是我不相信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权威在五六十年代下降了的说法。

[21] Benjamin Schwartz,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 p. 3.

第二章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1] 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共》，15～21页，台北，1966。

[2] 参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20～22页，北京，1951。

[3] 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65页，台北，1965。

[4] Swarup,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P. 72. Swarup说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把握住中国革命的脉搏”是对的，但若把国民党的全部农业政策看成是一种“自杀”政策，那也太离谱了。

[5] 参见蔡和森：《党内机会主义史》，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483～501页，台北，1966。

[6] Ch'I His-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1976, pp. 237～239.

[7] 参见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载北京大学马列所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53～472页，北京，1978。

[8] 参见钟亦木：《海陆丰农民运动》，71～86页，广州，1957。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6部，193～200页；第7部，153～154页；第8部，217～218页，香港，1977—1982。地方暴动与党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很少，因此有关的文字记载也不多。下面介绍各次起义和各苏维埃根据地的情况时，我将引用一两份有关材料，然后再引用司马璐著作的适当部分予以相互印证。司马璐比较详细地收编了中国内地各类报章杂志上有关的回忆录。

[9] 参见中共横峰县委编：《赣东北红区的斗争》，15～44页，南昌，1980。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2～165页；第8部，139～142页。

[10] 参见郑维山：《红色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集，第

二部分，729～737页，北京，1958。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67～170页；第10部，101～114页。

[11] 参见贺龙、周逸群分别于1928年9月和1929年9月19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辑，29～37、55～57页，北京，1979。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171～172页；第10部，127～135页。

[12]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87～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7部，95～117页；第8部，127～147页。

[13] 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8部，185～213页。

[14] 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10部，151～163页。

[15]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56～281页。决议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导致失败的最重要的情形是“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得党不能保持独立性，不能对同盟者进行阶级批判，不能扩大自身的革命力量”。

[16]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2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73。

[17] 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8月7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218～252页。该文件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

[18]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41～1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8页。

[20] 参见《斗争》杂志，1933年2月4日社论。

[21] 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该文件指出：

“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内容。”

[22] 这一估计是以一些分散的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个大致的分析。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41～42页，北京，1982。1930年以后，在国民党大多数军队中，军改成了师，师改成了团。

[23] 参见彭公达：《湖南秋收起义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Hyobom Pak,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7—1930*, Hong Kong, 1971, pp. 81～115.

[25] 同注 [23]。

[26] 参见《从武汉到井冈山》，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25～29页。

[27] 参见《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494、6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9～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 参见陈毅：《朱毛部队的历史与现状报告》，53～54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13～116页。

[30]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27～136页。

[31] 本书作者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李立三领导问题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参见 Benjamin Yang, “Complexity and Reasonability: Reassessment of the Li Lisan Adventure”,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anuary 1989.

[32] 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1929年2月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3]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98页，北

京，红旗出版社，1981。

[3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837～838页。

[35] 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29年6月7日。该信中说：“在中国革命中，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载《布尔什维克》，1929年9月1日。另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信中重申，“现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载《红旗》，1930年2月15日。

[36] 参见《向忠发供状》，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159页。

[37] Schwartz,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 pp. 127～140.

[38] 参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集，492页。

[39] 参见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1卷，25页。

[40] 参见“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7月2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通过”，载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2卷，42～45页。

[41] 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16～1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42] 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37～43页。

[43]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34～157页。

[44] 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50～55页。

[45]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 p. 170.

[46] 参见《给润之、玉阶二同志及湘赣边区特委前委的信》，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51页。

[47] 参见《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70～72页。

[48] 参见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29年9月2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29～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9] 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0]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 《前委通告第三号——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政策及其重要性》，1930年3月8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61页。

[52] 《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4月3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30～31页。

[53] 参见《关于进攻武汉扩大斗争的通电》，转引自凌宇：《毛泽东同志与立三路线》，载《党史研究》，1982（3），79～80页。

[54] 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8月24日，转引自凌宇：《毛泽东同志与立三路线》，1982（3），79～80页。

[55]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57～160页。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1] 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502页。作者是台湾的一名历史学家，他对蒋介石在战争中的损失是有所掩饰的。

[2]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66～568页。

[3] 参见红一方面军前委与江西省委的联合声明《目前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委的任务——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进行阶级决战！》，1930年10月26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3页，上海，《复旦大学学刊》，1979。

[4] 同上书，35页。

[5] 参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争取决战胜利的八项有利条件》，1930年12月22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40～42页。

[6] 参见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73页。作者当时任江西省政府军事局主任。

[7]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73~74页。

[8]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72~573页。

[9] 公秉藩：《第二次围剿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83页。作者当时任国民党第28师师长。

[10] 参见《总前委八次会议记录》，1931年5月25日至6月10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05~117页。

[11] 公秉藩：《第二次围剿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89~90页。

[12] 同上。

[13]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16~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参见《第三次反围剿中敌方情况资料》，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63页。

[15] 《总前委第九次会议记录》，1931年6月22日，于康都，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37页。

[16] 《总前委第九次会议记录》，1931年6月22日，于康都，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40~141页。

[1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19页。

[18]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259~260页。

[19]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16~220页；另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77页；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9部，100页。

[20] 《向忠发自供状》，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159页。

[21] 关于中共在大城市中地下党组织的严重损失情况，可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251~253页。

[22] 参见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10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3] 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263～269页，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3。

[24] 参见《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载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2册，108页。

[25]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稿》，第2册，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6] 参见《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决定与四中全会决议——苏区中央局决议第一号》，载《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册，299～330页；另见《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苏区中央局决议第四号》（1931年4月16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97～98页。

[27]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60页。

[28] 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41～42页。党中央抵达江西苏区的时间应为1933年1月初。

[2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251页。

[30] 参见张国焘：《关于鄂豫皖根据地致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1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1] 参见《鄂豫皖分局就鄂豫皖根据地的现状致党中央的报告大纲》，1931年10月9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册，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

[32] 张国焘：《贯彻党的路线，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载《实话》，1931年3月5日。

[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938页。

[34] 《张国焘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就肃反运动所作的报告》，1931年11月25日，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17页。

[35]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146～15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36] 参见《徐向前、曾中生就红四军状况及其作战计划给党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22页。

[37] 《党中央致鄂豫皖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同上书，131页。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06页。

[39] 《鄂豫皖分局报告大纲》，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册，6~10页。

[40] 陈昌浩：《关于肃反运动的详细报告》，1931年11月22日，载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2卷，471~472页。

[41] 参见《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175页。

[42] 参见陈昌浩：《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略述》，1933年7月25日，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二辑，750页。另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182~186页。

[43]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207~208页。

[4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34页。

[4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05~207页。

[46]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39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09页。

[47]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40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09~211页。

[48]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45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15页。

[49] 《党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信》，1933年3月15日，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77页。

[5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49~1050页。

[51] 参见《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开辟新根据地给鄂豫皖分局的指示》，1931年11月27日，载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25~226页。

[5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71~1072页。

[5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27～228页。

[5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49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31页。

[55]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232～233页。

[56] 《鄂豫皖省委关于第四次围剿及日后斗争给党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77页。

[57] 《党中央给鄂豫皖区省委的信》，1933年3月15日，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77页。

[58] 参见皮明麻：《三进洪湖》，载《回忆贺龙》，2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59]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2期合刊，10页。

[60] 参见皮明麻：《三进洪湖》，载《回忆贺龙》，291～292页。

[61] 参见王苗生：《丧失湘鄂西根据地原因研究》，载《中国现代史》，1983（9），117页。

[62] 参见许光达等：《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载《人民日报》，1962-02-01。

[63]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23～25页。

[64] 参见许光达等：《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载《人民日报》，1962-02-01。

[65] 参见李国良：《贺老总啊，洪湖赤卫队战士怀念您》，载《回忆贺龙》，247页。

[66] 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266页。

[67]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27页。

[68] 李国良：《贺老总啊，洪湖赤卫队战士怀念您》，载《回忆贺龙》，250页。

[69] 参见《致全体中国军人的公开信》，载《黔山红迹》，255

页，贵阳，1980。

[70]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61、163、164页。

[71] 参见中央军委：《关于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1932年1月10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78~182页。

[72] 参见马昆：《我在蒋军中守卫赣州的个人经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5卷，141~148页。作者当时是守赣州国民党军首要官长。

[73] 参见林彪、聂荣臻：《龙源、漳州之战详情汇报》，1932年4月1日至30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86~191页；另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18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74] 参见黄少群：《宁都会议时间考》，载《党史研究资料》，1984（1），69页。

[75] 同上。

[76]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77~578页。

[77] 有关1933年1月30日周恩来代表红军总司令部致党中央的电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62页。

[78] 参见孙瑞克：《回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159页。

[79] 参见同上书，160~166页。另见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和红五军团董振堂、朱瑞关于黄陂战役的军事报告，1933年2月28日至3月1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213~236页。

[80]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卷，190页。

第四章 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1]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505页。实际上，这一口号在第四次围剿时已经提出，而在第五次围剿时加以完善的。

[2] 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559～560页。

[3]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605～609、620～630页。

[4] 参见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1956, pp. 91～99.

[5]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605～609、620～630页；李守孔：《国民革命史》，559～560页。

[6] 参见杨伯韬：《蒋军第五次围剿简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183页。

[7] 参见《第五次反围剿中敌方情况资料》，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325～326页。

[8] 参见 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p. 79.

[9] 参见戴岳：《我向蒋介石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5卷，171～181页。

[10] 同上。

[11] 参见《文献和研究》，1984（6），20～21页。根据国民党方面在当时的统计数字，截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蒋军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共修建了14 294个碉堡。

[12]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596～602页。

[13] 同上。

[14] 罗明：《对我们工作的几点建议》，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2月，275页。此引文出自罗明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上杭、永汀两县现状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对此张闻天在《什么是罗明路线？》一文中做了大量引述，载《斗争》，1933-02-18。

[15] 张闻天：《什么是罗明路线？》，载《斗争》，1933-02-18。

[16] 参见罗明：《回顾反罗明路线》，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2月，246～253页。罗明回忆说：“实际上我怎敢反对主力红军的扩红运动，我只不过是要求中心区域和边沿区域的政策应该

有所不同罢了。”

[17] 参见张闻天：《什么是罗明路线？》；另见博古：《支持党的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载《斗争》，1933-02-23。

[18]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383~397页。

[19] 同上。另见 Kitada Sadao：《江西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载《亚洲研究》（日文），第23卷，1973（1），47页。

[20] 参见 Trygve Lotveit, *Chinese Communism, 1931—1934*, pp. 154~179; 郭华伦：《中共史论》，409~419页；Mori Kazuko：《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开展查田运动的原因探微》，载《亚洲研究》（日文），第19卷，1973（4），60~70页。

[2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与我党任务的决议》，载《斗争》，1933-08-12。

[22] 参见《红一方面军作战计划》，1933年10月14日，载《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287~291页；该作战计划要求“在敌人完成进攻部署以前，为截断一路敌军并与赣西北红军实行联合，我们应出其不意，在建宁、太宁、黎川一带迅速出击，歼灭敌军，并夺取这一地区”。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份文件是由“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代理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联名签署的，表示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似乎仍然维持着红军总政委的名义。

[23]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53页。

[24] 参见龚楚：《我与红军》，392~397页。

[25]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82~183页。

[26] 参见《抗日反蒋初步协定》，1933年10月26日，载《红色中华》，1934-02-14。

[27]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注意：毛泽东的提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应当是1933年12月。

[28] Otto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translated by Jeane Moore, Stanford, 1982), p. 62.

[29] 例如,《中共中央关于福建事变的第二次声明》,1934年1月26日,载《红色中华》,1934年1月;又载《斗争》,1934年2月。

[30] 参见蔡廷锴:《蔡廷锴自传》,31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1]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49.

[32]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4年1月18日,载《斗争》,1934-02-16。

[33] Waller, *The Kiang 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 pp. 84~85.

[34] Braun, *A G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54. 李德回忆说,多数来宾未能到场,会议礼堂只能容纳几百人。

[35]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190页。

[36] Waller,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 pp. 84~98.

[37]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105~10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另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192~193页。

[38]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33, p. 46. 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瑞金,同年12月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李德说:“在此以前,前敌司令部行动自作主张。”

[39]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88页。

[40] 参见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崩溃,1931—1934》,549~551页。

[41]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00页。

[42]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89~190页。

[43]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69.

[44] 参见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解放军报》，1981-07-26。

[4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组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声明》，1934年7月15日，载《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46]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74.

[47] 张义：《北上抗日先遣队始末》，载《中国现代史》，1983（1），110页。

[48] 参见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解放军报》，1981-07-26。

[49] 参见张义：《北上抗日先遣队始末》，载《中国现代史》，1983（1），110页。

[50] 参见史尊飞等：《方志敏与赣西北苏维埃》，载《中国现代史》，1983（1），224~225页。另见《方志敏传》，212~21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1]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04页。“不详”者应为胡天桃。——译者注

[52] 参见史尊飞等：《方志敏与赣西北苏维埃》，载《中国现代史》，1983（1），227、228页。

[53] 同上。

[54] 参见王耀武：《我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作战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61年12月，190~191页。

[55] 参见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传》，241~242页。

[56] 参见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7] 王耀武：《我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作战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203页。

[58]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99页。

[59] 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6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60] 李觉：《何键部阻截红军长征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64页。

[61] 参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建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1934年7月23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57~6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62] 参见萧克：《回忆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0（1），66页。

[63]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10页。

[64] 参见萧克：《回忆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0（1），66~68页。

[65] 参见李觉：《何键部阻截红军长征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66~67页。

[66] 《中央军委就红六军团今后行动与任务给六军团的信》，1934年9月8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61~63页。

[67] 参见李觉：《何键部阻截红军长征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66~67页。

[68] 参见萧克：《回忆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0（1），673~674页；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63页。

[69] 参见李觉：《何键部阻截红军长征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68页。

[70] 参见《中央军委给红六军团的指示》，1934年10月4日，载《黔山红迹》，43页。

[71] 参见《任、肖、王关于甘溪之战致中央军委电》，1934年10月10日，载《黔山红迹》，43页。

[72] 参见《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致党中央电》，1934年10月25日，载《黔山红迹》，44~45页。

[73]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469~471页；龚楚：

《我与红军》，537～544 页。

[74] 参见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 1 卷，350 页。

[75]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76.

[76] 参见林彪：《论短促突击》；彭德怀：《给某师师长的信》。林、彭两文分别载 1934 年 6 月 17 日和 1934 年 8 月 14 日的《革命与战争》。

[77]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76.

[78] 周恩来：《新形势下的新胜利》，1934 年 8 月 18 日，载《红星》，1934 年 8 月 20 日。

[79]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76.

[80] 参见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 年 9 月 26 日，载《红色中华》，1934 年 9 月 29 日。

[81]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78.

[82] 盛忠亮（原名盛岳）是上海中共中央局书记。他于 1934 年 10 月初被捕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地下无线电台全部被破获，因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中断。参见沈一芹：《上海中央局 1933 年形成的某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1（1），170 页。

[83] 龚楚：《我与红军》，397 页。

[84] John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p. 263.

[85] *Poems of Mao Tse-tung*,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1960, P. 26.

[86] 参见《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载《红色中华》，1934 年 8 月 1 日。

[87] 参见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146～156 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88]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1975, p. 118.

[89]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70.

第五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1] Benjamin Yang, “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Quarterly*, June 1986.

[2] 参见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载《人民日报》，1985-01-17；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8.《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188页。

[3]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28～231页。

[4]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9, p. 148.

[5] 参见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1卷，5～6页（廉臣是陈云的化名）；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93～194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16～217页。

[6] 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10页。

[7] 参见蒋介石1934年12月12日的委任令和何键1934年12月14日的就职宣言，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7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8]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89～90.

[9] 参见蒋的电报《湖南、广西和贵州联合作战纲要》，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77～79页。

[10] 参见朱德：《给林、聂、彭、杨等人的命令》，11月25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79～80页。

[11]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21～222页。

[12] 参见《红一军团致军委电》，11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红一、三军团电》，12月1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85～87页。

[13]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21～222页。

[14]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90.

[15] 根据国共双方的战报，我估计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损失了1/3或20 000人。不妨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523～526、561～565页。

[16] 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11、14页。

[17]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34～235页。

[18] 参见蒋介石12月18日电令，以及薛岳12月26日回电，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84、85、86页。

[19]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92～93；另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1934年12月18日，载《黔山红迹》，218～219页。

[20]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641页。作者用“放虎归山”一词来形容红军1934年12月底在贵州的自由行动。

[21] 参见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62期，86页。

[22] 参见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载《文史资料选编》，第62期，97页。

[23]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载《黔山红迹》，223～224页。

[24] 同上。

[25]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13页；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81页。

[26] 参见《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的通令》，由总政治部代主

任李富春签署，载《黔山红迹》，235～236 页。

[27] 参见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82～284 页。

[28] Dieter Heizig, “Otto Braun’s Memoir and Mao’s Rise to Power”, in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71, p. 280.

[29] 这份电报放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展览厅内。

[30] 伍修权和吴吉清都回忆说，遵义会议经常是在深夜至凌晨召开。参见伍修权：《我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 2 月，171 页；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196～197 页。

[31] 邹爱国：《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载《瞭望周刊》，1984 年 3 月 5 日，41 页。作为共产党的正式说法，作者的名单里包括邓小平和伍修权两人。

[32]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99～104.

[33] 参见伍修权：《我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 2 月，173～174 页。

[34] 参见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199～200 页。作者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员。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曾派吴吉清去慰问病中的邓颖超，显然不完全是出自个人关怀而已。

[35]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95 页。

[36] 参见《黔军 1 月 17、18 日战报》，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528 页。

[37] 陈云手稿。

[38] 参见当时军委致各军团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 年 1 月，20～25 页。

[39] 参见《黔山红迹》，236～252 页；Jerome Ch'en 所翻译的该文献英文本见 1969 年 10 月 *China Quarterly*。郭华伦对此有独特的分析，见《“遵义会议决议”研究》，台北，无出版日期，9～10 页。

[40] 参见《黔山红迹》，266～268 页；我所翻译的该文献英文

本见 *China Quarterly*, 1986 年 6 月。

[41]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载《黔山红迹》，268 页。

[42] 同上。

[43]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45 年 4 月中共中央通过，载萧作良：《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第 2 卷，787～803 页。

[44] 《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载《黔山红迹》，237 页。

[45]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载《黔山红迹》，266 页。

[46] 陈云手稿同上引书。

[47] 同上。

[48]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81～83.

[49]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载《黔山红迹》，239 页。

[50]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2 版，第 1 卷，23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47～248 页。

[5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2 版，第 1 卷，236 页。

[53] 《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载《黔山红迹》，238～239 页。

[54] 两条军事路线对比源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5]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 2.

[56] 参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载《黔山红迹》，267 页。

[57]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13～214 页。

[58] 后来李德倒也曾改任其他领导职务，但是他的军事职权再也不能与第五次反围剿时相提并论了。

[59] 周恩来曾与李立三共事几年，但是1931年李受到王明和博古攻击时，周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得到了加强。

[60]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104.

[61]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载《黔山红迹》，260～262页。

[62] 同上。

[63] 参见1935年1月29、30和31日刘湘致蒋介石电，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99～100页。据称有2 000多名中央红军战士遇害或被俘。另参见《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载《文史资料》，第62期，114～118页。

[64] 参见陈云手稿：《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载《文献和研究》，1985（1），34页。

[65] 参见朱德、周恩来1935年2月10、17、18日致各军团指挥员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及其他人电报，载《文献和研究》，1985（1），35～36页。

[66] 参见王家烈3月5日给蒋介石的“自责电”，以及1935年3月6日蒋给王回的“安抚电”，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114页；魏鉴贤：《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载《文史资料选编》，第62卷，52～56页。

[67] 《军委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命令》，1935年3月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40页；《前敌司令部命令》，1935年3月5日，载《黔山红迹》，280页。

[68] 参见周浑元1935年3月13日电，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120页。

[69] 参见王家烈“自责电”，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19～26页。

[70]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56页。

[71]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114~116.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58~259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98~199页。

[72] 参见《中央军委关于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载《黔山红迹》，62页。

[73]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74]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60页。

[75]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121.

第六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123.

[2] 参见匡册吉：《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1），79页；另见《四川省情》（成都，1984年，6页）也有相似的描述。

[3] 参见《四川农村经济》，136页，上海，1936。

[4] 参见《四川动乱的研究》，载《民国以来四川动乱史料编辑》，第2卷，117页，香港，1977。

[5] Robert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Haven, 1973, p. 88.

[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 053~1 061、1 071~1 079页。

[7] 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2卷，764~767页。

[8]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p. 88~89；又见《川陕省组织法》和《怎样分配土地》，均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143、590页。

[9] 参见周开庆：《民国川史纪要》，501~502页，台北，1974。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 90.

[10] 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2卷，769～770页；周开庆：《民国川史纪要》，504～507页。两份资料日期略有不同，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报告延缓之故。

[11] 同注[9]。

[12] 参见程世才：《空山坝大捷》，载《苦难的历程》，第1卷，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22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13]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p. 90～91；另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2卷，780页。卡普在书中屡次提及 suiting 城，显然是达县之误，刘存厚的指挥部驻扎在此。

[14]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211～214页。

[15] 参见张国焘：《右派分子的基本错误》，载《干部必读》，1933年8月31日；《土地分配与苏维埃建设》，载《苏维埃》，1933年10月20日。

[16]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80～184页。

[17] 参见周开庆：《民国川史纪要》，523页；另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2卷，779页。

[18]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92页。

[19] 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2卷，792～793页；张才千：《粉碎敌人六路围攻》，载《苦难的历程》，第1卷，452～468页。

[20] 参见周开庆：《民国川史纪要》，536、544页。

[21] 参见张才千：《粉碎敌人六路围攻》，载《苦难的历程》，第1卷，448页。

[22] 参见周开庆：《民国川史纪要》，545页。

[23] 《军委渡江作战计划》，载《红军长征在贵州》，56页。

[24]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入川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文》，载《红军长征在贵州》，57页。

[25]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03～1104页；徐

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95～96页。

[26]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193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01页。

[27] 参见《苦难的历程》，243页。

[28] 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载《张国焘问题资料》，451页，成都，1982。

[29] 参见同上；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13～1114页。

[30] 《张国焘问题资料》，449页。

[31] 《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声明》，转引自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449页。

[3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02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95页。

[3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02页。

[34] 参见杨成武：《忆长征》，150～15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韩冬山：《攻占懋功与达维会师》，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50～51页；Harrison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 pp. 239～240.

[35] 参见韩冬山：《攻占懋功与达维会师》，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53～55页；杨成武：《忆长征》，152～153页。

[36] 《苦难的历程》，245页。

[37] 参见《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转引自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183页。

[38]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121.

[39] 《中央军委就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致红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载《党史资料》，第7辑，179页。

[40]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03页。

[41] 参见同上；Harrison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An Un-*

told Story, p. 240.

[4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21页。

[43] 参见上书，1123～1127页。

[44] 参见上书，1130～113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58页。

[45]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59页。

[46] 同上。

[47]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 13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34页。

[48]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8日，载《党史资料》，第7辑，180页。从文件所注日期也可以看出决定是在会后起草的。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36页。

[49]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36页。

[50]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 95.

[51] 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557～559、570～572页；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p. 99～101.

[52] 参见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32页。

[53] 参见欧阳钦：《朱主席与我们在一起》，载《星火燎原》，第3集；Harrison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 pp. 312～313.

[54]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185页。

[55] 同上。

[56]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1页。

[57]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186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01页。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第3册，1156～1158页）提到的党和军队联席会议，很可能指的是芦花会

议。

[58]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36 页。

[59]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1 页。

[60]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64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1 159～1 160 页。

[61]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64～165 页。

[6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1 160～1 161 页。

[63]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载《党史资料》，第 7 辑，183～184 页。

[64] 同上书，185 页。

[65]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载《党史资料》，第 7 辑，186 页。

[66] 参见《苦难的历程》，247 页。

[67]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36～237 页。有些资料称红三十三军被解散，并入了红五军（原红五军团）。

[68]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01 页；伍云甫：《长征日记选》，载《文史资料》，第 72 期，34～35 页。

[69] 参见伍云甫：《长征日记选》，载《文史资料》，第 72 期，34～35 页。作者当时是红军总司令部三局政委，负责通讯联络。

[70]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68 页。

[71] 参见《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 年 8 月 20 日，载《党史资料》，第 7 辑，187～188 页。

[72] 同上。

[73] 参见《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1935 年 6 月至 9 月，载《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281～296 页。

[74]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01 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84 页。

[75] 参见程世才：《空山坝大捷》，载《苦难的历程》，123～

129 页；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318～320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3 册，63 页；另见《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1935 年 6 月至 9 月，载《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281～296 页。

[76] 参见姜新立：《张国焘的彷徨与觉醒》，311 页，台北，1981。

[77] 《红军司令部致右路军电》，1935 年 9 月 3 日，引自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8 页。

[78]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9 页。

[79] 参见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有何区别》，1937 年 2 月 27 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34～35 页。凯丰，即何克全，拿出以前反毛泽东的热情现在又反张国焘了。

[80] 《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致张国焘电》，1935 年 9 月 9 日，载《党史资料》，第 7 辑，189 页。

[81]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72 页。

[82] 《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再致张国焘电》，1935 年 9 月 11 日，载《党史资料》，第 7 辑，190 页。

[83] 参见阎捷三：《捉放李特的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72 辑，160～163 页。作者回忆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过这样的话：“捆绑不成夫妻，一家人不打一家人。愿意北上的立即北上，愿意留下的就留下。”

[84]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载《人民日报》，1977-09-19。

第七章 落脚陕北

[1]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03 页。

[2] 参见杨定华：《爬雪山过草地》，载《红军长征集》，第一分册，314～316 页。

[3]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432;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 p. 272.

[4] 参见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34～35页；另见《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1898—1949》，159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5]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74页。

[6] 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有何区别》，载《张国焘问题资料》，35页。

[7] 《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191页。

[8] 参见同上。另见俄界会议记录，转引自王治新：《关于长征归宿问题的讨论》，载《党史通讯》，1984（12），39页。

[9] 俄界会议记录，转引自王治新：《关于长征归宿问题的讨论》，载《党史通讯》，1984（12），39页。

[10] 参见俄界会议记录，转引自王治新：《关于长征归宿问题的讨论》，载《党史通讯》，1984（12），39页。

[11] 参见张觉僧：《鲁大昌部在腊子口的溃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191～192页；杨成武：《忆长征》，206～208页。

[12] 参见杨成武：《忆长征》，207～219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88～289页。

[13]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39～240页。

[14]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90页。

[15] 同上。

[16] 参见《于学忠等人的任命通告》，载《大公报》，1935-06-07。

[17] 榜罗镇会议记录，转引自王治新：《关于长征归宿问题的讨论》，载《党史通讯》，1984（12），43页。

[18] 聂荣臻认为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时间是1935年10月18日，但是《红军长征集》附录记载为1935年10月21日。参见聂荣

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93页；下册，439页。

[19] 《毛泽东诗集》，英文本，38～39页。

[2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039页。

[21] 参见胡华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辑，227～23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22] 参见马玉卿：《红军长征中的七次会师》，15～16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23] 参进程子华：《努力为党掌握军事力量》，载《红旗》，1978（8）；Harrison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An Untold Story*, pp. 291～292。

[24] 参见徐海东：《我的自述》，3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5] 参见张林：《徐海东将军传》，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

[26] 参见徐海东：《我的自述》，36～38页。

[27] 徐海东：《我的自述》，36～38页。

[28] [29] 参见马玉卿：《红军长征中的七次会师》，20～21页。

[30]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55～25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31]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55～256页。

[3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06页。

[33] 参见吴天伟：《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上的转折点》，22页，密歇根大学，1976；吴治平：《川陕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回忆》，载《革命史资料》，1981（3），134页。

[34]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190～191页。

[35]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02～206、221～222页。

[36]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28～232页。

[37] 参见上书，243～244页；李赤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三

次反围剿》，载《革命回忆录》，第五辑，86～93页。

[38]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48～249页。

[39] 参见上书，250～252；另见李赤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载《革命回忆录》，第五辑，94～123页。

[40] 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50～252页。

[41] 参见李赤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载《革命回忆录》，第五辑，124～125页；贺晋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运动实录》，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32页；沈叔明等：《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205～206页。

[42] 贺晋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运动实录》，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33～37页。

[43] 参见马玉卿：《红军长征中的七次会师》，27页；李赤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载《革命回忆录》，第五辑，126页。

[44] 参见周祖尧：《东北军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195～199页；贺晋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运动实录》，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38～41页。

[45] 参见贺晋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运动实录》，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42页；李赤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载《革命回忆录》，第五辑，130页。

[46]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96～97页。

[47]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10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48] 徐海东：《我的自述》，104～105页。

[49] 张林：《徐海东将军传》，345页。

[50]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42～248页。

[51]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册，296～300页；徐海东：《我的自述》，108～109页；沈叔明等：《东北军一〇九师直

罗镇被歼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209～214页。

[52] 张浩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的化名。

[53] 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52～53页；《中共党史稿》，第2册，225页；《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79页。

[54]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79～180页。

[55]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734～7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6] [57]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734～745页。

[58]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734～745页。

[59] 《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辑，288～289页。

[60] 同上。

[61] 同上。

[62]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3] G. M. Leibzon and K. K. Shirinia, *Povorot v politike komiternia* (《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 Moscow, 1975, p. 288.

[64] 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51～52页；郑玉岩：《回忆刘长胜同志》，载《上海文史资料》，第10册，68～69页，上海，1982；胡华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辑，359～360页。

[65]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233页。

[66] 参见上书，234页。

[67] 郭华伦似乎将《东征宣言》误认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开国民大会抵抗日本、保卫中国的宣言》，后者1936年2月21日发布。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53页。

[68]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11~214页。

[69]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308~309页。

[70] 同上。

[71]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314~316页；李赤然：《东征西征中的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58页。

[72]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14~215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316~322页。

[73] 同上；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188~190页。

第八章 红军大会师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72页。

[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72~1173页；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载《红旗飘飘》，第21辑，18~19页；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pp. 138~139；[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330~331页。

[3] 参见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载《红旗飘飘》，第21辑，18~19页；王维舟：《我的回忆》，载《革命回忆录》，第1册，119~120页；伍云甫：《长征日记选》，载《文史资料》，第72期，39页。

[4] 参见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载《红旗飘飘》，第21辑，18~19页。

[5] 参见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有何区别》，载《张国焘问题资料》，31页。

[6]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0页；《苦难的历程》，250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82页。

[7]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76～1178页。

[8]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0页；这是惟一我所见到的不完全的记述。

[9]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51～255页。

[10]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167～168页；另见《苦难的历程》，251～252页。

[11] 同上。

[12] 参见《重庆司令部关于追击长征红军的报告》，载《国民党档案》，326～328页。

[13] 《中共党史资料》，第7册，187页。

[1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82页。

[15] 参见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40～41页。

[16] 参见《川军和中央军关于反攻名、雅、天、芦、宝等县的电报》，载《国民党档案》，341～350页。

[17] 参见《苦难的历程》，253～254页。

[18] 郑维山：《踏上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载《星火燎原》，北京，1982年，选编之三，383～384页。红四方面军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在国民党军事报告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参见《国民党档案》，354页。

[1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92～1194页。

[20] 参见上书，545页、1192页。

[21]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1页。

[22]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载《中共党史研究文选》，第2册，80～81页，长沙，1983。

[23]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148页。

[24] 参见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679～689页。

[25] 《渡江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载《红军长征在贵州》，53～55页。

[26] 《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局粉碎湘鄂黔围剿给

二、六军团的指示》，1935年2月1日，载《黔山红迹》，265页。

[27] 参见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679～689页。

[28] 参见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679～689页。

[29] 参见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41页。

[30] 参见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写于1936年7月，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5页。

[31]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5页。

[32] 转引自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6页。请注意，通观任弼时报告，他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指由张国焘控制的红军总司令部。

[33] 参见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692页。

[34] 参见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6～237页；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4～35页。

[35] 参见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7～238页。

[36] 红二、六军团给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936年3月27日发于盘江，转引自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7～238页。

[37] 红二、六军团给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936年3月29日发于盘江，转引自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9页。

[38]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4～35页。

[39] 军事委员会给红二、六军团的电报，1936年3月30日发，转引自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9页。

[40] 参见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698页；任弼

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9～240页。

[41] 参见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刻》，698页；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39～240页。

[42] 参见任弼时：《长征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界到西康东北部的经过简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41页。

[43] 《五月五日纪念大会上张国焘同志的讲话》，载《干部手册》，1936年5月16日；另见《张国焘问题资料》，572页。

[4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197页。

[45] 参见上书，1147～1149页。

[46] 参见张国焘：《论国民革命的高涨和党的战略与策略的报告》，1936年1月28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486页；张国焘：《四川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全省会议上张国焘同志的报告》，1936年1月18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462页。

[47] 参见张国焘：《论高潮的报告》，载《张国焘问题资料》，513页。

[48] 张国焘：《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1936年4月1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540页。

[49] [50] [51] [52] 张国焘：《在中央重点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6月6日，载《张国焘问题资料》，581～584页。

[53] 参见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载《解放军报》，1977-07-2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05页。张国焘回忆说：“从前的教训（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师和分裂）记忆犹新，这次我们很谨慎”。

[54]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6页；左奇：《论长征》，载《文史资料》，第92辑，94页。

[55] 参见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48～249页。

[56] 参见同上；另见《苦难的历程》，257页。

[57] 参见左奇：《论长征》，载《文史资料》，第92辑，94页；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载《红旗飘飘》，第21辑，18～19页。

[58] 参见上书，95页；《苦难的历程》，257页。

[59]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251～255页。王健英把王震包括在西北局，我认为可能是有问题。

[60] 张子意：《长征日记》，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3），480页。按字面含义，汉语的“腐尸”概指恶臭的尸体，听起来更像是人而非动物尸体。

[61] 参见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有何区别》，55页。在一封给张浩的电报当中，张国焘甚至提出一个问题：“浩兄，你能自由给我发电报吗？”这显然是担心张浩受毛泽东控制。

[62]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7页；张子意：《长征日记》，487～493页。

[6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14～1215页。

[64] 这封电报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展出。

[65] [66] 参见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62卷，41页；周开勤：《民国川史纪要》，510～512页，台北，1974。

[67]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37页。

[68]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329～330页。显然聂荣臻在此抱怨二、四方面军不积极作战，而且不便指出其指挥员的名字。

[69]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17～218页。

[70]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19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117～118页。

第九章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1] 参见《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1936年10月10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62页。

[2] 参见张国维：《蒋介石洛阳庆寿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

辑》，第18辑，163～165页，1963。

[3] 关于毛泽东勤奋的工作作风和全面负责党军事务的情况，请参见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72, 以及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3册，1236页。关于基督教信条与资本主义习俗之间的相互影响，参见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58, 尤其是“路德的神职概念”一章，79～92页。

[4]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册，746页。

[5] 参见《毛泽东、彭德怀致张学良、王以哲电》，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41页；另见宋恩夫：《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一次历史性会谈》，载《历史知识》，北京，1985（1），1～3页。

[6] 宋恩夫：《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一次历史性会谈》，载《历史知识》，北京，1985（1），1～3页。

[7]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44～53页。

[8]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44～53页。

[9] [10] 同上；另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321页。聂荣臻回忆了他们是如何一边与东北军打仗，一边又与他们交朋友的有关情况。他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说法来形容共产党的战略。

[11]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10月5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73页。

[12] 参见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3] 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46页。

[14] 参见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30页；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p. 69.

[15] 参见《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另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69~270页；另见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p. 72~73.

[16] 参见《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2月12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131页。

[17]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169页。

[18] 参见《中央书记处致北方局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19] 《中央致北方局电》，1936年12月14日。

[20] 参见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

[21] 参见1936年12月17日《真理报》社论。

[22] 参见蒋晓涛：《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外交反映》，载《历史知识》，1985（1），19~21页。

[23] A. M. Grigoriev and A. B. Reznikov, “Geogry Dimitrov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in *Geogry Dimitrov, voshichi meshdunarodnovo komunichiskovo dvishrenia* (Moscow, 1972), p. 394.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24] 参见方德天：《张学良与西安事变》，112~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参见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47页。关于中共在西安事变最初几天的立场变化，请参考12月16、17日两天的《解放日报》评论，题目分别是：“双十二事件爆发后南京政府异常狼狽”、“停止一切内战”。

[26]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p. 156~178.

[27] 参见《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1937年1月

7 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 1 辑，168～169 页。

[28] 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71 页)，中共于 1936 年下半年在西安市周围 21 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 1 350 人。

[2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1214 页。张本人承认，红四方面军决定派他去陕北与党中央谈判，陈昌浩留在军中作军事后盾。

[30] 中央军委电：《十月份作战计划》，1936 年 10 月 11 日，转引自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 (5)，27～30 页。

[31] 参见上书。

[32] 张亦民：《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 (1)，61 页。

[33] 中央军委 10 月 25 日电，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6 页；另见张亦民：《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 (1)，61 页。

[34] 中央军委 10 月 26 日电，转引自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 (5)，28 页。

[35] 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载《党史研究》，1982 (1)，67 页。

[36]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1 215～1 216 页。

[37] 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16～217 页。

[38] 《红军司令部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 年 11 月 5 日，转引自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 (5)，29 页。

[3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新的作战计划》，1936 年 11 月 8 日；另见《张、周、博、林、朱、张、彭、贺、任电》，1936 年 11 月 10 日，转引自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9 页；另见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 (5)，30 页；另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58 页。

[40] 参见陈一贵：《古浪激战》，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265～269页；另见张亦民：《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1），63页。

[41] 参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12～14页，沈阳，东风出版社，1959；李兴国：《血洒西征路》，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256页。

[42] 参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12～14页。

[43] 参见马步青：《决战河西走廊》，载《今日大陆》，台北，第46期，1961年10月。

[44] 参见董汉和：《董振堂》，132～137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45]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3卷，19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204页。

[46] 参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29～54页；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65页。

[47] 参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55～70页；周春林：《我们的政委李先念》，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281～284页。

[48] 参见李兴国：《血洒西征路》，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96～100页；李天环：《走出祁连山》，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444～448页。

[49] 参见青海省政协：《马家军在青海的兴亡》，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1962，159～161页。

[50]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186～193页。

[51]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59～1265页。

[52] 同上。

[53] 参见李海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载《瞭望周刊》，1984（45），36～37页。

[54] 邓文仪：《从军报国记》，261页，台北，中正出版社，1979。

[55] 参见李海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载《瞭望周

刊》，1984（45），36～37页。

[56]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237页。

[57] 李海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载《瞭望周刊》，1984（45），36～37页。

[58]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166页。

[59] 参见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1936年12月25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72～73页。

[6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236～237页。

[61] [62]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年2月15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236～237页。

[63] [64]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259～261页；王沛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94～10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65] [66] 参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稿》，第2卷，259～261页；王沛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94～100页；康泽：《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纪实》，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20～21页；周恩来：《论统一战线》，载《周恩来选集》，上卷，195页。

[67] 参见周恩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76～78页。

[68]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p. 33.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 48; 李守孔：《国民革命史》，570页；王沛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72～73页；尤其是吴湘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卷，361～370页，台北，1974。

[69] 康泽：《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纪实》，载《文史资料选

辑》，第71辑，21～22页。

[70] 参见王沛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101页。

[71]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200～205页；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96页；以及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231～233页。

[72]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200～205页；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96页；以及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231～233页。

[73]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编红军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1937年8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增订本第5卷，101～102页，东京，1984；另参见王沛：《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130～13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240～241页。

[74] 参见王沛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134～137页。

[75] 关于日本人的突然入侵和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请参见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pp. 33～35；王沛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107～112页。

[76]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册，350～355页。

[77]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1937年9月21日），载《人民日报》，1981-07-07。

[78] 毛泽东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1937年9月25日），载《人民日报》，1981-07-07。

[79] 周恩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1937年11月13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80页。

[80]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206～213页。

[81] 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251～263页。

[82] 共产党的部队从1937年8月份的4万人增加到1938年的9万人。这种成功使得任何人包括王明在内都无法改变毛泽东的领

导路线。

[83] 参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19日—11月6日》，载《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214~220页。

第十章 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1]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1966, vol. 2, 最后一章。

[2] G. W. F. Hegel, *System der Philosophie. Erster Teil. Die Logik*, Stuttgart, 1929,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这里，黑格尔引用了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真理是它自身的标准，同时又是辨别错误的标准。

[3] 指十月革命。——译者注

[4] 参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7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指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向中国政治的转变。

[5] 参见《中央关于重庆谈判的通知》，载《重庆谈判纪实》，15页，重庆，1983；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的谈话》，载《重庆谈判纪实》，300页；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260~261页；以及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载《周恩来选集》，上卷，314页。

[6] 参见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02~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57, pp. 1~27. 革命有许多种，如工业革命、文化革命、科技革命、生态革命、宇宙革命，甚至女人发型的变化也可享用革命的美称。

[8] 狭义的革命与政治，不少人曾用各种不同的言辞来表达以上同一个意思。参见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谁人在何时以何

方式得到什么》，5～10页，纽约，1936。拉斯韦尔这本书很有名气，但即使就其标题定义而言，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浅显实用。

不妨在此简要说明我个人的有关认识。个人和个人构成家庭，家庭以精神为纽带；家庭和家庭构成社会，社会以经济为纽带；社会和社会构成国家，国家以政治为纽带；国家和国家构成人类世界，人类又以精神为主要活动。经济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类外部关系；政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类内部关系；精神是人和自然界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综合关系，或者说是人类外部和内部的综合关系。国家是政治的一部分，又是政治的集中表现，于是有政治的广义和狭义之分。

[9] Shanti Swarup,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pp. 73～105.

[10] Hugh Seton-Watson, *Neither War Nor Peace*, New York, 1960, pp. 188～193.

[11] Lucian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1976, pp. 36～37; Stuart Schram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London, 1963, pp. 81～84.

[12]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80, vol. 1, Introduction.

[13] 关于中国最近的改革，基本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乐观肯定；一种是冷嘲热讽，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不管是好是坏，中国正面临又一个政治革命而不只是经济建设的时代。

[14] Franz Bokrenau, *World Communism*, Ann Arbor, 1962, p. 376, p. 418.

[15] Ibid.

[16] Hugh Seton-Watson,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 New York, 1960, pp. 210～227.

[17] Hugh Seton-Watson,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 New York, 1960, pp. 291～301.

附录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

[1] [美]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24 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2] [美]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 页（译者序），17、25 页。

[3]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 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4] 参见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70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5] 其中译本为：《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6] 《伟大的长征》，740 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7] [美]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34、35 页。

[8] [美] 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顿：《埃德加·斯诺传》66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9] [美]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49 页。

[10] [美]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23 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11] Lyman P. 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1968.

[12]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80~181 页。

[13] 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London, 瓦伊出版社。

[14] 参见《毛泽东》，151 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15] Charlotte Y. Salisbury, *Long March Diary: China Epic*,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1986, 其中译本为：《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16] Jean Fritz, *China's Long March: 6 000 Miles of Danger*,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8.

[17]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81页。

[18] Stephen Uhalley J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p. 49.

[19] *The China Quarterly*, 1986, No. 106, p. 260.

[20] Benjamin Yang,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21] Benjamin Yang,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 xiii, back flap, p. 6~7, 31.

[22] 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rom the 1800s to the 198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70.

[23]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24]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 35. 请参见中译本：《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索引

(所注页码均为英文原书页码, 即本书边码)

A

- 阿坝会议 Aba Conference, 191—192, 193
-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261, 262
-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张闻天) “All for the Defense of the Soviet”
(Zhang Wentian), 96
- 肃反运动 Anti-counterrevolutionary campaign, 180—181
- 抗日阵线 Anti-Japanese front, 181—186, 190, 207—208, 221, 224,
239, 249, 266; 见中日战争 See also Japan, war with
- 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 Anti-Japanese Vanguard Arm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87—188
- 抗日先遣队 Anti-Japanese Vanguard Brigade, 82—88, 89, 98, 118—
119, 172, 173, 254
- 反罗明路线 “Anti-Luo Ming line,” 71, 72—73, 280 (n20)
- 阿基诺 Aquino, Corazon, 269 (n1)
- 八二九事件 August 29 Incident, 223
- 秋收起义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17, 18, 21, 26—27, 29

B

- 白崇禧 Bai Chongxi, 90, 104
- 百色起义 Baise Uprising, 20
- 榜罗镇会议 Bangluozhen Conference, 169
- 保甲 Baojia, 69
- 包座战役 Baozuo Battle, 163
- 巴西会议 Baxi Conference, 159

边水战役 Bianshui Battle, 203

兵变 Bingbian, 176—177

堡垒主义 Blockhouse policy, 70—71, 80, 81, 117, 279—280 (n12)

博古 Bo Gu, 48, 50, 51, 65, 68, 71, 72, 74, 75—77, 77 (表格),
79, 81, 94, 95—96, 99, 104, 109 (表格), 110, 111, 113, 114,
115—119, 120, 123, 125, 127, 129, 132, 144, 148, 151, 159,
181, 182, 185, 188, 192, 193, 208, 227, 240, 256, 281 (n21),
282 (n40), 288 (n65)

李德 (奥托·布朗) Braun, Otto, 76, 80, 82, 94—95, 98, 99, 101,
104, 105, 106, 109 (表格), 110, 111, 116, 120, 123, 124, 129,
141, 144, 148, 160, 166, 288 (n64)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方志敏), “A Brief Account of My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Fang Zhimin), 88

布哈林 Bukharin, Nikolai, 32

保加利亚 Bulgaria, 268

C

蔡和森 Cai Hesen, 32

蔡申熙 Cai Shenxi, 55, 56

蔡树藩 Cai Shufan, 168 (表格)

蔡廷锴 Cai Tingkai, 70, 73—74, 76, 281

广州公社 Canton commune, 18

广州起义 Canton Uprising, 21

中国共产党 CCP. Se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齐奥塞斯库 Ceausescu, Nicolai, 268

中央红军 (CRA) Central Red Army (CRA), 2, 3, 9, 30, 64, 128,
129, 143, 144, 145, 147—148, 149, 151—154, 156, 160, 161,
165, 175, 191, 192, 196, 207, 209, 211, 213, 215, 217, 229,
230, 231—232, 234—235, 287—288 (n56), 292 (n56), 295 (n5);
东征 Eastern Expedition, 181—189, 298 (n82); 华北定居 North
China settlement, 162—190; See also 陕甘支队 Shaanxi Gansu Branch
Brigade; 苏区中央局 Central Soviet Bureau, 49—50, 77

张国焘 Chang Kuo tao. See Zhang Guotao

- 陈志让 Chen, Jerome, 105
- 陈昌浩 Chen Changhao, 48, 51, 53, 57, 58, 135 (表格), 143, 148—149, 150 (表格), 151, 153 (表格), 154, 155, 156, 158—159, 163, 191, 193, 210, 212, 214 (表格), 215, 216, 228,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303 (n29)
- 陈诚 Chen Cheng, 65, 66, 69, 71, 89, 196, 201
- 陈独秀 Chen Duxiu, 14, 15, 272 (n12), 273 (n23)
- 陈公培 Chen Gongpei, 74
- 陈果夫 Chen Guofu, 238
- 陈海松 Chen Haisong, 150 (表格)
- 陈继承 Chen Jicheng, 55
- 陈济棠 Chen Jitang, 70, 74, 82, 90, 118, 216
- 陈铭枢 Chen Mingshu, 44, 73—74
- 陈渠珍 Chen Quzhen, 199, 200
- 陈然 Chen Ran, 94
- 陈绍禹, 见王明, Chen Shaoyu. See Wang Ming
- 陈时骥 Chen Shiji, 66
- 陈毅 Chen Yi, 36, 64, 101
- 陈云 Chen Yun, 77 (表格), 96, 108, 109 (表格), 111, 112, 115—116, 186, 234
- 程潜 Cheng Qian, 238
- 程世才 Cheng Shicai, 150 (表格)
- 程子华 Cheng Zihua, 172, 173, 175, 179, 180, 296 (n25)
- 谢尔潘诺夫 Cherepanov, Alexandr, 310 (n21)
- 蒋夫人 (宋美龄) Chiang (Madam), 219, 238
- 蒋冯阎战争 Chiang Feng Yan war, 253
- 蒋介石 Chiang Kai shek, 2, 13, 14, 25, 28, 35, 40, 54, 56, 59, 67, 69—70, 74, 85, 87, 90, 92, 127, 146, 156, 176, 178, 184, 188, 200, 216, 219, 235, 237, 238, 253, 257, 284 (n95); 中国共产党 CCP and, 240—242; 长征 Long March and, 103, 105, 106; 军事战略 military strategy, 45, 46, 70—71, 201; 东北军 Northeastern Army and, 220—228; 陕西战役 Shaanxi campaign, 196; 四川省 Sichuan province and, 134, 136, 146—147, 195; 中日战争 Sino-Jap-

- anese war and, 242, 244, 245, 250, 306 (n89); 苏联 Soviet Union and, 237; 围剿 suppression campaigns and, 41—67, 118
- 蒋桂战争 Chiang Li war, 28
- 秦邦宪 (博古) Chin Pang-hsien. See Bo Gu
- 中国共产党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 中央局 Central Bureau, 77; 第五次代表大会 Fifth Plenum, 7; 第四次代表大会 Fourth Plenum, 49, 76—77; 成长 growth of, 255—256, 307 (表格); 国共合作 KMT collaboration, 12—15, 22, 131, 237—242, 244—245, 253, 255, 257; 中央领导 leadership of, 21—22, 47, 48, 77 (表格), 79, 123—128, 296 (n38);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Mission to the Comintern, 182, 183, 209—210, 215, 237, 248; 西北局 Northwest Bureau, 215; 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of, 6—9; 第二次代表大会 Second Plenum, 32; 陕西委员会 Shaanxi Committee, 297 (n58); 第六次代表大会 Sixth Plenum, 31—32, 249; 西北特别委员会 Special Committee of Northwest China, 138; 第三次代表大会 Third Plenum, 33, 34; 参见党中央 See also Party Center
- 周恩来 Chou En-lai. See Zhou Enlai
- 朱德 Chu Teh. See Zhu De
- 全斗煥 Chun Doo Hwan, 269 (n1)
- 关门主义 “Closed-doorism,” 184—185
-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Combat Plan of Bingfan, Daqing, Gulang, and Liangzhou,” 232
- 渡江作战计划 “Combat Pl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215
- “绥崇丹懋战役计划” “Combat Plan of Sui Chong Dan Mao”, 194
- 红一方面军作战计划 “Combat Plan of the First Front Red Army”, 281 (n23)
-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Combat Plan of Tian Lu Min Ya Qing Da”, 194
- 十月作战计划 “Combat Project of October”, 229
- 共产国际 Comintern, 33—34, 47—48, 52, 78, 114, 141, 165, 182, 185, 186, 190, 207—208, 225, 235, 237, 240, 241, 249, 264, 266—267
- 共产主义运动 Communist movement, 1, 264—268

- 投降路线 Compromising line, 51
- 西北联邦政府 Confederate Government of Northwest China, 138, 140
-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阿坝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y Activists. See
Aba Conference
- 中央红军 CRA. See Central Red Army
-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262, 263
- “党的目前形势和任务”（博古） “Current Situations and Tasks of the
Party” (Bo Gu), 76
-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268

D

- 戴季英 Dai Jiying, 179, 180, 181
- 戴岳 Dai Yue, 70
- 远东局 Dalburo, 34
- “东征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Eastern Expedition”, 187
- 戴高乐 DeGaulle, Charles, 265
- 滕代远 Deng Daiyuan, 20, 28, 29（原文拼音似有误，应为 Teng
Daiyuan——译者）
- 邓发 Deng Fa, 77（表格），79, 109（表格），144, 151, 182, 186, 271
（n24）
- 邓文仪 Deng Wenyi, 237
- 邓小平 Deng Xiaoping, 20, 72, 109, 110, 144, 218, 263, 267, 280
（n20），305（n76），310（n23）
- 邓锡侯 Deng Xihou, 133, 134, 146, 290（表格）
- 邓子恢 Deng Zihui, 28, 72
- 季米特洛夫 Dimitrov, Gregory, 225, 309—310（n21）
- 威廉·唐纳 Donald, William, 238
- 董朗 Dong Lang, 18
- 董英斌 Dong Yingbin, 181, 186—187
- 董钊 Dong Zhao, 238
- 董振堂 Dong Zhentang, 102（表格），150（表格），230, 233
- 东江苏维埃 Dongjiang Soviet, 18, 40
- 东江起义 Dongjiang Uprising, 23

杜衡 Du Heng, 20, 177

段德昌 Duan Dechang, 59, 60, 61, 200

段祺瑞 Duan Qirui, 15

E

东征 Eastern Expedition, 188—189, 298 (n82)

八字方针 “Eight character policy”, 262

“取得伟大胜利的八个有利条件” “Eight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 Grand Victory”, 41—42

红八军团 8th Army Corps, 101, 105, 172

红八军 Eighth Red Army, 20

八路军 Eighth Route Army, 247, 249

俄界会议 Ejie Conference, 164—165, 168, 169, 192

欧洲共产主义 Eurocommunism, 264, 265, 266—267

鄂豫皖苏维埃 Eyuwan Soviet, 19, 35, 40, 46, 51—59, 66, 67, 117, 143, 171, 172, 178

F

费正清 Fairbank, John, 7

范开生 Fan Kaisheng, 17

樊崧甫 Fan Songfu, 203, 204, 216, 238

方志敏 Fang Zhimin, 18—19, 79, 85, 86 (表格), 86—88, 118, 119, 254, 282 (n40), 287 (n56)

法西斯主义 Fascism, 264. See also Japan

前敌指挥部 FCH. See Front Command Headquarters

冯玉祥 Feng Yuxiang, 13, 35, 40, 41, 176, 238

泮峪口会议 Fengyukou Conference, 175

红四方面军 FFA. See Fourth Front Army;

红十五军团 15th Army Corps, 170, 175, 180, 181

红五军团 5th Army Corps, 33, 101, 103, 105, 109, 110, 163, 192, 230, 295 (n5)

红五军 5th Red Army, 28, 29, 35, 38, 274 (n29)

红一军团 1st Army Corps, 30, 64, 80, 101, 103, 104, 108, 118,

- 119, 140, 160, 164, 181, 188, 191, 235, 295 (n5)
- 红一方面军 (见中央红军) First Front Army, See Central Red Army;
- 红一军 1st Red Army, 274 (n29)
- 五人小组 Five-Man Group, 166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262
- 红四方面军 Fourth Front Army (FFA), 9, 54, 55—57, 58, 62, 64, 116, 125, 127, 128, 130, 132—137, 140—141, 143, 144—145, 147—148, 149, 151—154, 156, 160, 163, 165, 171, 173, 174—175, 189, 190, 191, 192, 193, 196—197, 200, 102, 228, 229—230, 231, 235, 292 (n56), 295 (n5); 北进 northern march, 212—218; 南进 southern march, 197—198; 分裂 split by, 207—209
- 红四军 4th Red Army, 27—28, 29, 35, 36, 38, 49, 51, 53—54, 164, 192, 207, 274 (n29)
- 法国 France, 265, 267
- 前敌指挥部 Front Command Headquarters (FCH), 126
- 傅连暲 Fu, Nelson, 98
- 傅钟 Fu Cong, 212 (原文拼音似有误, 应为 Fu Zhong——译者)
- 符向一 Fu Xiangyi, 19
- 傅钟 Fu Zhong, 135 (表格), 151
- 福建人民政府 Fujian People's Government, 117
- 福建事变 Fujian Revolt, 49—50, 73—76, 117—118, 221, 227, 256, 281 (n25)
- 富田事变 Futian Incident, 49—50

G

- 甘泗淇 Gan Siqi, 91 (表格), 211, 214 (表格)
- 赣南会议 Gannan Conference, 7, 50
- 甘肃省 Gansu Province, 232
- 甘孜会议 Ganzi Conference, 212
- 高福源 Gao Fuyuan, 179, 187
- 高岗 Gao Gang, 175, 178, 179, 180, 181
- 高台战役 Gaotai Battle, 233
- “龚楚将军回忆录” General Gong Chu's Memoirs, 94

西北革命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Northwest,” 182

“红军总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Red Army”, 168

德国 Germany, 264, 266

公秉藩 Gong Bingfan, 42, 43—44

龚楚 Gong Chu, 8, 93, 94, 96—97, 98

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 Mikhail, 267, 269 (n1), 310 (n23)

英国 Great Britain, 238—239, 265, 266

“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 262

希腊 Greece, 266, 267

古柏 Gu Bo, 72, 280 (n20)

古大存 Gu Dacun, 18

顾顺章 Gu Shunzhang, 47

顾祝同 Gu Zhutong, 70, 82, 119, 196, 240

顾作霖 Gu Zuolin, 48, 49, 77 (表格)

关向应 Guan Xiangying, 59, 200, 212, 214 (表格), 215, 246 (表格)

邝继勋 Kuang Jixun, 134

广昌战役 Guangchang battles, 81—82, 94, 121

两广兵变 Guangxi Guangdong Revolt, 197, 198, 203—204, 213, 216, 223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26, 46, 148, 165, 247, 248, 250—251

郭洪涛 Guo Hongtao, 178, 179, 181, 182, 183, 204

古田会议 Gutian Conference, 36—37

H

郝梦龄 Hao Mengling, 45, 204

何长工 He Changgong, 102 (表格), 150 (表格), 193

何成睿 He Chengrui, 56, 60

贺国光 He Guoguang, 146

何桓国 He Zhuguo, 189

何健 He Jian, 38, 70, 90, 92, 103, 118, 119, 200

何克全 He Kequan, 77 (表格), 109 (表格), 111, 144, 151, 182

何立中 He Lizhong, 179

- 贺龙 He Long, 3, 19, 20, 21, 35, 45, 56, 59, 60—61, 62, 63,
92, 93, 106, 196, 198—206, 210, 211, 212, 213, 214 (表格),
215, 217, 218, 231, 246 (表格), 254, 272 (n13)
- 何孟雄 He Mengxiong, 47
- 何叔衡 He Shuheng, 72
- 何梅协定 He Utsumei Agreement, 141, 182
- 何畏 He Wei, 135 (table)
- 何应钦 He Yingqin, 43, 44, 65, 70
- 贺衷寒 He Zhonghan, 240
-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 Adolf, 264
- 虹桥机场事件 Hongqiao Airport Incident, 242
- 侯汉佑 Hou Hanyou, 286 (n27)
- 侯之担 Hou Zhidan, 107, 108
- 猴场会议 Houchang Conference, 107—108
- 萧作良 Hsiao Tso liang, 33
- 胡服 (见刘少奇) Hu Fu. See Liu Shaoqi
- 胡适 Hu Shih, 272 (n12)
- 胡宗南 Hu Zongnan, 137, 144—145, 146, 147, 148, 152, 154, 156,
163, 175, 193, 216, 217, 218, 223, 229, 230, 238
- 黄超 Huang Chao, 192, 193
- 黄公略 Huang Gonglue, 29, 35
- 黄新 Huang Xin, 102 (table)
- 华山会议 Huashan Conference, 172
- 惠子俊 Hui Zijun, 178
- 会理会议 Huili Conference, 128
- 湘鄂赣苏维埃 Hunan Hubei Jiangxi Soviet, 20
- 匈牙利 Hungary, 265

I

意大利 Italy, 265, 267

J

日本 Japan, 69, 260

354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共产党人 communists in, 265; 侵略 invasion by, 54, 59, 84, 167, 169, 182, 183—185, 208, 220—228, 241—242, 245, 248, 254, 255, 306 (n88); 战争 war with, 4, 5, 88, 130, 172, 241, 242—251, 254, 255, 257, 287—288 (n56), 306 (n88), 306—307 (n89), 307 (n90), 310 (n21)

见统一战线政策 See also United front policy

蒋鼎文 Jiang Dingwen, 70, 82

江口会议 Jiangkou Conference, 64

江西苏维埃 Jiangxi Soviet, 18—19, 26—31, 35, 40, 41, 46, 49, 52, 55, 58, 63—67, 87, 93—99, 115—119, 151, 171, 172, 254, 256

井岳秀 Jing Yuexiu, 178

乔莫尔·约翰逊 Johnson, Chalmers, 4

K

凯丰(何克全) Kai Feng. See He Kequan

康生 Kang Sheng, 77 (表格)

康泽 Kang Ze, 242

赫鲁晓夫 Khrushchev, Nikita, 269 (n1)

金日平 Kim, Ilpyong, 4, 5, 50

金日成 Kim Il Sung, 266, 268

北田定男 Kitada Sadao, 72

国民党 KMT. See Kuomintang

朝鲜 Korea, 266, 268, 269 (n1)

朝鲜战争 Korean, War, 261, 266

郭华伦 Kuo, Warren, 93—94

国民党 Kuomintang (KMT), 2, 5, 7, 13, 24; 国共合作 CCP collaboration, 12—15, 22, 131, 237—242, 244—245, 253, 255, 257; 中央军 Central Army, 25, 136, 155—156

毛泽东 Mao and, 6, 262; 军事派别 military factions, 272 (表格); 陕西委员会 Shaanxi Committee, 223; 围剿 See also Suppression campaigns

L

查田运动 Land Investigation Movement, 72—73, 281 (n21)

- 土地改革 Land reform, 23—26, 72—73, 132, 273 (n27)
- 崂山战役 Laoshan Battle, 179—180
- 腊子口战役 Lazikou Battle, 166—167
- 乐少英 Le Shaoying, 84
- 李抱冰 Li Baobing, 207
- 李达 Li Da, 91 (表格), 214 (表格)
- 李大钊 Li Dazhao, 14
- 李富春 Li Fuchun, 102 (table), 109 (表格), 144, 168 (表格)
- 李汉魂 Li Hanhun, 103
- 李觉 Li Jue, 89, 203, 204
- 李立三 Li Lisan, 32—39, 47, 51, 53, 253, 288 (n65)
- 李立三路线 Li Lisan line, 9, 29, 34, 35, 40, 41, 47, 49, 51—52, 63
- 李明 Li Ming, 66
- 李明瑞 Li Mingrui, 20
- 李铁 Li Tie, 159—160
- 李维汉 Li Weiham, 79, 102 (表格), 182
- 李文林 Li Wenlin, 28
- 李先念 Li Xiannian, 135 (表格), 141, 150 (表格), 193, 234
- 李卓然 Li Zhuoran, 109 (表格), 109—110, 193
- 李竹声 Li Zhusheng, 96
- 李宗仁 Li Zongren, 13, 28, 216
- 李卓然 Li Zuoran, 102 (表格), 212 (原文拼音似有误, 应为 Li Zhuo-ran——译者)
- 两河口会议 Lianghekou Conference, 140—146, 151, 292 (n46)
- 廖磊 Liao Lei, 91, 92
- 解放战争 Liberation War (1946—1949), 4
- 利比亚 Libya, 269 (n1)
- 林彪 Lin Biao, 37, 94, 102 (表格), 104, 106, 109 (表格), 122, 127, 128, 144, 146, 150 (表格), 151, 154, 156, 166, 168 (表格), 183, 193, 246 (表格), 289 (n81)
- 林伯渠 Lin Boqu, 79
- 林道文 Lin Daowen, 18

林育英 (张浩) Lin Yuying. See Zhang Hao

黎平会议 Liping Conference, 106

刘伯承 Liu Bocheng, 9, 48, 65, 102 (表格), 108, 109 (表格), 111, 124, 144, 149, 151, 153 (表格), 154, 163, 191, 193, 212, 214 (表格), 233, 246 (表格), 248, 271 (n24)

刘长胜 Liu Changsheng, 186

刘畴西 Liu Chouxi, 86 (表格), 87, 88

刘存厚 Liu Cunhou, 134, 136

刘茂恩 Liu Mao'en, 133

刘光瑜 Liu Guanyu, 136

刘建绪 Liu Jianxu, 90, 104

刘伯承 Liu Po cheng. See Liu Bocheng

刘少奇 Liu Shaoqi, 77 (表格), 109 (表格), 111, 127, 144, 182, 186, 248, 262, 288 (n65)

刘士奇 Liu Shiqi, 28

柳维元 Liu Wei yuan, 70

刘文辉 Liu Wenhui, 128, 131, 133, 134, 136, 156, 194, 290 (表格)

刘湘 Liu Xiang, 125, 131, 134, 136, 137, 195, 290 (表格)

刘英 Liu Ying, 84, 86 (表格), 87, 88

刘镇华 Liu Zhenhua, 56, 61

刘志丹 Liu Zhidan, 20, 167, 175, 177, 178, 179, 180, 181

六盘山 (毛泽东) "Liupan Mountain" (Mao), 170; 长征 Long March, 1—3, 7, 8, 89, 93—99, 100—107, 139 (fig), 185, 267

指挥纵队 Command Column, 104; 早期阶段 early phases, 121—123; 军事争议 military debates in, 121—123; 参与 participants in, 101, 102 (表格); 军队团结 army unity and, 114; 转移 as transition, 253—257

龙云 Long Yun, 91 (表格), 92

龙州起义 Longzhou Uprising, 20

陆定一 Lu Dingyi, 280 (n20)

鲁涤平 Lu Diping, 41, 42

吕振羽 Lu Zhenyu, 238

卢沟桥事件 Lugouqiao Incident, 242, 244, 305 (n71)

- 芦花会议 Luhua Conference, 149
- 罗炳辉 Luo Binghui, 102 (表格), 150 (表格), 209
- 罗林 Luo Lin, 41
- 罗明 Luo Ming, 71—73, 280 (n20)
- 罗明路线 Luo Ming line, 72
- 罗南辉 Luo Nanhui, 150 (表格)
- 罗荣渠 Luo Rongqu, 246 (表格)
- 罗少华 Luo Shaohua, 86 (表格)
- 洛川会议 Luochuan Conference, 244—245, 305 (n74)
- 罗坊会议 Luofang Conference, 41

M

- 马步芳 Ma Bufang, 231, 233, 234
- 马步青 Ma Buqing, 232, 233, 234
- 马鸿逵 Ma Hongkui, 61, 175, 179, 180, 189
- 马昆 Ma Kun, 64
- 清王朝 Qing Empire, 130
- 毛炳文 Mao Bingwen, 229
- 毛泽东 Mao Zedong, 2, 14, 20, 41, 48, 55, 72, 74, 75, 77 (表格), 84, 97—99, 112, 129, 141, 142, 143, 144, 151, 154—155, 160, 162, 163, 166, 168 (表格), 182, 202, 218, 238, 254, 257; 与博古的冲突 Bo Gu conflict, 79—80, 129—130; 福建事变 Fujian Revolt and, 75—76; 在江西苏维埃 in Jiangxi Soviet, 26—31, 49, 63—67, 96—97; 国民党 KMT and, 6, 262; 李立三路线 Li Lisan line and, 36—39; 长征 Long March and, 101, 106, 122; 军事策略 military strategy, 41—42, 44, 45, 46, 47, 104, 106, 117—118, 119, 120, 127, 145, 148, 155, 156, 165, 167—168, 169, 181, 188, 189, 193, 244, 247—248, 250; 南昌起义 Nanchang Uprising and, 17; 反对 opposition to, 192; 党中央 Party Center and, 149, 180, 281 (n25), 284 (n91); 政治危机 political critics, 192, 219—251; 政治思想 political thought, 6, 39, 161, 185—186, 188—189, 261—263; 权力巩固 power consolidation by, 9, 78—79, 219—251; 权力上升 rise to power, 4—7, 8—9, 21, 30, 38—39, 49, 50, 64,

119, 123—128, 163—164, 165, 181, 190, 271 (n25), 306 (n84);
 陕西运动 Shaanxi campaigns and, 180; 中日战争 Sino-Japanese War
 and, 244; 西安事变 Xi'an Incident and, 239; 徐海东 Xu Haidong
 and, 180—181; 与张国焘的矛盾 Zhang Guotao conflict, 129, 130,
 141, 142, 143, 146, 148, 152, 154, 159—160, 161, 164, 167,
 190, 193, 195—196, 207—108, 210, 228—229, 230, 234—236,
 299 (n2); 周恩来 Zhou Enlai and, 93, 99, 271 (n24); 朱德 Zhu De
 and, 17, 274 (n37), 299 (n2); 遵义会议 Zunyi Conference and,
 109 (表格), 110, 113, 114—115, 116, 122, 123, 124

毛泽覃 Mao Zetan, 72, 280 (n20)

毛儿盖会议 Maoergai Conference, 8, 154—155, 186

马科斯 Marcos, Ferdinand, 269 (n1)

卡尔·马克思 Marx, Karl, 264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Marxism-Leninism, 253, 256

五四运动 May Fourth Movement, 253

岷州会议 Minzhou Conference, 215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Mission to the Comintern, 182, 183, 209—210,
 215, 237, 248

蒙古 Mongolia, 268

木门会议 Mumen Conference, 134

N

南汉宸 Nan Hanchen, 187

南昌起义 Nanchang Uprising, 17—18, 21, 253, 254, 272 (n13)

南京政府 Nanjing Government, 224; 建立 establishment of, 13; 紧急治
 安法 martial law under, 47

军事体系 military system, 25; 弱点 weakness of, 13—14; 见蒋介石 See
 also Chiang Kai shek; 国民党 Kuomintang

国民革命同盟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lliance, 240, 241

国民党 Nationalist Party. See Kuomintang

国民革命军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Army, 244

东北军 NEA. See Northeastern Army

新文化运动 “New Cultural Movement”, 69, 253

“新形势下的新胜利”（周恩来） “A New Victory in a New Situation”,
(Zhou Enlai), 95

倪志亮 Ni Zhiliang, 135 (表格), 246 (表格)

尼加拉瓜 Nicaragua, 269 (nl)

聂荣臻 Nie Rongzhen, 102 (表格), 104, 105—106, 109 (表格), 111,
122, 127, 144, 150 (表格), 154, 156, 166, 167, 168 (表格),
193, 217—218, 245, 246 (表格)

聂为军 Nie Weijun, 179, 181

倪家营子战役 Nijiayingzi Battle, 234; 十九路军（福建事变）19th Route
Army. See Fujian Revolt 宁都会议 Ningdu Conference, 64, 126

宁都起义 Ningdu Revolt, 64

宁夏战役 Ningxia Campaign, 228—231, 236; 红九军团 9th Army
Corps, 101, 103, 109, 127, 163, 192, 230, 295 (n5)

牛元峰 Niu Yuanfeng, 182

东北军 Northeastern Army (NEA), 189, 220—228, 229

北伐 Northern Expedition, 12—13

北上先锋队 Northern Vanguard Brigade, 167

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 Northwest Office of the Soviet Republic, 181

西北军 Northwestern Army, 224, 226

O

十月计划 October Project, 229—230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 “On Tactics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Mao), 183, 18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 “On the Strategic Problem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Mao), 117

开门政策 Open door policy, 263

“松潘战役计划” “Operation of the Songpan Battle,” 148

“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的初步决议” “Outline Resolutions of the Enlarged Politburo Conference Concerning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Drawn from Smashing the Fifth Suppression Campaign”, 113, 115, 117, 122

P

潘汉年 Pan Hannian, 237, 238

潘中汝 Pan Zhongru, 19

党中央 Party Center, 40; 在博古的领导下 under Bo Gu, 68, 71, 72, 75—76, 132, 256, 281 (n21);

控制 control of, 32—33, 207—209; 鄂豫皖苏维埃 Eyuwan Soviet and, 171, 172; 江西苏维埃 Jiangxi Soviet and, 132; 在李立三的领导下 under Li Lisan, 33, 35, 37, 39, 253; 毛泽东 Mao and, 30—31, 36—39, 75; 陕西运动 Shaanxi campaigns and, 182; 四川运动 Sichuan campaign and, 137, 140; 移交 transfer of, 47—51; 张国焘 Zhang Guotao and, 59, 131, 137, 141—143, 148—149, 151—153, 157—159, 160, 164—165, 172, 192—193, 207, 208, 209—210, 299 (n10), 303 (n29), 304 (n41); 周恩来 Zhou Enlai and, 65—66 (见中国共产党) 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米夫 Pavel Mif, 49

农民运动 Peasant movement, 13, 17—20, 23

农民革命军 Peasant Revolutionary Army, 18

农民自卫队 “Peasant self-defense brigades,” 27

彭德怀 Peng Dehuai, 20, 21, 28—29, 30, 33, 35, 38, 41, 63, 64, 74, 75, 81, 94, 102 (表格), 104, 106, 109 (表格), 111, 118, 127, 128, 144, 146, 148, 149, 150 (表格), 151, 154, 165, 166, 168 (表格), 181, 183, 187—189, 210, 215, 217, 218, 220, 228, 230, 244, 246 (表格), 248

彭公达 Peng Gongda, 26

彭湃 Peng Pai,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307 (table)

人民生产党 People's Productive Party, 73—74,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61—268

福建人民共和国 (见福建事变) People's Republic of Fujian, 73—74, 74. See also Fujian Revolt

菲律宾 Philippines, 269 (n1)

平江起义 Pingjiang Uprising, 20

平型关战役 Pingxing Pass Battle, 248, 306 (n88)

人民解放军 PLA. Se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Plan of Going South for Political Security,” 192

博古 Po Ku. See Bo Gu

波兰 Poland, 265

政治局 Politburo, 77 (表格), 111—112, 143—146, 147, 153, 160—161, 207

“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活力”(德田) Political Dynamics of Maoism (Toku-da), 9

政治路线 Political line, 114

中共政治 Politics CCP and, 6—7; 定义 defined, 258—261; 建国以后 in PRC, 262—264

“全川苏维埃筹备会议” “Preparatory Congress of the All Sichuan Soviet,” 195—196

“田赋预征制” “Pretaxation system,” 130

肃清运动 Purification Campaign, 14

Q

卡扎菲 Qaddafi, Moammar, 269 (nl)

秦邦宪 (见博古), Qin Bangxian. See Bo Gu

瞿秋白 Qu Qiubai, 34

R

罗纳德·里根 Reagan, Ronald, 269 (nl)

整风运动 Rectification Movement, 9, 114

红军 Red Army, 89, 240; 分裂 division of, 153—154; 建立 establishment of, 17; 领导 leadership, 102 (表格), 148—149, 150 (表格); 西北军事委员会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Northwest, 178; 力量 strength of, 34—35; 结构 structure of, 165—166; 策略 tactics, 26; 三个基本关系 “three basic relations,” 22; 统一 unification of, 191—218, 219; 见中央红军、长征 See also Central Red Army; Long March; 围剿 Suppression campaigns

“我与红军”(龚楚) “The Red Army and I”, (Gong), 8, 94

红色中华 Red China, 8, 78,

红旗 Red Flags Fluttering, 8

红星 Red Star, 8

- 任弼时 Ren Bishi 48, 49, 50, 62, 63, 64, 77 (表格), 89, 90, 91
(表格), 92, 93, 103, 106, 119, 196, 198—206, 211, 212, 213,
214 (表格), 215, 217, 218, 228, 235, 246 (表格), 248, 254
- “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Party's Tasks,” 183—185
- “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
mittee on the Military Strategic Problems,” 183, 185
- 两河口会议的决议 Resolution of the Lianghekou Conference, 145—146
- 沙窝会议的决议 Resolution of the Shawo Conference, 152
- “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决议” “Resolution on Summing up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Enemy's Fifth Suppression” 113
- “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s on Several Historical Prob-
lems,” 9
- 革命的定义 Revolution defined, 258—261; 世界范围 worldwide, 264—
268
- “革命和战争”, Revolution and War, 94
- 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Northwest,
181
- 罗马尼亚 Romania, 268
- 约翰·卢 Rue, John, 8, 97

S

-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Harrison, 2, 193
- 本杰明·史华慈 Schwartz, Benjamin, 5, 6, 11, 33
- 红二军团 2nd Army Corps, 106, 125, 196, 198—206, 209, 211—213,
217
- 红二方面军 Second Front Army, 189, 190, 212—213, 214 (表格),
215—217, 228, 229, 235
-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77—79, 112
- 第二次苏维埃会议 (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Second Soviet Con-
gress. Se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 毛泽东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78, 114

- 红七军团 (见抗日) 7th Army Corps. See Anti-Japanese Vanguard Brigade
- 红七军 7th Red Army, 19, 20, 254, 274 (n29), 287 (n56)
- 陕西战役 Shaanxi campaign, 169—170, 174—109, 196
- 陕甘支队 Shaanxi Gansu Branch Brigade, 166, 167, 168 (table), 170
- 陕西苏维埃 Shaanxi Soviet, 162—190, 240, 245
- 陕西起义 Shaanxi Uprisings, 20
- 山城堡战役 Shanchengbao Battle, 217—218, 223
- 上官云相 Shangguan Yunxiang, 45
- 四一二事变 Shanghai Coup, 14, 253
- 邵力子 Shao Lizi, 178
- 邵世平 Shao Shiping, 18
- 沙窝会议 Shawo Conference, 8, 151—153, 154
- 沈泽民 Shen Zemin, 48, 51, 58, 59, 171, 172
- 盛岳 (盛忠亮) Sheng Yueh. See Sheng Zhongliang
- 盛忠亮 Sheng Zhongliang, 50, 96, 284 (n88)
- 舒玉章 Shu Yuzhang, 134
- 四川省 Sichuan Province; Chiang policy toward, 134, 136, 146—147, 195; 军阀 warlords in, 290 (表格)
- 四川苏维埃 Sichuan Soviet, 130—134, 136—137, 143, 151, 161
-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毛泽东)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A (Mao), 8, 37
- 中日战争 Sino-Japanese War, 4, 5, 88, 130, 172, 242—251, 254, 255, 257, 287—288 (n56), 306—307 (n89), 307 (n90), 310 (n21); 第六军团 6th Army Corps, 89—93, 103, 106—107, 125, 196, 198—206, 109, 211—213, 217; 第六路红军 Sixth Red Army, 19
- 马林 Sneevliet, Henricus, 14
- 宋黎 Song Li, 223
- 宋庆龄 Song Qingling, 238
- 宋子文 Song Ziwen, 238, 239, 241
- 文献资料 Sources, 7—11
- 陕南战役 Southern Shaanxi Campaign, 137, 140
- 苏联集团 Soviet Bloc, 265—266, 268
- 苏联运动 VSoviet movement, 17—26, 78—79, 131—132, 290 (n9)

- 苏联 Soviet Union, 1, 12—39, 78, 141, 165, 166, 168, 169, 176, 185, 186, 190, 224—225, 229, 232, 235, 237, 249, 250, 257, 261, 264, 265, 266, 267—268, 269 (n1), 308 (n5), 309—310 (n21), 310 (n22, n23)
- 约瑟夫·斯大林 Stalin, Joseph, 15, 32, 52, 131, 224, 257, 264
- 斗争 Struggle, 8
- 粟裕 Su Yu, 84, 86 (表格), 87, 88
- 孙科 Sun Ke, 238
- 孙连仲 Sun Lianzhong, 43
- 孙维 Sun Wei, 203, 204
- 孙蔚如 Sun Weiru, 137
- 孙中山 Sun Yat sen, 13
- 孙玉青 Sun Yuqing, 135 (表格), 150 (表格)
- 宋哲元 Sung Cheyuan, 305 (n71)
- 围剿 Suppression campaigns, 9, 28, 41—46, 120, 253—254, 287 (n56); 第五次 fifth, 68—69, 115—119, 254, 255; 第四次 fourth, 3, 54—67, 116—117, 120, 254; 第二次 (陕西) second Shanxi, 178; 第三次 third, 52—53, 116
- 斯瓦洛普 Swarup, Shanti, 5

T

- 台儿庄战役 Tai'erzhuang Battle, 306 (n88)
- 太湖战役 Taihu Battle, 171—172
- 谭道源 Tan Daoyuan, 42
- 谭震林 Tan Zhenlin, 72, 280 (n20)
- 唐祥芬 Tang Xiangfeng, 217
- 塘沽协定 Tanggu Agreement, 69
- “入川十大纲领” “Ten Point Program for Entering of Sichuan, A.” See “Three Covenants”
- “抗日救国十大原则” “Ten Principles of Resisting the Japanese and Rescuing the Nation,” 244
- 邓发 Teng Fa, 8; 10th Red Army, 274 (n29), 287 (n56)
- 片冈哲矢 Tetseya Kitaoka, 17

红三军团 3rd Army Corps, 64, 80, 95, 101, 103, 104, 112, 118, 119, 160, 162, 163, 164, 191, 235, 295 (n5);

红三军 3rd Red Army, 19, 35, 60—63, 116—117, 274 (n29); 红三十军 30th Red Army, 156, 164, 192, 230; 红三十一军 31st Red Army, 192, 230; 红三十二军 32nd Red Army, 207, 211; 红三十三军 33rd Red Army, 192

“约法三章”(张国焘) “Three Covenants” (Zhang Guotao), 131

三人小组 “Three Man Group,” 96, 112, 123, 149

田颂尧 Tian Songyao, 131, 132, 133, 134, 136, 146, 290 (表格)

天全战役 Tianquan Battle, 197

德田教之 Tokuda, Noriyuki, 9

涂振农 Tu Zhenrong, 86 (表格)

团村洵口战役 Tuancun and Xunkou Battles, 118; 红二十五军 25th Red Army, 162, 170—175, 179, 180, 235, 298 (n82); 红二十六军 26th Red Army, 170—171, 179, 298 (n82); 红二十八军 28th Red Army, 171

两条路线斗争 “Two-line struggle,” 29

U

统一 Unification, 13

统一战线政策 United front policy, 183—186, 190, 207—208, 221, 224, 239, 249, 266

美国 United States, 238—239, 250, 257, 265, 268, 308 (n5)

V

冯·法尔肯豪森 Von Falkenhausen, Alexander, 70

冯·赛克特 Von Seeckt, Hans, 70

W

多利克·沃勒 Waller, Derek, 7, 79

万涛 Wan Tao, 61

王稼祥 Wang Chia hsiang, 9

王凤 Wang Feng, 187

- 王宏坤 Wang Hongkun, 135 (表格)
- 王家烈 Wang Jialie, 107, 111, 124
- 王建安 Wang Jian'an, 150 (表格)
- 王稼祥 Wang Jiaxiang, 48, 49, 63, 65, 77 (表格), 84, 99, 102 (表格), 104, 109 (表格), 111, 144, 159, 166, 168 (表格), 182, 188, 271 (n24), 305 (n76)
- 汪精卫 Wang Jingwei, 306 (n89)
- 王金钰 Wang Jinyu, 43
- 王均 Wang Jun, 229, 230
- 王陵基 VWang Lingji, 60, 136
- 王明 Wang Ming, 48, 51, 52, 77 (表格), 186, 193, 209, 210, 237, 248—249, 288 (n65), 306 (n84)
- 王如痴 Wang Ruchi, 87, 88
- 王世英 Wang Shiyang, 187, 238
- 王树声 Wang Shusheng, 19, 135, 234
- 王维舟 Wang Weizhou, 135 (表格)
- 王耀武 Wang Yaowu, 87—88
- 王以哲 Wang Yizhe, 179, 181, 187, 223
- 王震 Wang Zhen, 91 (表格), 212
- 王佐 Wang Zuo, 17, 27, 28
- 军阀 Warlords, 12, 15; 在陕西省 in Shanxi Province, 177; 在四川省 in Sichuan Province, 130, 133, 136—137
- 瓦窑堡会议 Wayaobao Conference, 182—186, 190
- 卫立煌 Wei Lihuang, 55
- 西征 Western Expedition, 189—190. See also Long March
- 西征军 Western Expeditionary Army, 215
- 西北野战军 “Western Field Arm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d Army,” 189
- 西路军 Western Routh Army, 232—234, 236—237, 240, 255
- 西北工人委员会 Work Committee of the Northwest, 178
- 工农军 Worker and Peasant Army, 27
- 工人运动 Workers movement, 13, 18
-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265—266

- 吴广杰 Wu Guangjie, 19
 吴焕先 Wu Huanxian, 171, 172, 173, 175
 吴佩孚 Wu Peifu, 15
 吴奇伟 Wu Qiwei, 126, 196
 吴天威 Wu Tien-wei, 120
 伍修权 Wu Xiuquan, 110

X

- 夏曦 Xia Xi, 48, 59, 61, 62, 63, 199—200
 西安事变 Xi'an incident, 220—228, 233, 236, 238—239
 湘江战役 Xiang River Battle, 104—105, 286 (n16, n17)
 项英 Xiang Ying, 32, 49—50, 63, 64, 79, 96, 101, 282 (n40)
 向忠发 Xiang Zhongfa, 32—33, 47, 48
 苏维埃 Xiangchuanquan Soviet, 62
 湘西苏维埃 Xiangxi Soviet, 20, 40, 46, 56, 59—63, 66, 67, 117
 萧劲光 Xiao Jinguang, 72, 246 (表格), 280 (n20)
 萧克 Xiao Ke, 91 (表格), 92, 103, 198, 209, 211, 212, 214 (表格), 246 (表格)
 萧之楚 Xiao Zhichu, 57
 谢彬 Xie Bin, 201
 谢慕韩 Xie Muhan, 42
 谢唯峻 Xie Weijun, 72
 谢子长 Xie Zichang, 20, 177—178
 新井 Xinjing Battle, 196
 熊国炳 Xiong Guobing, 135
 徐宝珊 Xu Baoshan, 171, 172, 173
 徐锡根 Xu Xigen, 48
 徐海东 Xu Haidong, 162, 171, 172, 173—174, 175, 179, 180—181, 296 (n27)
 徐铭鸿 Xu Ming hong, 75
 许继盛 Xu Jisheng, 54
 许世友 Xu Shiyou, 150 (表格)
 徐庭瑤 Xu Tingyao, 55, 156

- 徐向前 Xu Xiangqian, 19, 46, 52, 55, 60, 63, 134, 135 (表格),
140, 141, 143, 144, 146, 148, 149, 150 (表格), 151, 153 (表
格), 154, 155, 156, 158—159, 160, 163, 191, 193, 201, 210,
212, 214 (表格), 215, 230, 231, 232, 233, 234, 246 (表格)
- 薛岳 Xue Yue, 2, 89, 103, 104, 196, 197, 111, 124, 138, 147,
156, 173, 193, 196—197, 213, 216
- 寻淮洲 Xun Huaizhou, 84, 85, 86 (表格), 86—87, 89, 119, 287
(n56)

Y

- 晏道刚 Yan Daogang, 105
- 晏福生 Yan Fusheng, 217
- 阎锡山 Yan Xishan, 13, 35, 40, 41, 179, 187, 188, 238, 247
- 杨得志 Yang Dezhi, 218
- 杨国栋 Yang Guodong, 20
- 杨虎城 Yang Hucheng, 57, 58, 133, 169, 174, 176, 177, 178, 186,
187, 190, 221, 222—223, 224, 226—227, 233, 239
- 杨克明 Yang Keming, 135 (表格), 233
- 杨森 Yang Sen, 134, 346, 156, 290 (表格)
- 杨尚昆 Yang Shangkun, 102 (表格), 109 (表格), 144, 159 (表格),
154, 182
- 叶剑英 Ye Jianying, 8, 9, 48—49, 102 (表格), 153 (表格), 159,
166, 168 (表格), 240, 246 (表格), 271 (n24)
- 叶挺 Ye Ting, 254, 272 (n13)
- 叶剑英 Yeh Chien-ying. see Ye Jianying 217
- 尤国才 You Guocai, 203
- 苏维埃 Youjiang Soviet, 20, 40
- 少帅 (见张学良) Young Marshall. see Zhang Xueliang
- 余笃三 Yu Dusan, 52, 54
- 余天云 Yu Tianyun, 135 (表格), 150 (表格)
- 于学忠 Yu Xuezhong, 156, 163, 169, 178, 233
- 于右任 Yu Youren, 238, 241
- 俞作榆 Yu Zuoyu, 20

袁世凯 Yuan Shikai, 284 (n95)

袁文才 Yuan Wencai, 17, 27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266, 267

Z

曾洪易 Zeng Hongyi, 84, 85

曾日三 Zeng Risan, 150 (表格)

曾养甫 Zeng Yangfu, 237, 238

曾中生 Zeng Zhongsheng, 51, 52—53, 54, 57, 59, 134, 152—153

詹开芳 Zhan Kaifang, 135 (表格), 150 (表格)

张冲 Zhang Chong, 237, 240

张鼎成 Zhang Dingcheng, 28

张广才 Zhang Guangcai, 150 (表格)

张国焘 Zhang Guotao, 3, 48, 51—52, 53, 55, 56, 57, 58, 60, 63, 64, 77 (表格), 131—132, 134, 135 (表格), 140, 151, 156, 163, 168, 174, 192, 202, 212, 214 (表格), 218, 231, 232, 254, 292 (n45); 毛泽东 Mao, 129, 130, 141, 142, 143, 146, 138, 152, 154, 159—160, 161, 164, 167, 190, 191, 193, 195—196, 207—208, 210, 228—229, 230, 234—236, 299 (n2); 军事战略 military strategy, 144—145, 146, 157c159, 161, 166, 194—195, 198, 202, 205, 212—218, 229—230, 255, 293—294 (n83), 294 (n94), 294—295 (n95); 党中央 Party Center, 59, 131, 137, 141—143, 148—149, 151—153, 157—159, 160, 164—165, 172, 192—193, 207, 208, 209—210, 299 (n10), 303 (n29), 304 (n41); 政治局 Politburo, 143—146, 147, 153, 160—161, 207; 政治策略 political tactics, 192, 197, 205, 208—210; 政治思想 plitical thought, 190; 权力 power of 134, 149, 150 (表格), 153 (表格); 四川运动 Sichuan campaign and , 137—138, 140; 分裂 split by, 207—209

张浩 Zhang Hao, 182, 183, 207, 210, 215, 218, 233, 235, 246 (表格)

张辉瓒 Zhang Huizan, 42

张秋琴 Zhang Qiuqin, 57, 59

张闻天 Zhang Wentian, 48, 71, 72, 74, 76, 77 (表格), 79, 81, 94,

96, 97, 99, 104, 109 (表格), 111, 112, 113, 114, 125, 127, 144, 145, 148, 151, 154, 159, 164, 181, 182, 192, 207, 208, 284 (n91)

张继 Zhang Xi, 241 (原文拼音有误, 应为 Zhang Ji——译者)

张学良 Zhang Xueliang, 13, 178—179, 186, 187, 189, 190, 196, 221, 222—223, 224—227, 233, 235, 238, 239

张云逸 Zhang Yunyi, 20, 254

张振汉 Zhang Zhenhan, 201

张正坤 Zhang Zhenkun, 203

张之洞 Zhang Zhidong, 6

长征日记 Zhang ziyi's Diary on the Long March, 213—214

漳县会议 Zhangxian Conference, 216

赵观涛 Zhao Guantao, 70

郑位三 Zheng Weisan, 172

直罗镇战役 Zh Luozhen Battle, 182

周夫人 (邓颖超) Zhou (Madame), 111

周纯全 Zhou Chunquan, 135 (表格)

周恩来 Zhou Enlai, 8, 14, 32—33, 34, 36, 37, 48, 49, 50, 55, 63, 64, 74, 75, 77 (表格), 79, 80, 81, 82, 101, 102, 112, 141, 142, 144, 149, 151, 154, 159, 164, 166, 181, 182, 187, 188, 192, 202, 208, 218, 230, 234, 248, 262, 288 (n65); 与国民党的关系 KMT relations, 240—241, 242; 长征 Long March, 106, 122; 毛泽东 Mao, 93, 99, 271 (n24); 军事策略 military strategy, 94—95, 105, 196, 121, 145—146; 南昌起义 Nanchang Uprising, 272 (n13); 党中央 Party Center, 65—66; 西安事变 Xi'an incident, 221, 222, 224, 225—226, 238, 239

遵义会议 Zunyi Conference and, 199 (表格), 110, 111, 114, 123—124

周浑元 Zhou Hunyuan, 104, 106, 126, 127, 196

周昆 Zhou Kun, 102 (表格), 246 (表格)

周士第 Zhou Shidi, 246 (表格), 272 (n13)

周小舟 Zhou Xiaozhou, 238

周逸群 Zhou Yiqun, 19, 25

周以粟 Zhou Yisu, 49

- 朱德 Zhu De, 9, 20, 30, 63, 74, 79, 84, 104, 111, 127, 141, 142, 143, 144, 148, 149, 151, 154, 156, 163, 164, 165, 191, 192, 202, 211, 212, 216, 219, 228, 230, 238, 248, 272 (n13); 权威 authority of, 55, 64, 65, 75, 77, 81, 102 (表格), 109 (表格), 112, 123, 124, 150 (table), 153 (表格), 181, 193, 210, 214 (表格), 218, 246 (表格); 毛泽东 Mao, 17, 274 (n37), 299 (n2); 军事表现 military performance, 27, 36, 215
- 朱光 Zhu Guang, 134
- 朱理治 Zhu Lizhi, 179, 181, 297 (n58)
- 朱绍良 Zhu Shaoliang, 147, 156, 163, 169, 178
- 卓木堡会议 Zhuomubao Conference, 192—193, 210
- 遵义会议 Zunyi Conference, 8, 107—128, 160, 163—164, 200, 271 (n24), 286 (n33), 287 (n44)
- 军事路线/政治路线 military, vs. political line, 113—115
- 进攻路线/防御路线 offensive, vs. defensive line, 119—121, 124
- 左权 Zuo Quan, 218
- 左江苏维埃 Zuojiang Soviet, 20, 40

译后记

本书作者杨炳章，英文名本杰明·杨，是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研究，著述颇丰。《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是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担任研究员期间，研究中国红军长征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崛起的一部学术专著。

该书英文版于1990年在美国出版，引起中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广泛引用。国内党史学界人士在介绍西方汉学界对红军长征史的研究状况时曾经指出：“自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后，陆续问世了一些纪实性长征专著……遗憾的是，在很长时期内没有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直到1990年出版了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才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正是基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国外同类著作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我们在此将其翻译并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和学人。（为便于读者了解国外的有关研著状况，我们特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萧军同志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一文附于书后。）

作为一部海外学者研究长征和毛泽东的学术著作，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作者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架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考察了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共产主义逐步政治化的过程。作者的这种研究视角，对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作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资料查阅和个人访谈，使用了大

量的国内外档案文献和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涉及面很广，而且基本真实可信（但个别史实也可能有误）。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十分丰富，因而纠正了一些以往研究著作中的失实或偏差，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第三，作者在本书中，不仅详述了长征的过程，而且着重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政治策略的转变，并肯定了毛泽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毛泽东的评价更为客观和公允，对历史的把握也更为深刻和全面。

第四，作者还就一些具体历史问题（如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关系、长征的起止时间、革命和政治的定义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这些新颖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也颇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所使用的方法与我们不同，所处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书中的有些观点与我们的传统观点不尽一致。但这正是本书的特色之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对待。

本书的最初译稿是五六年前完成的，当时参与翻译的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几位研究生。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郭伟统一翻译、校对、定稿。

由于原书所引用的中外文献资料浩繁，所涉及的人名、地名甚多，很难予以逐一核对，也由于译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其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5年12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5929号

ISBN 978-7-300-17637-6



定价：72.00元